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ISSN 2096-5710
CN 44-1739/G2

文博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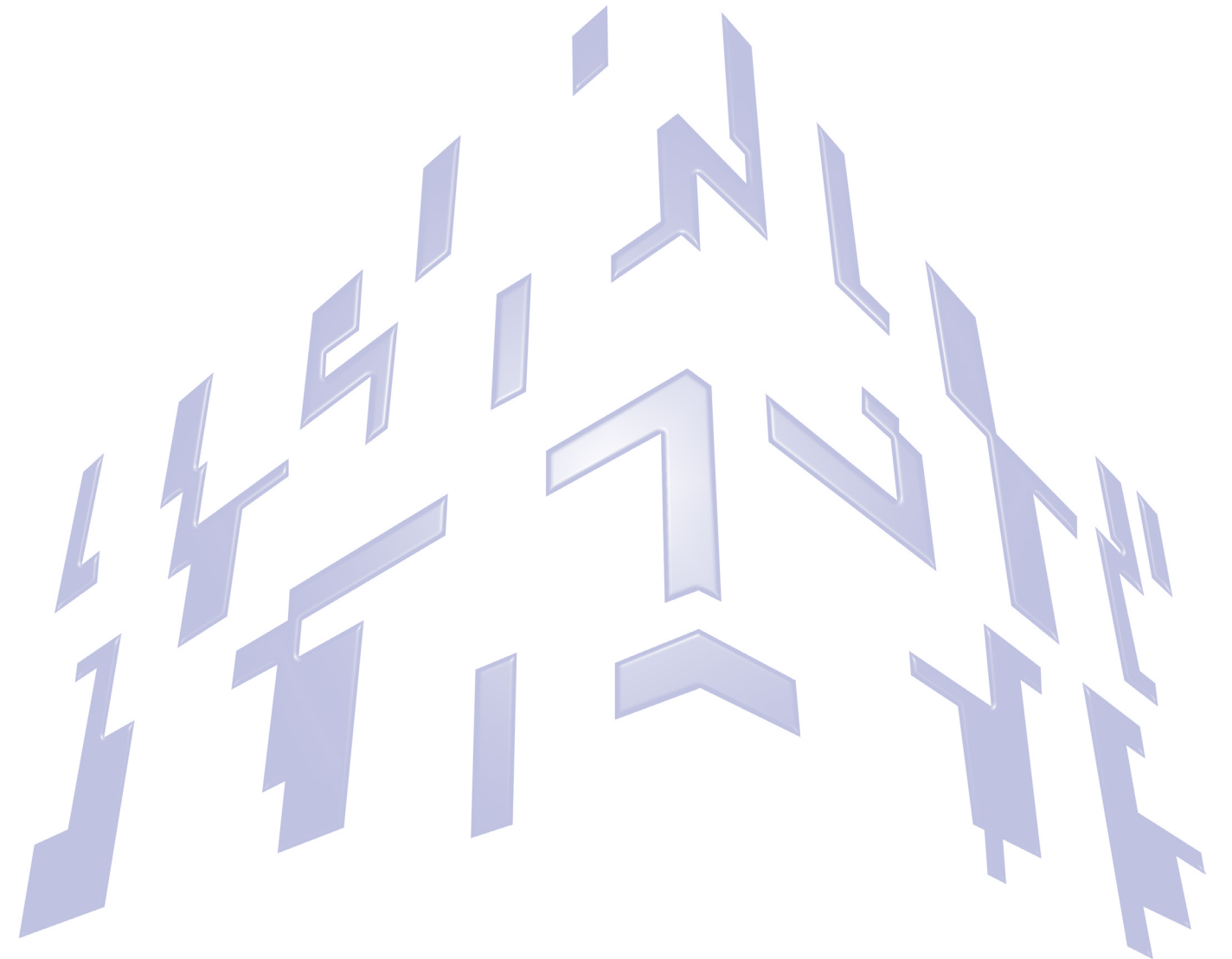
2024年 第1期

双月刊 总第25期

文博学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二〇二四年 第一期 双月刊 总第二十五期



ISSN 2096-5710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571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1739/G2

定价: RMB 48.00元

稿约

《文博学报》(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1739/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5710, 由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化馆共同主办。本刊以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提升文博学术研究水平为宗旨, 以活跃学术研究, 推动文博事业创新发展为目的。主要刊登考古学、博物馆学、藏品研究、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栏目包括: 考古前沿、博物馆人、博物新知、文物天地、遗产世界、青年论坛等。

1. 本刊只刊载首发作品, 谢绝一稿多投。

2. 本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 鼓励利用新资料、新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3. 来稿请提供作者信息, 包括姓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电子邮箱, 并注意不要在文章中出现能使审稿人直接判断作者身份的提法。文章如获得基金项目资助, 请注明基金项目及编号。

4. 来稿务请遵循学术规范, 遵守国家有关著作权、文字、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法律和技术规范以及本刊相关规定。

5. 稿件正文为五号宋体, 字数以 8000~10000 字为宜。摘要 300 字左右, 关键词 3~5 个, 并提供对应的英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注释采用脚注, 每页重新编号, 文章的注释内容依次为: 作者、书名、卷册、出版者、出版年份、页码; 期刊的注释内容依次为: 作者、文章名、期刊名、年份、期数; 图片请提供 600dpi 以上的清晰大图; 图、表请注明名称、来源。

6. 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 本刊有权对来稿进行必要的文字处理。

7. 来稿一经采用, 即通知作者。自投稿之日算起, 3 个月内未接到用稿通知, 可另投他刊。稿件请寄编辑部, 勿寄个人。来稿恕不退回, 请自留底稿。

8. 稿件一经刊发即付稿酬。同时本刊有权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 在网络媒体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已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

9. 本刊电子邮箱 WBXK0228@126.com。纸质稿请寄: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2 号《文博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 510623, 电话: 020-38046882。若已投递电子稿件, 则无需邮寄纸质稿。

《文博学报》编辑部

文博学刊

2024年 第1期

双月刊 总第25期

《文博学刊》编委会

主任委员：肖海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绍强 刘成基 刘昭瑞 刘晓春 许永杰
李庆新 肖海明 吴昌稳 沈辰（加拿大）
宋向光 陈邵峰 杭侃 姜波 曹劲
蓝海红 谭美儿（中国香港） 潘路

主 编：肖海明

副主编：阮华端 蓝海红 陈邵峰 吴昌稳

编辑部主任：吴昌稳（兼）

本期执行编辑：张红艳

编 辑：吴昌稳 兰维 陈曦 张红艳
肖羽彤

声明：

凡向本编辑部投稿，即视为授权本刊及本刊编辑部网站、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等期刊数据库出版，所付稿酬包含网络出版稿酬。本刊文责自负，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

主 管：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 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
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

出版单位：广东省博物馆《文博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0-38046882

传 真：020-38046800

电子邮箱：WBXK0228@126.com

网 址：www.gdmuseum.com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2号

邮政编码：510623

设 计：王序设计

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年2月29日

创刊日期：2018年3月30日

邮发代号：46-600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571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4-1739/G2

2024年第1期（总第25期）

卷首语

2018年2月,《文博学刊》诞生于生机勃勃的广州,它的出现填补了华南地区长期没有文博类期刊的空白。2024年2月,《文博学刊》从季刊变为双月刊与读者、作者和关心杂志发展的朋友们见面,增强服务文博学术研究的力度。

新时代,中国文博事业显示出高速、高效和高质量发展态势,文博机构和人员数量高速增长,文博工作高效展开,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厕身其间,《文博学刊》主动嵌入行业和事业发展大局,坚持做好学术研究的组织、学术成果的发表以及学科理论与行业实践的呈现工作。此次调整刊期,加密出版频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立足时代之需,服务发展大局。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自信植根于文明的长度、深度和广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博研究是深入阐释、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抓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考古与博物馆机构作为探索与展示中华文明的前沿,在学术研究方面肩负重要使命。对此,《文博学刊》责无旁贷,要深度聚焦文化自信建设,做好中华文明和华夏文化的阐释阐发工作。

第二,立足行业需要,服务事业发展。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事业发展有了更强的底气,文博行业发展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势头。一方面,文博机构人员编制不断增加,展览展示场所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不断走向深入。此外,考古学和博物馆学双双成为一级学科,发展后劲很足,学术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文博学刊》要“预流”,刊发中国文博事业奋勇创新的新成果,努力服务广大文博学人,让研究成果更快地惠及整个行业。

第三,推动学术进步,提升学科成熟度。文博行业的发展历史较短,学术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亟待提升。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在行业和学科发展过程中,新思维、新思想和跨学科理论之间的碰撞将会十分热烈,行业发展样貌千姿百态,各种学说和实践层出不穷。学术杂志应该为相关实践、观念和理论提供阐释平台,从而探索行业边界,廓清学术迷思。《文博学刊》将以此为工作重心,秉持学术追求,强调守正创新,呈现文博研究的当代肌理和群像,助力文博学科专业性和成熟度的提升。

变更刊期,以更加频密的出刊周期服务文博行业发展,不是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而是我们对中国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作为。学术研究是一项长期事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文博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有学术属性,又有行业属性,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因此,期刊要兼收并蓄,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更加“科学”,更加“以人为本”。当前,文博学术杂志数量尚少,而全国有近20万专业技术人员和大量喜爱文化、文博的人群,文博类杂志的担子很重,需要勇毅前行。《文博学刊》要像破土的新苗一样,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日日新,又日新。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在万象更新的2024年春天,《文博学刊》期待与文博同仁携手同行,跨越山海,让文博事业开出繁花一片,结出硕果满园。

主编: 

目录

2024年第1期 总第25期

卷首语肖海明(2)

◎特稿

浅议岭南地区的中国化进程.....赵辉(4)

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历史回溯与当下思考.....安来顺(10)

当代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潘守永(15)

◎考古前沿

广东高明古椰遗址新石器时代植物遗存初步分析

.....李昭 李岩 马永超 马志坤 李泉 刘长江 崔勇 杨晓燕(26)

珠江口西岸史前渔业初探.....余翀 李梓杰(35)

从汉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看农牧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史浩成(44)

◎博物新知

集体记忆在考古成果展中的运用.....朱琳 黄洋(58)

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实践研究.....刘欣(66)

◎文物天地

滇中地区的青铜剑研究.....戴铖(74)

北朝石葬具的类型与来源研究.....王涛(85)

佛山经堂铁塔文物研究.....许晓静(95)

◎遗产世界

将“社区”问题化：重思遗产研究中的社区议题.....赵慧君(104)

整体保护利用视角下革命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价值评估研究.....江梓君(111)

◎青年论坛

“接触”视角下云策展大赛的知识生产.....张书良(121)

观众视角下地方史展览中重要信息点的策划.....林禹岑(128)

浅议岭南地区的中国化进程^{*}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 岭南文化是具有很强特殊性、独立性的一元, 但在之后的发展演进中, 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一步步融入一体化进程之中。开展岭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国化”进程的研究, 其范围应包括两广和福建, 这也应该成为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就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岭南而言, 区域内的文化在内容上有相似性, 在进程上有同步性, 从福建到广西存在一个位于岭北农业文化区外缘的半环形文化带。在大多数时间里, 岭南地区的文化显得消极、被动, 更多是受岭北农业文化区的影响, 接受多, 反馈少。岭南文化进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占据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此时岭南仍处于采集经济阶段, 没有谷物农业。但是, 本土文化强势崛起, 南北文化交流空前活跃, 文化关系变得复杂, 且不再是来自岭北的单方向传播。其中, 最早出现于横岭类型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意味着岭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别于中原社会的途径。第二阶段是商周时期, 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乃至思想对岭南的全方位渗透, 为岭南地区早期文化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秦汉时期, 汉文化逐渐显露出取代土著文化的势头。

关键词: 岭南 中国化 半环形文化带 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

中图分类号: K8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 (2024) 01-0004-06

这两年里, 我有好几次机会来广东、福建, 这次又来到了广西柳州。这两年里, 我也多多少少地参与设计了岭南的同志们正在筹划的“考古中国”项目, 既接触了岭南地区最新的考古材料, 又在包括今天会议在内的多个场合与各位的当面交流中不断得到启发, 加上在参与“考古中国”项目设计时的一些思考, 自我感觉想通了一些事情, 愿借今天这个场合把我对岭南考古的几点理解和认识讲出来, 与大家交流。

一、立足岭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国化”进程研究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暨甌皮岩遗址发掘 50 周年”, 但我个人在谈岭南地区的时候, 总是注意避免使用“文明化”一词。要说清楚背后的原因, 需先从“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说起。这两个词在一些场合意思是相同的,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有区别。在本应该仔细区分的场合混用, 就会引起误解和混乱。例如, 在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研究中, 就有把两者混为一谈的情况。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是大约 40 年前由夏鼐先生、

* 本文根据 2023 年 11 月 16 日笔者在广西关林“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暨甌皮岩遗址发掘 50 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改定。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先生整理成文字稿, 修改过程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闻捷先生的指教, 一并感谢。

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来的。他们根据当时考古学对夏商时代国家状况的了解，尤其是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一些最新发现如大地湾、良渚、牛河梁以及龙山文化等进行评估后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或国家的形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对此，他们两位说得很明白，即所谓中国文明问题就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的起源问题以及最早的国家的问题。此后，学术界有关如何看待文明三要素等的讨论，以及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有学者说，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中国文明探源的任务。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当时无论安特生先生还是李济先生，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还是本土的，这里面没有多少关于国家这种政体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内容。也有学者主张，8000年前就有了七阶音乐，有了占卜，有了刻画符号等，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应当从这个时候开始。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向前推，推到人们发明农业，推到有巢氏、燧人氏。这些确实是人类文化一步步向上的标志，但还没有到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发生的历史节点上，所以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妥。

回到岭南考古上来。听说一些主管部门强烈希望把岭南考古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猜想，他们也许是把文化过程的研究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任务搞混淆了。前者是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如何时何地有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它受到来自何方的影响或者它影响了谁等问题。后者是社会状况、发展程度的研究，重点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问题上。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研究代表了考古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水到渠成地开启后者。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对资料的要求和研究的技术方法有非常大的差别，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以要求两步并作一步走，既做文化过程的研究，又做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但社会研究需要的是聚落考古材料，而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聚落考古在岭南开展得比较晚，相关资料的积累尚不能支撑这个课题的开展。两步并作一步，在眼下还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更何况岭南长期位于史前农业文化区的外围，自己虽然在发展，但并不是中国史前文明总进程的主要参与者。

所以，当下岭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重点不是这个地区的文明化过程，而是更基础的岭南地区文化的中国化过程。我们所说的岭南，范围很大，包括广东、广西和福建三地。这么大的地域里，各地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系列还很不完整，在建立当地的文化体系上，考古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这个文化系列或框架不建立起来，内部的各种文化关系没有梳理清楚，学问就没有继续深入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我主张文化过程的研究才是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

尽管研究岭南文化过程的资料还不完整，但已经可以从其中看出一个大趋势、大方向，即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文化曾经是具有很强特殊性、独立性的一元，但在之后的发展演进中，主要受北方的影响而一步步融入一体化进程。我主张的“中国化”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来说，我们如果把文化的动态看作其背后社会动态的表达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化过程还将是引导我们接下来深入探讨社会文明化的重要线索。

二、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岭南

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谈及南方文化时，提出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存在一个从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为轴线的南方文化区。就当时的资料看，这无疑是很合理的。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知道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南岭两侧的文化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时段所见的来自岭北方向的影响也不止赣江流域一个方向。归拢这些新资料，我们还是将岭南岭北分开

看待比较好。

岭南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两广和福建三地。两广的北面皆以南岭为界，地理范围清楚。广西在文化上向西是否与云南东部和贵州南部有联系尚不得其详，但西江是在贵州境内发源的，几乎流经了云南整个东半部，所以两广地区的文化与云贵存在关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福建地区几乎全部是山地，历年的发现被划分为内陆山区和濒海区。内陆山区内的发现分布在浦城、南平、三明一线，年代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论者都注意到它们与浙南和江西等地的文化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可以视其为岭北文化向东南方向山区的渗透，其沿海地带的文化如最近在平潭岛上发现的包括壳丘头遗址在内的一连串文化方可算作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三地文化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这是以后需要探讨的课题。但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无论如何，岭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或者说与岭北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独立的一大块，理由如下。一是在新仙女木期结束后，两地文化在新石器化方向发生了明显分歧。岭北地区开始向农业，或者更准确地说向谷物农业的方向发展，岭南则长期滞留在采集经济阶段。刚才赵志军先生在他的学术报告中重申，岭南地区很可能也有农业，因为贝肉热量太低，人类不能仅靠采集贝类为食物而存活，一定还有其他种类的食物。在甌皮岩一期地层中发现了一块炭化块根，这被看作是当时人们开发块根类植物资源的证据，即岭南极可能存在这种种植块根类植物的农业。话虽如此，我们现在就这个农业的具体形态如管理、栽培、驯化等还是所知甚少，也不知道块根作物在储存方面可否比得上谷物，能否在人们的生活中和谷物农业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无论如何，南岭两侧是不一样的。二是岭南各地文化进程的阶段性几乎同步。这一点，后面再重点讨论。

总之，岭南地区的文化在内容上有相似性，在进程上也有同步性。如此，从福建到广西，存在一条位于岭北农业文化区外缘的半环形文化带。童恩正注意到，这条文化带大致与400毫米年降水带重合，中国北部从东北到西南边地还存在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正是中国农业文化区的北部边缘。如前所述，这两个半环还很可能在云贵地区碰头并联络起来了。如此就在史前中国的文化格局中形成了围绕农业区的一个环形结构。但是必须注意到，两个半环的差别也很大。简单地说，北半环很早就开始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中。它既在某些历史时段接受陕晋冀地区文化的影响，又在另一些时段反过来向南积极扩张。例如，兴隆洼文化甚至就是农业的发明者，在磁山文化北福地类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来自兴隆洼文化的传播因素；龙山时代的石峁文化向南，齐家文化向东，其影响都深入到中原腹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也曾对整个北方文化有过重大影响。至于藏彝走廊上的文化传播流向，也是以自北而南为主。反观岭南，在与岭北的关系上，好像在大多数时间里显得消极、被动，更多是受到岭北农业文化区的影响，接受多，反馈少。这一点也在下面再仔细说。总之，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总进程中，南北两个半环的作用不同。

三、岭南文化进程中的三大阶段

岭南文化进程中材料最完整的是粤北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和广西的资料尚不完整，但与广东地区的情况对照来看，也能大体上知道当地文化的阶段性变化，且与广东基本同步。

第一阶段占据了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最后一次全球冰期结束到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之间的万余年间，岭南岭北同属一个石器工业传统并都处于采集经济阶段，这使得此后两地依然在文化的某些部分上长时间保持着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岭南各地都能见到的

绳纹圜底陶罐(釜)和彭头山文化的几乎一模一样。彭头山文化之后不久,岭北陶器群的器类变得多样起来。此时的岭南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的咸头岭文化、古椰文化中开始出现源自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影响因素,其陶器群构成也渐趋多样,只是复杂程度远远赶不上岭北。

南岭两侧文化这些隐约可见的联系尚不足以掩盖两地间巨大的或者说本质上的差别,即前文已经说到的,自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以后,岭南、岭北的文化在生业经济上就分道扬镳了。岭北地区开始向谷物农业的方向发展,经彭头山、汤家岗、大溪、屈家岭一路走下来。而在岭南,我们却始终未能找到这个阶段谷物农业随上述因素一同南下岭南的确凿证据。在另一个方向上,位于钱塘江南侧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以及河姆渡三、四层文化,也都没有任何南进武夷山地的意图。再晚一些的牛鼻山、龙头山等遗址发现了崧泽文化因素,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岭北农业文化才渗透到武夷山地的西北部,并且到此为止。总之,这个阶段的岭南仍然处于采集经济,没有谷物农业。

岭南地区出现谷物农业是拜石峡文化所赐。石峡文化因粤北韶关的石峡遗址得名,但在我看来,它并非粤北的土著文化,而是和樊城堆文化有相当密切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是赣江流域文化的南缘。赣江流域的文化越过南岭到达粤北,更远的动因也许和良渚文化晚期对江西的影响有关。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近几年广东从化横岭,黄埔茶岭、甘草岭等遗址,以及早些年发现的三水银洲一期遗存表明,石峡文化并没有驻足粤北,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也随之到了这里。在黄埔茶岭等遗址中,植物考古获得了炭化稻米,是为证明。以此为标志,岭南文化进入到第二阶段,即谷物农业开始的阶段。只是现在还不知这里的农业程度究竟如何,它是怎样立足和发展的,又是怎样推动当地文化、社会发展的,这是今后要深究的课题。

与此同时,广西地区由于这个时段的材料太少,无法讨论。东侧福建沿海地带的昙石山文化则显然受到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它的陶器群和石器工具群一改采集经济文化的单调和简单,变得复杂起来,陶器分炊爨、饮食、盛贮等器类,石器组合则与农业文化无异。这些变化至少表明农业文化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影响。

这个阶段的另一特点是本土文化的强势崛起,导致南北方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文化关系变得复杂,不再是来自岭北的单方向传播。在石峡文化阶段,珠江三角洲东侧突然出现了一个制作水平甚高的陶器群,曾被称为“涌浪类型”“虎头埔类型”等,最近李岩先生根据横岭墓地的发现将之命名为“横岭类型”。横岭类型的陶器以烧成温度高、胎色灰白、遍饰曲折纹的高领矮圈足小罐最为多见,在虎头埔还发现了烧制这类器物的专业窑场。在横岭墓地,这类高领矮圈足小罐的数量与石峡的陶器几乎是对开的,两个文化在此硬生生地对撞在一起。这类器物的分布很广,在粤北石峡、福建昙石山甚至牛鼻山、好川诸文化类型中都有发现,广西境内也有其踪迹。从这些情况看,横岭类型作为岭南本土文化,在与南下文化的关系上互有折冲,即此时的岭南不再只是北方影响的单方面受体,这是这个阶段的新现象。

横岭类型独特的器物类型、颇高的制作工艺和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乃至商品化生产,其出现在岭南,都给人非常突兀的感觉。在采集经济社会中是如何形成这样一个文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最近,在闽西山地的三明市明溪发现的南山遗址也出土了拍印纹陶器,其曲折纹、梯格纹等几乎和横岭别无二致,只是它的碳十四测年较与横岭同时的石峡文化早了一个阶段。从南山到珠江三角洲,隔着重重大山。今天的会议上,虽然付琳先生的报告分析了南山的印纹陶向东传播,与闽侯一带的昙石山文化有所关联。但南山新的发现非但没有解决横岭类型的起源,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眼下的资料看,印纹陶的起源似乎有两个中心,一个在闽西,一个在珠江三角

洲东侧，果然如此？显然还要好好研究方可。

继横岭类型之后，印纹陶在岭南大盛，先后出现了云雷纹和夔纹两个阶段，年代自夏商延续到两周。按博罗横岭山墓地发掘者吴海贵先生的看法，这套印纹硬陶的分布中心在粤东地区。最近几年的新材料表明，它的中心区范围也许更大。广东平远水口、福建浦城猫儿弄都发现了大规模的云雷纹陶窑场，广州博罗梅花墩则发现了夔纹陶时期的窑场，表明此时的印纹硬陶几乎覆盖了整个岭南，甚至越过南岭，延伸到了江西东南和浙江的南部，在湖南、贵州的南岭北麓也能觅到其踪迹。较稍早的横岭类型而言，南岭土著文化在面对北方文化时变得更加强势，更加积极进取。这个时期，岭南文化还有一大意义深远的发明创造，即原始瓷产业。泉州永春苦寨坑原始瓷窑场由至少9座初具龙窑形态的窑址组成，年代最早可能上溯到夏纪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原始瓷生产地。它的发现不仅表明原始瓷技术源自印纹硬陶，是岭南制陶业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其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原始瓷生产很快成为一个产业，如近年在浙江安吉等地都发现了生产原始瓷的专业窑址。该产业所带来的社会分工之深刻，不亚于北方青铜制造业，且产品较青铜器更加“亲民”。所以，它的生产和流通更像是一个商业化体系，而非主要服务于“祀与戎”的贵族手工业。如此一来，这套最早出现于横岭类型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就意味着岭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条新的有别于中原社会的途径。这当然也是值得下大力气深究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此时的岭南已然不再局限于岭南，而是向北把浙江的全部都纳入其中，江西也应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即历史上的越、百越。当然，既然号称“百越”，就不是一个统一体。譬如闽东的黄土仑和揭阳潮汕一带的浮滨都是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但在宏观格局上，它是相对于北方文化的一大块，并且和前一阶段被动受体的角色不同，积极参与了中国化的混一进程。

商周之世，以中原为根基的北方文化、社会、政治不断壮大。《左传·哀公》：“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1]《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2]所谓是焉。伴随着长江流域的地方社会被不断并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开始是长江流域，后来是直接来自北方中原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渗入岭南。在博罗横岭山墓地，我们发现了青铜斧，意味着先进生产力的注入；发现了青铜戈、矛、短剑、箭镞等兵器，意味着北方生产力对当地军事能力的提升；还发现了铜鼎，意味着北方制度对当地的影响。而中原制度对岭南的影响，更早可以追溯到岭南地区牙璋的出现。这些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乃至思想对岭南全方位的渗透，为岭南地区文化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第二阶段。

秦汉时期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第三阶段。秦王朝建立后，开始着手统一岭南的大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凿通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大军旋即席卷百越，于兹设岭南三郡，加上在福建设置的闽中郡，岭南地区第一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这个进程还有反复，直到汉武帝平复南越国割据政权，将岭南秦郡析三为九，设立九郡，标志岭南局势彻底稳定，中央王朝也从此开始对岭南“深耕细作”，随之而来的汉文化逐渐显露出取代土著文化的势头。

岭南地区文化的中国化进程大势大略如此，但其中的细节问题甚多，有的还颇为关键。这些问题，上文指出了一部分，实际上更多。所以我认为，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还是要先把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搞清楚一些。这是考古学的基础，关乎我们获得有关岭南地区的文化如何汇入中国历史大潮的更仔细、准确的认识，这也是深入讨论岭南各历史族群、地方社会之关系的线索。在把握这些历史动态的同时，

[1]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2270页。

[2] 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1年，第177页。

注意积累一些古代社会的资料，以便将来条件成熟，系统开展岭南地区文化背后的社会变迁研究，即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这是我的建议。

(责任编辑：吴昌稳)

Discussion o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Lingnan Region

Zhao Hui

Abstract: In the diverse and integrated landscape of Chinese culture, Lingnan culture was onc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uniqueness and independence. However, in the subsequent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t gradually became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cultural framework,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northern cul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early culture in the Lingnan region should encompass Guangdong, Guangxi, and Fujian, while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come a focus of Lingn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nowadays. In the context of Lingnan within the landscape of unity and diversity, the cul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was similar in content and synchronized in process. From Jujian to Guangxi, there existed a semi-circular cultural belt located at the outer edge of the Lingbei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zone. In most of the time, the cul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appeared to be passive and reactive, influenced more by the Lingbei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zone, with more acceptance and less feedback.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Lingna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occupied the majority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During this time, Lingnan remained in a gathering economy without grain agriculture. However, with the strong rise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unprecedentedly active exchang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es, cultural relations became complex and were no longer a one-way transmiss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The earliest appearance of the Hengling type of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system implied that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distinct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society emerged in the Lingnan region. The second stage covered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during which the culture, systems, and even thoughts from the north penetrated into Lingnan in all aspect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inicization of the Lingnan culture. The third stage wa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n the Han culture gradually showed momentum in replacing the indigenous culture.

Keywords: Lingnan, Sinicization, Semi-circular Cultural Belt,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System

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历史回溯与当下思考^{*}

安来顺

上海大学文化信息与遗产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 生态博物馆在中国落地已经二十多年, 国际博物馆领域对博物馆形态的探索从未停步。回顾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历程, 总结这批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经验, 对当前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由于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建在贵州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 其中的多歧因素对今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启发, 即在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 寻找政府与农民的最大共识,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落在实处, 取得实效。

关键词: 生态博物馆 新博物馆学 贵州 苏东海

中图分类号: G26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010-05

20世纪90年代以降, 生态博物馆或者说新博物馆学受到中国博物馆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持续关注, 热度至今不减。今天, 不少大学为文博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生态博物馆或类似课程。公允地说, 我国有关生态博物馆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 是中国博物馆学术界和博物馆行业对亚洲乃至世界博物馆领域做出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作为一名博物馆人, 我有幸在著名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的率领下, 与贵州各级文物部门、挪威数位生态博物馆研究者与管理者以及贵州当地4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热心村民一道, 直接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中国第一批4座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我与这些生态博物馆深度交集的时间从1995年5月开始至2002年10月结束。一定程度上, 我本人学术和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与这个项目密切相关。博物馆本身是一个关于记忆的机构, 记忆也是博物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 哪怕是片段式的, 也有助于学界在知既往的同时启未来。

一、为什么要在今天谈贵州的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

像许多时候一样, 一段记忆需要某种外力把它重新激活。这里有4件事需要提及。第一件事, 2021年8月的一个风雨交加之日, 我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团队负责人, 同时也是中国生态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苏东海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的逝世是中外博物馆学界的巨大损失, 而他领导的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建设是他晚年学术生涯的重要一页, 我曾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些文字和言论, 纪念我的这位学术导师。第二件事, 贵州生态博物馆项目肇始于中国和挪威两国学者的研究课题, 逐步发展成中挪两国政府间遗产领域的合作项目, 挪方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John Aage Gjestrum)

^{*} 本文根据作者2023年8月5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博物馆学研究: 知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定。

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可惜他在2001年便英年早逝，年仅48岁，而他失去生命的地点是俄罗斯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工作现场，让人唏嘘不已。贵州梭戛苗族村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地）的村民们自发为这位国际友人种下一颗中挪友谊之树。去年夏天我到贵阳出差，同事再次提及这颗松树，说它早已成材并且根深叶茂。第三件事，2023年春节前的1月6日，我收到了一封特别令我感动的邮件，邮件来自我们做贵州项目时的同事莱顿·维雅（Reidun Vea），她早已退休。那时，她是挪威文物局国际合作部门的负责人，也是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她丈夫罹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这令其产生很多关于人生的感慨。她写这封邮件是为了一件她至今难以释怀的事——二十多年前她到访梭戛生态博物馆时，苗寨妇女送她一条裙子。她说，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何时走到尽头，但强烈意识到这件东西是属于苗族人民的，希望我能让这件苗绣服装有机会重新回到苗寨。我深受感动，随后《中国日报》、新华社纷纷跟进，让我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四件事，2023年5月中旬，贵州生态博物馆项目挪方重要成员、时任挪威文物局副局长的达格·梅克勒博斯特（Dag Myklebust）的前妻发来邮件，告诉我达格于2023年5月5日去世了，享年75岁。

上述短时间内发生的看似巧合但实则自然的人与事，让我在感慨岁月和人生的同时，产生了谈谈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想法。以下，我着重谈三个方面：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时间线，后工业时代的博物馆思想如何与少数民族社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相遇，在当前乡村振兴、文旅融合背景下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和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不涉及学术界所描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因为那是一个更宽的维度。

二、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时间线

现在，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我作为亲历者，有必要阐明其主要的时间线。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落地贵州要从1994年说起。1993或1994年，苏东海先生被贵州省政府聘为“贵州民族村寨保护顾问”，生态博物馆选择在贵州民族村寨进行尝试肯定与苏东海先生的这个身份有关。1994年9月，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在北京举行学术年会，其间，生态博物馆、新博物馆学问题被反复提及，苏东海先生与国际生态博物馆领域两位重量级人物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密集对话，一位是挪威人杰斯特龙，另一位是法国人安德烈·德斯沃里斯（André Desvallées，也译作安德烈·德瓦雷）。苏东海先生与杰斯特龙一拍即合，决定在中国贵州民族村寨做一次调研并于1995年5月劳动节假期之后动身。

当时，贵州省文物局列出约10个村寨作为项目候选地点，但1995年5月为期两周的考察调研集中在4个偏远社区：一是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一处苗族村寨，当地人称他们为“长角苗”；二是位于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镇山村的布依族村寨；三是在黔东南州黎平县的堂安侗寨；四是黔东南州锦屏县的隆里村，居民为明代从内地迁来的汉族，周边都是少数民族，由于仍保留着明代以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传统，他们在当地属于“少数”民族。此次调研结果以贵州建设生态博物馆群的可行性报告的形式报贵州省政府和挪威开发合作署。

1996年，中国博物馆学会（今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会成立专门的项目组，由苏东海先生任组长，我担任项目协调人兼翻译。这个项目得到各个层面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关注。1997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和哈拉尔五世的共同见证下，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和挪威驻华大使签署合作协议，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作为中国

和挪威的文化交流项目正式启动。

1998年，梭戛生态博物馆（苗族）正式对外开放，这是贵州也是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这个生态博物馆建在当时有4900多人的苗族村寨中，他们因习惯用长长的牛角状装饰物而被称为“长角苗”。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以生态博物馆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作为生态博物馆，我们希望有一个留存记录或记忆的实体场所——资料信息中心，来记录他们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环境。村民中的能工巧匠用传统技艺建造了资料信息中心。我们希望这个中心能够真正属于他们自己，所以开幕式是由苗族村寨代表来组织的。我们作为“外来”的专家学者，主要在技术上帮助村民记录他们的历史，包括从族谱开始的各种记录。我们认为，理想状态的生态博物馆是专家给予村寨技术上的支持，比如怎么做采访，而不是直接干预他们收集和整理自己的文化。我非常关注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后，特别是运行数年后的情况。2006年我回到那里，见到了那些曾经合作的村民，感受到他们对生态博物馆的感情。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太多机会再去了。2021年，在贵州省博物馆我看到一位非常有心的摄影师跟踪拍摄梭戛生态博物馆10年，拍下了大量影视作品，让我间接感受到它的近况。尤其是，照片中的孩子们让我感动，我特别希望这个生态博物馆能够对他们文化的未来有所帮助，对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有所帮助。

2000年，中挪生态博物馆研讨班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来自中挪双方的文物管理者、博物馆研究者和4个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村民代表参加了研讨。贵州省政府领导与挪威文物局、中挪项目团队、村寨居民代表和挪威生态博物馆的社区代表，从管理、学术、运行等不同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六枝原则》。由于梭戛属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所以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所在地的“六枝”被用于该文件的标题。

2001年，第二座生态博物馆——镇山生态博物馆（布依族）对外开放。这个布依族村寨的自然生态、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历史遗存甚至以青石板作为原料建造的房屋等，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文化都被列入生态博物馆的范围，资料信息中心发挥了存储文化记忆的功能。2003年，第三座生态博物馆——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在黔东南州的锦屏县对外开放，代表了内地古老汉族文化，如保留完整的明代规制的隆里古城、祠堂、民居等物质文化以及砖雕、木雕、舞龙、舞狮等非物质文化，都成为博物馆的内容，资料信息中心除了具有存储文化记忆功能外，还是当地民众举行文化活动的聚集场所。2005年，第四座生态博物馆——堂安生态博物馆（侗族）在黔东南州黎平县对外开放，这里随山就势的梯田生态景观、久负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古建筑、蜚声海内外的侗族大歌，为生态博物馆带来难以抵挡的魅力。这里的资料信息中心不仅具有尊重生态博物馆建议的基本功能，还对服务内容和方式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严格说来，从1995年开始调研到2005年以堂安生态博物馆对外开放为标志，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即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就告一段落了。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交流与探索”在贵阳召开，世界生态博物馆界领军人物济济一堂，并实地考察了这4座生态博物馆。会议对《六枝原则》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后工业时代的博物馆思想如何与少数民族社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相遇

讨论生态博物馆，有一个话题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为什么会有生态博物馆。事实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专业、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然而，有几个重点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为

什么人们容易把露天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弄混淆？因为它们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末，为应对农村人口流失导致的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消亡，借助民族志的方法，北欧人开始借助博物馆对社会背景进行重构。为保存民族传统知识和技术，人们需要把它放在社会背景下，即把它们集中在一起露天展示，因此露天博物馆是为了回应传统工艺的消失而出现的。1891年，世界上第一个露天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斯堪森露天博物馆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它在20世纪前10年直接影响了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社区博物馆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探索。此时，博物馆不再仅仅是藏品资源在某个空间里重新组合的机构，而是为社区民众了解艺术、历史提供更加直接的场所。1967年，美国安纳考斯蒂亚社区博物馆诞生，开启一个博物馆不被视为相关学科藏品的储存场所，而是作为“社区发展工具”的新博物馆流派。沿着这样的思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批露天博物馆演变成生态博物馆，成为公共权力机构与当地居民共同筹划、建立、经营和管理的一种工具，生态博物馆被视为当地居民发现、观察和寻找自身所处环境与解释传统的一面镜子，一面当代人用来向外展示并且被人尊重的镜子，这是生态博物馆的基本逻辑。

与传统博物馆相比，生态博物馆的几个关键词尤其引人关注。广义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包含社区区域和公众记忆，尤其重要的是当地居民，他们直接参与建立和管理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特别是早期生态博物馆观念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认为，生态博物馆代表性人物的观点可以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卓识。生态博物馆概念的首创者是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ière），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他：“他是最早完全认识到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复杂性，这个概念可能的延伸，这个概念分支的人，而这种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迄今为止仍然被我们的时代所忽视。”这是评价他的博物馆思想特别是生态博物馆思想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句话。

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标志性成果是2000年形成的《六枝原则》。它虽然篇幅不长，但几乎涵盖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全部基本问题：“一、村民是他们文化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解释和证明其文化的权利；二、文化的含义及其价值，只能通过人的理解和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解释才能得到确认，对文化的理解必须得到加强；三、在生态博物馆中，公众的参与至关重要，文化是一种共同的和民主的美好事物，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四、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后者必须具有优先权，文化遗产中的真品不应当出售，但以传统工艺为基础的高质量纪念品生产应当得到鼓励；五、长远和全面的规划至关重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损害文化的短期经济利益必须避免；六、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与整体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在这方面，传统技术和材料至关重要；七、观众在道德上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行使自己的行为，他们必须得到规范性的指导；八、生态博物馆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它们应当结合自身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条件而各具特色；九、在生活社区中建立生态博物馆，促进社会发展是先决条件，在不改变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下，居民的幸福安康必须得到加强。”这些原则即使在今天看来仍颇具启发价值。苏东海先生或者说他的学术思想最后一次在国际舞台亮相是在2016年。当时，他委托我在2016年国际博协米兰大会上宣读一篇论文，文中提到中国第一批或者说第一代生态博物馆。他说，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在于从传统博物馆中走出来，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博物馆，弥补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

我们应当承认，一个后工业时代出现的新博物馆理念，与中国偏远少数民族社区的邂逅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尤其当我们的思维还处在村寨文物保护框架下时，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生态博物馆进行公正和理性的评价。这些评价可以反映在对当下热点问题的思考中，如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遗产旅游。

四、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在文化层面强调要保护和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有关的内容。乡村振兴与生态博物馆存在何种联系呢?3年前,全国政协所做的乡镇公共文化设施调研反映了一些问题。这些年来,作为文化惠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乡镇陆续建立了一批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场馆,呈现出数量增长快、地域覆盖广、基础条件改善的特点。但是,地方政府的意愿和当地农民的愿意在一些场馆建设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出现了巨大分歧。某些地方把文化送到村口,但没有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文化设施建设不符合村民的需求,未满足村民的期待。其中,关键之处在于这些设施与农民的感情和实际需求存在隔阂。内容不够丰富、不够接地气、不够讲情怀,当地民众缺少文化上的感同身受,就很难产生使用和反复使用这些场馆的动力。有些场馆运行缺乏当地民众最直接、最有效的参与,村民觉得这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政府要办的事情,共建意愿当然更加不足。

乡村振兴可以借鉴生态博物馆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进一步整合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提高乡镇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适配性,这是衔接政府意愿和老百姓意愿的关键。政府可以调整乡镇博物馆等在内的功能定位和运行模式,借鉴生态博物馆的合理成分。以传统农业社区为基础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地方文化馆等,虽然名字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值得我们借鉴: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讲求文化情怀;符合当地文化特色,强调本地村民广泛和直接的参与;建筑体量较小且运行成本较低,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这些共同特点以提高农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感为切入点,帮助当地建立符合其实际功能需求的文化聚集地,通过组织民间艺术活动、传统工艺工作坊等形式,形成一个富有人文情怀的社区中心。这样既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提高生活品质,在传统、现在和未来的梦想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本地居民是否参与乡村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决定了这些场馆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认为,应考虑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博物馆的发展阶段,推动村民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包括从最基本的参与到最终实现对乡村博物馆的管理。此外,乡村博物馆应当接受“大文化”的概念,依托当地人文和环境资源,与文史机构、艺术团体、学校、媒体、企事业单位、旅游机构、地方艺术家等展开合作,共同开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环境,共同收集、记录、整理、研究和呈现当地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而不宜“包打天下”。

其次,生态博物馆理念和实践对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作用。现在我们强调文旅融合,但文旅融合的关键在于其可持续性。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遗产价值的阐释必须是所有利益相关方达成的共识,而不由旅游部门或专家学者去阐释,这是文化遗产旅游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二是对遗产价值的共同认知不能只停留在字面上,而要到当地去验证。有时关于遗产价值认知的所谓共识往往停留在规划文本当中,当现场验证时,会发现不同利益相关方在认识上依然存在冲突。在实践中,找到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案,形成最大公约数,是确保文化遗产旅游或者文化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责任编辑:吴昌稳)

(下转第34页)

当代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潘守永

上海大学文化信息与遗产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拆分为“博物馆”和“文物”两个一级学科,属于“专业学位”(区别于学术学位),且后者升格为“博士专业学位”,这是1997年以来博物馆学学科经历的第三次巨大变化。从“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到考古学独立为一级学科后博物馆学更名为“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使用“文物与博物馆”名称),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处于“摇摆”和“不确定”状态。因此,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边界、范畴以及当下的处境,特别是博物馆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跨学科属性,需要系统检视和讨论。

关键词: 博物馆学 学科地位 跨学科属性 博物馆繁荣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015-11

我在大学教书30年,曾经讲过“博物馆学通论”,后来叫“博物馆学导论”“博物馆学概论”。名称虽然有变化,但讲授的主要内容是比较固定的。一门学科的基础课程,可以很好地反映这门学科的情况,授课教师使用自己编写的教学大纲、课件或讲义,重点或侧重点不一定相同。王宏钧先生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是多数大学博物馆学教学的基本参考教材。“马工程”教材《博物馆学概论》^[1]出版以后,不少高校开始使用这版教材。

我在教学中使用蒂莫西·阿姆布罗斯(Timothy Ambrose)和克里斯平·佩恩(Crispin Paine)编写的《博物馆基础》(*Museum Basics*)^[2]作为基本教材,使用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编写的《博物馆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3]作为教学参考书。有人说,这两本英文著作都没有使用“博物馆学”(Museology),是否意味着他们不认同或不完全认同博物馆学是一门学科呢?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存在或提出这种疑问的人不了解当前的国际学术社群及其语境。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也不是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言”。这里不展开论述。我还讲过“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等一些选修课程,在不同时期有机会和任海(Hai REN)教授、溥摩根(Morgan Perkins)教授、倪威亮(William Nitzky)教授、杜辉博士、尹凯博士等学者,联合主持过“博物馆人类学工作坊”“新博物馆学读书会”等学术性活动。这些课程、讲座和工作坊对学科意义上的,特别是所谓的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博物馆学”和作为领域研究的“博物馆研究”,其实是不怎么区分的。

^{*} 本文是作者2023年8月5日在广东省博物馆“博物馆学研究:知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并经作者补充、润色和审定。

[1] 《博物馆学概论》编写组:《博物馆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2] Timothy Ambrose, Crispin Paine, *Museum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1st, 1993; 2nd, 2006; 3rd, 2012; 4th, 2018. 该书经多次修订,前后有四版。

[3] Sharon Macdonald(e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一、关于博物馆学：对象、概念与边界、范畴

从学科意义上来说，博物馆学的三个核心议题，即研究对象、基本概念、范畴与边界，其实是比较清晰的。这是从“教科书”和学科建设规划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学理上，也就是形而上的角度，博物馆学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假如从不同的学派、流派出发，可能基本概念、边界等都很难达成一致。此外，在实践的层面，博物馆千差万别，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强调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和“轨迹”，所以国际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和他的兄弟尼尔·科特勒（Neil Kotler）在第二版《博物馆战略与市场营销》的序言中写道：如果用一个词来描绘今天的博物馆，只能是“多样性”（Diversity）。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任职时曾担任“学科建设与规划办公室”（前身是211工程办公室）主任，对学科规划有一些认识，但我并不准备从“学科规划”的角度来讲。我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感悟和思考，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讨论“当代博物馆学学科建设问题”。我把“论域”限定在当代，也就是从当下出发，不计划做过多的历史性回顾和评述，而是将“历史”看作是连续性的，当下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安来顺先生在刚刚的演讲中，系统回顾了生态博物馆的发生、发展和实践探索，他是这个领域的引介者和实践者，我的演讲内容也会涉及这个议题。

我把自己定位为新博物馆学的信徒，为什么？因为这和我的学科信念有关系。我本科是学博物馆学的，当时全班有20名学生，今天还坚持研究博物馆学的只剩我和张文立博士两人了（今天张老师也来参会了）。当然，有不少大学同学在执教鞭，他们的学术领域基本上是考古学或历史学。这些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的同学，基本上不再关心“博物馆学是什么”的问题，甚至偶尔还对“博物馆学”表达出怀疑的态度，显露出鄙夷的神情。

博物馆学是什么？博物馆学科是什么？或者博物馆学不是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思考得比较多，辩论也比较多。中年以后，我本人的确不怎么关注这些“宏大话题”了，而关注具体的领域或问题，很少参与“作为整体存在的博物馆学学科”的相关讨论。但是，作为教育和人才培养单位，作为机构，学科问题的确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课题。大学的教育资源是按照学科分类以及学科的等级分配的，院系设置也基本遵循这一原则。博物馆学在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一直难以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国家和地方人文类基金项目中也未被单列，就连“核心”期刊也无博物馆学学科这一分类。在当前资源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博物馆学学科建设似乎有一种确定的使命感、迫切性和目的性，它的重点和终点就是成为“一级学科”。

国际上有没有博物馆学一级学科？其实国际上没有一级、二级学科和重点学科的划分，也没有什么博士点、博士生导师的头衔和规定。国内和国外背景、语境不一样，评价方式、生产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知道，莱斯特大学的博物馆学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有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莱斯特大学虽然使用“博物馆研究院”的名称，但也没有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概念以及说法和做法。“Museum Studies”（博物馆研究）这个词美国使用得比较多，与之类似的有亚洲研究、美国研究、国际研究等，属于领域研究，强调的恰恰是“跨学科性”。在莱大的专业介绍中，“Museum studies”（博物馆研究）和“Museology”（博物馆学）是并列使用的，也不一定做严格的区分。所以，国际上博物馆学的研究虽然开展较早，不少大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但回到学科建设、学科范畴等层面，其实难以直接“引进”国际经验和做法。

博物馆学有自己的核心文献吗？这个问题早在20年前杰·朗德斯（Jay Rounds）就做过专门研究，答案是“有”。他从422篇英文文献中确定了39篇核心文献。这些文献具有鲜明的特点，即85%的

核心文献是关于博物馆的具体业务，80%的核心文献作者直接参与博物馆的工作。^[1] 这篇论文被译为中文，发表在《中国博物馆》上，但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核心文献清单中，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分别排在第12位和第19位。一门学科的“核心文献”虽然属于情报学、文献学的技术范畴，但对任何学科的独立性和成熟度来说，这是关乎这门学科的“最基本的技术性议题”。核心文献是那些普遍被引用且意义较大的“经典”著作，包括基础理论、技能方法和规程上的重要例证等，是学术共同体所达成的某种学术共识最直接的反映。

二、蓬勃发展的博物馆事业与博物馆学的困顿

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博物馆学理论的缓慢成长，或者说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事业发展，似乎是当代的新现象。博物馆从业者特别是管理者普遍感觉到，博物馆学的理论无法指导实践，甚至远远落后于实践。有的馆长甚至抱怨，博物馆学专业的毕业生看来只适合做馆长。显然，这是批评博物馆学的教育脱离博物馆实际，未能使学生掌握开展博物馆相关业务的工作技能。我曾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前馆长成建正先生讨论过此事，他说综合性大学(通常指211、985等重点高校)博物馆学专业的学生似乎历史、考古、鉴定、管理等都学了一点，但基本上只学到了皮毛，到了博物馆还得从头学习，不少学生觉得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每每瞧不上这些工作，眼高手低的现象很普遍。

最近20年，国内博物馆的发展变化非常快，博物馆学的学术产出非常多，但后者显然还是跟不上前者的速度。其实，国际上也大致如此。就博物馆的发展而言，最近30年的确是博物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时期。有人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欧美博物馆的黄金时期，但如果将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博物馆发展做比较，无论是博物馆数量，还是博物馆类型，显然是小巫见大巫。经初步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共诞生300多座新的儿童博物馆，几乎是过去100年的数量总和。^[3] 数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变化是博物馆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欧美国家一些历史悠久的博物馆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甚至修改了沿用多年的标志(Logo)。在类型上，与移民、少数族裔相关的博物馆发展很快，不少新类型博物馆在最近二三十年产生，比如美国的“墨西哥艺术”博物馆、“日本艺术”博物馆、“亚洲移民”博物馆等，这些主题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就北美地区而言，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题类博物馆。它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靠近华盛顿纪念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筹备到21世纪初开放，前后持续15年。它的基本陈列采用“控制流线”的有序式而非自由开放式参观，看似是某种博物馆历史遗产的回归，事实上其在展示理念上有众多变革，特别强调叙事方式和特色，用生动灵活、声情并茂的方式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它创新了博物馆的存在方式，既是博物馆、纪念馆，是某种历史仪式的场所，也是跨文化合作和学习的空间。而史密森学会旗下另一家黑人主题博物馆——安那考斯蒂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Community Museum)，这座曾被誉为“最新型”的博物馆显然有点门前冷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确创造了全新的用户体验，并实现了持续有效的互动。这座博物馆在美国国家历史和国家文化的体系中重建了“美洲/美国黑人历史和文化传统”，是新理论指引下的

[1] Jay Rounds, Is There a Core Literature in Museology?, *Curator*, Vol.44, 2001(2).

[2] 杰·朗德斯(Jay Rounds)著，韦立立译：《博物馆学有核心文献吗？》，《中国博物馆》2004年第1期。

[3] 杨玲、潘守永主编：《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博物馆美学和博物馆叙事的新典范。

此外，一些革命性的概念和观念也在博物馆界悄悄发生，新技术的应用普遍、广泛而深刻。德国国家博物馆体系在东、西德合并后 15 年开始构建，最近开馆的德国国家博物馆之一的洪堡论坛，使用了“论坛”（Forum）而不是“博物馆”（Museum），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在英国，博物馆成为广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如格拉斯哥建立了一个关注地方历史、技术和财富故事的河畔博物馆（Riverside Museum），这个 2003 年才建成开放的博物馆，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赞誉。格拉斯哥是蒸汽机发明家瓦特的故乡，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也是财富的象征。这个城市也是拥有亚当·斯密的地方，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传统博物馆学的逻辑是无法兼容地方历史、技术、财富和人的故事的，也就是说河畔博物馆这样的创意，属于典型的建构主义理论模式。展览中使用的 200 多个故事，是从征集的 4000 多个故事中遴选、整理并加工提炼出来的，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联系完全是博物馆“合理”制造和“戏剧性”演绎而成的。它的管理模式也不是常规的馆员责任制体系下的馆长负责制，而很像职业经理人制度，即采用类似总一分馆的形式，日常管理者是“经理”（Manager），经理之上是总馆长。总馆长管理这个城市大约 9 个博物馆，他只负责战略规划、经费和人员，并不管理具体的“馆务”。这个博物馆除了观念设计“超前”外，空间结构、建筑布局等也不同于一般博物馆。其基本陈列体系、展示内容使用“人的故事”串联机车、马达等各种展品，技术和财富故事是核心展示内容，但不在展品里直接呈现，而是隐藏在机器和“故事”背后的语码。

上述两个案例似乎说明，当今的博物馆建设逻辑是先有理念（观点）、理论，再有行动（行为受制于理论），最后才是结果。而传统博物馆学的逻辑是藏品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建立一个博物馆并依据这些藏品来举办相应的展览。这样的博物馆属于“自我驱动型”，当然也符合社会期许。当代博物馆学兼容“内驱”“外驱”双重视角。其实，如果进行文献梳理，我们可能无法找到这两种博物馆在建馆之前的学术阐释（或观念、理念申明），也找不到有关这两种博物馆的学术和理论体系论述，对建馆者而言，一切似乎不言自明。和新美术馆学边干边说、先说再干不同（先有目标和旗帜，然后才有行动和实践），这些具有鲜明新博物馆学特征的实践，通常干完了也不说（不做理论总结和探讨），是否也是因为理论方面的产出没有同步增加呢？

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和博物馆学理论建树之间的“落差”也大致如此。一些大馆的馆长批评博物馆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显然不是“苛求”。我们在大学从事博物馆学教育的人，内心常常很不安。那些拥有优秀博物馆的欧美大学，他们拥有同样优秀的博物馆学教育吗？据我个人的浅见，他们的情况也类似。大部分拥有优秀博物馆的大学，博物馆学教育不仅不见得同样好，甚至没有博物馆学教育的传统。按常理，好的博物馆不是那些优秀的博物馆学家建造的吗？或者是在优秀的理论指导下建造的吗？多年前，我和博物馆学家伊万·卡普（Ivan Karp）、博物馆人类学家科瑞·罗杰斯（Cory Rodgers）讨论此议题时，卡普指出，能指导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不会是一个好理论。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都没有系统的博物馆学课程，但都拥有多家非常优秀的博物馆，有自己的博物馆体系（群）。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学教育有 50 多年的传统，位居世界前列，但博物馆很一般，经过几轮变革，近年才将主攻方向确定为纺织博物馆。

我国博物馆行业经历了 30 年的快速增长，截至 2022 年底总数达到 6565 家，每年举办新展览近 3 万个，最高峰时期的观众量基本上与我国人口总量持平。中国博物馆协会及下属各专业委员会、各省博物馆协会（学会）每年举办众多的学术研讨会，讲座和各类活动也令人目不暇给。此外，每年博物馆学硕士、博士毕业论文超过 200 篇，应该说学术产出的数量“基本到位”。

从人类学的整体论视角看，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可以分别作为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社会总体事实存在来看待吗？可能很难，大家通常认为博物馆学就是关于博物馆事实的一种存在，不能是另外的独立存在。我个人愿意使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理论”来分析，博物馆是一种文化工具、文化现象，是服务于“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这个目的。博物馆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类型、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和生成方式，符合我们所说的文化特性即文化习得性。

当我们讨论文化的时候，格尔茨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它的前提是杜尔干学派提出“总体事实大于个体事实的简单相加”^[2]。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博物馆使用方式、博物馆产生方式、博物馆工作，甚至博物馆学的存在方式等，都属于民族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人从他所在的群体中获得的社会遗产。

博物馆的保护、传承、展示、阐释、传播等功能，其实这些内容从个体来说，像广东省博物馆的收藏不会属于某个个体，某一部分可能属于某一家族或者某一个时期的人，如今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文化是一种思维、感觉，也是一种信仰方式，博物馆何尝不是如此？博物馆为什么要存在，其实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1980年代，我们想象不到一座博物馆要建15万平方米，那个时候我们想如果建国家博物馆，离开天安门广场另外选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大家也不同意。我参与中国民族博物馆方案论证的30多年时间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选址问题。大家认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是反映国家性质的，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统一和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因此不可能离天安门广场周边超过10公里，所以最早的论证方案一直是在北京长安街沿线（最好是在天安门广场周边）这个范围。

博物馆从论证、建立到呈现反映了一个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来源于行动的抽象。我国的博物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苏联综合馆的模式，把自然和社会历史放在一起，广东省博物馆就是这样。总体来讲，自然科学馆比较少，我们认为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也没有像样的自然博物馆。“中华民国”政府筹建中央博物院的时候，规划了自然和少数民族部分的内容，如今南京博物院有七八万件少数民族相关文物就和当初筹建中央博物院有关，但它的自然类标本很少。这也是为什么说博物馆来源于行动的抽象。

人类学家对文化的讨论比较多。格尔茨关于文化定义多层性的观点，以及更关注经验而非理论研究的做法^[3]，主张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也适合博物馆领域。我们研究博物馆的繁荣发展，也可以借用他的分析模式。中国博物馆的繁荣发展与40多年的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同时，全世界的博物馆在这段时间里也在不断成长。如果具体到最近10年，即2011—2021年，虽然博物馆数量有起伏，但除了增长之外，其实找不到特别的规律。近20年来，博物馆观众量翻了十几倍，去除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博物馆观众数量是直线上升的。

观众数量的直线上升意味着社会需求的增加。近年来，许多博物馆变成“网红馆”，预约参观变成竞争性行为，不少观众预约不上门票，参观无门。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我们在杭州调查，发现大家都不去博物馆，有的去看博物馆是因为买了西湖门票顺便去看的。那时天安门广场的厕所收费五毛钱，去博物馆是两块钱，博物馆里面的厕所不用排队，大家宁愿排队两个小时，也不愿意再多花1.5元去不用排队、有纸和环境好的厕所。那时，我们的博物馆好像不被大众喜欢。现在为什么会“博物馆热”呢？根本原因是博物馆事业繁荣了，在座各位对此都做出了贡献，博物馆推出了很好的展览。

[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第22-23、63-65页。

[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第5页。

原先，博物馆的家底没人能清楚地知道。故宫博物院这么大，工作人员用了很多年才搞清楚藏品总数。国家用数十年时间，从方方面面提升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质量，才实现了博物馆的免费开放，用高质量的展览吸引大众，大众慢慢将参观博物馆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除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以外，全球化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刚才，安来顺先生提到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面临现代化的巨大冲击，传统村落正在急遽减少。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66%，再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另外，我国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的超大城市或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和美国纽约地区、大波士顿地区相似，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城市连成一体。博物馆在城市群当中如何定位，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众关于文物、国宝、收藏、财富的知识较为有限，一开始博物馆人不愿意用“国宝”这个词，因为收藏界有一个“国宝帮”把“国宝”污名化了。博物馆人觉得，我们怎么能用“国宝”？但是，大众在心理上就是要到博物馆去看国宝。因此，中央电视台策划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面向的就是普通大众。它以每集5分钟的长度讲述一件国宝，并且成功做到了，在播出时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我们看到这个节目在设计海报时，摒弃博物馆常规的海报设计模式，完全站在普通大众的角度。其中，越王勾践剑有一个它横着放的海报，挂在北京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海报挂上去几分钟就有年轻人过去拍照打卡。可见，大众对历史文物的了解，对藏品的关注，不一定仅发生在博物馆语境下，过去这些物件必须在博物馆脉络里呈现，通过展览或活动来让大众了解。如今，在自媒体时代，文物、艺术品的知识生产可以脱离语境，它们甚至可以独立存在，社会正在建构新的关于博物馆以及文物的形象。甲骨文居然可以理解为“因为刻骨所以铭心”，三星堆面具可以与奥特曼联系起来等，但这些理解非常符合大众的认知和审美。大众要在瞬间记住他们喜欢的内容，就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构建与文物的联系，使用一些原有的记忆或知识，甚至“错误的理解”来学习新知识。这也是当前社会上比较盛行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博物馆的繁荣还可以从受众的社会参与度体现出来。上海大学等单位发起的“中国博物馆公开课”项目，主要通过网络传播。安来顺先生主讲的第二课“博物馆的物与事、往与今”时共有120多万人在线收看。我估计，安来顺先生之前所有的线下讲座加起来的听众都不会超过这个数。我上课时大概20多人，这个基数就是乘以40年，人数也不过800人，它和网络受众数量根本无法相比。我们原先估计博物馆公开课可能会有几千人关注，但没想到一开始就有几十万人，课程直播过程中人数不断飙升。此外，我们策划了一些小众活动，如《看见》节目，让大众参与。栏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和策展人一起看展览，第二个阶段是学者和策展人一起对谈，这个节目每期平均有80万观众收看。这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本来以为是特别小众的节目，小众是怎么成为大众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可见，博物馆行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可是博物馆学的发展似乎没那么好，甚至遇到很多困顿。首先，我们看一下3个国家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教育部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那时二级学科可以设博士点，并且还没有明确区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1998年有了一级学科的概念，一级学科之下可以设立二级学科，并且最多可以设9个二级学科，所以各个学校开始重视一级学科建设。后来，一级学科也细分成硕士点、博士点，2022年还出现交叉的一级学科，其下可以设专业博士点。其次，被“消失”的博物馆学。2011年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公布，历史学科下出现了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考古学在谋求一级学科时，联合了博物馆学，但它成为一级学科后，博物馆学的学科地位却大幅下降。2022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只有“文物与博物

馆学”，而我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尚有独立的博物馆学专业。前后对比，让人唏嘘不已。文物与博物馆学这个名称也很奇怪，用人单位搞不清楚文物与博物馆、文物与博物馆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写错了？后来我们解释，有“学”的是学术硕士，不加“学”的是专业硕士。我记得有一年某博物馆的招聘要求上写的专业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最后应聘学生的毕业证书里面都没有这个专业。可见，就连和考古学、博物馆学关系密切的文博机构都无法准确列出招考需求的准确专业名称，社会又如何知道“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对不对？

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同仁都知道，博物馆学这些年处于一种不自主的状态，没有学科地位，在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和教育部各类基金项目里也没有独立的分类，而被归到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或考古学下。即使申报了课题，评审专家都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或考古学方面的，博物馆学的课题也难以被立项。在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学科评估中，这样的设置对博物馆学的发展无疑是致命的，高校不可能投入办学资源支持它的发展。

博物馆学学科如何突围？我们也注意到，安来顺先生和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陈建明先生等在组织《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博物馆学科”卷编写时，把博物馆学独立成卷，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另外，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努力下，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下设的全国博物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了。博物馆学名词审定工作对规范博物馆学名词，加强博物馆学学科建设，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突破对博物馆学学科竞争学术资源，开展学科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们对博物馆学教育影响不大，因为博物馆学教育、博物馆学学科学位设置是由教育部负责的。要推动博物馆学学科发展，下一步应该由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会商教育部，让博物馆学变成独立的一级学科。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后不久，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就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更是如此，一直都有博物馆学专委会，而且还比较活跃。国际博协除了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还有新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我本人就在新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

需要承认的是，博物馆学学科的突围难度非常大。一方面，博物馆事业发展很迅速，逛博物馆已经成为大众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它的声音和意见很重要，2023 年许多博物馆竟然一票难求，但在学术领域却不受重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博物馆学的学科属性模糊，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有人说，它既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学科，那么它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好像都是，它还有自然科学属性，因为我们还有大量的自然博物馆。博物馆学学科的跨学科特点在现阶段是一个劣势。一个学科假如不具有相对纯粹性，在同行评价时就可能受到其他学科的挤压，导致不是由研究博物馆学的人决定博物馆学的地位。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讨论和投票时，博物馆学就不占优势。举个例子，博物馆学就像物理化学一样，它和化学物理是不一样的，现在还有生物化学，也有化学生物学。可见，具有多重学科属性的学科，它本身就很复杂。假如你认为博物馆学是一个研究领域那就更麻烦，这是学科属性对学科发展产生的障碍。还有一些学科，它们不是从传统学术里发展出来的学科，会被认为有术无道，学科系统性不够，构不成一个系统思维。我参加过某市的博物馆协会年会，他们请我评审参会论文，我一看都是一些浅论、初论，去年是这样，今年还是如此，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学科自身没有“道”就构不成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看不见学科的时代进步和传承。

另一方面，大家认为博物馆学谁都可以做，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不是思辨的，好像用了“博物馆”三个字就是博物馆学，什么都可以靠。博物馆学的大部分知识与博物馆实践、博物馆业务是相关的，博物馆学自身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我们的博物馆机构设置是从苏联学习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普遍采用三部一室制（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和办公室），当时还没有研究部，这也使得

博物馆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这是需要明确的。另外，博物馆人对理论存在态度问题。我大学学的是理论，理论是有局限的，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每个人都在不断学习，博物馆专业原来设置的课程和今天的博物馆实践完全不一样，因此理论研究是要与时俱进的。此外，还有导向和偏好的问题，一些人甚至一些学术期刊不重视理论研究。我最近在为某杂志做论文评审时，对方强调，博物馆学的相关研究必须围绕博物馆的具体工作，不刊发博物馆学理论方面的文章。我想，这本杂志对博物馆理论的认知是存在局限的。

三、博物馆学的跨学科性与目的论、存在论的纠葛

作为高校教师，我发现受过不同学科训练的人，理论追求以及个人的学术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我属于“两栖”——同时是博物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教师，除了指导博物馆学学生外，也讲授人类学基础课程和指导研究生。博物馆学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很少关心理论议题，有突出的“工具论”和“实用主义倾向”。安来顺先生的意见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提出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的学生经常提问：“老师，我的这个田野研究，使用这个理论或学术范式可不可以？”“这篇论文我计划和这个理论、假说对话可不可以？”由此可见，人类学“学术社群”（Academic Community）的理论意识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类学学术共同体反对“一张白纸式的学术”。人类学所遭受的众多批判中，有一个代表性的质疑就是“带着学术社群铸造的有色眼镜”进入田野研究。就是说，“尺子”是在书斋里做好的，然后再到田野去测量，得出来的数据（事实）其实已经被“圈定了”范围。但是，假如没有任何理论训练，像“一张白纸”或者“镜子”一样就进入田野，没有工具，那会得到些什么呢？当然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美国人类学家编辑的《文化人类学大百科全书》中收录了310多位作者撰写的340个学术词汇，洋洋洒洒4大册。它说明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经过150多年的积累，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编写“博物馆学词汇”，可以呈现学术范式的词汇一定不多。国际博物馆学界有学者做过这样的尝试。德瓦雷（André Desvallées）和梅黑斯（François Mairesse）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下编写的《博物馆关键概念》于2010年出版。其中，选定了20个基本词汇，即建筑、藏品（收藏）、传播（沟通）、教育、伦理、展览、经营/管理、制度/机构、媒介（中介）、博物馆的/博物馆域、博物馆化、博物馆实务、博物馆、博物馆学、博物馆物、遗产、保存、职业/专业、公众/观众、研究和社群，除了这20个关键概念外，他们还罗列了衍生概念53个、相关概念271个。^[2]

我们从事历史学、艺术史、博物馆学研究的人，似乎从来不自问某个研究或一篇论文要做什么理论对话，认为一篇学术论文把“事实”说清楚就可以了，这个“历史事实”或“社会事实”就是研究的对象。可是，学术研究在理论上或者范式上的意义和价值很重要。哈佛大学柯文（Paul Cohen）教授提出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即历史事实、态度和神话^[3]，我对此非常认同。当然，不是说三个层次中“事实”层次最低，它是研究中最基础和最根本的部分，很多时候也应该是研究目的：搞清历史事实。但是，按照历史哲学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来说，这个最基本的层次是变化的，并且要依靠另外两个层次才能获得当代人们期望的认识。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的，态度和神话是学术上“接

[1] 安来顺：《界定博物馆学关键概念中的四个“如何”》，《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2期。

[2] [法]安德烈·德瓦雷、方斯瓦·梅黑斯指导，张婉真译：《博物馆学关键概念》，Armand Colin 2010年。

[3]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近”事实的主要凭借。此外，任何学术都涉及“技术问题”，大部分都属于“态度”问题，也就是“构成/形成技术”，书写是技术，口述传说也要借助技术/技艺等手段。因此，事实本身可能和你所用的工具极有关系，学术研究中它就是你所依靠的理论。我清楚地知道，不同理论模式或不同学术范式使用的学术工具是不同的，它取决于研究的问题导向。

如前所述，博物馆学的关键概念只有20个，而人类学有100多个，一些成熟学科可能更多，说明博物馆学的理论产出明显不足，与“一级学科”有一定的距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是两个一级学科，那么从应用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博物馆学的实践部分（或工具论）可否作为一级学科？不少同仁主张“博物馆学属于实践性学科”，不需要研究理论议题。其实，国际上将博物馆学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即“博物馆学”（Museology）和“博物馆实务”（Muscography，可译为博物馆实践、博物馆技术），说明博物馆学的两类活动是有明显区别的。是否可以直接把“Muscography”译为“应用博物馆学”呢？

我国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学的属性也存在理论和实践的争论，大部分人认为其偏实践性、偏工具论。也有学者主张，博物馆研究要偏重本土主义。只有少数学者主张要重视一般通则的理论性探讨。本土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它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多元价值观和多元学科体系之下，博物馆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更系统、更充分的辩论，大家围绕博物馆学目的论、存在论的讨论也不够深入，至于围绕博物馆存在的社会基础、公众需求等的认识，也处于“浅表层面”，少数基于构建博物馆学中国话语、中国体系的论述，还处于提出主张和发出声音的阶段，至于什么是中国学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还在“酝酿的路上”。国际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学和社会热点议题，如艺术展览当中的“毁坏的艺术”（这类颠覆性概念的展览）、人类遗骸展览的博物馆伦理、社会性别平等议题、贫困与反贫困、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等，也只有零星的讨论，而未得到国际博物馆学界的深度关注，更谈不上系统性研究。

在目前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框架和语境下，博物馆学学科遭遇众多困顿，其发展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突出。个中原因很多，最核心问题可能是博物馆学人没有掌握话语权，它涉及学科的命名权和学术资源的分配权。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初，考古学“蛰伏”在历史学之下，现在中国史、世界历史和考古学分别独立成为3个一级学科。很长一段时间里，吉林大学考古学教授林沅先生是教育部历史学科的召集人，考古学家成为历史学科的召集人，对在历史学之下发展的考古学显然是“利好”。一、二级学科的设置不是基于学理的，是人为的，是与中国的学术特色密切相关的。2022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原来的80多个一级学科增加到100多个。这么大的增幅，说明一个学科能否成为一级学科，学科之外的因素是很微妙的。一个学科是不是一级学科决定了它能否有机会参与学科评级，如A（A+、A、A-）学科、B（B+、B、B-）学科，等等。除了国家学位和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体系外，还有一些期刊评价体系，如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CSSCI期刊评价体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分别简称“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中的学科分类，这些学术体系对学科的发展和学术生产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甚至是生存性的影响。

四、博物馆学的国际语境与学科建设

我们讨论博物馆学的国际语境，也难以离开学术刊物和学术共同体。国际上，不存在一级、二级学科的划分，更喜欢强调领域研究，所以美国语境中“Museum Studies”是常用语，而不是“Museology”。

国外领域研究与学科设置是并行不悖的，领域研究一般包括多个学科，如亚洲研究系包含历史、语言、人类学和艺术史等学科。莱斯特大学在英国高校中处于二流和三流大学之间的位置，但它的博物馆教育是全英国甚至全球最好的。它的博物馆学位教育涵盖本科至博士阶段，体系完整，大致由三个不同领域构成，涵盖博物馆/美术馆、保护和媒介技术等，很符合博物馆学学科的实践特色，但莱斯特大学没有出色的博物馆。伊万·卡普教授是著名的博物馆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生在艾默瑞大学（Emory University）教书，但这所大学的博物馆很一般，所以他的诸多博物馆学著作都是在史密森学会体系中完成的。^[1]

哪些大学既拥有好的博物馆，又有比较完善的博物馆学教育？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流的人类学博物馆，又有良好的博物馆学教育，但它的博物馆学学位在人类学学科之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1972年就设立了独立的博物馆教育项目（Museum Studies Program），培养了大批博物馆人才，它和史密森博物馆群仅一街之隔，位置得天独厚，不少老师来自史密森国家博物馆体系，专业上拥有过硬的实践经验，但是2016年这个独立的“博物馆学院”被并入设计学院。

国际上，博物馆学教育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学位教育中教育学和艺术史学科从事博物馆研究的人比较多，此外是人类学学科。我们曾粗略统计过1990年以来博物馆研究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情况，截至2022年大约有5100多篇，分布在博物馆学、教育学、艺术史（艺术教育）和人类学等领域。还以莱斯特大学为例，它自1966年开展博物馆学教育以来，学科体系和教学内容一直“与时俱进”，近期也有很大的变化。比较重要的变革是，莱斯特大学新近启动了“CRÍA”跨学科研究中心，博物馆学则提供科学硕士学位（MSc）和人文硕士学位（MA），兼容科学与人文艺术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在两个学位体系（MSc和MA）之下，设置美术馆（Gallery）、保护与博物馆学（Protection and Museology）、博物馆学（Museology）三个学位方向，其下再设置4个教育教学模块，即博物馆与变迁、公众（接待）、创意生活设计、物件与藏品：保护、管理与策展。3个学位研究方向中，第二个方向“保护与博物馆学”不太容易理解，因为第三个方向就是“博物馆学”，其实这个方向更加强调了“保护”在博物馆学体系中的作用，也可以直接理解为“博物馆的保护科学与技术”。这个项目大约开始于2016年，课程模块是逐步完善的，4个模块构成了当前的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教育体系，每个模块中大约有6~7门课程，学校对学生选课的门数有严格要求。此外，还有其他课程模块，如实习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博物馆学教育体系保持了并置的两组指标和两个维度，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能在“兼容”的情况下，寻找适合自己的认知维度。当然，大学的学科和教育教学体系并不能代表一所大学全部的博物馆学主张，但的确是重要的“集体意识”的反映。莱斯特大学有两个博物馆学刊物，即《博物馆学评论》和《博物馆与社会》，似乎也揭示了前者偏于“学理”，后者偏于“应用”和“社会视角”。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学教育始于1976年，设“辅修学位”和“硕士学位”，培养方向也大致分为4个模块，即藏品管理、博物馆管理、展览与观众体验和公众服务。它没有设置藏品保护方向，这是因为史密森学会和乔治·梅森大学合作设置了“艺术保护”学科，因此没有重复设置。每个学生选其中的模块进行1~2年的学习。乔治·华盛顿大学使用“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而不是“博物馆学”（Museology）的名称，属于领域研究而不属于某个单一学科，但所获学位都称“博

[1] 伊万·卡普教授一生著述丰富，主要学术领域是非洲研究和博物馆学，代表性的博物馆学著作主要有《博物馆与社区：大众文化的政治学》（*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1990）、《展览文化：博物馆陈列的诗学和政治学》（*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1991）、《博物馆摩擦：大众文化/全球转型》（*Museum Frictions: Public Cultures/Global Transformations*, 2006），以上三本著作属于“文化、社会和博物馆系列丛书”。

物馆研究学位”（主要是硕士学位）。2016年，这个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研究学院全部并入该校的设计学院。

关于博物馆学的学科属性，我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但兼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点。关于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功能/作用和分支学科等，学界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将博物馆学分成两大块可能比较合理，即博物馆学（Museology/Museum Studies）和博物馆实务/技术（Museography，也可以译为“应用博物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博物馆学科”卷中将博物馆学分为16个分支，基本代表了当前我国博物馆界的认识。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体系中，博物馆学分为8个分支。如果将来博物馆学成为一级学科，其下如设置两个二级学科，应为理论博物馆学和应用博物馆学。但是，如果按照一级学科之下至少要有4个二级学科的要求，我建议设理论博物馆学、应用博物馆学、博物馆史、专门博物馆学。新博物馆学、社会博物馆学、博物馆社会学应放在博物馆学学科内的哪个位置？我还没有想好。

今天，普遍性的共识是博物馆学无法被放在现有任何一个一级学科的框架内，它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考古学、艺术学。另一个普遍性的共识是，如果博物馆学无法获得一级学科地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直会“处境尴尬”，更无法获得足够的学术资源。这不仅不利于博物馆学科的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更与我国当前的国家利益、社会对博物馆的强烈需求等背道而驰。

（责任编辑：吴昌稳）

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useum Studies

Pan Shouyong

Abstract: On the Classifications of Disciplines issu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cademic Degrees Committee in 2022,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is split into two first-level disciplines: “Museums” and “Cultural Relics”. Professional degrees, distinct from academic degrees, are conferred upon them, with the latter upgraded to a “Doctoral Professional Degree”. This marks the third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discipline of museum studies since 1997. From “Archaeology and Museum Studi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rchaeology as an independent first-level discipline, and the subsequent renaming of Museum Studies to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Studies”, the disciplinary status of Museum Studies has consistently undergone fluctuations and uncertainties. Therefore,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and discussion are needed for the disciplinary status, boundaries, scop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eum Studies, particularly its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Keywords: Museum Studies, Disciplinary Status,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Museum Boom

广东高明古椰遗址新石器时代植物遗存初步分析

李昭¹ 李岩² 马永超³ 马志坤⁴ 李泉⁵ 刘长江⁶ 崔勇² 杨晓燕⁷

1.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广东广州, 510632; 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075; 3. 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四川成都, 610207; 4.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6.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7. 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寒区旱区生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 古椰遗址的饱水环境为保存植物遗存提供了优势, 为探索古椰先民与植物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对采集和浮选所获植物遗存的分析显示, 古椰先民可能利用低矮处水域边缘的克拉莎 (*Cladium jamaicense* subsp. *chinense*) 草丛作为废弃物倾倒处, 并且善于开发利用遗址周边的森林植物资源, 从中获取植物性食物, 包括壳斗科 (Fagaceae) 橡子, 特别是柯属 (*Lithocarpus*) 坚果、橄榄 (*Canarium album*) 和破布木 (*Cordia dichotoma*) 等。这些结果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是更广泛的亚热带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木本植物采集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和参考。

关键词: 古椰遗址 采集经济 橡子利用 新石器时代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 (2024) 01-0026-09

目前, 岭南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探索农业 (主要包括粟、黍、水稻在内的驯化谷物农业) 的传入时间以及传播路径上^[1], 较少关注采集狩猎人群的植物利用模式或其不同于南岭北部的早期农业形态。依托民族学的研究成果, 岭南地区曾存在依赖植物块根块茎 (主要包括芋头、薯蕷等) 无性繁殖的园圃农业的假说被提出^[2], 部分遗址开展的淀粉粒分析结果也证实了这类植物的重要性。但是, 近期的植物考古学证据强调了木本植物, 如棕榈^[3] 和橄榄^[4] 在岭南地区史前人类饮食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岭南地区的植物采集经济打开了新视角。

古椰遗址位于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古椰村鲤鱼岗侧, 是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图一)。遗址水田区的饱水环境为植物遗存, 如种子、果实、果壳等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厌氧条件, 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古椰先民甚至更广泛区域的史前人类其植物利用多样性提供了丰富材料。在考古发

[1] 杨晓燕、李昭、王维维等:《稻作南传: 岭南稻作农业肇始的年代及人类社会的生计模式背景》,《文博学刊》2018年第1期; 夏秀敏、张萍、吴妍:《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1期; Deng Z., Huang B., Zhang Q., et al., First Farmers in the South China Coast: New Evidence From the Gancaoling Site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0(10), pp.858492; Yang X., Wang W., Zhuang Y., et al., New Radiocarbon Evidence on Early Rice Consumption and Farming in South China, *The Holocene*, Vol.7, 2007(27), pp.1045-1051; Yang X., Chen Q., Ma Y., et al., New Radiocarbon and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Reveal the Timing and Route of Southward Dispersal of Rice Farming in South China, *Science Bulletin*, Vol.22, 2018(63), pp.43-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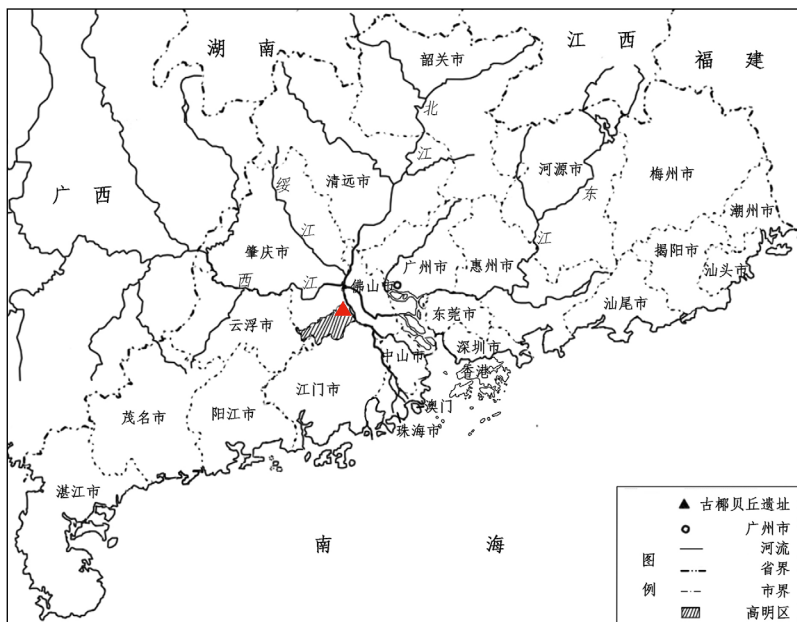
[2]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 农业出版社 1987年; 童恩正:《南方文明》, 重庆出版社 1998年; 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Zhao Z.,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52), pp.295-306.

[3] Yang X., Barton H., Wan Z., et al., Sago-type Palms Were an Important Plant Food Prior to Rice in Southern Subtropical China, *PLoS ONE*, Vol.5, 2013(8), pp.e63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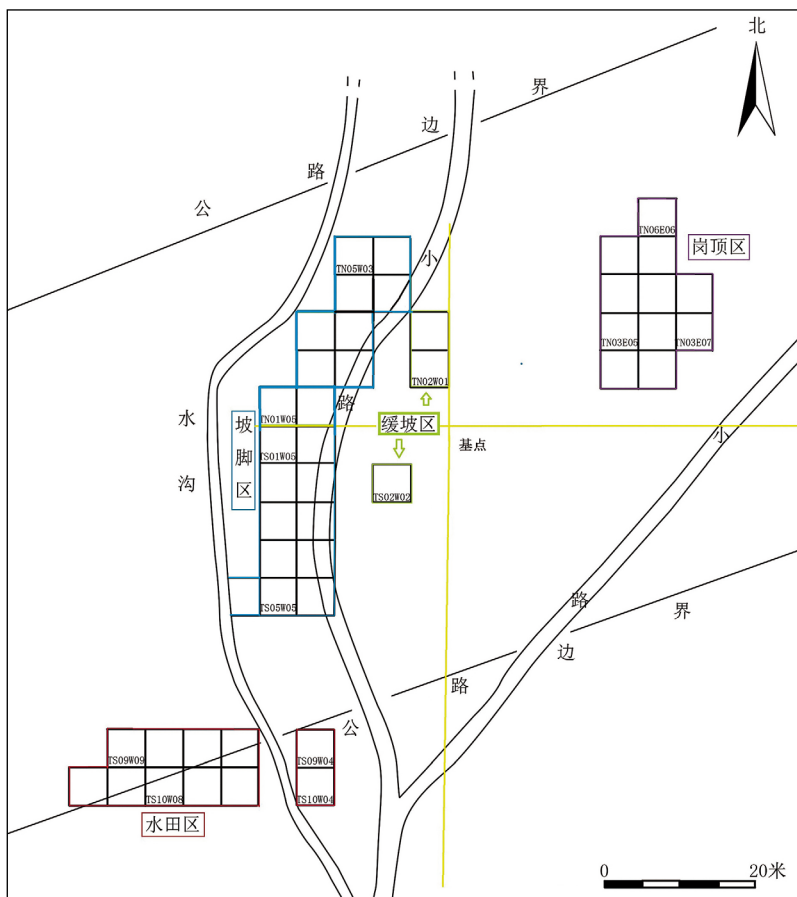
[4] Deng, Z., Hung H. C., Li Z., et al., Food and Ritual Resources in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 *Canarium* Nuts in Southern China and Beyond, *Antiquity*, Vol.372, 2019(93), pp.1460-1478.

掘(图二)期间,工作人员主要对水田区探方内的植物大遗存进行了随手收集,并将其分为86个样品。采集后,这些样品被浸泡在水中,并储存在冰箱里。我们随后对水田区植物遗存较多的4个探方——TS09W07、TS09W08、TS10W08和TS10W09的土样进行了浮选,共浮选土样864升,浮选出样品65个。^[1]对于此类土样,我们在遗址所在地采用小水桶法进行浮选,所用筛网为8目和80目。植物遗存阴干后被送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鉴定和统计。

依据考古年代学的分析结果,古椰遗址的堆积可分为四段,其中第一到第三段为早期阶段,第四段为晚期阶段。为进一步确定古椰遗址以及相关植物遗存的绝对年代,我们选择了12粒植物种子和3份陶器外壁烟痕进行碳十四测年。这些植物种子包括橄榄(*Canarium album*)、破布木(*Cordia dichotoma*)、柯(*Lithocarpus glaber*)和稻米(*Oryza sativa*),均来自遗址的早期阶段(水田区探方⑤~⑦层)。测年结果显示,古椰遗址早期阶段的年代为距今5900—5400年(表一)。^[2]



图一 古椰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二 古椰遗址探方分布图

[1] 杨晓燕、李昭、王维维等:《稻作南传:岭南稻作农业肇始的年代及人类社会的生计模式背景》,《文博》2018年第1期。
[2] 杨晓燕、李昭、王维维等:《稻作南传:岭南稻作农业肇始的年代及人类社会的生计模式背景》,《文博》2018年第1期。

表一 古椰遗址探方地层关系及其年代对照

| 性质 / 层位 (新石器) | 年代 (BP) | 浮选样品 总个数 | 采集样品 总个数 | TS09W07 | TS09W08 | TS10W08 | TS10W09 | TS09W06 | TS09W09 | TS10W06 | TS10W07 | TS10W10 | TN01W05 |
|------------------|---------------|-------------|-------------|---------|---------|---------|---------|----------|---------|---------|---------|---------|---------|
| 探方位置 | — | — | — | 水田区 | | | | | | | | | 坡脚区 |
| 探方类型 | — | — | — | 重点 | | | | 其他 | | | | | |
| 第四段 | 约 5000 | 5 | 1 | — | — | — | ④ | — | — | — | — | — | ⑦ |
| 第三段 | 5900— 5400 | 26 | 30 | ⑤ | ⑤ | ⑤ | ⑤ | ⑤ a/ ⑤ b | ⑤ | ⑤ | ⑤ | ⑤ | ⑧ |
| 第二段 | | 13 | 37 | ⑥ | ⑥ | ⑥ | ⑥ | ⑥ a/ ⑥ b | ⑥ | ⑥ | ⑥ | ⑥ | — |
| 第一段 | | 12 | 17 | ⑦ | ⑦ | | ⑦ | | ⑦ | ⑦ | ⑦ | ⑦ | — |

一、植物遗存鉴定和分析

在发掘阶段植物遗存收集的基础上,我们对探方 TS09W07、TS09W08、TS10W08 和 TS10W09 进行了浮选,因此在这里将这 4 个探方划分为重点探方,对其中采集和浮选所得全部植物遗存进行合并分析与讨论。仅在发掘阶段采集植物遗存的探方(TS09W06、TS09W09、TS10W06、TS10W07、TS10W10 和 TN01W05)出土的植物种子将单独讨论,各段的样品数统计见表一。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进行浮选的单位有限,本文不再对其出土概率进行统计。另外,测年结果显示,古椰遗址中发现的炭化籼稻应为现代扰动所致^[1],而非古椰遗址先民利用的植物资源,因此不再对出土的水稻遗存进行统计与分析。

(一) 重点探方植物遗存分析

除籼稻种子外,我们在重点探方内共发现了 45824 粒完整的、来自 33 个科的植物遗存,以及不计其数的碎块和果壳(表二),尤其是柯属(*Lithocarpus*)坚果壳(图三,1)。经鉴定,在完整的植物种子中,有 42502 粒是莎草科克拉莎(*Cladium jamaicense* subsp. *chinense*)的小坚果(图三,2),在各段中的比例均超过 89%(图四,左)。这些黑色的小坚果全部来自浮选样品,外观呈宽椭圆状球形,小尖头,基部缩细,长 0.93~1.25 毫米,宽 0.88~0.96 毫米,表面有小凸起和 2~3 条白色细纵沟。

在剩下的 3322 粒完整的植物遗存中,数量最多的是豆腐柴属的某种植物(*Premna* sp.)果实(图三,3),数量为 863 粒;其次为橄榄核(*Canarium album*) (图三,4),其完整个体有 747 粒。其他数量较多(>100 粒)的还有破布木(*Cordia dichotoma*) 637 粒(图三,5)、杜英科(*Elaeocarpaceae*) 293 粒(图三,6)、壳斗科(*Fagaceae*)坚果 202 粒(图三,7)以及楝树种子(*Melia azedarach*) 135 粒(图三,8)。

克拉莎小坚果和植物残块数量过大,第四段样品较少。若排除这 2 个异常值后可知,从第一到第三段,两种重要的食物资源——橄榄和壳斗科坚果的占比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图四,右)。橄榄核的比例稳定增长,而壳斗科完整坚果的比例在前两段基本不变,到第三段略有下降。然而,在发掘时收集的植物遗存中,我们鉴定出了无法计数的植物碎块和果皮,尤其是柯属植物的坚果壳。因此,关于这两种重点木本食物的占比和变化趋势还有待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来验证。

[1] 杨晓燕、李昭、王维维等:《稻作南传:岭南稻作农业肇始的年代及人类社会的生计模式背景》,《文博学刊》2018 年第 1 期。

表二 古椰遗址重点探方出土植物遗存完整个体数量统计

| 植物名 | | | 完整植物遗存个数 | | | | |
|----------------------|---------------------------|--|----------|-------|-------|------|-------|
| 科名 | 属名 | 种名 | 第一段 | 第二段 | 第三段 | 第四段 | 总计 |
| 莎草科 (Cyperaceae) | 克拉莎属 (<i>Cladium</i>) | 克拉莎 (<i>Cladium jamaicense</i> subsp. <i>chinense</i>) | 8107 | 13544 | 19813 | 1038 | 42502 |
|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 豆腐柴属 (<i>Premna</i> sp.) | | 279 | 272 | 312 | 0 | 863 |
| 橄榄科 (Burseraceae) | 橄榄属 (<i>Canarium</i>) | 橄榄 (<i>Canarium album</i>) | 139 | 379 | 229 | 0 | 747 |
| 紫草科 (Boraginaceae) | 破布木属 (<i>Cordia</i>) | 破布木 (<i>Cordia dichotoma</i>) | 197 | 391 | 49 | 0 | 637 |
|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 | | 72 | 180 | 41 | 0 | 293 |
| 壳斗科 (Fagaceae) | | | 61 | 103 | 38 | 0 | 202 |
| 楝科 (Meliaceae) | 楝属 (<i>Melia</i>) | 苦楝 (<i>Melia azedarach</i>) | 41 | 54 | 40 | 0 | 135 |
| 其他* | | | 112 | 231 | 96 | 6 | 445 |
| 总计 | | | 9008 | 15154 | 20618 | 1044 | 45824 |

* 包括樟科、芸香科、防己科等其他 26 个科的植物类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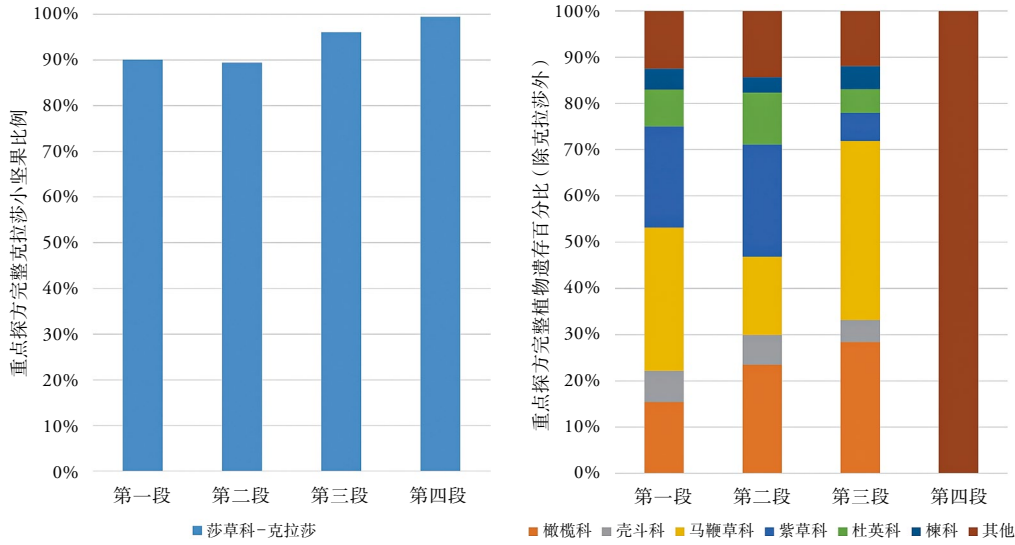


图三 古椰遗址部分植物遗存

1. 柯属碎壳; 2. 克拉莎; 3. 豆腐柴属; 4. 橄榄; 5. 破布木; 6. 杜英属; 7. 壳斗柯; 8. 苦楝

(二) 其他探方植物遗存收集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除了未发现克拉莎小坚果外,在其他探方发掘过程中采集的植物遗存来自 21 个科,其中数量较多的植物遗存与重点探方类似,仍有大量壳斗科坚果碎壳(表三)。发掘过程中采集的 29 个样品中,仅有 1 个样品来自坡脚区探方 TN01W05 的第⑦层。根据考古代学分析结果,这也是这部分植物样品中唯一一个来自第四段的植物样品。这个样品中的橄榄核数量与坚果碎壳数量均非常少,数量最多的是来自豆腐柴属的某种植物。这与水田区其他探方植物遗存的占比有较大不同,可能与堆积位置及性质有关,故暂不论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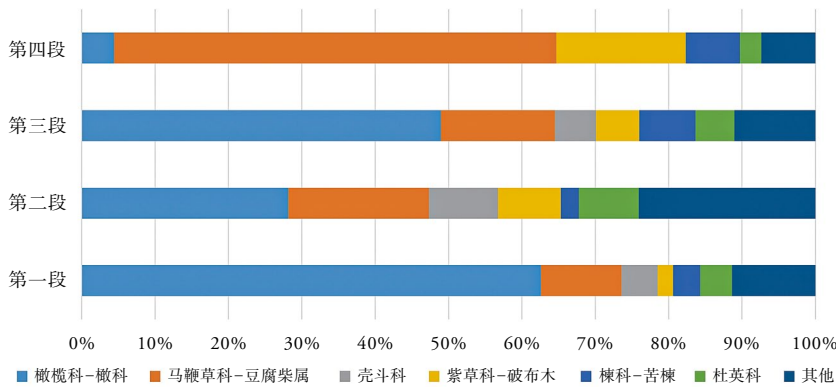
图四 古椰遗址重点探方完整植物个体比例分布*

* 克拉莎之外的其他植物仅详细列出了完整个体超过 100 的科

表三 古椰遗址其他探方收集植物遗存完整个体数量统计

| 植物类别 | | | 完整遗存个数 | | | | |
|----------------------|---------------------------|---------------------------------|--------|-----|-----|-----|------|
| 科名 | 属名 | 种名 | 第一段 | 第二段 | 第三段 | 第四段 | 总计 |
| 橄榄科 (Burseraceae) | 橄榄属 (<i>Canarium</i>) | 橄榄 (<i>Canarium album</i>) | 303 | 69 | 324 | 3 | 699 |
| 马鞭草科 (Verbenaceae) | 豆腐柴属 (<i>Premna</i> sp.) | | 53 | 47 | 103 | 41 | 244 |
| 壳斗科 (Fagaceae) | | | 24 | 23 | 37 | 0 | 84 |
| 紫草科 (Boraginaceae) | 破布木属 (<i>Cordia</i>) | 破布木 (<i>Cordia dichotoma</i>) | 10 | 21 | 39 | 12 | 82 |
| 楝科 (Meliaceae) | 楝属 (<i>Melia</i>) | 苦楝 (<i>Melia azedarach</i>) | 18 | 6 | 51 | 5 | 80 |
|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 | | 21 | 20 | 35 | 2 | 78 |
| 其他* | | | 55 | 59 | 73 | 5 | 192 |
| 总计 | | | 484 | 245 | 662 | 68 | 1459 |

* 包括樟科、芸香科、防己科等其他 26 个科的植物类别



图五 古椰遗址其他探方完整植物遗存比例分布*

* 仅详细列出了完整个体超过 100 的科

在第一到第三段遗存采集的完整植物遗存中，超过半数的植物遗存被鉴定为橄榄、豆腐柴某种植物和壳斗科(柯属)，其中橄榄核的占比最高，均超过 28%，在第一段甚至高达 63%。豆腐柴属某种和壳斗科的占比次之，且相对稳定，分别占比 11%~19%

和 5%~9%，与重点探方的结果类似。在这部分结果中，壳斗科柯属的坚果皮的数量仍然巨大，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段（图五）。因此，壳斗科完整个体的占比仅作参考。

二、讨论

（一）古椰遗址所处自然环境

从植物生长环境来看，古椰遗址出土的来自 33 个科的植物遗存可以分为水生植物和陆生植物。水生植物由于生长环境特殊，其化石通常被用来指示湿地或湖泊环境。^[1] 在古椰遗址的植物遗存中，我们鉴定出了 2 种水生植物——超过 40000 粒的克拉莎小坚果和零星的大茨藻（*Najas marina*），前者为生活在泥沼中的多年生草本植物^[2]，后者为沉水草本植物。它们的发现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古椰遗址应与一处边缘生长着大量克拉莎植物的水域相邻，即发掘过程中水田区所处的位置。然而，遗址中发现的壳斗科植物以碎壳为主，完整个体较少，应是取果仁后的废弃物。结合这一发掘区中出土的大量橄榄核以及鱼骨等情况，新石器时代此处水域周边的克拉莎草丛可能是古椰人的废弃物倾倒区域，而非储藏区域。

古椰遗址的陆生植物遗存组合以乔木为主，包含 20 个科的植物，显示遗址周边存在大片森林。具体而言，在仅统计完整植物遗存的情况下，出土频率较高的植物遗存基本都是生长在热带或者南亚热带地区的乔木或者林下灌木（表二、表三），如壳斗科柯属是华南地区常绿阔叶林中常见的建群树种之一。此外，还有少量的攀缘植物和草本植物。由此推测，古椰遗址所处环境森林植被繁盛，壳斗科柯属为优势树种，伴生其他乔木和灌木，林下草本植物稀疏。这种植被类型与孢粉分析复原的全新世中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性植被环境基本相似。^[3]

综上，新石器时代的古椰先民选择的居址应处于亚热带林地或其边缘。居址周边的低洼处存在一片被克拉莎草包围的水域，除了为古椰人提供水生资源外，也成为其倾倒废弃物的场所。

（二）古椰遗址的木本植物采集经济

亚热带和热带森林中丰富的植物资源曾经支撑了许多地区度过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由此形成的依赖森林资源的植物采集经济可能延缓了谷物农业的接受速率。^[4] 从植物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古椰先民同样善于从周边的森林资源获取食物。

尽管古椰先民已经与长江流域的农业人口有了文化上的交流^[5]，但在古椰遗址的植物遗存中并未发现常见的粟、黍、水稻等传统农作物，这意味着谷物种植等农业活动在遗址的存续期间并未成功进入古椰人的生业经济系统。遗址中壳斗科坚果及碎壳的发现描绘了新石器时代定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部分史前先民集中利用橡子的情形。古椰遗址第一到第三段均发现了完整的壳斗科坚果，尽管

[1] Huang Y. J., Ji X. P., Su T., et al., Fossil Seeds of Euryale (Nymphaeaceae) Indicate a Lake or Swamp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Miocene Zhaotong Basin of Southwestern China, *Science Bulletin*, 2015(60), pp.1768–1777.

[2] Liang X. Q., Lu P., Tiwari A., et al., New Fossil Record of Cladium (Cyperaceae) from the Middle Miocene of Zhenyuan, SW China, and the Palaeobio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Genus,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2017(237), pp.1–9.

[3] Ma T., Rolett B., Zheng Z., et al., Holocene Coastal Evolution Preceded the Expansion of Paddy Field Rice Farm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39, 2020(117), pp.24138–24143.

[4] Barker G., Hunt C., Barton H., et al., The ‘Cultured Rainforests’ of Borneo,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7(448), pp.44–61; Barton H., The Reversed Fortunes of Sago and Rice, *Oryza sativa*, in the rainforests of Sarawak, Borneo,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2(249), pp.96–104.

[5] 李岩、崔勇：《古椰贝丘遗存初识——兼谈香港沙下等相关遗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 13 集），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226–250 页。

数量不多,但占比相对稳定,结合各段出土的大量坚果壳,可推断在距今 5900—5400 年,古椰先民长期经营着一种以橡子为主的植物采集经济。

作为前农业时代关键的淀粉来源之一,以壳斗科坚果为主的植物采集经济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亚及环太平洋岛屿地区^[1],壳斗科坚果为采集狩猎人群提供了稳定的热量。古椰遗址这种以橡子为主的植物性食物结构与稍晚的依赖棕榈类西米植物的新村遗址(距今 5300—4400 年)不同,也与此前侧重植物块根块茎的假说相距甚远,应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植物采集经济类型的另一种代表。但无论新村遗址还是古椰遗址,到目前为止仍属个例,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否存在区域性的前农业时代植物利用模式仍需更多的植物考古学证据。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古椰遗址出土的壳斗科遗物遗存也反映其独特之处。首先,在植物类别上,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和北方地区以栎属(*Quercus*)为主的橡子组合^[2],古椰人似乎更偏爱柯属坚果。橡子中较高的单宁含量使其味涩而无法直接食用,需要复杂的加工处理,如通过反复浸泡或加入石灰水等手段,方可食用。^[3]但根据《中国植物志》,部分“果壁厚角质或硬木质种类”的柯属坚果,“其种仁(子叶)煮熟后无涩味,可食用或作淀粉原料”^[4],这种相对简单的处理方法或许是古椰人选择柯属坚果的重要原因,也显示古椰人对其所处的森林环境有了深入的认识。柯属坚果壳在古椰遗址第一到第三段(距今 5900—5400 年)反复大量出现,或许揭示古椰人对这类植物的集中利用,甚至为收获足够的柯属坚果,古椰人可能已经存在管理柯属树木的行为。

除了可作为碳水化合物来源的壳斗科植物坚果外,遗址中发现的可食用植物还可以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在可鉴定到种的植物类别中,数量较多的有橄榄和破布木,这两种木本植物果实即属此类。

岭南地区的先民集中使用橄榄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 9000 年左右,并在距今约 4500 年赋予其祭祀价值。^[5]古椰遗址第一到第三段出土了较多的橄榄核,表明它是古椰人在距今 5900—5400 年间稳定的植物性食物之一。与欧洲的油橄榄(*Olea europaea*)不同,中国南方的青橄榄(*Canarium album*)富含维生素且脂肪含量低,是岭南地区常见的药食两用水果。^[6]这种橄榄可生食或腌渍后食

[1] 傅稻镰、秦岭、赵志军等:《田螺山遗址的植物考古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第 47-96 页;Field J., Summerhayes G., Luu S., et al., Functional Studies of Flaked and Ground Stone Artefacts Reveal Starchy Tree Nut and Root Exploitation in Mid-Holocene Highland New Guinea, *The Holocene*, Vol.9, 2020(30), pp.1360-1374; Kawashima T., Food Processing and Consumption in the Jōmon,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404), pp.16-24; Liu L., Field J., Weisskopf A., et al., The Exploitation of Acorn and Rice in Early Holocene Lower Yangzi River, China,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29, 2010(3), pp.317-336; Messner T. C., *Acorns and Bitter Roots Starch Grain Research in the Prehistoric Eastern Woodlands*,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1; Stevens N. E., McElreath R., When are Two Tools better than One? Mortars, Millingslabs, and the California Acorn Econom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15(37), pp.100-111; Wang J., Jiang L., Intensive Acorn Processing in the Early Holocene of Southern China, *The Holocene*, 2021(3), pp.1-12

[2] 傅稻镰、秦岭、赵志军等:《田螺山遗址的植物考古分析》,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第 47-96 页;赵志军、张居中:《贾湖遗址 2001 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考古》2009 年第 8 期;Liu L., Field J., Weisskopf A., et al., The Exploitation of Acorn and Rice in Early Holocene Lower Yangzi River, China,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0(3), pp.317-336; Wang J., Jiang L., Intensive Acorn Processing in the Early Holocene of Southern China, *The Holocene*, 2021(3), pp.1-12; Deng Z., Qin L., Gao Y., et al., From Early Domesticated Rice of the Middle Yangtze Basin to Millet, Rice and Wheat Agriculture: Archaeobotanical Macro-remains from Baligang, Nanyang Basin, Central China (6700-500 BC), *Plos One*, 2015(10), pp.e0139885; Yao L., Yang Y., Sun Y., et al., Early Neolithic Human Exploi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Plant Food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426), pp.56-64.

[3] 刘耀武:《古代木本粮食——橡实》,《云南林业》1983 年第 3 期;〔日〕桥口尚武、刘恒武:《七叶树果实的食用习俗与石锤及石砧》,《南方文物》2010 年第 2 期;Tuechler A., Ferrier A., Cosgrove R., Transforming the Inedible to the Edible: An Analysis of the Nutritional Returns from Aboriginal Nut Processing in Queensland's Wet Tropics, *Australian Archaeology*, Vol.1, 2014(79), pp.26-33.

[4]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 22 卷),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32 页。

[5] Deng Z., Hung H. C., Li Z., et al., Food and Ritual Resources in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 *Canarium* Nuts in Southern China and Beyond, *Antiquity*, Vol.372, 2019(93), pp.1460-1478.

[6] 钟超、吴倩、卜智斌等:《青橄榄营养成分及加工现状研究进展》,《现代农业科技》2019 年第 19 期。

用,鲜果初入口时口感生涩,但久嚼微甜,因此也被称为“谏果”,被赋予“忠言逆耳”的文化含义。^[1]《中国药典》称其干燥成熟果实有清热解毒、利咽生津的功效,主治咽喉肿痛、咳嗽痰黏、烦热口渴,并可用于解鱼蟹中毒。^[2]

破布木同样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成熟破布木果实的果皮含胶质,且富含维生素,带有甘味和黏性。^[3]这种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却是维吾尔族的传统药材,主要用于治疗发烧、咳嗽、头痛、食欲不振和两便不利等。^[4]但在破布木的分布区,这种果实的可食用价值大于单纯的药用价值,因为其不仅具有开胃健脾的功效,还能作为调料去除鱼类和海鲜的腥味。^[5]

对比以上两种植物的功效,这两种植物果实的大量利用,除其本身的食用价值外,可能也与古椰人饮食中的鱼类海鲜有关。其余数量较少的且可以鉴定到种的可食用植物包括同样药食同源的南酸枣(果可生食,入药可消炎解毒、止血止痛或治疗烧烫伤)以及作为水果的杨梅、富含油脂的山核桃和嫩叶可作蔬菜的葫芦。

结 语

古椰遗址水田区的饱水环境为植物遗存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厌氧条件。我们通过发掘期间的采集以及相对系统的浮选工作,从中提取到丰富的超越植物饮食范畴的植物信息,为复原古椰遗址的生活环境及探究古代先民利用森林资源的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植物遗存的类型显示古椰人的居住地应当靠近一处边缘生长茂盛克拉莎草丛的水域,而在陆地环境方面,遗址周围的亚热带森林植被茂盛,林地可能以壳斗科植物,尤其是柯属植物为优势种,但林下草本植物稀疏。古椰人表现出了对环境的良好适应能力,他们可能将水域边缘的克拉莎草丛作为废弃物的倾倒场所,并十分善于利用森林资源以满足其饮食需求。除了广泛采集如橄榄等植物作为蔬果外,壳斗科坚果尤其是柯属,是古椰先民采集经济中最主要的淀粉食物来源,并且展示了其不同于其他地区以栎属为主的橡子采集策略。这些植物遗存证据展现了森林资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史前生业经济中的重要性,为研究史前人类依赖木本植物的采集经济提供了重要线索。

古椰遗址的浮选工作仍有一些遗憾。首先,植物样品分布不平衡。由于遗址水田区的第四段已经超出了水位线,在脱离厌氧环境的条件下,这一时间段内的植物遗存受自然条件影响,留存十分有限。因此在本研究中,第四段的样品仅有5个,包括来自缓坡区(TN01W05)的1个采集样品和来自水田区1个探方(TS10W09)的4个浮选样品,导致很难依靠遗址中的植物种子和果实分析古椰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古人类的植物采集策略。为此,我们在后续的植物微体遗存样品的采集和分析中做出了相应的补充,以期比较完整地复原遗址第四段的植物采集经济情况。其次,未能找出合适的方式对数量庞大的坚果壳进行统计。我们对遗址植物遗存中鉴定出的数量过于庞大的柯属坚果壳无法进行有效的统计,因此仅能用“多”来说明。这部分数据无法量化,进而无法用于分析古椰人对橡

[1] 陈皎、游宇、廖婉等:《药食同源中药青果的保健功效及现代应用探析》,《中草药》2021年第20期。

[2]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一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年,第206页。

[3] 何国生:《破布木的栽培及利用技术》,《林业实用技术》2009年第9期。

[4] 庞克坚、唐萍、魏洋等:《我国破布木属植物药用研究进展》,《中国药房》2021年第19期。

[5] 何国生:《破布木的栽培及利用技术》,《林业实用技术》2009年第9期。

子的利用规模。如何量化统计这些无法计数的壳斗科坚果碎壳来复原其在古椰人生产经济中的地位仍然是一个问题，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可以有所突破。

(责任编辑: 张红艳)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Neolithic Plant Remains from the Guye Site in Gaoming, Guangdong

Li Zhao Li Yan Ma Yongchao Ma Zhikun Li Quan Liu Changjiang Cui Yong Yang Xiaoyan

Abstract: The waterlogged environment of the Guye site well preserved the ancient plant remains, providing direct evidence to explore how the ancient people in Guye interfaced with the local plants.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and flotation-recovered plant remains at the Guye site suggests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in this settlement probably utilized the saw-grass (*Cladium jamaicense* subsp. *chinense*) at the edge of low-lying water bodies as dumping grounds for waste. They were also adept at exploiting the surrounding forest plant resource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ite to obtain plant-based foods, including nuts from the family *Fagaceae*, especially those of genus *Lithocarpus*, olives (*Canarium album*), and *Cordia dichotoma*. These results provide important evidence and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foraging economy of woody plants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even in the broader South Asian tropical region.

Keywords: Guye Site, Foraging Economy, Acorn Exploitation, Neolithic Period

(上接第 14 页)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Current Reflection on China's First Batch of Eco-museums

An Laishun

Abstract: The eco-museu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museum forms in 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field has never ceased.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first batch of eco-museums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ng these eco-museums are of great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useum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first batch of eco-museums in China were built in Guizhou, a province with a multi-ethnic population, the diversity factor therein provides certain inspi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day'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at i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o find the greatest consensu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rmers, and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be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and to achieve practical results.

Keywords: Eco-museum, New Museology, Guizhou, Su Donghai

珠江口西岸史前渔业初探*

余翀¹ 李梓杰²

1.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2. 澳门考古学会, 中国澳门, 999078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现生鱼类骨骼比对本库的建立,使鉴定与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成为可能。通过对珠江口西岸三水银洲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进行鉴定与研究,发现银洲遗址共出土至少9种鱼类标本。结合古椰遗址的研究结果,可得出史前时期这一地区的渔获都来自河口淡水及近岸水域的认识。但是,两处遗址鱼类种属的数量及其比例存在差异,说明两处遗址周围的微环境也不甚相同。

关键词: 鱼类骨骼考古 银洲遗址 古椰遗址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035-09

已有研究证实,食物与人类起源、人类进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及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 食物的种类、获取方式、加工方式以及烹煮方式的改变会引发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大的变化。^[2] 而食物的种类是讨论古人类生存手段和谋生方式等问题的重要基础,其认定方法是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3]

华南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南沿,是衔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环南中国海地区、环太平洋岛链等地区的重要地带。晚更新世以来诸多考古发现都证实这一地区是东亚早期人类迁徙史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且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4] 而全新世以来人类文明的起源与传播,尤其是南岛语系的发源与扩散,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著名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认为,我国华南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在距今约6000年前后是南岛语系的潜在发源地。^[5] 这使得该地区的考古发现备受瞩目,而岭南文明化进程研究则是广东考古学界的热点问题。^[6] 因此,这一地区的生业经济作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重要基础,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对岭南地区史前时期的生业经济模式和发展水平的认识,更多依赖于稻作农业的相关证据,以及陶器、石器等人造制品的考古学研究,而缺少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支撑。^[7]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岭南与中南半岛东海岸文明演进与文化交流的考古人类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780014)、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项目批准号:XYLC2210056)的阶段性成果。

[1] Zink K. D., Lieberman D. E., Lucas P. W., Food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Early Hominin Processing Techniqu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4(77), pp.155-166.

[2] Eng C. M., Lieberman D. E., Zink K. D., et al., Bite Force and Occlusal Stress Production in Hominin 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4, 2013(151), pp.544-557.

[3] Reitz E., Wing E., *Zoo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谢光茂:《百色旧石器与南亚、东南亚早期旧石器的关系》,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37-248页。

[5] Bellwood P., The Austronesian Dispersal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1, 1991(265), pp.88-93.

[6]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2021年第2期。

[7] 余翀:《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及周边地区的生业初探》,《南方文物》2018年第2期。

动物考古学证据缺失的主要原因,一是埋藏条件所致,二是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开展得十分有限。首先,华南地区地表被侵蚀切割强烈,丘陵广布,在长期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丘陵台地上发育出深厚的红色风化壳。在快速的生物积累过程中,土壤中还进行着强烈的脱硅富铝化过程,因此华南地区成为我国砖红壤、赤红壤的集中分布区域。^[1] 这样的埋藏环境不利于有机质的保存,因此动物骨骼基本仅见于少量贝丘遗址。其次,在该地区动物群的组成中,鱼类的种属和数量比中国同时期其他遗址都多。但是,目前我国动物考古学者的学术训练主要以哺乳动物为主,而鱼类在分类学、形态学、解剖学和生态学等方面皆与哺乳动物有巨大差异,因此以往的动物研究对鱼类骨骼的鉴定和研究提供的借鉴十分有限。同时,由于鱼种类繁多,且具有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我们很难直接受益于国际学术界已经积累的现生标本资源。此前,国内并无完善的鱼类骨骼比对本库,这一鉴定工作和个案研究最为关键的基础条件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动物考古学者对鱼类骨骼的辨识。

近年来,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协助下,笔者对广东佛山高明古椰和三水银洲两处贝丘遗址的鱼类骨骼开展鉴定和研究工作。这两处遗址系岭南地区经过系统考古发掘且出土动物骨骼数量较多、保存状况较好、采集方法较科学的史前贝丘遗址。高明古椰遗址出土鱼类骨骼的鉴定结果和初步认识已发表^[2],结合本文公布的三水银洲遗址出土鱼类骨骼的鉴定结果,我们可以管窥珠江三角洲西岸的史前渔业。

一、三水银洲遗址与研究概况

三水银洲遗址位于今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银洲村东侧一座孤立的椭圆形岗丘上。1982年,三水县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该遗址。1991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水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进行试掘。1992—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与三水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其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重点关注遗址的聚落布局和文化内涵。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西坡和东面岗底平地的贝壳密集区进行柱状取样。前后4次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近1000平方米,清理墓葬86座、灰坑102个和一批房基、柱洞遗迹,出土大量陶器残片,石铤、石镞等石制生产工具以及骨质玉石装饰品和动物骨骼。^[3]

发掘者根据遗址地层、遗迹、墓葬的层位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变化,将银洲遗址划分为三个时期,文化层主要以二期为主,一期和三期的堆积较薄^[4],本文所涉动物骨骼也主要出自二期的堆积单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银洲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可归为涌浪类文化遗存,该文化遗存以香港涌浪二期为代表,同属该文化遗存的还有深圳赤湾和鹤地山下层、珠海后沙湾二期、南海鱿鱼岗。^[5]

笔者对银洲二期柱状采样的两件哺乳动物骨骼进行碳十四测年,测年结果分别为距今 3745 ± 30 年和 3860 ± 30 年,与南海鱿鱼岗二期的数据相近^[6],使用OxCal v3.10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2280BC—2030BC(95.4%)、2470BC—2200BC(95.4%),因此银洲二期的年代应为距今4420—3980年(表一)。

[1] 黄瑞采:《关于华南土壤发育和分布规律的认识》,《土壤学报》1953年第3期。

[2] Yu C., Cui Y., Fishing-reliant Subsistence System among Prehistoric Coastal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n Ichthyoarchaeological Case Study on the Guye Sit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Vol.13, 2021(129), <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1-01381-6>.

[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水区博物馆:《广东三水区银洲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6期。

[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水区博物馆:《广东三水区银洲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6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0页。

[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实习队:《广东南海市鱿鱼岗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6期。

表一 银洲遗址动物骨骼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测试结果

| 实验室编号 | 样品 | 样品原编号 | 碳十四年代 (BP) | 树轮校正后年代 | |
|----------|-------|--------|----------------|--|---|
| | | | | 1 σ (68.2%) | 2 σ (95.4%) |
| BA151414 | 猪右眼眶 | SP1:35 | 3745 \pm 30 | 2210BC(55.7%)2130BC 2090BC(12.5%)2050BC | 2280BC(5.7%)2250BC 2230BC(1.2%)2220BC 2210BC(88.5%)2030BC |
| BA151415 | 小鹿右股骨 | SP1:11 | 3860 \pm 30 | 2460BC(30.1%)2370BC 2350BC(37.4%)2280BC 2250BC(0.7%)2240BC | 2470BC(84.1%)2270BC 2260BC(11.3%)2200BC |
| BA151416 | 猪右肩胛骨 | 92SD | 样品无法满足 实验需要 | — | — |

注: ①所用碳十四半衰期为 5568 年, BP 为距 1950 年的年代。②样品无法满足实验需要有如下原因: 送测样品无测量物质, 样品成分无法满足制样需要, 样品中碳含量不能满足测量需要。③树轮校正所用曲线为 IntCal04^[1], 所用程序为 OxCal v3.10^[2]

银洲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方法包括地层采样、全层采样和柱状采样^[3], 其中柱状采样为全国首例^[4]。多位学者对这批动物骨骼进行了研究。1995 年, 袁靖根据观察柱状取样中贝类种属的变化、河蚬尺寸和鱼类骨骼大小推测遗址从使用到废弃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海退现象, 并认为居民对鱼类的捕捞存在明显的选择性。^[5]

2000 年, 赵辉等在《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中提及在银洲遗址上“采集到的动物遗存有猪、鹿和鱼类骨骼, 贝壳类计有蚬、文蛤、牡蛎、石螺和丽蚌等, 其中蚬和文蛤的数量为最, 其余皆少见”, 而根据对岗西侧坡(二期)和东侧鱼塘底(三期)两处贝壳堆积柱状取样的初步观察, 遗址中的文蛤数量在逐渐减少, 而河蚬数量则相对增加且个体逐渐变小, 这可能反映遗址使用期间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生计活动强度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6]

2015 年, 李梓杰等对银洲遗址的人地关系进行再解读, 通过对银洲遗址柱状采样中的贝类遗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认为银洲遗址贝类种属数量结构的变化未必是海退造成的, 且遗址中的贝类不存在捕捞压, 先民对鱼类大小的选择也不存在偏好。^[7]

2016 年, 李梓杰对银洲遗址地层采样的 104 个堆积单位、全层采样 W9N2 ⑥ b 的抽样样品和柱状采样的 SP.1、SP.2 的全部样品进行了整理、鉴定与研究, 确认了方形环棱螺、钉螺未定种、中国耳螺、珍珠蚌未定种、珠蚌未定种、剑状矛蚌、背瘤丽蚌、河蚬、大蚬、长牡蛎、僧帽牡蛎、软骨鱼纲、鲤鱼、青鱼、鲢鱼、鮠科、鲷科、鳃科、龟科、鳖科、鼈、鸟纲、猪、小型鹿科、梅花鹿、水鹿、水牛、小型啮齿动物、狗、黑熊、猪獾、小型食肉动物等共计 8 纲 10 目 21 科 24 属, 并对银洲先民的生存环境、生业模式、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 以及对动物的开发和利用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银洲遗址的经济模式应以捕捞—渔猎水生资源的经济模式为主, 以饲养家畜为辅, 其中猪和狗是家养动物, 当时不存在

[1] Reimer P. J., Baillie M. G. L., Bard E., et al., Intcal04 Terrestrial Radiocarbon Age Calibration, 0–26 Cal Kyr BP, *Radiocarbon*, Vol.46, 2004(3), pp.1029–1058.

[2] Bronk Ramsey C., www.rlaha.ox.ac.uk/orau/oxcal.html, 2005.

[3] 李梓杰:《广东银洲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 25 页。

[4] 袁靖:《关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 年第 12 期。

[5] 袁靖:《关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 年第 12 期。

[6] 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组:《珠江三角洲史前遗址调查》,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 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355–403 页。

[7] 李梓杰、李岩、袁靖:《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银洲贝丘遗址古环境与人地关系的再解读》,《南方文物》2015 年第 4 期。

捕捞压的现象。^[1]

2022年,笔者对部分解剖学特征明显的鱼骨进行回访研究,鱼骨的分类与鉴定参照笔者建立的现生标本库(涵盖超过50科100属240种来自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近海鱼类和常见淡水鱼,共计约500个个体)和一些图谱。^[2]鱼类骨骼中文名参考《新鱼类解剖图鉴》^[3],鱼类科、属、种名依《中国海洋及河口鱼类系统检索》^[4]。此次回访对上述研究中鱼类种属的鉴定结果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二、银洲遗址鱼类骨骼鉴定结果

经鉴定,银洲遗址共出土鱼类9种,分别是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鲤鱼(*Cyprinus carpio*)、赤眼鲮(*Squaliobarbus curriculus*)、鲤科(*Cyprinidae*)、中国花鲈(*Lateolabrax maculatus*)、海鲰科(*Ariidae*)、褐毛鲮(*Megalonibea fusca*)、尖吻鲈(*Lates calcarifer*)和魮属(*Dasyatis* sp.)。下文依出土单位分别介绍鉴定结果。

1. 银洲二期遗迹单位出土鱼骨鉴定结果

T1 ②: 褐毛鲮角骨左侧1件。

T1 ⑤: 青鱼咽骨左侧2件。

T2 ②: 青鱼咽骨左侧1件(图一,15)。

H5 ③: 中国花鲈主鳃盖骨右侧1件;青鱼咽骨左侧2件,咽骨右侧1件,主鳃盖骨右侧1件(图一,13)。

H14 ①: 中国花鲈主鳃盖骨左侧1件,鲤科前颌骨1件(图一,3)。

H14 ④: 鲤鱼方骨左侧1件,方骨右侧2件;赤眼鲮咽骨左侧1件(图一,2);鲤科咽骨1件。

H22 ③: 青鱼咽骨右侧1件。

H26: 中国花鲈主鳃盖骨右侧1件。

H38: 中国花鲈主鳃盖骨左侧1件(图一,9)。

H45: 中国花鲈齿骨左侧1件,褐毛鲮上颌骨右侧1件。

H62: 鲤科咽骨2件。

H64: 青鱼舌颌骨左侧1件,前鳃盖骨2件,咽骨1件;中国花鲈方骨左侧1件,匙骨右侧1件(图一,10)。

H80: 褐毛鲮前颌骨左侧1件(图一,7)。

E1N1 ①: 青鱼咽骨右侧1件。

E4N1 ①: 青鱼前鳃盖骨左侧1件。

W7S2 ② a: 青鱼咽骨右侧1件。

W9N2 ③: 海鲰科胸鳍棘左侧1件(图一,11)。

[1] 李祥杰:《广东银洲贝丘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2] Nakajima T.,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Pharyngeal Teeth of Cyprinids*, Tokai University Press, Hiratsuka, 2018; Matsui A., *Fundamentals of Zooarchaeology in Japan and East Asia*, Kansai Process Limited, Kyoto, 2007; Yamazaki K., *Fish Bone Atlas*, Iwaki Junior College, 2016; Yamazaki K., Uyeno T., *Jaws of Bony Fishes*, Tailai, Kawaguchi, 2008.

[3]〔日〕木村清志:《新鱼类解剖图鉴》,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

[4] 伍汉霖、钟俊生:《中国海洋及河口鱼类系统检索》,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年。



图一 银洲遗址出土鱼类骨骼

1. 中国花鲈齿骨; 2. 赤眼鲮咽骨; 3. 鲤科前颌骨; 4. 海鲶科耳石; 5. 鲤鱼A2齿; 6. 鲟属脊椎; 7. 褐毛鲮前颌骨; 8. 尖吻鲈齿骨; 9. 中国花鲈主鳃盖骨; 10. 中国花鲈匙骨; 11. 海鲶科胸鳍棘; 12. 褐毛鲮角骨; 13. 青鱼主鳃盖骨; 14. 褐毛鲮前鳃盖骨; 15. 青鱼咽骨

W9N2 ⑥ b: 海鲶科胸鳍棘左侧 1 件。

W9N2 ⑦: 青鱼咽骨左侧 1 件。

W9N2 ⑦ b: 青鱼咽骨 1 件。

W9N2 ⑧: 褐毛鲮齿骨右侧 1 件, 前颌骨右侧 1 件, 上颌骨左侧 1 件, 方骨右侧 1 件; 尖吻鲈齿骨左侧 1 件 (图一, 8)。

W9N2 ⑨: 海鲶科背鳍棘 1 件, 青鱼主鳃盖骨右侧 1 件, 褐毛鲮角骨右侧 1 件 (图一, 12)。

W9N2 ⑩: 褐毛鲮前鳃盖骨 1 件 (图一, 14)。

SP.1: 鲟属脊椎 2 件 (图一, 6); 海鲶科胸鳍棘左侧 2 件, 耳石右侧 1 件 (图一, 4); 尖吻鲈前颌骨左侧 1 件, 前颌骨右侧 1 件; 鲤科咽骨 4 件; 鲤鱼方骨右侧 1 件, A2 齿 1 件 (图一, 5); 中国花鲈齿骨左侧 1 件 (图一, 1), 齿骨右侧 1 件, 方骨左侧 1 件。

2. 银洲三期遗迹单位出土鱼骨鉴定结果

SP.2: 鲤科咽骨 1 件。

三、数量统计

此处使用可鉴定标本数 (NISP) 和最小个体数 (MNI) 对银洲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进行数量统计。由于银洲三期仅出土 1 件鱼骨, 故下文将二期与三期的数据合并分析。银洲遗址共发现可鉴定鱼

表二 银洲遗址出鱼类骨骼可鉴定标本数与最小个体数

| 鱼类种属中文名 | NISP | 占比 (%) | MNI | 占比 (%) |
|---------|------|--------|-----|--------|
| 青鱼 | 18 | 28.13 | 8 | 28.58 |
| 中国花鲈 | 11 | 17.19 | 3 | 10.71 |
| 鲤科 | 9 | 14.06 | 4 | 14.29 |
| 褐毛鲮 | 9 | 14.06 | 2 | 7.14 |
| 海鲢科 | 6 | 9.38 | 4 | 14.29 |
| 鲤鱼 | 5 | 7.81 | 3 | 10.71 |
| 尖吻鲈 | 3 | 4.69 | 2 | 7.14 |
| 鲮属 | 2 | 3.13 | 1 | 3.57 |
| 赤眼鲮 | 1 | 1.55 | 1 | 3.57 |
| 合计 | 64 | 100 | 28 | 100 |

类骨骼 64 件, 经计算至少代表 28 个个体。其中, 青鱼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均占 28% 左右; 中国花鲈的易识别部位较多^[1], 可鉴定标本数也较多, 占比 17.19%, 因此用最小个体数进行修正为占比 10.71%; 鲤科包括无法细分的咽骨等, 数量也较多, 占比 14.06%; 褐毛鲮的出土单位较为集中 (W9N2 ⑧), 且从骨骼尺寸推断可能属于 2 个个体, 因此可鉴定标本数较多, 占比 14.06%, 最小个体数有所减少, 占比为 7.14%; 海鲢科因出土的骨骼部位主要为左侧胸鳍棘, 因此最小个体数占比 (14.29%) 比可鉴定标本数占比 (9.38%) 高。其余种属出土量均较小 (表二)。

四、古椰遗址与鱼类骨骼鉴定结果

高明古椰遗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上古椰村东北的鲤鱼岗, 1985 年文物普查时被高明县文物普查队首次发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6 年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面积达 1150 平方米。^[2] 古椰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木器和动植物遗存, 为探讨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和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被评为“200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中, 工作人员对全部泥土进行水洗, 收集了一批动物骨骼。当时使用了 2 种孔径的筛网, 大孔径的筛网是 8 目, 小孔筛网为 22 目。动物骨骼主要出自水田区的 TS09W06、TS09W07、TS09W08、TS09W09、TS10W06、TS10W07、TS10W08、TS10W09 和 TS10W10 的 ⑤ ~ ⑦ 层。对应的是古椰遗址堆积中的第一至第三段, 年代约为距今 5900—5400 年。^[3]

经鉴定, 古椰遗址共出土了包括鲮属 (*Dasyatis* sp.)、鳊鱼 (*Aristichthys nobilis*)、鲤鱼 (*Cyprinus carpio*)、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赤眼鲮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鲮属 (*Xenocypris* sp.)、翘嘴鲈 (*Culter alburnus*)、种属不明的鲤形目 (*Cyprinidae*)、黄颡鱼属 (*Pelteobagrus* sp.)、丝鳍海鲢 (*Arius arius*)、鲮科 (*Mugilidae*)、胡椒鲷属 (*Plectorhinchus* sp.)、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棘鲷属

[1] 余焯:《考古遗址出土中国花鲈与尖吻鲈骨骼的辨识——以古椰遗址为例》,《南方文物》2022 年第 2 期。

[2] 崔勇:《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 年 1 月 12 日第 2 版。

[3] 李岩、崔勇:《古椰贝丘遗存初识——兼谈香港沙下等相关遗存》,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 13 集),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226—250 页。

(*Acanthopagrus* sp.)、尖吻鲈(*Lates calcarifer*)、石首鱼科(Sciaenidae)、鲮属(*Platycephalus* sp.)、内尔褶囊海鲶(*Plicofollis nella*)、多纪鲃属(*Takifugu* sp.)等至少19种鱼类,共计2444件,是迄今为止中国动物考古研究中鉴定出鱼类种属最丰富的遗址。^[1]古椰遗址各段的鱼骨比例并没有显著差异,故下文将第一至三段的数据合并讨论。

五、讨论

(一) 鱼类骨骼在考古研究中的可鉴定程度

由上文可知,古椰遗址和银洲遗址中有部分鱼骨只能鉴定到科,如石首鱼科与鲤科等。但是,对已有对比标本的种属进行排除,仍旧能得到有益的认识。这种方法提示我们可以重点寻找哪些鱼类可用于对比标本的制作。石首鱼科在中国有15属32种,石首鱼的最佳鉴定要点是矢耳石的形态特征,主要参考的是林千翔和张至维收集的标本。^[2]但是,银洲遗址和古椰遗址中都没有发现石首鱼的矢耳石。笔者依据主鳃盖骨、前鳃盖骨、齿骨、前颌骨、上颌骨、角骨、方骨、舌颌骨和后颞骨的形态将它们认定为石首鱼科。银洲遗址出土的石首科骨骼与褐毛鲢(*Megalonibea fusca*)的形态最为接近,但是古椰遗址出土的石首鱼科与笔者收集到的9种石首鱼皆不能对应,因此它们只能是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黄姑鱼(*Nibea albiflora*)、鲢(*Miichthys miiuy*)、尖头黄鳍牙鲷(*Chrysochir aureus*)、皮氏叫姑鱼(*Johnius belangerii*)、褐毛鲢、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和黑姑鱼(*Atrubucca nibe*)等以外的石首鱼。由于许多石首鱼的现存数量较少,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还被列为易危(VU)或濒危(EN)物种,目前能够收集到现生标本的机会非常小。

鲤科的咽骨是重要的分类器官,咽齿的形状、大小、排列和数量是区分种属的关键。

表三 银洲遗址和古椰遗址出土鱼类种属鉴定结果

| 鱼类种属中文名 | 鱼类种属学名 | 银洲 | 古椰 |
|----------|---------------------------------|----|----|
| 青鱼 | <i>Mylopharyngodon piceus</i> | √ | √ |
| 鲤鱼 | <i>Cyprinus carpio</i> | √ | √ |
| 赤眼鲮 | <i>Squaliobarbus curriculus</i> | √ | √ |
| 鲤科(种属不明) | <i>Cyprinidae</i> | √ | √ |
| 黄颡鱼属 | <i>Pelteobagrus</i> sp. | | √ |
| 鲮鱼 | <i>Aristichthys nobilis</i> | | √ |
| 鲮属 | <i>Xenocypris</i> sp. | | √ |
| 翘嘴鲮 | <i>Culter alburnus</i> | | √ |
| 鲮属 | <i>Dasyatis</i> sp. | √ | √ |
| 中国花鲈 | <i>Lateolabrax maculatus</i> | √ | √ |
| 尖吻鲈 | <i>Lates calcarifer</i> | √ | √ |
| 海鲶科 | <i>Ariidae</i> | √ | |
| 丝鳍海鲶 | <i>Arius arius</i> | | √ |
| 内尔褶囊海鲶 | <i>Plicofollis nella</i> | | √ |
| 褐毛鲢 | <i>Megalonibea fusca</i> | √ | |
| 石首鱼科 | <i>Sciaenidae</i> | | √ |
| 鲮科 | <i>Mugilidae</i> | | √ |
| 棘鲮属 | <i>Acanthopagrus</i> sp. | | √ |
| 胡椒鲮属 | <i>Plectorhinchus</i> sp. | | √ |
| 多纪鲃属 | <i>Takifugu</i> sp. | | √ |
| 鲮属 | <i>Platycephalus</i> sp.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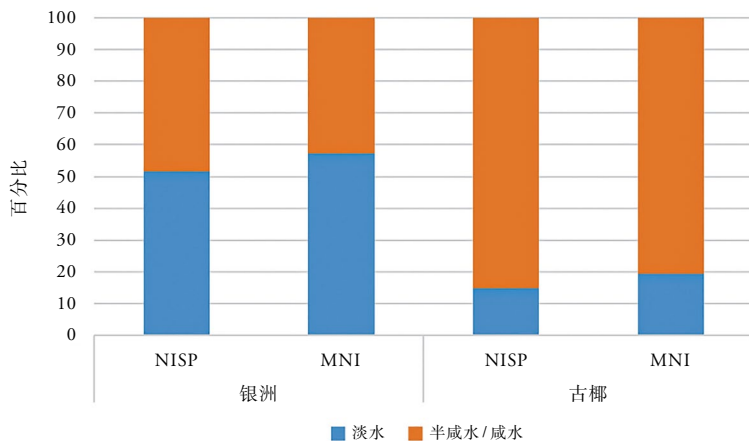
[1] Yu C., Cui Y., Fishing-reliant Subsistence System among Prehistoric Coastal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n Ichthyoarchaeological Case Study on the Guye Sit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Vol.13, 2021(129). <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1-01381-6>.

[2] Lin C. H., Chang C. W., *Otolith Atlas of Taiwan Fishes*,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Pingtung, 2012; Lin C. H., Wang Y. C., Ribas-Deulofeu L., et al., Changes in Marine Resource Consumption over the Past 5000 Year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Revealed by Fish Otolith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42, 2022, 103400. <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2.103400>.

在银洲遗址和古椰遗址中,虽然我们成功鉴定出6种鲤科鱼类,但仍有至少3种未能确认。基于目前收集到的现生标本,我们只能确认遗址出土的鲤科未定种在以下20种之外,包括倒刺鲃(*Spinibarbus denticulatus*)、花鲮(*Hemibarbus maculatus*)、唇鲮(*Hemibarbus labeo*)、鳊(*Parabramis pekinensis*)、翘嘴鲃(*Culter alburnus*)、鲮鱼(*Cirrhinus molitorella*)、鲤鱼(*Cyprinus carpio*)、赤眼鲮(*Squaliobarbus curriculus*)、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鳙鱼(*Aristichthys nobilis*)、鲫鱼(*Carassius auratus*)、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鳊鱼(*Elopichthys bambusa*)、蒙古红鲃(*Erythroculter mongolicus*)、黄尾鲮(*Xenocypris davidi*)、鲮(*Hemiculter leucisculus*)、马口鱼(*Opsariichthys bidens*)、白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宽鳍鱮(*Zacco platypus*)和桂华鲮(*Sinilabeo decorus*)。

表四 银洲遗址出土淡水鱼、半咸水/咸水鱼的数量与比例

| 鱼类生境 | 鱼类种属 | NISP | 占比(%) | MNI | 占比(%) |
|--------|------|------|-------|-----|-------|
| 淡水 | 青鱼 | 18 | 28.13 | 8 | 28.57 |
| | 鲤科 | 9 | 14.06 | 4 | 14.29 |
| | 鲤鱼 | 5 | 7.81 | 3 | 10.71 |
| | 赤眼鲮 | 1 | 1.56 | 1 | 3.57 |
| | 合计 | 33 | 51.56 | 16 | 57.14 |
| 半咸水/咸水 | 中国花鲈 | 11 | 17.19 | 3 | 10.71 |
| | 褐毛鲮 | 9 | 14.06 | 2 | 7.14 |
| | 海鲈科 | 6 | 9.38 | 4 | 14.29 |
| | 尖吻鲈 | 3 | 4.69 | 2 | 7.14 |
| | 鲷属 | 2 | 3.13 | 1 | 3.57 |
| | 合计 | 31 | 48.44 | 12 | 42.86 |



图二 银洲遗址和古椰遗址出土鱼类的比例

目前,中国有超过500种鲤科鱼类^[1],珠江流域则有超过150种^[2],占珠江流域鱼类种类的一半。广东省内有超过120种鲤科鱼类^[3],而目前笔者仅收集到20种,因此尚有部分样品只能认定为鲤科。由此可见,尽管我们所参考的已经是目前全国种属最丰富、个体数量最多的比对标本库,但仍有一定数量的样品只能鉴定到科,无法再往下细分,需要继续积累和完善标本库。

(二) 银洲遗址与古椰遗址的比较

由于银洲遗址出土鱼类骨骼的数量较少,且两处遗址的样品采集方法不同,不宜对它们的绝对数量进行直接比较。此处仅对比两处遗址出土鱼类的种类(表三)。

如表三所示,从出土鱼类的种类看,银洲遗址出土9种,不及出土了19种的古椰遗址丰富。虽然古椰遗址出土了更多种类的鱼,但不少种属的数量少且占比小:翘嘴鲃和多纪鲃属仅各出土

[1] 陈宜瑜:《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鲤形目》(中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页。

[2] 郑慈英:《珠江鱼类志》,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广东淡水鱼类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5页。

1件,占比0.04%;黄尾鲷出土4件,占比0.16%;鲮属和鳊鱼分别出土7件和9件,分别占比0.29%和0.37%。由于银洲遗址W9N2⑥b采用全层采样的方法,一共收集到体积巨大的165袋样品,故笔者只从每袋中抽取大概1%的堆积进行浮选后用作研究。若今后有机会对剩余样品进行整理,或能发现更多的种属。

两处遗址共有的种属有:属于淡水鱼的青鱼、鲤鱼、赤眼鲮和鲤科,以及属于半咸水/咸水鱼的鲮属、中国花鲈、尖吻鲈。银洲的海鲶因为缺少头骨进行种属判断,只能鉴定到科,根据笔者对环珠江口其他考古遗址出土鱼类骨骼鉴定的经验,银洲的海鲶很可能属于丝鳍海鲶或内尔褶囊海鲶,耳石的形态则更接近丝鳍海鲶。

依据鱼类的生活环境和习性,笔者将它们分为淡水鱼、半咸水/咸水鱼两类,并计算银洲遗址和古椰遗址两类鱼的比例(表四、图二)。其中,属于淡水鱼的有黄颡鱼属及所有鲤科鱼类,它们对盐度的耐受低,终身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余则为半咸水/咸水鱼,它们可以适应一定程度的盐度变化,一般生活在河流入海、近岸水域,其中的一些种属为洄游鱼类。

如图二所示,银洲遗址出土的鱼类有半数以上终身生活在淡水中,生活在河口、近岸的种属超过40%;而古椰遗址只有不到20%的淡水鱼,河口、近岸的种属超过80%。这种明显的差异反映两处遗址周围渔场环境不同。从地理位置上看,银洲遗址比古椰遗址更靠北,更靠近河流的上游,因此银洲遗址附近水域的盐度较古椰遗址低,淡水鱼的比例较高。总体来说,两处遗址出土的鱼类都是亚热带河口地区较为常见的种类,推断当时先民的捕鱼场所为居址附近,所以遗址出土鱼类种属及比例差异与遗址附近微环境有关。此外,虽然目前笔者缺乏用于推断青鱼和褐毛鲮体长的现生数据,但从图一可知,银洲遗址出土的青鱼、褐毛鲮个体巨大。与此同时,两处遗址皆未出土与捕鱼有关的遗物,关于史前捕鱼方法问题的探讨,尚有待积累更多素材后才能开展。

结 语

通过对三水银洲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进行回访研究,共鉴定出9个种属64件鱼骨,包括青鱼、鲤鱼、赤眼鲮、鲤科、中国花鲈、海鲶科、褐毛鲮、尖吻鲈和鲮属,至少代表28个个体,其中褐毛鲮在我国鱼类骨骼考古研究中属首次发现。与古椰遗址相比,银洲遗址出土的鱼种较少,反映出当时的渔场为典型的河口、近岸环境,没有发现先民至深海和远海捕鱼的证据,也没有长距离鱼类交换的证据。两处遗址所见鱼类都是现在珠江河口地区较为常见的种类,结合哺乳动物、贝类等方面的研究,可推知银洲先民的肉食来源主要依靠狩猎、拾贝和捕鱼。本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珠江口西岸史前鱼业的认识,为今后进一步探讨该时域内关于渔季、渔具、渔法等方面的问题题奠定了基础。

附记:感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崔勇研究馆员、李岩研究馆员,三水区博物馆、高明区博物馆的全体同事在鱼类骨骼研究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责任编辑:张红艳)

(下转第65页)

从汉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看农牧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

史浩成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东汉至隋唐时期, 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冲突不断, 加速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帐篷一般被视为游牧民族最具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帐篷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现, 不仅见于游牧民族的墓葬, 也见于中原汉族的墓葬, 反映出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影响。墓葬中的帐篷形象以不同形式呈现, 如陶质模型、壁画、纳骨器以及石质或木质葬具等。相关发现为探讨农牧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运用图像分析的方法, 结合民族志与历史文献材料, 可见帐篷形象的时空特征以及对应的文化传统, 进而观察此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在社会风俗与族群互动中的表现。东汉至隋唐时期正处于农牧文化相互认同、相互融合的时期, 并随“胡风东渐”这一文化传播过程, 逐渐形成“胡汉一体”的文化格局。

关键词: 帐篷形象 农牧文化 社会风俗 区域互动 胡风东渐

中图分类号: K8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044-14

帐篷很早就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居住形式及家庭组织单位, 也是区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重要标志。东汉末期至隋唐时期, 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 并在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中与中原汉族在西北地区交往日益密切, 既有器物层面, 也有社会风俗以及族群层面的交流与互动。帐篷是游牧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 在墓葬中出现较多且表现形式多样, 可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面貌及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一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帐篷已有所研究。其中, 葛承雍对载帐架骆驼俑中的帐架及毡帐进行论证, 指出其为帐篷的间接形象^[1], 但其论证多依据历史文献而较少使用民族志材料, 与考古学材料的对应关系较弱。吕红亮以青海郭里木地区出土彩绘棺板上的帐篷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穹庐”与“拂庐”进行形象辨析^[2], 但未系统梳理帐篷形象, 仅就帐篷名称有所论述。程嘉芬较之前学者更进一步, 通过考古材料中的帐篷形象分析族群互动, 又以“方形帐篷”为例进一步探讨族群互动。^[3]可见, 既有研究以辨析形象、名称及分析族群互动为主, 未对中国古代帐篷进行系统梳理, 对农耕与游牧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少有涉及。

因此, 本文将对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进行深入探讨, 将其划分为尖顶式、屋脊

[1] 葛承雍:《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

[2] 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3] 程嘉芬:《考古材料所见魏晋隋唐时期圆形毡帐形象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族群互动关系初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05-224页;程嘉芬:《北朝时期的方形帐篷与族群互动》,《中原文物》2014年第4期。

式和圆顶式三类，并进一步分析游牧文化传统与农耕文化传统下帐篷形象体现的社会生活和族群互动，以期为“胡风东渐”现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目前发现的帐篷形象共计 57 例(附表)，可分为直接形象和间接形象两类。

(一) 直接形象

帐篷的直接形象共 29 例，可分为以下 7 种形式。

1. 陶质模型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4 例。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 M2 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平城时期，尖顶式和圆顶式帐篷均有发现。尖顶式帐篷呈长方体，向上逐渐收拢，顶部似用毡覆盖，中间有 2 个天窗(图一，1)。圆顶式帐篷由下部圆形的围壁和上部隆起的顶盖两部分组成，底部呈圆形，正中开门，用毡或其他织物覆盖在伞形支架上，形成半球形的隆起顶盖(图一，2)。^[1]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太和八年(484)，为尖顶式帐篷，形制与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 M2 出土的尖顶式帐篷相同。^[2]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 M10 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太和之后，为尖顶式帐篷，形制与上述墓葬所出尖顶式帐篷类似。^[3]河南巩义北窑湾唐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盛唐前后，为圆顶式帐篷，整体呈半球形，有长方形开门，门上部为垂帐形(图一，3)。^[4]

2. 纳骨器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2 例。新疆吉木萨尔墓葬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唐代，为圆顶式帐篷，整件器体下大上小，呈毡帐形，器身塑附加堆纹，呈毡帐饰带状(图一，4)。^[5]新疆库车墓葬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唐代，为尖顶式帐篷，圆柱形器身，圆锥形器盖，子母口，装饰以漆绘为主，图案为繁缛的乐舞人物(图一，5)。^[6]

3. 石质葬具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3 例。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周大象元年(579)，圆顶式和屋脊式帐篷均有发现。圆顶式帐篷为一顶圆形虎皮纹穹隆顶帐篷，帐篷门楣一周及门框涂红彩(图一，6)；屋脊式帐篷为一入字顶帐篷占满上半部，帐篷顶饰贴金日月徽标，并有对称的花叶装饰(图一，7)。^[7]北周史君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周大象二年(580)，为圆顶式帐篷，顶部有一圆形装饰，下饰覆莲(图一，8)。^[8]太原隋虞弘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隋开皇十八年(598)，为屋脊式帐篷，

[1] 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第 66-68 页。

[2] 王雁卿：《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毡帐模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 年第 4 期。

[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M10)发掘简报》，《文物》2017 年第 11 期。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巩义市北窑湾汉晋唐五代墓葬》，《考古学报》1996 年第 3 期。

[5] 陈凌：《中国境内中古袄教徒葬俗考论(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 12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第 324-341 页。

[6] 陈文平：《流失海外的国宝·图录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 年，第 391 页。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第 20-27 页。

[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北周史君墓》，文物出版社 2014 年，第 118-119 页。



图一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

1、2.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 M2；3. 河南巩义北窑湾唐墓；4. 新疆吉木萨尔墓葬；5. 新疆库车墓葬；6、7. 西安北周安伽墓；8. 北周史君墓；9.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10. 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11. 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12. 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壁画墓；13. 新密打虎亭 2 号壁画墓；14.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 1 号墓；15.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 98-6 号墓

形制与安伽墓中的形象相同。^[1]

4. 彩绘棺板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2 例。大同智家堡北魏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平城时期，为尖顶式帐篷，用彩布织成（图一，9）。^[2]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吐蕃时期，为圆顶式帐篷，帐篷为半球形，顶部中间开喇叭状天窗（图一，10）。^[3]

5. 壁画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16 例。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壁画墓^[4]、山西省夏县王村东汉墓^[5]、新密打虎亭 2 号壁画墓^[6]、辽宁辽阳南郊街东汉壁画墓^[7]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均为东汉时期。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壁画墓为尖顶式帐篷，其余皆为屋脊式帐篷。尖顶式帐篷为长方形，由多布组成（图一，12）；屋脊式帐篷顶部由梁架构成，四角由立柱支撑，四周围挡（图一，13）。安平遼家庄东汉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汉熹平五年（176），为屋脊式帐篷，形制与上述屋脊式帐篷相同。^[8]后面所述帐篷类型与上述帐篷形象相同，此不赘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汉魏时期，为尖顶式帐篷。^[9]甘肃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 1 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曹魏至西晋时期，为圆顶式帐篷，帐篷整体呈半球形，中部开门（图一，14）。^[10]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吴时期，为尖顶式帐篷。^[11]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12]、嘉峪关魏晋壁画墓^[13]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魏晋时期，为圆顶式帐篷。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 408 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十六国时期，为尖顶式帐篷。^[14]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太延元年（435），为圆顶式帐篷。^[15]山西大同南郊全家湾北魏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和平二年（461），为尖顶式帐篷。^[16]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武平二年（571），为屋脊式帐篷。^[17]北齐高润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隆化元年（576），为屋脊式帐篷。^[18]太原南郊北齐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时期，为屋脊式帐篷。^[19]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吐蕃时期，壁画绘制于木墙之上，画面虽部分残缺，但其帐篷为半球形，上部收拢，推测其可能为圆顶式帐篷（图一，11）。^[20]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105-109 页。

[2] 刘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文物》2004 年第 12 期。

[3]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 年第 1 期。

[4]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39-40 页。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地区文化局、夏县文化局博物馆：《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文物》1994 年第 8 期。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第 290-291 页。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辽阳南郊街东汉壁画墓》，《文物》2008 年第 10 期。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 年第 21 期。

[9] 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 年第 1 期。

[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2003 年第 6 期。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3 期。

[1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 年第 7 期。

[13]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第 68 页。

[14]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 408、409 号墓》，《考古》2006 年第 12 期。

[1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10 期。

[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全家湾北魏墓（M7、M9）发掘简报》，《文物》2015 年第 12 期。

[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10 期。

[18]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 年第 3 期。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 年第 12 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 年第 8 期。

6. 木质彩绘模型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1 例。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 98-6 号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汉时期，为屋脊式帐篷，帐篷顶部有明显的梁架结构，中部开门，下部为方形（图一，15）。^[1]

7. 彩绘漆案中的帐篷直接形象

1 例。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帐篷直接形象，年代为东吴时期，为尖顶式帐篷，图案中皇室众人皆居坐于帐篷观看宴乐活动。^[2]

（二）间接形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随葬载物骆驼俑等相关陶俑逐渐流行。其中，载帐架骆驼俑最为常见，支架、帐布以及绳索是其基本构成要素。此外，有的骆驼俑还载负其他物品，可能导致形象辨认错误，故此处讨论剔除这部分载物骆驼俑。

载帐架骆驼俑的形象也见于壁画、画像砖以及彩绘棺板。葛承雍曾根据白居易《青毡二十韵》及《太平广记》等历史文献，并结合民族志材料辨析载帐架骆驼俑形象。^[3]由于载帐架骆驼形象一般只载负帐架、帐布以及绳索，较少载负其他物品，结合相关民族志材料^[4]推测其可能为帐篷拆解后的间接形象，故此处将载帐架骆驼形象归为帐篷的间接形象。

目前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帐篷的间接形象共 28 例，可分为以下 4 种形式。

1. 载帐架骆驼俑中的帐篷间接形象

24 例。河北曲阳北魏墓^[5]、洛阳孟津北魏墓^[6]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魏正光五年（524），均为载帐架骆驼形象，它们或站立，或前肢下蹲。目前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帐篷的间接形象形制大体相同，故后文仅介绍年代。咸阳市渭城区胡家沟侯义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西魏时期。^[7]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图二，1），年代为西魏大统七年（541）。^[8]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西魏大统十年（544）。^[9]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东魏武定八年（550）。^[10]北齐元良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天宝四年（553）。^[11]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西魏恭帝元年（554）。^[12]太原圪坡北齐张肃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天宝十年（559）。^[13]太原北齐张海翼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图二，2），年代为北齐天统元年（565）。^[14]太原北齐东安王

[1] 曹国新：《骆驼城出土珍贵文物》，《丝绸之路》1999 年第 3 期。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3 期。

[3] 葛承雍：《丝路商队骆驼“穹庐”、“毡帐”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3 期。

[4]〔澳〕罗杰·克里布著，李莎、唐仲明等译：《游牧考古学——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70-73 页。

[5]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考古》1972 年第 5 期。

[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 年第 8 期。

[7]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古代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91 页。

[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区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陕西西安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9 年第 4 期。

[9] 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博物馆：《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2 期。

[10]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4 期。

[11] 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磁县北齐元良墓》，《考古》1997 年第 3 期。

[1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 年第 1 期。

[13] 山西省博物馆编：《太原圪坡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第 10 页。

[14] 李爱国：《太原北齐张海翼墓》，《文物》2003 年第 10 期。



图二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

1. 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2. 太原北齐张海翼墓；3. 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4.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5. 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

娄睿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图二，3），为北齐武平元年（570）。^[1]北齐高润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武平七年（576）。^[2]安阳隋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代。^[3]陕西长安隋宋沙忻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开皇七年（587）。^[4]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迁葬墓地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开皇至大业时期。^[5]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隋大业十二年（616）。^[6]唐代富镇墓^[7]、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8]、河南省巩义市孝西村唐墓^[9]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均为唐代。偃师北窑村二号墓^[10]、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11]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均为唐咸亨三年（672）。偃师关窑唐墓^[12]、西安西郊唐墓^[13]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均为盛唐时期。巩义芝田唐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唐天宝五年（746）。^[14]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2]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陕西长安隋宋沙忻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迁葬墓地》，《文物》2005年第10期。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7] 沧州市文物局编：《沧州文物古迹》，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8] 李振奇、辛明伟：《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文物》1993年第6期。

[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省巩义市孝西村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1期。

[10]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四座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11]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文安县文物管理所：《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第1期。

[1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13] 陈安利、马咏忠：《西安西郊唐墓》，《文物》1990年第7期。

[1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巩义芝田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

2. 载帐架骆驼壁画中的帐篷间接形象

2 例。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北齐武平元年（570），为载帐架骆驼，骆驼两侧背负多个帐篷架，由赶路商人牵引。^[1]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唐神龙二年（706）北齐武平元年，其图像与上述相同。

3. 载帐架骆驼画像砖中的帐篷间接形象

1 例。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盛唐时期，帐篷载于骆驼架上，骆驼由商人率领（图二，4）。^[2]

4. 载帐架骆驼彩绘棺板中的帐篷间接形象

1 例。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出土的帐篷间接形象，年代为吐蕃时期，帐篷载于骆驼架上（图二，5）。^[3]

二、帐篷形象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分布

根据上述考古材料，可归纳出帐篷形象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分布特点。

东汉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都是直接形象，且仅见于墓室壁画，分布于当时属边疆地区的内蒙古、辽宁、山西以及甘肃等地。由此推测，此时期的帐篷形象可能一定程度上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数量增多，既有直接形象也有间接形象，两者数量相当，见于墓室壁画、葬具、载帐架骆驼俑以及陶质模型，地区分布范围较东汉扩大，集中在北方以及西北地区，中原地区也有少数发现。由此推测，游牧文化在此时期进一步往南传播扩散。

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基本为间接形象，形式以载帐架骆驼俑为主，此外也见于墓室壁画及画像砖，远离中原的青海地区则以彩绘棺板上的直接形象为主，体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差异。此时期的帐篷形象主要分布在关中及中原地区，在西北及青海地区也有部分发现。由此可见，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帐篷形象受到游牧民族南下和西来影响，呈现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如屋脊式帐篷逐步融入中原汉族家庭的日常生活，所见场景皆为身着汉服的人们宴饮或居家闲坐。综上可见，其深受农耕传统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的特点。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见于北方及西北地区，不见于南方地区，表明帐篷在北方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这些帐篷形象既表现出农耕文化因素，也表现出游牧文化因素，反映出此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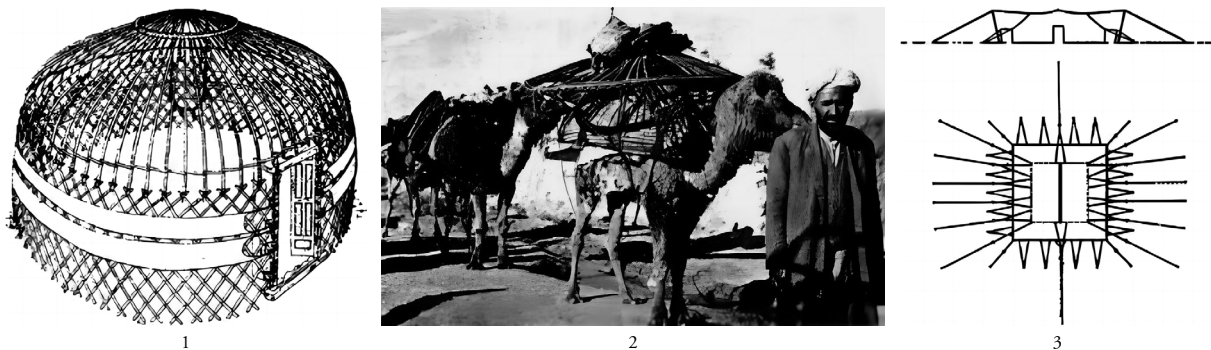
三、帐篷形象背后的文化传统

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帐篷显现出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形象。从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来看，这些形象可归入游牧和农耕两大文化传统。这一时期中亚及北方草原民族的墓葬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第30-31页。

[2]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2年第1期。

[3]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图三 圆顶式帐篷及黑帐篷

1. 蒙古包式帐篷；2. 帐篷骨架及帐篷的运输（中东地区圆形毡帐）；3. 黑帐篷结构示意图

中尚保留大量游牧文化传统中的帐篷形象，如北魏司马金龙墓^[1]、北周安伽墓^[2]、隋虞弘墓^[3]等，而这些帐篷形象又可根据其结构归为圆顶式、尖顶式、屋脊式三类。受农耕文化影响，关中及中原地区的墓葬中，部分帐篷形象逐渐呈现出屋脊式帐篷特征，这种形象亦反映出农耕文化特质。然而，在隋唐时期墓葬中，帐篷的间接形象仍保留了一定的游牧文化痕迹。

由此可见，这些帐篷形象背后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

（一）游牧文化传统

1. 圆顶式帐篷

圆顶式帐篷^[4]与中国内蒙古地区以及土耳其地区所见的圆形毡帐（图三，1）形制相似，这类帐篷一直存在于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多用弯曲的木枝相互交错形成经纬结构，并在顶部形成圆形的透气口，外附毛毡，拆分之后用骆驼运输（图三，2）^[5]。这种形制的帐篷与文献记载中的“穹庐”相符：“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6]结合使用这类帐篷的民族分布区域推测，穹庐属于典型的游牧文化传统帐篷。

2. 尖顶式帐篷

尖顶式帐篷与北非、中东的阿拉伯以及中国境内青海、四川西北部等地区的黑帐篷（图三，3）相似^[7]，都采用尖顶式的帐篷结构，这类帐篷主要以支撑帐架、具有张力的帐布以及绳索相互固定而成，外观如房屋一般，因此容易被农耕文化所接受。^[8]历史文献中的“拂庐”可能指向这种帐篷形象，《通典》记载：“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毡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9]此处“张大拂庐”应指帐篷特性，其具有一定张力，与黑帐篷一致。此外，文献记载中采用这

[1]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第20-27页。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第105-109页。

[4]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193-196页。

[5] 程嘉芬：《考古材料所见魏晋隋唐时期圆形毡帐形象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族群互动关系初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第205-224页。

[6]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761页。

[7] A. Manderscheid, The Black Tent in its Easternmost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21, 2001(2), pp.154-160.

[8] [澳]罗杰·克里布著，李莎、唐仲明等译：《游牧考古学——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第71-73页。

[9]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百九十《边防六·西戎二·吐蕃》，中华书局1988年，第5171页。

种帐篷的地区与考古材料显示的地区分布相符，推测“拂庐”即尖顶式帐篷。

（二）农耕文化传统

从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发现的帐篷形象来看，早期北方或西北边疆地区主要受游牧文化影响，其帐篷形象多为圆顶式帐篷，而中原的河南、河北以及山西等地则出现了受游牧文化影响产生的屋脊式帐篷形象。^[1]这种帐篷形象源于游牧文化中的尖顶式帐篷，与中原地区使用的帷帐不同。帷帐在中国古代属于重要的室内陈设，有遮挡坐具、卧具的功能，根据不同的遮挡方式又有幕、帷、幄之分，主要作为家具在室内使用。屋脊式帐篷虽然采用中国古代建筑的屋脊造型，且多与屏风组合，具有较突出的农耕文化特点，且形制逐步摆脱游牧文化传统风格，但其结构和使用方式仍保留游牧文化传统帐篷的可移动性与用于室外临时居住的特点。

由此可见，中国境内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所见的帐篷形象，部分源于游牧文化传统的帐篷，主要见于游牧民族的墓葬。然而，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部分中原地区的墓葬亦开始出现帐篷形象，并逐渐发展为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屋脊式帐篷形象。在此过程中，载帐架骆驼形象在墓葬中仍显著体现游牧文化传统特点，主要见于隋唐墓葬，且多与胡人俑同出，反映出“胡风东渐”的文化传播现象。

四、农牧文化交流与互动区域

东汉至隋唐时期，游牧民族与中原往来频繁，他们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将游牧文化带入中原地区，与中原本土的农耕文化传统相互碰撞。在此过程中，游牧民族不仅吸收了农耕文化，还改变了部分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中原汉族也积极吸收游牧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帐篷形象揭示了社会活动中游牧文化的丰富内涵，随葬的陶俑则体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的特点，总体反映了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的状况。

（一）社会活动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反映出较丰富的社会活动，根据不同活动场景中的具体内容，可将社会活动分为以下五类。

1. 宴飨

宴飨场景常见于壁画及葬具，且涉及不同民族，如新密打虎亭汉墓中的宴乐图（图四，1）^[2]、北周安伽墓石质葬具上的宴饮图以及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彩绘棺板上的宴飨画面等。这些宴飨活动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逐渐被中原地区各阶层接受，且比较受重视，这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一定程度上受“胡风东渐”的影响。

2. 游猎

游猎场景可见于壁画及随葬陶俑，如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的捕鸟图（图四，2）^[3]、北周安伽墓石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Z1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90-291页。

[3]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0页。



图四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帐篷形象反映的社会活动

1. 新密打虎亭汉墓宴乐图；2. 嘉峪关魏晋壁画墓捕鸟图；3. 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商旅图；4.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壁画墓屯营戍卫图；5. 北齐徐显秀墓夫妇并坐图

质葬具上的狩猎图等，反映出狩猎活动已成为当时较重要的社会风俗。《开元天宝遗事》“探春”条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1]。这种探春活动与狩猎较相似，表现出游牧文化传统的特点。

3. 战争

战争场景较为少见，仅在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中有所发现，该墓葬群壁画有屯营戍卫的军事战争场景（图四，4）^[2]，由此推测这一时期帐篷形象所反映的战争冲突较少，侧面体现出游牧文化在壁画装饰题材中选择较为温和的表现形式，以及“胡风东渐”的渐进式特点。

4. 居坐

居坐场景较常见于壁画，且大部分出现在中原地区墓葬中，表现出农耕文化的特点，如山西省夏县王村东汉墓居坐图、北齐徐显秀墓夫妇并坐图（图四，5）^[3]等。帐篷形象中的居坐场景一般是夫妇并坐，正视向前，表现墓主人夫妇在地下世界的生活场景。不仅如此，这种帐篷形象也常与屏风组合

[1]〔五代〕王仁裕、〔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卷下，中华书局2006年，第56页。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6期。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出现,构成帐与屏的组合空间,用以表达墓主人地下生活的空间区分及布局。

5. 贸易

贸易场景常见于壁画及随葬陶俑,其中壁画画面多表现胡人商贩与载帐架骆驼,且有商品货物的出现,由此推测其题材为商旅出行,如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商旅图(图四,3)^[1]、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行商图以及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画像砖等。以上墓葬中,商旅贸易活动画面中的间接帐篷形象集中见于隋唐时期,侧面揭示了隋唐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二) 族群互动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帐篷形象反映的墓主人身份、画面内容以及葬俗,主要涉及三大族群,即北方草原民族、西域胡人以及中原汉族,他们自东汉至隋唐以来一直不断互动交流,通过战争、贸易等方式,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逐渐融合。

东汉至魏晋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南下入侵中原,其中以鲜卑为主。这一时期发现帐篷形象的墓葬中均可见到具有鲜卑族文化因素的随葬器物,如雁北师院北魏墓中的具装骑俑、鲜卑服饰人物俑以及鳖甲车^[2]等。随着鲜卑势力的壮大,部分汉族墓葬中发现的帐篷现象也表现出鲜卑文化特征,它们多处在鲜卑统治区域内,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游牧文化风格,但其中也保留了汉族文化的特征。

隋至初唐时期,北方的突厥发展较盛,不断入侵中原,但在与唐朝的战争中落败,部分突厥人由此迁入中原地区,并将风俗习惯带入中原,北方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在此时期逐渐以一种较缓和的方式与汉族农耕文化融合。汉族的居室文化也与突厥的毡帐文化相互影响,文献中有关唐代日常使用帐篷的记录逐渐增多,如太子李承乾在宫中“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3],搭设毡帐以游玩。这表明此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受到汉族文化吸引,而汉族也在吸收游牧文化,形成一种文化融合的趋势。

盛唐以后,西域胡人大批进入中原开展贸易、传教等活动,他们将中亚、西亚的习俗带入中原。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大量胡人俑、骆驼俑等随葬器物表现出明显的中亚、西亚文化特色。此外,此时期西域胡人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西亚粟特地区使用的葬具纳骨器^[4],以及入华胡人墓葬中发现的石椁、石榻等石质葬具都表现出汉族农耕文化风格,但装饰图样仍保留了一定的西域风格^[5]。可见这一时期西域胡人与汉族之间的互动十分密切,农耕与游牧文化相互融合,有别于传统游牧文化传统的帐篷形象因此得以形成,折射出“胡风东渐”的文化传播过程。

综上所述,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西域胡人以及中原汉族的兴衰而流转变。在此期间,各文化的风格在帐篷形象上有所反映,游牧与农耕文化相互排斥直至彼此融合,成为当时的趋势。帐篷形象背后的社会风俗也逐渐为各个阶层所接受,成为一时社会风尚。

结 语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的帐篷形象,为研究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及族群区域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帐篷形象反映了该时期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趋势。通过分析不同形式的帐篷形象,可以辨

[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崔氏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2] 刘俊喜主编:《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第66-67页。

[3]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6190页。

[4] 林梅村:《高昌火袄教遗迹考》,《文物》2006年第7期。

[5] 姜伯勤:《中国袄教画像石的“语境”》,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析“胡风东渐”的文化现象，进一步了解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的实际情况。此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陶质模型、纳骨器、石质葬具以及骆驼俑等遗存。同时，涉及游猎、宴飨、居坐以及贸易等活动的遗存也开始表现出农耕文化特色，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时期沿丝绸之路产生的文化交流与区域互动。从这一时期墓葬所出的帐篷形象表现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来看，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文化逐渐相互渗透和吸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帐篷作为游牧民族文化标识的象征符号也逐渐被中原汉族所接受，成为两种文化融合的标志之一。

（责任编辑：张红艳）

Examin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Societies through the Images of Tents Discovered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mbs

Shi Haocheng

Abstract: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 were constant conflicts between nomadic people and the Han Chine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accelerated th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ultures. Tents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most symbolic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nomadic people, and the images of tents were found in a large number of tombs in this period, not only in the tombs of the nomadic people, but also in those of the Han people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flecting that the nomadic culture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agricultural culture. The images of tents in these tombs were also presented in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ceramic models, murals, cinerary urn, and stone or wooden burial objects. The relevant findings provid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for explor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societies. Using the method of image analysis and combining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can discov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s of the tents mentioned above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n observ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fusion of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ultures in terms of social customs and interactions of ethnic groups during this period.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t was a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recogni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ultures. Along with th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process known as “eastward spread of the Hu style”, a cultural pattern of “integration of Hu and Han” gradually formed.

Keywords: Images of Tents,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ultures, Social Customs, Regional Interaction, Eastward Spread of the Hu Style

附表: 东汉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帐篷形象汇总

| 墓葬 | 年代 | 帐篷类型 | 载体 |
|-------------------------|--------------|---------|----------------|
| 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小板申村壁画墓 | 东汉 | 尖顶式 | 卧帐图, 后室西壁 |
| 山西省夏县王村东汉墓 | | | 夫妇并坐图, 前室东壁 |
| 新密打虎亭 2 号壁画墓 | | 屋脊式 | 宴乐百戏图, 中室北壁 |
| 辽宁辽阳南郊街东汉壁画墓 | | | 宴饮图, 北耳室西壁 |
|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群 98-6 号墓 | | | 木质青庐模型 |
| 安平逯家庄东汉壁画墓 | 东汉熹平五年 (176) | 屋脊式 | 墓主人坐帐图, 中室右侧南壁 |
| 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 | 汉魏时期 | 尖顶式 | 宴饮图, 右小室右壁 |
| 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苦水口 1 号墓 | 曹魏至西晋时期 | 圆顶式 | 进食图, 墓葬中室 |
| 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 | 东吴时期 | 尖顶式 | 宫闱宴乐图漆案 |
| 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 | 魏晋时期 | 圆顶式 | 墓室壁画 |
| 嘉峪关魏晋壁画墓 | | | |
| 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 408 号墓 | 十六国时期 | 尖顶式 | 庄园生活图, 墓室后壁 |
|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 M2 | 北魏平城时期 | 尖顶式、圆顶式 | 陶帐房 |
|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 | | 尖顶式 | 彩绘棺板画 |
|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 | 北魏太延元年 (435) | 圆顶式 | 宴饮图, 墓室南壁 |
| 山西大同南郊全家湾北魏墓 | 北魏和平二年 (461) | | 宴饮图, 墓室北壁 |
| 北魏司马金龙墓 | 北魏太和八年 (484) | 尖顶式 | 釉陶毡帐模型 |
| 山西大同云波路北魏墓 M10 | 北魏太和之后 | | 陶毡帐模型 |
| 北齐徐显秀墓 | 北齐武平二年 (571) | | 夫妇并坐图, 墓室北壁 |
| 北齐高润墓 | 北齐隆化元年 (576) | 屋脊式 | 墓主人图墓室北壁 |
| 太原南郊北齐墓 | 北齐时期 | | 主人并坐图, 墓室北壁 |
| 西安北周安伽墓 | 北周大象元年 (579) | 圆顶式、屋脊式 | 围屏石榻 |
| 北周史君墓 | 北周大象二年 (580) | 圆顶式 | 石堂 |
| 太原隋虞弘墓 | 隋开皇十八年 (598) | 屋脊式 | 石椁 |
| 新疆库车墓葬 | 唐代 | 尖顶式 | 舍利容器 |
| 新疆吉木萨尔墓葬 | | | 纳骨器 |
| 河南巩义北窑湾唐墓 | 盛唐前后 | 圆顶式 | 陶帐形器 |
| 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 | 吐蕃时期 | 圆顶式 | 彩绘木棺板 |
| 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 | | 推测为圆顶式 | 帐居图, 后室西壁 |

直接
形象

(续表)

| | 墓葬 | 年代 | 帐篷类型 | 载体 | |
|-------------|-------------------|-------------|-------------------------------|-------------------------------|---------|
| 间接形象 | 河北曲阳北魏墓 | 北魏正光五年(524) | 间接形象的帐篷为拆解形式,故无法直接辨别其具体所属帐篷类型 | 陶骆驼 | |
| | 洛阳孟津北魏墓 | 北魏正光五年(524) | | | |
| | 咸阳市渭城区胡家沟侯义墓 | 西魏时期 | | 载丝骆驼 | |
| | 西魏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 | 西魏大统七年(541) | | 陶骆驼 | |
| | 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 | 西魏大统十年(544) | | | |
| | 东魏茹茹公主墓 | 东魏武定八年(550) | | 陶骆驼俑 | |
| | 北齐元良墓 | 北齐天宝四年(553) | | | |
| | 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 | 西魏恭帝元年(554) | | 陶骆驼俑 | |
| | 太原圉坡北齐张肃墓 | 北齐天宝十年(559) | | 陶骆驼 | |
| | 太原北齐张海翼墓 | 北齐天统元年(565) | | | |
| | 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 北齐武平元年(570) | | 陶骆驼; 驼队图, 墓道东、西壁 | |
| | 北齐高润墓 | 北齐武平七年(576) | | 间接形象的帐篷为拆解形式,故无法直接辨别其具体所属帐篷类型 | |
| | 安阳隋墓 | 隋代 | | | |
| | 陕西长安隋宋沙忻夫妇合葬墓 | 隋开皇七年(587) | | | 陶骆驼 |
| | 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迁葬墓地 M6 | 隋开皇至大业时期 | | | 牵驼胡俑 |
| | 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 | 隋大业十二年(616) | | | |
| | 唐代富镇墓 | 唐代 | | | 陶骆驼 |
| | 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 | | | | |
| | 河南省巩义市孝西村唐墓 | 唐咸亨三年(672) | | | 三彩骆驼俑 |
| | 偃师北窑村二号墓 | | | | |
| | 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 | 盛唐时期 | | | 陶骆驼 |
| | 偃师关窑唐墓 | | | | |
| | 西安西郊唐墓 | 盛唐时期 | | | 骆驼俑 |
| |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 | | | | |
| | 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 | 唐神龙二年(706) | | | 三彩骆驼 |
| | 巩义芝田唐墓 | 唐天宝五年(746) | | | 胡商牵驼模印砖 |
| 青海德令哈夏塔图吐蕃墓 | 吐蕃时期 | 牵骆驼图, 墓道东壁 | | | |
| | | 三彩骆驼 | | | |
| | | 彩绘木棺板 | | | |

集体记忆在考古成果展中的运用*

朱琳 黄洋

上海大学文化信息与遗产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 考古成果展为强调考古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 开始重视考古集体记忆在展览中的运用。考古成果展对集体记忆的呈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作为考古工作者集体记忆的外化形式, 能够打破公众对考古的刻板印象, 消除公众对考古认知的偏差,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目前,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主要运用于诠释知识和渲染情感, 但是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内容的完整性尚且存疑。考古成果展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呈现方式也存在内容与形式的协调性问题。这些不足仍待完善。未来,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除加强对考古集体记忆的采集外, 还可从打造沉浸式展项与协助开展教育活动等方面努力优化。

关键词: 集体记忆 情感共鸣 沉浸式体验 考古 展览

中图分类号: G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 (2024) 01-0058-08

考古成果展不仅向公众展示考古出土的文物, 还向公众科学普及相关考古知识, 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当前, 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展不再只强调出土文物, 而开始重视隐藏在物背后的人的作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作为弘扬考古文化内涵与精神的外化形式, 也逐渐运用到考古成果展中。因此, 关于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作用与实践的研究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一、考古集体记忆和考古集体记忆载体

(一) 考古集体记忆的相关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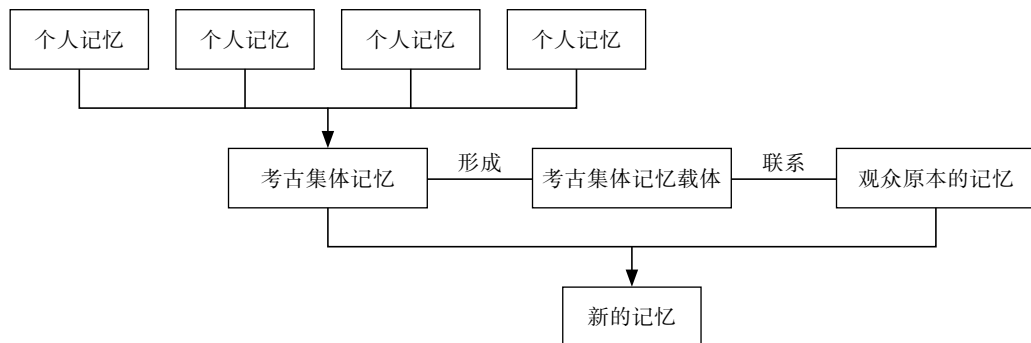
1. 考古语境下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 又称群体记忆, 是某一集体对过去共同经历的事情的回忆。一个集体的构成并不需要庞大的人员数量。实际上, 两个人也能构成一个“社会”, 而此时的集体记忆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构筑出来的“物”。^[1]如此一来, 共同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就能形成一个考古集体, 他们对自己过去工作的回忆可被称为“考古集体记忆”。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 (Avishai Margalit) 将集体记忆区分为共同的记忆和共享的记忆, 前者是经历并记录了某个事件的所有记忆, 是所有人的记忆之和; 后者并不是个人记忆之间的简单相加, 而是融合了不同人的不同视角所形成的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忆。^[2]考古集体记忆属于后者, 是考古工作者从各自视角对考古工作的回忆, 最终形成他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化解码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21CKG025)的阶段性成果。

[1]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2] 李桂艳:《集体记忆的价值认同功能》,《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7年第5期。



考古集体记忆重构图

的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认为,集体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构,重构过去的框架由当下的社会决定。因此,他强调集体记忆的可重构性,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框架下,集体记忆可以重建过去的记忆,并且每个记忆都与当时的社会主导思想相一致。^[1] 这表明为满足当下社会的需求,过去的记忆会被不断重构,形成新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还指出,“只要我们把自己置于群体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采取它的反思倾向”^[2],那么我们就把自己的记忆汇入这个集体的记忆。这也说明,人们可以在媒介的帮助下,使自己置于某一集体的记忆之中,从而使自己的记忆与该集体的记忆融合。如上图所示,在考古语境下,不同考古工作者将各自的记忆相融合,形成考古集体记忆。该集体记忆为满足当下社会弘扬考古文化内涵、展现考古人精神的需要,不仅对考古出土的珍贵文物进行阐释,并且对过去的考古工作进行回顾。考古成果展则利用记忆的可重构性,通过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使从未有过考古记忆的观众与考古集体记忆产生联系,让观众参与当前考古集体记忆的建构,从而拉近他们与考古的距离,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2.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

集体记忆通过口头交流和物质信息记录两种渠道保存。^[3]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作为考古集体记忆的外化形式,可以分为考古口述信息和考古物质信息记录两种表现形式。考古口述信息指考古工作者以口述的形式回忆过去参与考古工作时所经历的人和事,并且通过录音、录像等形式将这段记忆保存下来,后期进行梳理与整合,形成相关的视频、音频以及文本。考古物质信息记录又可分为考古工作者自己创造的物品和考古工作者工作时使用的物品。考古工作者自己创造的物品包括考古发掘日记、编写的考古报告和手稿以及参与测绘的图纸,它们多以文字或图片等形式存在。考古工作者工作时使用的物品多指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勘探、发掘、绘图以及修复等工具和设施设备。它们可以作为展品帮助观众了解不同的考古业务活动。总而言之,考古集体记忆载体指从事考古工作的个人或集体将过去关于其工作的回忆以物质或非物质形式保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物。

(二)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运用于考古成果展的发展历程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考古成果展中的运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民国时期,考古成果展已经出

[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2]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第93页。

[3] 管健、郭倩琳:《共享、重塑与认同:集体记忆传递的社会心理逻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现。20世纪20年代,地质矿产陈列馆举办了仰韶文化展览,展览专门开辟一个展厅展示考古工作人员的调查图稿。^[1]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为展示河南殷墟以及山东城子崖的出土文物,举办了为期4天的考古成绩展览会。展览周围的墙壁上张贴了放大的考古工作照片以及图表。^[2]1931年,在山西省古物展览会中,除在展厅墙壁四周张贴发掘现场的照片外,考古学家卫聚贤还在现场进行讲解。^[3]这一时期,考古成果展在内容上着重展示考古出土的文物,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以反映考古工作的文字说明、照片及图片的形式出现,在展览中起辅助作用。

20世纪50年代,我国出现了遗址博物馆这一博物馆新类型,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开始与考古遗址结合。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实现重大突破,其中“文物外交”起了重要作用,但出国出境展览中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不多。20世纪90年代,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在考古成果展中得到普及。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过去40年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集中陈列,通过展示田野考古地图和邀请考古工作者来现场进行解说^[4]的方式与观众共享考古记忆。1997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在展厅的最后通过展示考古现场照片向观众介绍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的诞生、发展和取得的成果。^[5]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展览中的比重逐渐增大且运用形式有所创新。

21世纪以来,考古成果展重视传播考古文化内涵。随着科技的发展,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考古成果展的应用形式更为多样。展览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应用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反映考古学科发展的博物馆,其策划的展览会使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以便向大众普及考古工作。例如,陕西考古博物馆作为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以考古学学科发展为主线,以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遗迹遗物为展示对象,向公众展示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现场保护、实验室修复、文物考古学研究等工作及考古学科发展史。第二种形式是在考古成果展中运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如首都博物馆举办“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时,在尾厅专门设计多媒体放映厅,展示海昏侯考古发掘的视频资料,启发人们对身边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6]首都博物馆还在“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展览中展示考古发掘工具,为观众营造考古发掘现场的氛围,使他们感受考古学的魅力。^[7]第三种形式是在通史展中运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这类展览在展示该地区的考古遗迹或考古学文化时,为使观众更直观地了解考古发掘过程,会运用考古记忆载体使展览内容更完整。这一阶段的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开始在考古成果展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衬托出土文物价值的辅助展品变为传播考古展览目的的重要展品。

二、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作用与价值

(一) 向“以人为本”转变的具体实践方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博物馆学界兴起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对博物馆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博物馆逐渐从“以物为主”向“以人为本”转变,这里的“人”不仅指重视博物馆的观众,也包括关

[1] 杨颖、高蒙河:《中国公众考古展示的实践历程》,《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2] 杨颖、高蒙河:《中国公众考古展示的实践历程》,《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3] 《晋省古物展览会》,《申报》1931年4月2日第7版。

[4] 邢义田、严文明、杜正胜等:《考古研究所四十年研究成果展览笔谈》,《考古》1991年第1期。

[5] 邵文良:《〈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成功展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

[6] 龙霄飞:《让展览成为文化事件——“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的策划与实施》,《文物天地》2016年第8期。

[7] 李梅:《“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展览创意浅析》,《中国博物馆》2009年第4期。

注博物馆的相关专业人员。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是博物馆向“以人为本”转变的具体实践。

不同于单纯依赖馆藏文献与重要实物的传统展览，考古成果展不局限于将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作为展览的主要内容，还逐渐加大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考古成果展中的运用，与博物馆“以人为本”观念的变革一起对人们的记忆进行重构，从而展现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价值，促进观众对考古文化内涵与考古人精神的认知。例如，2022年长沙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发·现——长沙考古七十年成果巡礼”展览，不仅介绍考古队成员在考古发掘中使用的工具，还在展览结束时重点展示考古队员，让观众在了解考古成果的同时，还可以感受考古人的精神。同年举办的“服务太忻 考古先行——太原考古成果展”，虽然仍以展示发掘出土的陶瓷器为主，但也展出了探铲、手铲、考古日记、研究成果等展品。这些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作为考古人的回忆，直接或间接展现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突出人在考古发掘中的地位。

（二）消除公众对考古认识的偏差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完全遵照法定体系开展相关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发表工作。^[1]但是在现实中，公众对考古的认识仍然存在误解与偏差。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观众对考古的误解与认知偏差。

1. 缓解陌生感，扩大考古普及范围

由于考古工作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公众缺少了解的渠道。另外，考古作为一个小众行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少，再加上高度的专业性，因此公众对考古工作普遍感到陌生。

虽然公众没有太多专业考古知识，但是记忆是可以传递的。记忆至少以两种重要的方式在人际间传递，一种是经历过的记忆被分享，另一种是将从未经历过的信息整合到记忆中。^[2]对考古集体记忆来说，考古工作者以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形式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分享给他人，然后这些记忆载体又将所蕴含的考古集体记忆传递给没有经历过考古工作的公众，公众再把这些信息整合到自己的记忆中，从而使公众构建一个与考古有关的新记忆。集体记忆可以通过外在形式把回忆固定到未来的符号中并以此与后代维系一种共同的回忆。^[3]在考古语境中，集体记忆的外在形式指的便是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考古成果展运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使观众即使没有考古发掘工作的经验，也能与考古产生联系，从而维系公众与考古之间的关系，消除他们对考古工作的陌生感。2018年，南京市博物馆举办“铲释三城——宁镇扬三地考古成果展”，通过展示考古发掘过程的照片和听考古人讲述考古故事，观众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考古工作的认知。

2. 打破刻板印象，提升考古的“温度”

部分文博机构常以“镇馆之宝”为噱头博取公众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博物馆的展览起到了宣传作用，但也给公众留下了“考古发掘等于官方寻宝”^[4]的刻板印象。为消除观众对考古行业的误解，树立正面形象，大力宣传考古文化内涵迫在眉睫。

山西考古博物馆的“考古的温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以青灯黄卷、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山西的考古工作者为开篇，展示“十三五”期间山西考古成就，以及山西考古工作者

[1] 魏峭巍、方辉：《公共性与社会化：公共考古学与公众考古学之思辨》，《考古》2018年第8期。

[2] 管健、郭倩琳：《共享、重塑与认同：集体记忆传递的社会心理逻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3] 冯亚琳、〔德〕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余传玲等译：《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4] 张婧文：《公共考古学视角下考古文化的阐释与传播》，《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在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上的新认识，将考古人的田野、读书、情感、生活展现给观众，让严肃的考古学有高度也有温度。^[1]这里所谓的“温度”，是考古工作者的考古日记、工作照片和使用的工具等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它们作为考古人情感的寄托、工作生活的缩影，使“人”在考古展览中的形象变得丰满，考古工作也因此变得有“温度”。

（三）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随着博物馆的工作逐渐从关注藏品转向关注人、人与藏品的关系以及藏品与人的双向互动上^[2]，研究人员开始重视博物馆观众的共情体验。共情是指对他人感受和处境的理解，是个体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系统综合形成的，通常被认为是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结合体。^[3]在考古成果展中采取共情策略，不仅可以帮助观众了解考古成果的重要价值，还可以让观众体会考古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实现考古与观众的双向互动，引发情感共鸣。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展览中是构建观众与考古之间关系的桥梁，使得大众能够共享考古集体记忆，从而深化观众对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的认知。记忆载体从考古人的角度向观众讲述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人与事，使观众快速进入考古发掘的场景。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2023 年举办“探索未知 记忆荆楚——湖北省 2022 年度考古工作成果展”，该展览的一大亮点就是专门设置了一面展示湖北考古项目风采的照片墙，将考古队的工作照和项目负责人的感悟以图版的形式贴在墙上供观众参观。

三、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现状与问题

（一）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现状

目前，考古成果展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运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诠释知识。由于观众难以理解专业性过强的考古成果，展览利用记忆载体通俗易懂的特征，用质朴的语言向公众诠释考古学文化。例如，口述信息作为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一部分，可以帮助观众理解学术性强且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陕西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在介绍考古历程时大量运用反映考古发掘历程的照片和考古工具，向公众解释考古工作的内容及陕西考古的具体成果。同时，展览通过邀请考古从业人员进行访谈或播放工作回忆的相关视频，让更多人了解考古工作。

另一种类型是运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渲染情感。考古成果展为促进观众更好地体会考古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促进展览与观众的双向互动，会运用主观情感强烈的考古集体记忆载体来烘托展览气氛。例如，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山东”展览展示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如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器物图、田野发掘日记与发掘报告。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往往极具个性化色彩，可以为人们提供具体、真实、生动的细节，也让人们可以带着情感认识考古。观众对考古发掘遗址往往会感到震撼，对考古工作者的艰辛会产生由衷的敬佩，从而更有效地传达考古成果展的意图，触动观众的情感之弦。

（二）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运用的问题

1. 内容的完整性存疑

以口述信息形式存在的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其内容的完整性较难把握。因为口述资料是考古人的

[1] 王媛：《投身桑田探未知 叩问苍穹溯本源》，《山西经济日报》2022 年 2 月 22 日第 7 版。

[2] 龚良、张蕾：《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品质、效能与评估》，《东南文化》2019 年第 2 期。

[3] 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等：《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心理科学进展》2009 年第 5 期。

回忆,难免会有遗漏与缺失。人在经历某一事件后,会形成短期记忆,其中只有少部分重要的、具有意义的记忆会被保存下来成为长期记忆。之后,相关记忆被重复提及、诉说,在这一过程中,记忆不断被加工。在口述采访的过程中,相关记忆再一次经过加工重构被叙述出来,经记录后形成最终的口述材料。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偏差,这些记忆已不是完整的记忆,而是相对完整的记忆。

2. 展示内容与形式难权衡

在考古成果展中,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主要作用是介绍考古发掘过程,展现考古人的精神面貌,但仅将考古集体记忆载体摆放在展厅里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记忆载体的表现形式缺乏吸引力,导致考古成果展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运用无法最大限度发挥其内容优势。例如,展览对考古学者工作日记和使用物品的展示模式仍然以静态陈列为主,不能充分体现展品本身的情感内涵,但如果展览过于强调形式,又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因此展示内容与形式难以平衡。

四、考古集体记忆载体未来实践的优化建议

未来,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实践过程中,除了要仔细甄别载体内容的真伪以及平衡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外,应当探索记忆载体更多的采集和运用途径,使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价值得到更充分地展现,从而更好地为考古成果展服务。

(一) 加强集体记忆的采集

考虑到记忆具有时效性,搜集集体记忆的时间越遥远,人们就越难获取全面的信息。因此,为了确保内容的完整性,工作人员应当及时记录考古发掘过程中的集体记忆,并将其转化为考古集体记忆载体。

首先,健全考古集体记忆采集制度。例如,制定口述档案资源采集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除 201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有条文涉及“传统口头文学”并要求“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外,目前没有其他与口述档案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议结合国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将口述记录纳入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从而确保该项工作落到实处。

其次,丰富考古集体记忆采集方式。考古负责人应当在考古工作中重视采集考古集体记忆,最好是边工作边采集,日清日结,从而保证记忆的相对准确性与完整性。在采集考古集体记忆时,应该以视频、照片等音像形式记录记忆。此外,考古工作日记也是集体记忆转化为记忆载体的有效途径。

(二) 打造沉浸式展项

“沉浸体验”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是指个体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某种活动中后无视外物的存在甚至忘我时的一种状态,并且个体由此产生了充实感、兴奋感、幸福感,因此也被称为“最佳体验”(Optimal Experience)^[1]。考古成果展应该利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语言通俗、形式多样的特点,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进行利用,让观众沉浸其中。目前普遍认为博物馆所营造的沉浸式氛围主要归功于新媒体技术,但史蒂文·比特古德(Stephen

[1] 景娟娟:《国外沉浸体验研究述评》,《心理技术与应用》2015年第3期。

Bitgood)认为,产生沉浸体验需要四个因素:物理空间的利用、环境反馈、多感官刺激以及实物。^[1]所以,考古成果展应当多利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的优势打造沉浸式展项,帮助观众快速进入考古集体记忆,体会考古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

首先,使用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传播考古知识。考古集体记忆载体是考古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考古记忆的表现形式,内容通俗易懂,便于观众理解。因此,可以在展厅中播放考古工作者的口述音频、影像,讲述相关考古专业知识,可以帮助观众在后续参观时更好地理解展览。

其次,利用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营造多感官体验。多感官体验是让观众产生沉浸感的重要手段。“博物馆应该更多地考虑‘身体’与体验以及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本体感觉等感官体验之间的组合与复杂交互”^[2],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包含音频、田野发掘日记、手稿以及使用的工具等多种形式,适合策划多感官体验展项。在视觉上,观众可以观看考古工作者口述影像和他们日常使用的考古工具。在听觉上,可以邀请考古专家录制语音导览,让观众一边参观一边收听相关展品的故事及信息。在触觉上,考古工具可以设置互动展项,甚至在展厅里设置模拟考古场景,让观众现场“参与”和感受考古工作现场,试用相关考古工具,学习考古发掘的关键流程。

(三) 协助开展配套教育活动

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可以直接或间接协助举办配套教育活动。展览可以邀请考古学者举办学术讲座,分享他们的考古记忆,传播考古学知识,弘扬人文精神。2016年,在“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期间,首都博物馆举办讲座,邀请考古专家分享考古发掘经历和考古学界对妇好墓及其个人的最新认识。^[3]2022年,“服务太忻 考古先行——太原考古成果展”专门在展览中设置了南北长9米、东西宽7米的讲座活动区,利用大型电子显示屏播放讲座课件,观众可以随时观看。

展览也可以利用新技术对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进行再加工,使记忆载体转化为教育活动的辅助工具。展览可以根据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照片复原考古现场环境;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工作日记、报告和手稿还原特定的考古发掘情境;根据考古人使用的工具模拟考古工作场景,从而丰富教育活动的內容。目前,已有考古成果展将VR与记忆载体相结合来辅助展示教育。“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虚拟考古体验馆都运用了此技术,参观者戴上VR眼镜,古墓、随葬品、人骨架等仿佛就在眼前,观众犹如置身考古现场,与考古工作实现“近距离接触”。展览以喜闻乐见的新技术、新方式,让参观者亲身感受考古的魅力。

结 语

历史是一个国家的根脉,考古工作者的任务便是探寻与保护国家的根与脉。考古集体记忆作为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记忆,能帮助大众了解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传播考古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展现考古工作者的精神。考古集体记忆载体在考古成果展中的运用使公众与考古产生联系,将观众原本

[1] 赵昕宇:《沉浸理论在考古成果展中的早期实践——以〈西汉齐王墓陪葬坑陈列〉为例》,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编:《2021年“博物馆与多元学科的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335-343页。

[2] 王思怡:《〈多感知博物馆:基于触摸、声音、嗅味、空间与记忆的跨学科视野〉——突破博物馆传统展陈设计的新理念》,《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8年第6期。

[3] 巩文:《刍议考古成果展览、展示与公民素质教育》,《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年第6期。

的记忆汇入考古记忆之中，重构新的集体记忆。考古集体记忆载体能拉近考古与观众的距离，消除大众对考古的认知偏差，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未来，考古成果展需要深入挖掘载体内容，为观众打造沉浸式展项，让观众多感官地欣赏、倾听、触摸和感受记忆载体，丰富观众的观展体验。考古集体记忆载体作为考古人记忆的外化形式，不应再作为出土文物的陪衬隐于幕后，而应成为考古成果展不可或缺的展品，成为展览人文性的重要表征。

（责任编辑：吴昌稳）

The Applic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Zhu Lin Huang Y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humanistic spirit of archaeology, 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has begu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exhibi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rchaeological exhibitions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As an external form of collective memory for archaeologist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rs can break public stereotypes about archaeology, eliminate public biases in archaeological cognition, and trigger emotional resonance among the audience. At present,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rs are mainly used for interpreting knowledge and rendering emotions, but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of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rs is still questionable. In addition, there is also an uneven coordination between content and form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rs in 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se shortcomings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besides enhancing the coll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ies, we can optimize the archaeological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r by creating immersive exhibition projects and coordinating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Emotional Resonance, Immersive Experiences, Archaeology, Exhibition

（上接第 43 页）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Fisheries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Yu Chong Li Ziji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men database of bone comparison of living fish in China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identify and study the fish bones unearth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fish bones unearthed from the Yinzhou site on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it was found that a minimum of nine species of fish specimens were unearthed at the Yinzhou sit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Guye sit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ishing in this region during the prehistoric period mainly came from freshwater in river mouths and nearshore waters. However,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quantity and proportion of fish taxa between the two sites, indicating that the micro environments around the two sites were also not quite similar.

Keywords: Ichthyoarchaeology, Yinzhou Site, Guye Site

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实践研究

刘欣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100034

内容提要：红色文创产品是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触发人们重建集体记忆的线索，是强化红色文化认同的媒介。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以红色文化内涵研究为基础，通过围绕革命馆情境确定创意主题、红色文化层次分析、侧重精神层次的产品开发、依据消费者反馈优化产品设计等方法，探索红色文创产品在文化上的有形塑造、行为表达和精神传达的转化路径。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实践以产品销售数据为检验，利用产品品类的拓宽增加观众感官体验的维度，强化革命文物元素的呈现触发人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文物符号象征性转化体现红色精神文化内涵，从而深化观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促进革命文物的研究与利用，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关键词：北大红楼 集体记忆 红色文创产品 设计实践

中图分类号：G269.2/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10(2024)01-0066-08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1]红色文创产品是指以红色文化为依托，创新性地提取红色文化的核心元素，经过创意设计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此类产品以革命文物与历史事实为依据，在具有普通商品经济属性的同时，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传播等文化属性。当前我国红色文创产品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都尚在探索中。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在追求产品价值的同时，他们更看重从产品的使用中获取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2]因此，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应以红色文化研究为基础，在满足产品商品属性的基础上，注重拓宽其在精神层面的情感化表达。红色文化相关的集体记忆依附于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以下简称“革命馆”）的特定场域或物件，文创产品可以提取这些信息，刺激消费者的记忆，建构他们的革命意象，从而强化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理论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文创产品开发的意义，与文化三层次理论相配合，为革命馆提供清晰的产品设计思路，在具体的产品设计中探索文化的有形塑造、行为表达和精神传达的转化路径。

本文集中探讨以革命馆为依托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理念与设计方法，整合北京大学红楼（以下简称“北大红楼”）的红色文化，综合其展示空间的客观情境和消费者参观后的主观反馈，分析北大红楼文创产品设计的实践工作。本文探讨的红色文创产品均已在市场上销售，下文将通过案例对产品销售数据展开分析，验证产品设计方法的可行性，并进行若干反思。

[1]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

[2] 于尚艳、李华轩：《感知价值对参照群体与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的中介作用》，《探索》2013年第4期。

一、基于集体记忆与文化层的文创产品设计理念

(一) 革命馆红色文化与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理论由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其在《论集体记忆》中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他认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于集体,群体通过分享共同的记忆,获得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塑造稳定的集体和社区。我们保存着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长存。^[1]从功能视角看,集体记忆有助于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能够维持群体的稳定和完整。从建构视角看,集体记忆是由群体共同建构、传承和共享的,包括个体的回忆与群体层面的记忆。博物馆是记忆的载体与媒介,展品与参观者共同构建沟通系统。博物馆通过展品遴选、展陈设计、路线规划、讲解、教育等方式构建符合某种历史话语的叙事系统,强化相关参与群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生成。^[2]集体记忆需要提取与转化,并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呈现。革命馆开发的红色文创产品作为承载红色文化的媒介,以一种贴近群众的方式触发人们的集体记忆,进而赢得市场的认可。在开发红色文创产品之前,我们需要对红色文化与产品设计的理念进行深度研究。

(二) 基于文化层理论观察产品设计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等方面对文化进行阐述。他指出,物质文化决定文化的水准,精神文化作用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紧密联系。人在一定界限内生活,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则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自动运行的。^[3]马凌诺斯基揭示了文化的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该理论的提出对其后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裕富认为,文化是指一种对“各种人群”生活的区别与理解,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形而上层次文化(思考活动与语言)、形而中层次文化(人群相处与互动的制度)、形而下层次文化(人所使用的器物与具体可见的形式),这三个层次相互指引辩证,使得目标的“各种人群的生活”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来。^[4]徐启贤、林荣泰根据文化三层次理论,对产品设计要素进行阐述,包括实体的(物质的)、使用行为的(仪式习俗的)、意识形态的(精神的)三个层次,分别对应文化产品属性的三个层次:色彩、质感、纹饰与线条、造型等要素,功能性、操作性、结构性、结合关系等要素,产品的故事性、产品感情及文化特质等要素。在此基础上,寻求文化特色与产品呈现之间合理的转换路径,将产品语义学、情景故事法相结合,得出一种相对通用的文化产品设计程序。^[5]

有研究指出,红色文化的内涵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6]器物形态的红色文化是以革命文物、遗迹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文化是在上述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与革命道德传统等。因此,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要对文化层次进行整体分析,使其相互关联,启发产品创新设计,通过产品外观与功能设计,抒发情感并传达意义,利用有形的物质符号承载无形的红色精神文化,呈现红色文化的价

[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2] 燕海鸣:《博物馆与集体记忆——知识、认同、话语》,《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3期。

[3] [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4] 杨裕富:《设计的文化基础:设计、符号、沟通》,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5] 徐启贤、林荣泰:《文化产品设计程序》,《设计学报》2011年第4期。

[6] 刘琨:《红色文化研究》,辽宁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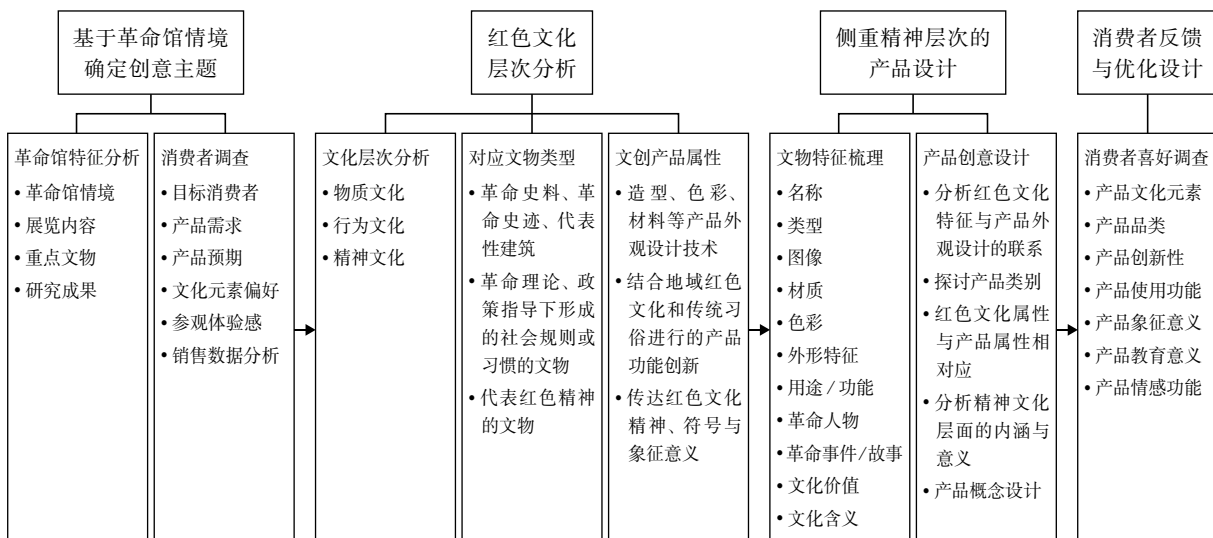
值理念。红色文创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在具体的产品开发中,需通过红色符号的提取、叙事性表达、象征意义引申等设计策略,在体现革命文物具象形态的基础上,更突出产品背后的革命精神。^[1]

因此,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理念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通过产品外观对观众进行刺激,从而与其记忆中的红色文化形成联系,产生情感共鸣。其次,透过产品的功能与细节,激发观众在使用过程中对特定记忆产生联想。最后,触发观众对相关联的物件、情景与人物的记忆,从精神层面引发情感认同。红色文创产品的开发价值要体现在意义层面,承载红色文化的文创产品对社会文化建设、群体交往、文化传播等应产生积极影响,将集体记忆融入产品设计,通过产品增强集体凝聚力与归属感。

二、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红色文创产品开发应达到三个目的。第一,红色文创产品作为红色文化的显性载体,需要体现革命文物最具代表性的外特征;第二,红色文创产品要有教育公众的作用,以产品为载体对社会公众进行红色教育,触发集体记忆,激发公众的爱国热情;第三,红色文创产品是红色文化传播的媒介,要有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象征意义,旨在让消费者产生对红色文化产生认同,并自觉进行红色文化传播。

基于上文的探讨,结合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实践经验,本文提炼出革命馆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模型(下图)^[2]。该模型围绕基于革命馆情境确定创意主题、红色文化层次分析、侧重精神层次的产品设计、消费者反馈与优化设计四部分展开,强调革命文物、革命人物、博物馆人、设计师、产品、公众之间的联系。“博物馆人”“设计师”和“公众”是集体记忆建构的主体。“产品”是集体记忆的载体,通过各种形式激发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具体来看,“博物馆人”对“革命文物”与“革命人物”进行研究,并向公众进行阐释,“设计师”对“博物馆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创新性转化,对“革命文物”与“革命人物”相关文化元素进行提取与运用,而实体“产品”则让“公众”与“革命文物”“革命人物”“博物馆人”“设计师”产生连接并激发观众的集体记忆。



革命馆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模型

[1] 刘欣:《基于红色文化空间的文创产品开发——以北大红楼红色文化空间及文创产品为例》,《博物院》2023年第1期。

[2] 作者自制。

第一，基于革命馆情境确定创意主题。红色文创产品创意源于革命遗址或革命馆的空间，场所中曾经被使用的物件、活动于其中的人、发生的重要事件都以物的形式存储。在产品创意之初，需要充分利用研究成果，分析革命馆的情境，梳理展示空间语义与展览内容、文物内涵、革命人物与历史故事等，使产品的设计元素与观众参观过程中接触到的信息相呼应，让观众可以通过产品回忆参观经历并进行情感体验。

第二，红色文化层次分析。基于文化三层次理论，对革命馆红色文化进行分析，明确对应的产品属性。物质文化层面，通过对革命文物外观与造型的提炼，在产品造型、色彩、材质设计上进行创意转化，直观体现革命文物的特征。制度文化层面，对革命文物原始的用途、使用方法和作用进行分析，注重产品的功能，让消费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加深对文物特征的理解，领悟文物背后的故事。精神文化层面，博物馆要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含义、情感表达进行研究，通过产品设计，让消费者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体会先辈高尚的信念与崇高的精神。

第三，侧重精神层次的产品设计。精神形态、物质符号、文化记忆构成红色文化传承内容的三维形态，其中精神形态是核心，物质符号是载体，文化记忆是重要形式。^[1] 革命文物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承载着珍贵的集体记忆。因此，精神层面的创意设计是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核心理念与重点。一方面，围绕文物本身的特征与含义，借助产品语义学对红色文化元素进行提取、解析与创意转化，整合为承载独特文物信息的创新形态产品，或是承载完整文物信息的综合性产品。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和使用行为与重点文物、重点展项进行关联，提炼红色文化精神，设计生产文创产品。

第四，消费者反馈与优化设计。在文创产品概念设计与小规模生产阶段，利用问卷、访谈或销售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消费者喜好进行调查，包括对产品文化元素、产品品类、产品使用功能、产品创新性、产品多重意义、产品情感功能等方面的调查，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接受程度，评估产品量产的可行性，扩充接受度高的文化元素所设计的产品品类，并优化产品设计。

三、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实践

（一）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主题的确立

革命文物是北大红楼红色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红色文创产品的主要创意来源。北大红楼的革命文物分为以北大红楼历史建筑为标志的不可移动文物和以文物史料为主要形态的可移动文物。下文以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为例，探讨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实践。

北大红楼建成于1918年，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是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2]的物质见证。北大红楼在展示策略上凸显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重点人物，用珍贵文物资料讲述其背后的故事，人、事、物、场所相互作用体现红楼特有的红色精神文化。

经过整体修缮保护与展览提升，北大红楼于2021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文创商店也在同期营业。截至2021年12月底，北大红楼累计接待观众近16万人次，其中35岁以下的参观群体占近50%，未成年观众约占24%。针对目标观众，北大红楼重点开发了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新款产品。文创团队综合近5

[1] 文丰安：《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1期。

[2]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中国文物报》2022年1月4日第5版。

年的产品销售数据,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同时结合展览内容与情境、北大红楼革命遗址的特征等,进行主题明确的系列化产品开发。文创产品的主题根据展示内容确定,产品的创意元素全部源自展览中的文物,主要包括以《新青年》杂志为创意元素的“新青年”系列产品、以北大红楼建筑为主要元素的“北大红楼”系列产品、以新文化及建党重要人物和史料为元素的“新文化运动”系列产品。

北大红楼曾是北京大学校部、文科和图书馆所在地,许多革命人物以北大红楼为平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北大红楼保存的革命文物以纸制品居多。因此,学习用品类产品成为承载红楼集体记忆的优选媒介,观众在使用笺纸、毛笔、笔记本等产品时,能够联想到革命人物曾经学习与思索的过程。结合以往产品的销售数据,我们最终将学习用品作为北大红楼文创产品的核心品类。同时,推出生活用品、服装、饰品和食品等品类。由于“新青年”主题是开发最完善的系列文创产品,因此下文以其为重点探讨文创产品的开发思路。

(二)“新青年”系列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

消费者购买一个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产品与其个人的情趣品味是一致的。^[1]因此,基于学习用品类产品的设计需求,结合观众对北大红楼红色文化元素的认知度,综合展览中的重点展示对象,提取集体记忆中的符号,我们发现《新青年》杂志最适合用作文创产品开发的创意元素。

《新青年》是激发人们产生集体记忆的核心线索之一。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至1926年杂志终刊,共出版63期。“新青年”系列文创产品以《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为主要开发对象,从文化三层次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物质层面上,杂志为16开,封面“新青年”三个红色中文字体非常醒目。《新青年》作为中国最早使用新型美术字体的刊物之一,字体设计受西方无衬线体和日本哥特体的影响,字体笔画粗壮、棱角分明,字形紧凑,同时保留了传统宋体字的严谨结构,字体整齐美观,具有强烈的视觉识别性和冲击力。^[2]中文字体下是法文“青年”——LA JEUNESSE,独特的盾牌形线条框内为杂志当期“要目”,整个杂志通过红黑两色以及不同字体与字号体现现代平面设计意识。制度层面上,杂志对新思想、新文化进行传播,推动文学革命与文学创作,推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精神层面上,它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具有启蒙意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等人都曾在该杂志发表文章,至今还有人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精神力量。

在产品设计上,参照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法模型中“文物特征梳理”的内容,我们对文物的特征进行详细整理与分析。基于纸质文物的特点,设计师很容易联系到文具类产品中的笔记本,因此将文物向笔记本产品进行转化。笔记本封面影印文物图像,沿用杂志的尺寸。在沿用杂志外形的基础上,发挥纸质载体的传播功能,将文物最初的文化传播功能延续到文创产品上,笔记本内页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包含有关《新青年》刊物发展历程的珍贵馆藏史料。

在物质文化层面,该系列产品的设计比较注重造型、线条、色彩,并结合精神层面的深层含义,以“新青年”中文和法文文字为核心元素,保留其独特的字体,经过二次创意设计为标志图案,应用于新形态的产品上。值得一提的是,冰激凌产品的造型提取《新青年》封面中间“要目”的边框,将“新青年”中文和法文文字组合为创意图案,开发立体盾牌形的“新青年”冰激凌。从文化含义上看,产品定位为讲“新青年”的故事,文字字体与边框元素的提取,是一种继承与创新,也让具有视觉冲击的“新青年”文字继续发挥文化与传播的作用。

[1] 包德福:《基于文化意象的产品设计方法研究》,浙江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5页。

[2] 肖云:《民国时期期刊封面中的字体设计》,《美术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

认识和理解红色文化,进而认同并积极践行红色文化,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基本过程。^[1]红色文创产品不只在吸引人的注意,更在于叙说红色故事,进行革命教育,触发集体记忆,正向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立场。集体记忆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建构。^[2]观众对《新青年》杂志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官方定义与革命馆的研究成果上,这种集体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将集体记忆融入产品,也是革命馆参与集体记忆建构的主动行为。《新青年》杂志作为集体记忆的承载物,与当代“新青年”称号形成双关语,不仅代表早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也寓意在新时代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做当下的“新青年”。“新青年”也是一种符号,产品使用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与“爱国”“有为”等标签产生联系,有助于传承红色文化。

(三) 文创产品销售数据反馈

前有提及,本文所讨论的文创产品均已实现量产,并在位于北大红楼的文创商店进行销售。通过2021年7—12月^[3]文创商店商品的销售数据来看,“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和“北大红楼”系列文创产品的销售数量分别占总销量的69.6%、17.1%和13.3%。由此可见,产品创意主题与展示情景相呼应、突出重点革命文物元素、通过符号转化体现革命精神等产品的设计策略是成功的。在各类别产品的销售量统计中,“新青年”系列中食品和学习用品类产品销量占该类产品销量的76.4%;“新文化运动”系列中学习用品类产品销量占该类产品销量的48.1%;“北大红楼”系列中纪念类产品销量占该类产品销量的52.4%。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元素在产品属性上各有侧重。比如,“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系列产品的文化元素源于纸质革命文物,因此在产品的设计上采取与文物材质和造型相通、功能与结构近似的转化策略,其中学习用品类产品最多。北大红楼建筑作为一种承载集体记忆的符号,以该建筑为元素开发的产品更需要突出纪念性与情感价值。

进一步来说,在北大红楼文创单品销售量方面,销量最高的产品是“新青年”冰激凌,其次为“新青年”系列的笔记本、帆布包、徽章等,其中使用《新青年》原版封面做设计的笔记本居文具类产品销售榜首。该笔记本具有文物的外观特征,内含珍贵历史知识,且具备二次创作的延展性功能。消费者可在购买笔记本后打卡盖章,盖章后的产品不仅具有专属的个性,也更具有收藏价值。提取原版文物封面图案印制的“新青年”帆布包辨识度强,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而经二次设计的“新青年”创意组合图案背包销量不够理想。因此,在产品投入市场后,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与使用体验,及时优化“新青年”系列产品设计,注重拓宽原版封面元素产品的品类,淘汰辅助元素较多的设计图案,并开发突出“新青年”文字特点的创意性产品。

(四) 红色文创产品设计策略反思

第一,食品设计拓宽革命馆文创开发视野。“新青年”冰激凌单品销售量占产品总销量的37.2%,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食品文创能够增加感官体验的维度,近些年受到媒体与消费者的高度关注;“新青年”文化元素被消费者熟知并认可,是引发集体记忆的核心线索之一;冰激凌产品外观设计源于文物中的元素,造型独特。从消费结构角度看,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偏高,即“吃”占开支的比重偏大。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人的饮食是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吃”是生活和享受的重要部分。^[4]在食品文

[1] 文丰安:《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1期。

[2] 王蜜:《集体记忆的重建与文化自信的生成》,《阅江学刊》2017年第1期。

[3] 该时间段的销售数据受疫情影响较小,相关数据较能反映消费者的消费倾向。

[4] [美] 迈克尔·R·所罗门、卢泰宏著:《消费者行为学》(第6版·中国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

创开发过程中,更应注重将“吃”的行为与文物相对应,在品尝美食时体会文物背后的精神文化。

第二,文物元素的提取。目前,观众已不再单纯地接收信息,而是试图理解展览,并与自身的知识框架相融合,构建新的意义。^[1]观众对《新青年》杂志有非常好的认知基础,其封面设计被普遍认可,通过展览的重点展示,更强化了观众对该文物的理解。观众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将到革命旧址的参观感受、拍摄的照片进行分享,不仅是对红色文化的二次传播,也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建构,并实现了身份证明与自我建构。从销售数据看,人们更接受根据文物原图开发的产品,笔记本、帆布包产品的外形延续杂志的长方形外观,更容易与记忆中的文物原型信息相匹配。因此,基于革命文物的文创开发,有些特征鲜明、容易被识别、本身就是优秀艺术作品的文物,需要在产品开发中适度保留文物的本真信息。

第三,作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故事的物质载体。革命馆具有承载集体记忆、教育公众、传承革命精神的职责,在进行红色文化的宣传展示时,通常把纪念性放在第一位。冰箱贴是常见的文创产品,北大红楼冰箱贴是唯一畅销的红楼建筑元素产品。尽管纪念品经常被指责为“庸俗品”,不值得被视作艺术品,但是纪念品可以唤起人们的回忆,因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意义。^[2]北大红楼冰箱贴的图案由红楼建筑、校徽和校旗、《新青年》等元素创意组合而成,能让人们记住北大红楼。因此,这类文创产品在革命遗址所在地应作为重要的品类进行设计开发。

第四,体现精神文化与情感。将革命精神文化内涵转换到产品上,是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中的难点。在北大红楼文创产品的实践中,贴纸与布艺钥匙扣的创意元素来自文字。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作品,摘录能够激励后人的文字应用于文创产品上,是北大红楼文创产品设计中比较成熟的做法,也比较容易被消费者感知和接受。《新青年》笔记本是承载完整文物信息的综合性产品,我们希望人们在阅读内页文物史料和使用笔记本的过程中,触发他们精神层面的活动。红色文创产品能够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的需求,承载历史和集体记忆的产品有助于相关群体实现身份认同。

结 语

集体记忆与文化三层次理论拓展了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强调红色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与情感价值,有利于观众理解产品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引发人们的思考。红色文创产品的设计基于红色文化,作为开发方的革命馆希望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形成具有文化特征的产品矩阵、文化意象和审美哲学。在设计北大红楼文创实践中,我们发现红色文创产品开发仍存在很多难点。首先,红色文创产品应以物质文化为创意依据,不仅要呈现革命文物独特的外在特征,更要与时代背景、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密切联系。其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交织,革命馆要深入研究革命文物,精准触发人们的集体记忆。最后,在思考各文化层次的产品设计应用时,要考虑观众参观革命遗址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以及产品所代表的符号与象征含义。革命馆应充分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开发能够承载集体记忆、体现红色文化特征与内涵、发挥革命文物的教育意义、满足观众情感需求的红色文创产品,从而对革命文物的研究与利用,以及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起到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吴昌稳)

[1] 刘欣:《论当代博物馆知识传播模式的转变》,《文博学刊》2018年第3期。

[2] [美]唐纳德·A·诺曼著,何笑梅、欧秋杏译:《设计心理学3:情感化设计》,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Research on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Practice of Peking University's Red Building

Liu Xin

Abstract: The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serve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red culture, triggering clues for people to rebuild collective memory, and also serving as a medium to strengthen identification with red culture. The design of the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t Peking University's Red Building is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of red culture. It involves methods such as determining creative them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Revolution Hall, analyzing the levels of red culture, focusing on the spiritual level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optimizing product design based on consumers' feedback. Through these approache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al pathways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n terms of cultural shaping, behavioral expression, and spiritual conveyance. The design practice of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of Peking University's Red Building i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products sale data. It increases the dimension of audience's sensory experience by expanding product categories, strengthens the present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elements to trigger collective memory, and embodi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red spirit through the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symbols. Therefore, the design practice activity deepens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d culture, promotes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driv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Keywords: Peking University's Red Building, Collective Memory,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Practice

73

博物新知
北大红楼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实践研究

书 讯

《博物馆与公众：从公众的视角重新发现博物馆》

尹凯 著

本书是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博物馆学视域下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共计 25 万字，包括绪论、结语和正文八章。在历史与传统部分，本书描述了欧洲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旨在拆解我们对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的认知定式，进而解放我们对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想象。在范畴与转向部分，本书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应对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关系危机的对策或方案，公众在博物馆中定位的变化反映出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绝不能仅在博物馆学框架内进行书写。在批判与反思部分，本书针对的不是博物馆与公众的现实关系，而是由此引发的认识。也就是说，批判与反思的对象聚焦于博物馆与公众的认识论层面。

文物出版社 2023 年 8 月出版，16 开，简装本，定价 180 元。

滇中地区的青铜剑研究

戴 铖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昆明, 650214

内容提要: 滇中地区是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的中心分布区, 出土青铜剑的代表墓葬共计 16 处, 年代从春秋中晚期至东汉初期。所出的青铜剑可分为 A、B、C、D 四型, A 型剑与周邻的曲靖、巴蜀有密切联系, B 型剑与中原地区、北方地区显示出密切的文化联系, C 型剑显示出与滇西地区的交流痕迹, D 型剑显示出吴越遗风的影响。从春秋至西汉中晚期, 滇中地区的青铜剑很大一部分朝着增强实用功能的方向发展, 另一部分则以装饰繁缛为特点, 凸显礼仪象征功能。多种型式的青铜剑交叉演进, 显示早在东周至秦汉时期, 这里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 云南青铜文化与周边地区、中原、川渝等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格局。

关键词: 滇中地区 青铜剑 多民族 融合 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K87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 (2024) 01-0074-11

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剑有明显的区域差异, 滇中地区的青铜剑与滇西地区的青铜剑明显不同。“滇中地区”指东到宜良县一带, 北至东川区, 西到安宁市, 南以元江为界, 包括以滇池区域和抚仙湖、杞麓湖、星云湖三湖为中心的昆明、玉溪地区, 今天仍是云南的中心腹地。这是考古学“滇文化”遗物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 是《史记》中“古滇国”的政治影响区域。本文主要对滇中地区春秋至东汉初 16 处墓葬遗址所出的青铜剑进行考察, 一窥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概貌。

一、滇中地区青铜剑的发现和研究回顾

目前滇中地区公开发表的材料中出土青铜剑的墓葬遗址共 16 处, 它们是晋宁石寨山古墓群^[1]、安宁太极山墓地^[2]、江川李家山古墓群^[3]、昆明呈贡区龙街石碑村墓地^[4]、昆明呈贡天子庙墓地^[5]、昆

[1]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59 年;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9 期;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 年第 9 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2]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群清理报告》,《考古》1965 年第 9 期。

[3]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玉溪市文管所、江川县文管所:《江川李家山第 86 号墓清理发掘简报》,《云南文物》2003 年第 1 期。

[4]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第 86-97 页;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昆明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 年第 3 期。

[5]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 3 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第 132-142 页;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 年第 4 期;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第三次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4 年第 12 期。

明大团山墓地^[1]、江川团山古墓群^[2]、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群^[3]、嵩明凤凰窝古墓群^[4]、宜良纱帽山墓地^[5]、昆明羊甫头墓地^[6]、呈贡黄土山古墓群^[7]、晋宁金砂山古墓群^[8]、嵩明凤溪山古墓群^[9]、澄江金莲山墓地^[10]和华宁小直坡墓地^[11]。

迄今为止，学界对滇文化青铜剑或滇中地区青铜剑的专门研究尚少，学者主要关注分布在滇西、滇西北地区的三叉格剑^[12]以及含北方系因素的青铜短剑^[13]，也有学者对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4]；对滇中地区的青铜剑，一些学者在研究贵州、巴蜀等周边地区的青铜剑时，会将其纳入比较分析的视野中^[15]。

对滇中地区青铜剑较为细致的分析，仍属 20 世纪 70 年代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一文，其将滇中地区的青铜剑归为西南夷系统的 B 型剑一类，对青铜剑的形态特征、佩带方法、大致年代及其反映的文化交流关系和民族信息进行阐释。童恩正认为，晋宁石寨山 6 号墓滇王金印的发现，证明战国至西汉时滇池地区（即本文所指的滇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就是滇族的遗留，而这一地区出土的青铜剑，也是滇族文化的表现之一。^[16]由于该研究主要基于早期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的发掘材料，涉及的样本尚不够全面。

二、滇中地区青铜剑的型式分析

滇中地区春秋至东汉初期的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剑共计 970 件，还有一定比例的铜铁合制剑、铁剑和金茎首剑。本文仅就青铜剑做型式分析，按有无剑格和剑格的形态分为四型，其中无格剑为 A 型，一字格剑为 B 型，山字格（三叉格）剑为 C 型，宽格剑为 D 型，另有 19 件由于材料不足无法分型。

A 型 491 件。均为无格剑。茎首与剑身连铸，依据茎、首的不同形态可分为六亚型。其中，7 件由于资料公布不清晰无法分出亚型。

Aa 型 389 件。空心扁圆茎，首部与茎部紧密衔接，整体呈蛇首状，有的首部呈管状伸出（如晋宁石寨山 M71:78 ④）。依据剑茎表面纹饰、技法、蛇首截面可分为四式。其中，133 件由于资料公布

[1]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大团山发现滇文化墓地》，《云南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2]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江川团山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第 95-99 页。

[3]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 年第 3 期。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嵩明凤凰窝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文物》2003 年第 1 期。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宜良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313-392 页。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5 页。

[7] 昆明市博物馆：《呈贡黄土山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文物》2012 年第 2 期。

[8] 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县金砂山古墓群清理简报》，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四），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第 1487-1517 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晋宁区金砂山墓地发掘简报》，《云南文物》2019 年第 2 期。

[9] 袁媛、蒋志龙：《嵩明凤溪山古墓群清理发掘简报》，《云南文物》2017 年第 1 期。

[10] 蒋志龙：《金莲山墓地研究》，吉林大学 2013 年博士学位论文。

[1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华宁县文物管理所：《华宁小直坡墓地》，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第 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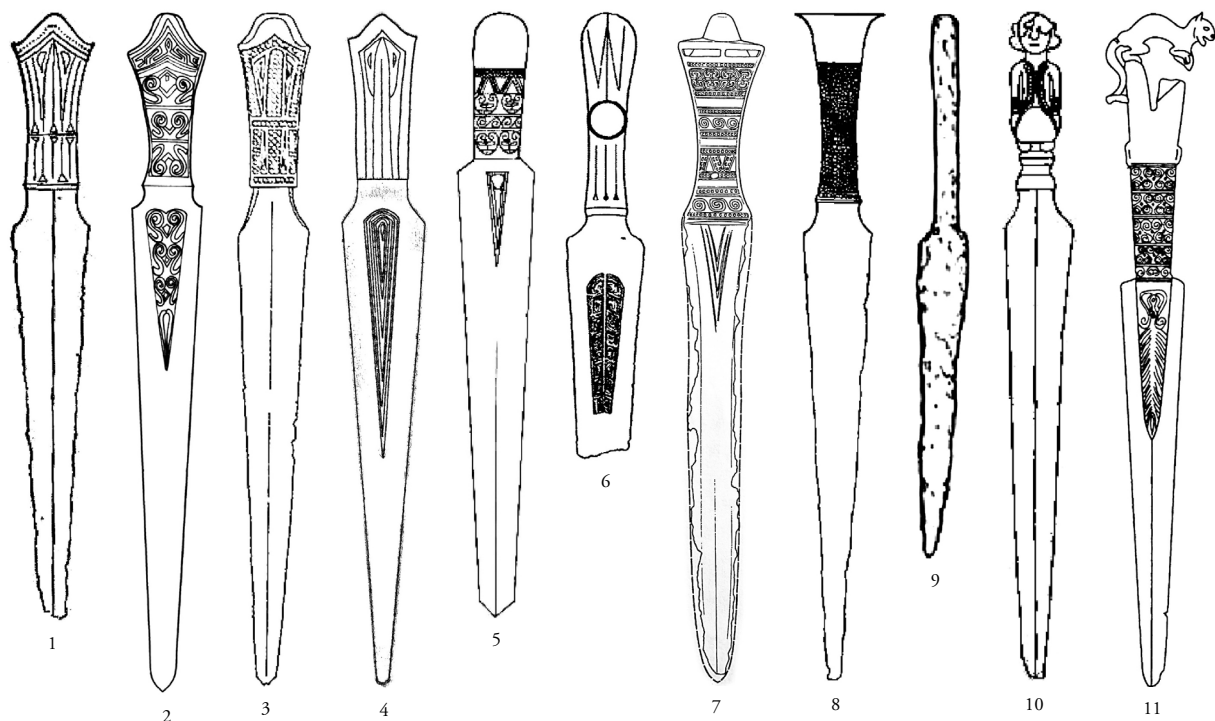
[12] 陈心舟：《试论西南地区三叉格铜剑的年代与源流》，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49-61 页；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 年第 12 期；苏奎、尹俊霞：《试析西南夷地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四川文物》2005 年第 2 期。

[13] 苏奎：《西南夷地区三种含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短剑的研究》，四川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

[14] 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 年第 7 期。

[15] 毕洋：《试论可乐式剑》，《形象史学》2021 年第 3 期；何钰婧：《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剑研究》，安徽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史恣：《滇东黔西地区出土东周秦汉时期青铜兵器研究》，西北大学 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

[16]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图一 A型青铜剑

1. Aa型I式(呈贡天子庙 79M41:24); 2. Aa型II式(官渡羊甫头 M19:215); 3. Aa型III式(江川李家山 M68X2:28-1); 4. Aa型IV式(江川李家山 M63:6); 5. Ab型I式(官渡羊甫头 M113:345); 6. Ab型II式(晋宁石寨山 M3:28); 7. Ac型(晋宁石寨山 M58:2); 8. Ad型(江川李家山 M24:87); 9. Ae型(澄江金莲山 M178 ①:1); 10、11. Af型(江川李家山 M24:85、江川李家山 M51:124)

不清晰无法分式。

I式 195件。蛇形茎首，茎表面以镂空三角形、线条形刻纹为主，首部有呈八字形分布的线纹和圆点纹，如呈贡天子庙 79M41:24(图一，1)^[1]。

II式 46件。蛇形茎首，茎首部饰铸刻纹，铸纹丰富多样，有对称双旋纹、弦纹、绞绳纹、圆点纹、折线纹、蛙纹、菱格纹、羽纹等，有的腊部中央铸连续对称的长尾旋涡纹，整体看上去像双蛇意象，如官渡羊甫头 M19:215(图一，2)^[2]。

III式 11件。蛇形茎首，用孔雀石、绿松石、玛瑙珠、玉管等镶嵌于剑茎表面，将传统的三角纹、线条纹灵活穿插其间，整体外观与Aa型I式剑保持一致，但工艺水平大为提升，如江川李家山 M68X2:28-1(图一，3)^[3]。

IV式 4件。蛇形茎首，茎首部铸有三角形、弦纹、齿纹等纹饰，风格与Aa型I式镂空纹一致且更加简化；剑首截面不再是椭圆形或圆形孔，而是上下分开类似蛇张口状。江川李家山 M63:6，茎部铸纹，近首处略作两个三角形，其间下凹，如蛇双眼，腊后段中线饰蕉叶纹(图一，4)^[4]。

Ab型 75件。空心扁圆茎或圆茎，茎部、首部组合成杵形，腊部多饰长尾对称旋纹或云雷纹。依据剑茎装饰纹样可分为两式。其中，27件由于资料公布不清晰无法分式。

I式 40件。茎部纹饰以旋纹为主体，有的辅以弦纹、齿纹、绞绳纹、编织纹等，如官渡羊甫头

[1] 胡绍锦：《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124页。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68页。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69页。

M113:345(图一,5)^[1]。

Ⅱ式 8件。茎部纹饰以线纹、三角形纹为主,类似Aa型I式剑的纹饰风格,腊部多有刻纹,如晋宁石寨山M3:28(图一,6)^[2]。

Ac型 6件。塔形茎首,茎部上宽下窄或呈束腰状,剑首呈塔形突起。晋宁石寨山M58:2,茎部呈束腰状,通体鎏金(图一,7)^[3]。

Ad型 2件。喇叭形首,剑首平齐,茎部空心呈圆形或扁圆形,接近首部逐渐变宽。茎部有不规则镂空,有的缠有皮条和麻绳,有的有凸点纹。江川李家山M24:87,空心扁圆茎,玉制标首平齐,茎上有绿松石镶嵌的蛙形图案(图一,8)^[4]。

Ae型 5件。扁柱形实心茎,个别剑首部呈分叉状,如澄江金莲山M178①:1(图一,9)^[5]。

Af型 7件。茎首为圆雕立体纹饰,立体形象变化不一。江川李家山M24:85,茎首为跪坐式女像,束长发,长及后背,穿圆领窄衣,着短裙,佩耳环(图一,10)^[6];江川李家山M51:124,剑茎铸作盃状,而“盃口”即剑首为立雕的动物形象(图一,11)^[7]。

B型 453件。一字格剑,依据茎首的不同形态可分为九亚型。其中,7件由于材料不足无法分出亚型。

Ba型 294件。茎首为喇叭形,首部平齐,依据茎部、首部的变化又可分为三式。其中,7件由于材料不足无法分式。

I式 160件。茎首部无镂空纹,大多饰铸刻纹,纹饰有双旋纹、弦纹、圆点纹、云雷纹、短线纹、绞绳纹、编织纹、齿纹、蛙纹等,个别茎首素面无纹饰。有的剑腊中央有一圆形穿孔,剑腊上的纹饰有长尾对称双旋纹或蛙纹,如华宁小直坡M389:1(图二,1)^[8]。

Ⅱ式 93件。近首部有镂空线条纹,茎部沿袭丰富多样的铸刻纹装饰,新增缠纒纹、螺圈纹、点纹、蕉叶纹等纹饰,茎部近格的地方有的刻近似具象的泉鸟纹、孔雀纹、虎、牛纹等,有的茎部缠绕织物,剑腊中央多有刻纹,如江川李家山M68X2:2(图二,2)^[9]。

Ⅲ式 26件。近首部有镂空线条纹,茎部有单列或双列的近方形镂空,茎首部无铸刻纹,如江川李家山M86:049(图二,3)^[10]。

Ⅳ式 2件。近首部有镂空线条纹,茎部铸乳钉状凸纹,剑腊刻线纹,如龙街石碑村79M19:5(图二,4)^[11]。

V式 6件。近首部有镂空线条纹,茎部除有铸纹外,中部还镶嵌玛瑙片、管状珠等,如江川李家山M47:127(图二,5)^[12]。

Bb型 75件。鼓形茎首,剑首顶端平齐,首茎结合部整体为铜鼓形。根据茎部纹饰风格可分为两式。其中,5件由于材料不足无法分式。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168页。

[2]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43页。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126页。

[4]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5] 蒋志龙:《金莲山墓地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7页。

[6]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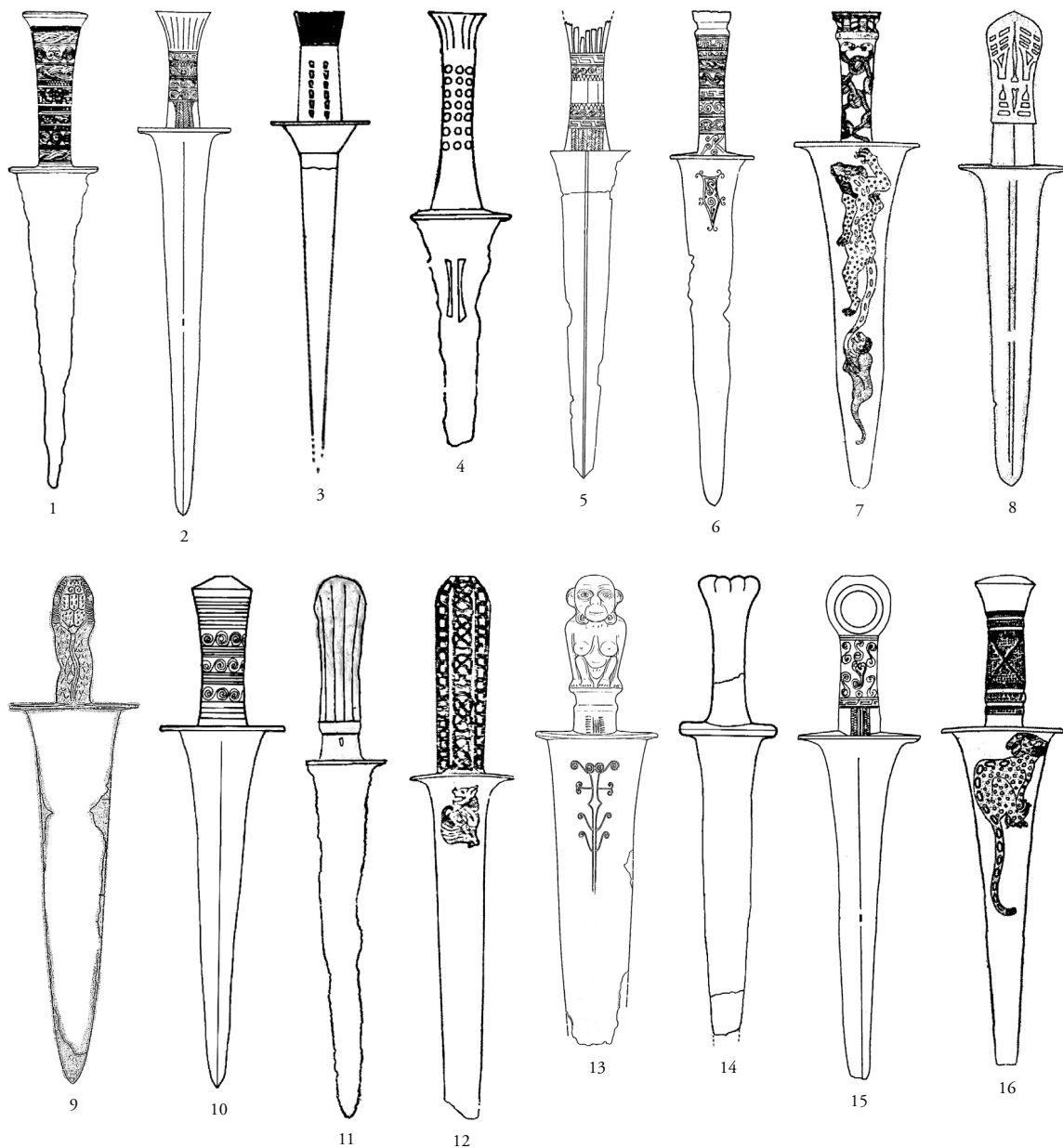
[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华宁县文物管理所:《华宁小直坡墓地》,第150页。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72页。

[10] 玉溪市文管所、江川县文管所:《江川李家山第86号墓清理发掘简报》,《云南文物》2003年第1期。

[11]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昆明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1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72页。



图二 B型青铜剑

1. Ba型Ⅰ式(华宁小直坡 M389:1); 2. Ba型Ⅱ式(江川李家山 M68x2:2); 3. Ba型Ⅲ式(江川李家山 M86:049); 4. Ba型Ⅳ式(龙街石碑村 79M19:5); 5. Ba型Ⅴ式(江川李家山 M47:127); 6. Bb型Ⅰ式(江川李家山 M51:156-1); 7. Bb型Ⅱ式(晋宁石寨山 M13:219); 8. Bc型Ⅰ式(江川李家山 M57:25-1); 9. Bc型Ⅱ式(晋宁石寨山 M71:37); 10. Bd型(官渡羊甫头 M113:344); 11. Be型Ⅰ式(龙街石碑村 74M33:7); 12. Be型Ⅱ式(晋宁石寨山 M6:39); 13. Bf型(晋宁石寨山 M71:30); 14. Bg型(官渡羊甫头 M646:4); 15. Bh型(江川李家山 M51:110); 16. Bi型(晋宁石寨山 M13:233)

I式 49件。茎首结合部为铜鼓形，茎部装饰几何抽象铸纹，如双旋纹、弦纹、短线纹、菱格纹、羽纹等，有的有织物包裹痕迹，如江川李家山 M51:156-1(图二，6)^[1]。

Ⅱ式 21件。茎首结合部为铜鼓形，茎部装饰具象铸纹，如猎首人纹、缠纒纹、缠绕双蛇纹、多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75页。

人首纹、鹤纹等，如晋宁石寨山 M13:219（图二，7）^[1]。

Bc 型 28 件。蛇形茎首，依据茎首与蛇之间的逼真程度可分为两式。

I 式 14 件。茎部与首部组合成近似蛇首状，表面有镂空的平行短线纹，首部截面上下分开，像张开的蛇口，如江川李家山 M57:25-1（图二，8）^[2]。

II 式 14 件。茎首直接立雕成蛇头的形状，形态逼真，蛇身弯曲似正在爬行，蛇口张开，露出尖牙，如晋宁石寨山 M71:37（图二，9）^[3]。

Bd 型 2 件。剑首呈塔形状突起，剑茎呈束腰状，茎部交叉装饰回旋纹和弦纹，如官渡羊甫头 M113:344（图二，10）^[4]。

Be 型 10 件。柱形茎首，根据剑茎的横截面形状可分为两式。

I 式 1 件。柱形茎首，剑茎呈圆柱或椭圆柱状，首部圆润，如龙街石碑村 74M33:7（图二，11）^[5]。

II 式 9 件。空心六棱柱形茎，首部圆润。晋宁石寨山 M6:39，茎上有双绳纹，剑腊阴刻一虎（图二，12）^[6]。

Bf 型 16 件。茎首为一个整体立雕的图像。晋宁石寨山 M71:30，茎首部分为空心立体猴首人形，蹲坐于鼓面上（图二，13）^[7]。

Bg 型 1 件。蒜头形首，如官渡羊甫头 M646:4（图二，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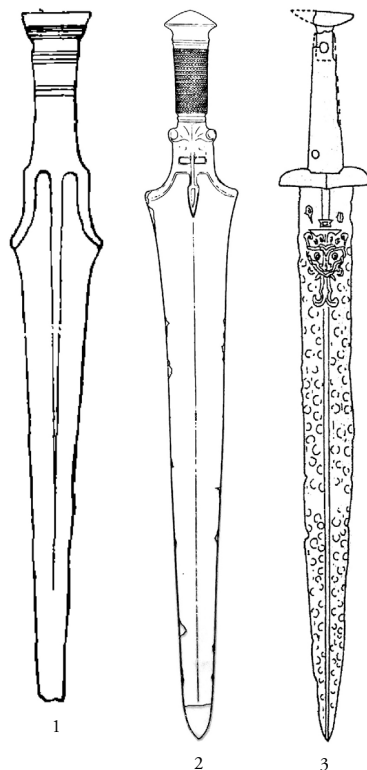
Bh 型 18 件。饼首。江川李家山 M51:110，扁圆形首，饼形首部镶嵌绿松石小珠，环茎铸多道双旋纹、雷纹、弦纹等组合图案，接格处饰直列三角齿纹和羽状纹，表面镀锡（图二，15）^[9]。

Bi 型 2 件。蕈首。晋宁石寨山 M13:233，空心圆茎，茎首为蕈形，茎上饰突起的圆点纹，剑身两面各刻一金钱豹（图二，16）^[10]。

C 型 12 件。山字格（也称“三叉格”“花蒂形格”）剑，根据茎首的差异可分为两亚型。其中，3 件由于材料不足无法分出亚型。

Ca 型 6 件。喇叭形茎首。江川李家山 M20:13，空心圆柱喇叭形茎，首部平齐，茎上铸弦纹（图三，1）^[11]。

Cb 型 3 件。蕈首。晋宁石寨山 M71:84 ①，蕈首，实心圆茎，茎部饰突点纹，格呈花蒂形（图



图三 C、D 型青铜剑

1. Ca 型（江川李家山 M20:13）；2. Cb 型（晋宁石寨山 M71:84 ①）；3. D 型（江川李家山 M50:23）

[1]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 44 页。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 69 页。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 52 页。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 169 页。

[5]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第 86-97 页。

[6]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 43 页。

[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 53 页。

[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 584 页。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 70 页。

[10]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 43 页。

[11]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三, 2) [1]。

D型 1件。宽格剑。江川李家山 M50:23, 凹字形宽格剑, 实心扁平宽茎, 首穿销固定, 首部表面鍍金(图三, 3) [2]。

三、滇中地区青铜剑的分期与年代

(一) A型剑的分期和年代

1. 主要器形的演变规律

Aa型剑各式中, 使用镂空纹对茎首部位进行装饰的Aa型I式最为普遍, 在数量上远超使用铸刻旋纹、弦纹、齿纹装饰的其他各式剑。Aa型III式剑显示出生产技艺的进步, 引进镶嵌工艺, 用绿松石、孔雀石、玛瑙石等在茎首部位镶嵌出不同的纹饰。Aa型IV式剑显示出复古倾向: 一方面茎部使用铸纹的手法再现I式剑的传统镂空纹样式, 一方面运用新出现的立雕技法将茎部做成上下分开、类似蛇嘴张开的形状。这种运用新技法复原旧纹饰的做法, 应是表达族群的归属感, 赋予Aa型剑礼器的意义。

Ab型剑在装饰纹样的选择上与Aa型剑相反, 绝大多数Ab型剑使用铸纹的装饰技法, 纹饰也以双旋纹、弦纹、齿纹、编织纹等纹饰为主, 这是Ab型I式剑的典型特征。Ab型II式剑显示出复古倾向, 但数量很少, 如剑首用铸纹的技法铸上三角纹、线条纹, 这是模仿Aa型I式剑的外观风格。

可见, Aa型II式剑茎首部的纹饰风格由Aa型I式的镂空手法转向铸纹手法, 是受Ab型剑的纹饰风格影响而产生, 而Ab型II式剑茎首部的几何铸纹又是受Aa型I式剑上镂空纹饰形状影响产生的。A型剑其余各亚型由于数量较少, 难以分式, 只能结合出土墓葬进行年代判断, 难以在亚型内部总结出演变规律。

2. 年代

最早流行Aa型I式剑、Ab型I式剑和Ac型剑的是同一批墓葬, 分别是晋宁石寨山 M56、M82、M58, 都是春秋早期墓 [3]。Aa型II式剑、Ad型剑最早出现于上马五台山 M5、M11, 这批墓葬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 [4], 同出Aa型II式剑的呈贡天子庙 79M41、79M33, 为战国早中期墓葬 [5]。

最早流行Aa型III式剑的是以江川李家山 M24、晋宁石寨山 M71 为代表的一批墓葬, 前者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早期 [6], 后者年代为西汉早中期 [7]。所有Ae型剑均发现于澄江金莲山战国时期的墓葬中。 [8] Af型剑最早发现于江川李家山 M24, 流行于西汉中晚期的江川李家山 M51、M57 等墓葬中。 [9]

Ab型II式剑流行于以晋宁石寨山 M71 为代表的墓葬中。最早出现Aa型IV式剑的是嵩明凤溪山 M124, 其年代处于战国中期至西汉时期。 [10]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 第58页。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 第78页。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 第151页。

[4]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

[5]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6]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 第153页。

[8] 蒋志龙:《金莲山墓地研究》, 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27、49、55页。

[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 第232页。

[10] 袁媛、蒋志龙:《嵩明凤溪山古墓群清理发掘简报》,《云南文物》2017年第1期。

综上,可将A型剑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Aa型I式、Aa型II式、Ab型I式、Ac型、Ad型剑为代表,中期出现了Aa型III式、Ae型、Af型剑,晚期以Ab型II式、Aa型IV式剑为主。结合出土墓葬的年代分析,可知早期年代对应春秋时期,中期年代对应战国时期,晚期年代对应西汉早中期。

(二) B型剑的分期和年代

1. 主要器形的演变规律

Ba、Bb、Bc、Be四个亚型内各式有明显的时代演变规律,数量上均为I式明显多于后面各式。Ba型I式剑最为原始、基础,首部无条形镂空,茎部中央多铸刻繁复的纹饰,如双旋纹、弦纹、齿纹等;Ba型II式剑吸收了镂空手法,在剑首部位装饰条形镂空纹;Ba型III式剑进一步运用镂空手法,放弃了铸纹技法,除首部采用条形镂空外,茎部也采用单排或双排的镂空方格纹;Ba型IV式剑进一步创新,在茎部铸上乳钉状凸点;Ba型V式剑引进镶嵌技法,在茎部铸造传统纹饰的同时,茎部中央还镶嵌玛瑙片等宝石。

Bb型剑将铜鼓形象铸造于剑首,I、II两式的差异反映出从抽象纹饰到具象纹饰的转变。Bc型剑有模仿Aa型剑的意味,I、II两式的差异反映出从传统几何镂空纹饰向立雕具象纹饰的转变。Be型剑有模仿Ab型剑的意味,I、II两式的差异反映出从传统圆柱形茎首向多棱柱形茎首发展的审美转向。而B型剑其余各亚型由于数量少难以分式,只能结合出土墓葬进行年代判断,无法在亚型内部总结发展规律。

2. 年代

Ba型I式剑最早流行始于呈贡天子庙79M41、金莲山战国时期墓葬如06M7、06M16等^[1],是滇中地区战国时期的代表性器物。

Ba型II式、Bb型I式、Bc型I式、Be型I式、Bg型(仅1件)剑见于以江川团山M4,官渡羊甫头M469、M150、M646,龙街石碑村74M33,江川李家山M13为代表的一批墓葬,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2]。

Ba型III式、Bb型II式、Bc型II式、Bd型、Bf型、Bh型、Bi型剑见于以官渡羊甫头M568、M113,澄江金莲山M191,晋宁石寨山M71、M3、M13为代表的一批墓葬,其年代为西汉早中期^[3]。

Ba型IV式、Ba型V式、Be型II式剑见于以官渡羊甫头M155、龙街石碑村79M19、江川李家山M47、晋宁石寨山M6为代表的一批墓葬,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4]。

综上,B型剑大致可分为三期:一期是Ba型I式、Ba型II式、Bb型I式、Bc型I式、Be型I式剑的流行时期,Bg型剑开始出现,年代大致为战国时期;二期是Ba型III式、Bb型II式、Bc型II式、Bd型、Bf型、Bh型、Bi型剑的流行时期,年代大致为西汉早中期;三期是Ba型IV式、Ba型V式、

[1]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蒋志龙:《金莲山墓地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2]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大团山发现滇文化墓地》,《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715页;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第86-92页;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715页;蒋志龙:《金莲山墓地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0、57页;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133-134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151页。

[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715页;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昆明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3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228-232页;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133-134页。

滇中地区青铜剑年代分期

| 类型 | 分期 | 一期（春秋时期） | 二期（战国时期） | 三期（西汉时期） | 四期（东汉初期） |
|-------|----|---------------------------|----------------------------------|------------------------------------|------------------|
| | | 1段（春秋时期） | 2段（战国时期） | 3段（西汉早中期） | 4段（西汉中晚期） |
| A型剑 | | Aa I、Ab I、Ac、 Aa II、Ad | Aa III、Ae、Af | Ab II、Aa IV | |
| B型剑 | | | Ba I、Ba II、Bb I、 Bc I、Be I、Bg | Ba III、Bb II、Bc II、 Bd、Bf、Bh、Bi | Ba IV、Ba V、Be II |
| C、D型剑 | | | | Ca、Cb | D |

Be型II式剑的流行时期，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

（三）C、D型剑的年代

由于Ca、Cb、D型剑数量较少，型、亚型内部缺乏分式的依据，只能依据其出现的墓葬年代来进行断代。

Ca型剑见于以江川李家山M20、晋宁石寨山M10为代表的战国末至西汉初期的墓葬，也见于西汉中晚期墓葬江川李家山M68。初步断定Ca型剑的流行年代为西汉早中期。Cb型剑见于晋宁石寨山M71、晋宁石寨山M10等西汉早中期墓葬，其流行年代亦可推定为西汉早中期。D型剑仅1件，见于江川李家山M50，该墓葬被认为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墓葬，D型剑生产使用的年代当不晚于此时期。

综上，滇中地区青铜剑总体可分为四期5段，一期1段为春秋时期，二期2段为战国时期，三期3段为西汉早中期，三期4段为西汉中晚期，四期5段为东汉初期（上表）。

四、滇中地区青铜剑的渊源和流变

（一）渊源

滇中地区青铜剑的型式风格非常多样，A型无格剑有斜肩、平肩两个类别，其中斜肩铜剑与巴蜀柳叶形铜剑有较大的关联性，平肩铜剑则与中原地区的扁茎平肩铜剑有较大的相似性。巴蜀柳叶形铜剑和东周中原平肩扁茎剑都没有连铸剑茎，需要在扁茎上加装木柄、玉柄后才能使用。滇中地区A型无格剑是剑茎与剑身连铸，绝大部分为空心茎，Ae型为实心茎首，其外形接近柳叶形铜剑。

春秋时期的A型剑为多个亚型并存，有蛇形茎首、喇叭形首、塔形茎首、柱形茎首。其中，塔形茎首剑接近曲靖八塔台墓地春秋早期墓葬中流行的无格平肩铜剑（图四，1）^[1]，应是吸收曲靖八塔台墓地文化因素而产生的剑式。柱形茎首剑应是直接从巴蜀柳叶形铜剑和东周平肩扁茎剑发展而来。滇中地区最近发现的晋宁古城村遗址商周遗存中出土了一批滇文化源头的本土剑式，有扁茎实心喇叭形首剑、平首空心镂空茎剑以及束腰镂空塔形茎首剑，尚未见Aa型I式蛇形镂空茎首剑。可见，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翟德芳：《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Aa 型 I 式蛇形剑最初应是从塔形镂空茎首剑演变而来,演化过程中融入蛇的符号形象成为滇文化中最流行、延续时间最长的剑式。

童恩正认为 B 型一字格剑是受到中原地区薄格剑的影响。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中原和吴越地区在东周时期都不乏薄格剑,中原地区这类剑是受吴越剑的影响产生的。B 型一字格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除直刃剑之外,还有少量的曲刃剑。这种曲刃剑流行于东周时期北方偏东的青铜剑类群,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琵琶形铜剑”就以曲刃为代表。B 型一字格剑中的曲刃剑应与同时期我国东北部民族文化有互动关系。值得一提的是,Bh 型饼首剑与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西群铜剑(图四,2)^[1]的形态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滇中地区 C 型山字格(三叉格)铜剑出现于西汉早期,对应滇西地区山字格铜剑的相对成熟样式^[2],应是这一时期滇中地区族群与周边族群交流加强后,从滇西地区引进的铜剑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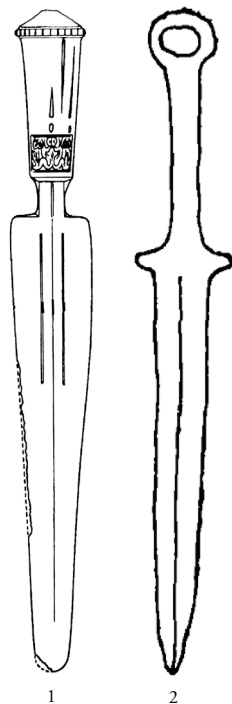
D 型宽格铜剑,在滇中地区直到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才出现,这种铜剑的剑格、茎、首均显示吴越系统铜剑的特点,应是西汉时期中原地区沿用战国吴越青铜剑的遗风影响至此区域所致。

(二) 流变

在春秋至战国早期,滇中地区所见铜剑均为 A 型无格剑,其中以 Aa 型 I 式剑占绝大多数。这些无格剑的茎首已经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多个亚型并存,共同演进。战国中晚期,一字格剑开始流行,Aa 型 I 式剑和 Ba 型 I 式剑并驾齐驱,其余多个亚型并存,共同演化。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滇中地区青铜剑的样式达到鼎盛阶段,出现了众多亚型并存的盛况。以晋宁石寨山、官渡羊甫头、江川李家山等一批大型墓地为代表,各处青铜兵器的多样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峰。无格剑出现了 Af 型立雕茎首剑,一字格剑吸取无格剑的装饰风格,衍生出了 Bc 型蛇形茎首一字格剑,吸收铜鼓元素形成了 Bb 型鼓形剑首一字格剑,吸收时代特点创造出 Bf 型立雕形茎首一字格剑。传统的茎首装饰工艺被新的仿生立雕手法大量取代,在剑的茎首部位镶嵌宝石成为贵族阶级的风尚。铜剑平面装饰纹样趋于简化和具体,如 B 型一字格剑晋宁石寨山青铜剑 M13:172、M13:219,其腊部的装饰告别了二维抽象纹,出现具体的活动场景纹饰,如执剑人纹、动物纹^[3]。晋宁石寨山 M13:172 茎部的二维抽象纹饰进一步简化,出现了新型的三叉格铜剑,形态上注重功能,没有繁复的装饰,如晋宁石寨山 M10:21。

从春秋至西汉中晚期,滇中地区青铜剑朝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增强实用功能。用于实战的剑式主要有 Aa 型 I 式和 Ba 型 I 式剑,这两种剑式数量较多且延续时间长,在西汉晚期、东汉初期的墓葬中都有出现,呈现纹饰简化、出现曲刃、剑身加长的规律。滇人也很重视引进周边地区的先进剑式,如一字格剑、三叉格剑和宽格剑。滇人为表达对 D 型剑式的重视还使用了剑首部鎏金的加工工艺。第二个方向是一部分剑成为礼器,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准而弱化功能性。例如,Aa 型 I 式剑作为滇文化的符号,从春秋时期的墓葬到东汉时期的墓葬都有发现,是出现



图四 滇东北地区 and 北方地区青铜剑

1. 曲靖八塔台 M280:5; 2. 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战国时期铜剑

[1] 翟德芳:《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2] 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年第7期。

[3]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44页。

频率最高的兼具实用性与民族符号的剑式。A、B型剑中各种造型多样的亚型剑，如剑茎镶嵌宝石、装饰镂空纹、使用立雕工艺以及引进饼首、蒜形首剑式等，这些装饰繁缛的剑式显示滇人对审美的极致追求。

滇中地区青铜剑的上述发展倾向，可以归纳为青铜兵器发展的功能化和美术化倾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滇中地区的铜剑不仅呈现功能上的演进，也呈现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演进。

结 语

滇中地区代表剑式A型无格剑、B型一字格剑的并列交叉演进和发展，显示出滇中地区早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同时受到周边各个方向多元文化的影响。形式多样的青铜剑功能化和美术化并列演进的态势，说明滇文化统治阶级学习东周中原礼仪制度，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发展取向，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百花齐放的边疆文化景观。云南青铜文化与周边地区、中原、川渝等地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格局。

（责任编辑：陈曦）

A Study on the Bronze Swords in Central Yunnan

Dai Cheng

Abstract: The central Yunnan region is the central area of Dian culture in Yunnan's Bronze Age, with 16 representative tomb containing bronze swords dating from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bronze sword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 B, C, and D. Type A swords ha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neighboring regions such as Qujing and Bashu. Type B swords showed close cultural connections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and northern China. Type C swords displayed traces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western Yunnan. Type D swords revealed the influence of the legacy of Wu and Yue.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bronze swords in Central Yunnan developed towards enhancing their practical functions, while another por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elaborate decoration, highlighting the ceremonial symbolic function. The cross evol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bronze swords signified that as early as the Eastern Zhou to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is region was inhabited by multiple ethnic groups. The intricate connections between Yunnan's bronz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s of the surrounding area, as well as the Central Plains, Sicuan, and Chongqing, reflected the early landscape of "diversity and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Central Yunnan, Bronze Sword, Multi-ethnic, Integration, Diversity and Unity

北朝石葬具的类型与来源研究

王涛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8

内容提要: 北朝墓葬中出土的石葬具主要有石床、石床屏风、石棺床、石棺、石堂等, 主要发现于这一时期的统治中心及其邻近地区。石床、石床屏风和石棺床应为拓跋鲜卑民族火炕与华夏民族床、榻和屏风相结合的产物, 石棺应是北朝晚期统治者赠予上层贵族的特殊葬具, 石堂可能是对魏晋十六国时期墓内石椁的继承与创新, 同时也是对汉代墓上祠堂和生前居室的承袭和发展, 符合北朝时期人们将墓室看作永生之维空间的需求。

关键词: 北朝 石葬具 石床屏风 石堂 来源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085-10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道:“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 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 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 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 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1] 北朝上启汉魏, 下开隋唐,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隋唐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朝墓葬中的石葬具主要发现于大同、洛阳、西安、安阳等地, 这些地区均为北朝时期的都城及京畿所在, 石葬具主要有石床^[2]、石床屏风、石棺床、石棺和石堂等。

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中出土一件石床上三面有屏风的组合式文物, 发掘者将其称为“围屏石榻”^[3], 后发掘简报中对此类文物的定名大都沿用这一名称。韦正将其称为“围屏石床榻”, 郑岩称其为“围屏石棺床”, 杨泓称其为“围屏石床”。^[4] 可见, 学界对这类文物的定名仍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 深圳博物馆藏东魏翟门生石床右后屏下部中间的长方形条框内刻“胡客翟门生造石床瓶甗(屏风)吉利铭记”的题记^[5], 为这类文物的定名提供了新证据。笔者认为应称其为“石床屏风”, 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 床和榻在文献记载中有不同之处, 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曰:“人所坐卧曰床。床, 装也, 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 言其体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 主人无二, 独所坐也。”^[6] 唐代徐坚《初学记》引服虔《通俗文》中提到了床榻的尺寸:“床三尺五曰榻板, 独坐曰枰, 八尺曰床。”^[7] 东汉一尺约折合为今 23.4 厘米, 则床长约为 187.2 厘米, 榻长约为 81.9 厘米。可见, 床是古人日常生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第 3 页。

[2] 鉴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石葬具有置棺和无棺两种形式, 故笔者将置棺的床称为“石棺床”, 无棺的床(即尸骨直接陈放其上)称为“石床”, 特此说明, 后不赘述。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 年第 1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4] 韦正:《北朝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2015 年第 7 期;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增订版), 文物出版社 2016 年, 第 123 页; 杨泓:《古物的声音: 古人的生活日常与文化》,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 第 53 页。

[5] 吉笕学:《东魏石刻的标形器——翟门生屏风石床研究》,《美术学报》2021 年第 2 期。

[6] [汉]刘熙:《释名》卷六, 中华书局 1985 年, 第 93 页。

[7]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五, 中华书局 2004 年, 第 601 页。

活中供坐卧的用具，而榻一般仅容一人独坐，所以将安伽墓中长2米有余的石质葬具称为“围屏石榻”或“围屏石床榻”都不够准确。其二，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屏风式石床，床上只有尸骨没有棺木，如安伽墓中出土的石葬具上就没有棺木痕迹，所以将其称为“围屏石棺床”也不甚妥当。其三，按器物自铭的原则，这类文物应称为“石床屏风”。

目前学界对北朝石葬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制特征、图像内涵、文化因素、葬具来源和艺术特征等方面。^[1] 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朝石葬具的类型及来源进行细致分析，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北朝石葬具类型

就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北朝石葬具多见石床、石棺床、石棺和石堂等，其中既有单独使用者，也有组合使用者。鉴于研究需要，现对其分开叙述。

1. 石床

北朝石床平面均呈长方形，通常由多块石板组合而成，主要发现于大同、西安、安阳、濮阳等地，依据石床上有无屏风可分为两型。

A型 砂岩质，床框和床板由多块石板组成。石板平面呈长方形、工字形或倒凹字型，前部有二壶门，仅有床面及立面，四周没有木质或石质围屏。根据具体形态和足的高低可分为两亚型。

Aa型 足较低。石床前部雕刻波状忍冬纹和水波纹，两侧足各雕一朵忍冬，中间足雕兽面纹，或三足均雕忍冬纹，如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12（图一，1）^[2]、南郊区田村北魏墓^[3]、北魏宋绍祖墓^[4]、北魏尉迟定州墓^[5]等。

Ab型 足较高。前部有二壶门或二假壶门，石床前立板上部刻波状忍冬纹，下部为三足，两端足部雕刻波浪纹，中足图案为兽面纹，壶门上部雕刻连续波浪纹，如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 M14^[6]、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7]等。

B型 石床由多块石板组成，其东、西、北三面均围绕石质挡板（从挡板形态及刻绘图案来看，应为漆木质屏风的变体），前部有三足或四足。依据有无双阙可分为两亚型。

Ba型 石床屏风。石床左、右、后三面围绕石质屏风，屏内面雕刻贴金浅浮雕图案，图案主要为车马出行、居家宴饮、狩猎、乐舞、送别和会客等场面，床板前部雕刻联珠纹和莲花纹，足部或以狮子充当，或线刻力士承托床板立面图案。除此之外，屏风内面还线刻宗教场景等图案，如西安北周康

[1] 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围屏石榻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1-376页；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的改变及墓葬功能的实现》，中央美术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雁卿：《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石棺床》，《文物世界》2008年第2期；曹鹏：《北朝出土石质葬具研究》，内蒙古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振东：《论北朝时期无棺葬》，《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5期；韦正：《北朝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7期；王秀玲：《北魏平城出土石葬具研究》，山西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姚庆庆：《北朝入华粟特人石葬具图像研究：基于山水画元素的视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环宇：《北朝棺床艺术探究》，西安美术学院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马嘉琪：《北魏平城（398—494）房形石堂墓研究》，东南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李梅田：《北朝石棺床的使用场景与画像配置》，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编：《东亚文明》（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9-73页。

[2]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编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50-351页。

[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5期。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7] 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业墓(图一, 2)^[1]、安伽墓^[2]等。

Bb型 双阙式石床屏风。石床左、右、后三面围绕石屏风, 前部两侧各有一道石墙和子母阙, 石墙上部覆盖屋檐, 较低于三面石屏, 石屏分栏画面为墓主人夫妇画像、孝子图、出行图等, 石床前部图案为青龙、凤鸟、麒麟等珍禽瑞兽, 莲花瓣饰边, 画面外围用金箔贴出方形画框, 正面三足雕刻力士和瑞兽, 如安阳固岸墓地 M57(图一,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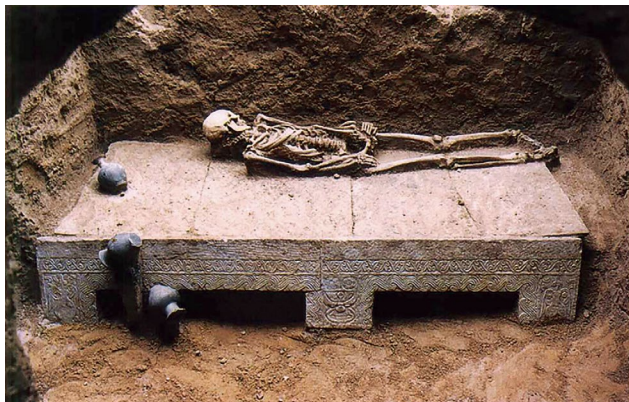
2. 石棺床

因上面放置石棺或木棺, 发挥其作为棺床的作用, 所以将其单独叙述。依据棺床整体形态可分为三型。

A型 石棺床屏风。砂岩质, 由多块大型石板组成床框和床板。平面呈长方形, 前部雕刻精美图案, 床前立板上部为波状忍冬纹, 波心为伎乐童子和珍禽异兽。下部为三足, 两端足部雕力士, 中足图案为兽面与双托举力士, 三足之间饰波浪纹。在石棺床上直接放置或嵌置三面漆质屏风, 如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4]; 棺床上由三块石板并列平铺, 床上左右及后部三面均有石板围挡, 前床腿及架上线刻人物及鸟兽等图案, 边侧饰多方连续的忍冬纹, 屏风内侧面线刻人物画像, 如河南泌阳县西向北朝墓^[5]。

B型 仿砖式石棺床。棺床平面呈长方形, 由若干块方形石块拼砌而成, 石块对合严密, 石面平整, 素面无纹, 如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6]。

C型 须弥座式石棺床。棺床用青石围边, 内铺白色或灰白色石板, 正中朱绘仰莲, 立面雕忍冬纹、连环纹等图案, 如河北



1



2



3

图一 北朝石床

1. Aa型石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12); 2. Ba型石床屏风(西安北周康业墓); 3. Bb型石床屏风(安阳固岸墓地 M57)

[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第20-59页。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4]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5] 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磁县湾漳北朝墓^[1]。

3. 石棺

北朝石棺的平面均呈梯形,主要发现于洛阳、西安等地。北魏平城时代墓葬中仅见木棺,不见石棺。此外,在大同与洛阳之间的山西榆社县、河北蠡县等地也发现了北朝石棺。鉴于考古发掘出土的北朝石棺材料不足,故石棺的类型学分析也囊括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北朝石棺材料。石棺的形制在整个北朝时期变化不大,依据石棺外侧有无画像及装饰图案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 四神石棺。由四围(左右帮、前后挡)及盖、底六块石板拼合而成,平面呈梯形,前部高宽,后部低窄,四周左刻青龙、右刻白虎、前刻朱雀、后刻玄武形象,棺盖外侧或素面,或刻伏羲女娲手托日月图像,或刻青龙与白虎前方各有导引羽人,后方有导护仙人,左右两帮下方均绘连绵山峦,如河北博物院藏四神浮雕石棺^[2]、陕西西安北周李诞墓^[3]、开封博物馆藏龙虎升仙石棺^[4]、洛阳北魏画像石棺^[5]等。

B型 孝子石棺。由左右帮、前后挡、盖及底六块石板拼合而成,平面亦呈梯形,前部高宽,后部低窄,个别有彩绘和贴金,左右帮线刻孝子图案,间以树木、山林、流云等图案,前档大多刻绘一门,两侧各有一门吏,上部为两怪兽戏摩尼宝珠图案,如洛阳北魏曹连墓出土石棺^[6]、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7]、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孝子画像^[8]等。

C型 素面石棺。由棺盖、前后挡、左右帮和底板等组成,前部高宽,后部低窄,石板上未绘制图案,如偃师前杜楼北魏墓^[9]、清河王元怱墓^[10]、南平王元暉墓^[11]等。

4. 石堂

学界对北朝墓葬中仿生人木构建筑的石质葬具称呼不一,有的称作“石椁”“房形石椁”,有的称作“石室”“石堂”等。2003年西安市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出土石质葬具的门楣上阴刻“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篆书题铭。^[12]2014年于山西大同御河东岸建筑工地发现的解兴石堂门楣上有“唯大〔代〕太安四年,岁次戊戌,四月甲戌朔六日己卯。解兴,雁门人也。夫妻王(亡),造石堂(室)一区之神枢(祠),故祭之”墨书题记。^[13]无独有偶,最新发现的大同北魏吕续墓出土浮雕彩绘石椁间西廊柱正面竖刻两列铭文,为“惟大代太安二年岁次丙申正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石文口江将军扶风太守槐里界雍州扶风郡槐里县民吕续石屋一区”。^[14]可见,关于北朝墓葬中出土房屋状石质葬具的名称,学界至少有“石堂”“石屋”两种称呼,鉴于研究需要,我们以出现两次的“石堂”题记为宜。石堂主要发现于大同、西安、洛阳等地,在北齐统治中心发现较少,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2] 张丽敏:《北朝四神浮雕石棺》,《文物春秋》2009年第4期。

[3] 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诞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91-400页。

[4] 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第356-357页。

[5]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

[6] 司马国红、顾雪军编著:《洛阳北魏曹连石棺墓》,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7] 贺西林:《道德与信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相关问题的再探讨》,《美术研究》2020年第4期。

[8]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7页。

[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前杜楼北魏石棺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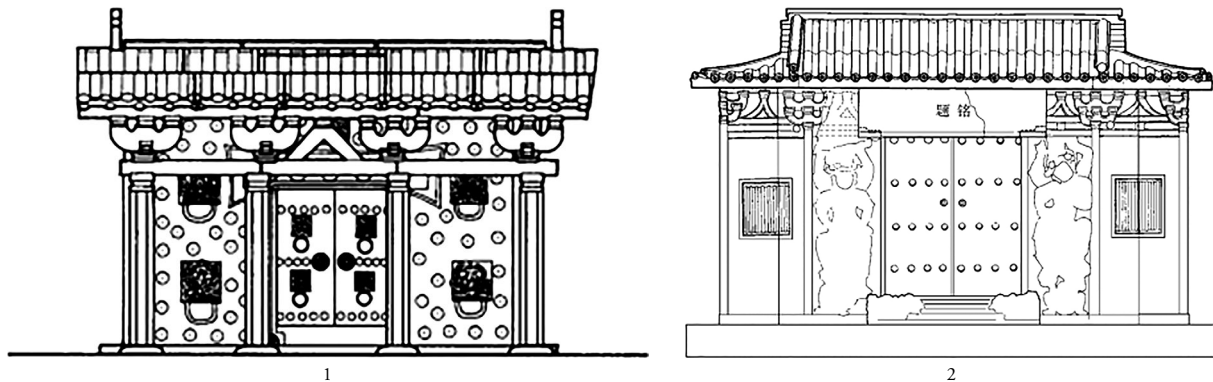
[10] 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怱墓壁画》,《文物》2002年第2期。

[11] 韦娜、李聚宝:《洛阳古墓博物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1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13]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

[14]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021年度山西考古新发现|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kyMzgWMA==&mid=2819004069&idx=1&sn=8a1f493d01429ae822a58c97386a4db7&chksm=bd86c2928af14b84447cb089728a237794d1edb3dc4e99df9959ba3f5e73b853e0ed13bc8def&scene=27, 2021年12月20日。



图二 北朝石堂

1. Ba 型石堂（大同北魏宋绍祖墓）；2. C 型石堂（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

依据石堂具体形制与屋顶形态可分为三型。

A 型 单面坡顶石堂。顶部为平顶，由若干石板组合而成。内壁和正面外侧彩绘壁画，做法较为简单，在石壁上刷白灰，然后直接彩绘，正面门两侧各绘一身着铠甲的门吏，内壁纹饰多为墓主画像、宴居场景，如北朝艺术博物馆藏北魏解兴石堂^[1]。

B 型 悬山顶石堂。仿木结构，单檐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三椽。依据有无前廊可分为两亚型。

Ba 型 前出廊式悬山顶石堂。石堂为抬梁式承重墙结构，前有廊，后有室，四根廊柱平面为八边形，覆盆式柱础，廊柱上各施一坐斗，开十字卯口，上承撩风榫，当心间内部梁架向外伸出，与坐斗相交，梁头出头后直断，石堂内置石床，墓主人直接置于其上，头枕石灰枕，无棺，如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2]；或为炉斗上承阑额，斗拱为一斗三升，当心间柱头铺作之间为人字形拱，石堂内置石床，墓主人直接置于其上，头枕石灰枕，无棺，如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图二，1）^[3]。

Bb 型 无廊悬山顶石堂。石堂为抬梁式承重墙结构，单檐人字坡悬山顶，整个亭室由数十块砂岩料石拼合而成，壁画直接绘于石堂内四壁、顶部、三角形梁和脊榫上，题材主要有墓主人夫妇同榻并坐画像、男女侍者、牛车出行图等，如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亭壁画^[4]；或为仿木建筑殿堂式结构，单檐悬山顶，门两侧各线刻一身着铠甲的门吏，上部隐刻人字形拱，内外壁刻墓主人画像、车马出行、孝子故事图等，如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孝昌三年（527）魏横野将军甄官主簿宁懋石堂^[5]。

C 型 歇山顶石堂。石堂为歇山顶殿堂式建筑，面阔三间，当心间辟门，两次间设直棂窗，柱头铺作用一斗六升，补间铺作均用人字形拱，四壁分别浮雕四臂守护神、祆神、狩猎、宴饮、出行、商队、祭祀和升天等图像，部分有彩绘或贴金，如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图二，2）^[6]；或石堂顶部由歇山顶造型的石构件覆盖，上有 2 个鸱吻，现仅存 1 个，雕刻立柱横枋，并以阴线刻出柱头斗拱和补间人字拱，石堂正面辟门，门左右两侧各有一胡人守护，四壁线刻出行、乐舞、仪仗、圣火等图像，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7]。

石质葬具主要有石床、石床屏风、石棺床、石棺和石堂等，而且大多组合出现。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北朝石葬具为北魏太安二年（456）吕续墓出土石堂。就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A 型石床基

[1]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著：《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青铜器 陶瓷器 墓葬壁画》，第 6-21 页。

[2]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2 期。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7 期。

[4]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亭壁画》，《文物》2001 年第 7 期。

[5] 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 年第 2 期。

[6]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 3 期。

[7] 葛承雍：《北朝粟特人大会中祆教色彩的新图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2016 年第 1 期。

本出土于大同地区，年代大致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余仅在河南濮阳出土一具，时代为北齐时期；B型石床出土于西安、洛阳^[1]和安阳等地，时代为北魏晚期至东魏、北周和北齐，均为北朝后期的都城或京畿所在，石床在具体形制、图像题材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可能与北朝时期三地的文化差异及外来交流情况不同有密切联系。A型石棺床屏风仅见于大同、洛阳和沁阳等地，时代为北魏平城时代及迁都洛阳以后和北齐时期，A型石床与A型石棺床屏风仅在有无棺具和有围屏上有差别，可能存在等级差别，年代基本相同；B型仿砖式石棺床仅见于北魏宣武帝景陵；C型须弥座式石棺床也仅见于湾漳北朝墓，学界基本认同湾漳墓为北齐文宣帝高洋武宁陵，采用这种与佛座极为相似的葬具应该与墓主的佛教信仰有关。

目前考古发掘正式出土的北朝石棺仅见于洛阳北魏曹连墓和西安北周李诞墓，石棺形制大同小异，差别主要体现在画像题材上，前者主要刻绘孝子图像，后者刻绘四神图像。鉴于石棺大多为非出土物，所以我们不能过多解释，但洛阳无疑为北朝晚期石棺出土的重要地区。石堂主要发现于大同、洛阳和西安等北朝时期的统治中心（或京畿重地），A型单面坡顶石堂仅见大同北魏解兴石堂一例，或许是因为构造太过简单，此后不再见这种单面坡顶的石堂；B型悬山顶石堂见于北魏平城时代和洛阳时代墓葬中；C型歇山顶石堂年代为北周时期，后成为隋唐石堂的主要流行形式。

北朝墓葬中的石葬具主要发现于大同、洛阳、西安、安阳、邯郸等北朝时期的统治区域，此外在北朝的其他统治区域也有零星发现。石葬具的使用人群多为统治阶层，既有帝王墓葬，如北魏宣武帝景陵、磁县湾漳墓等；又有皇族成员，如北魏清河王元怱、南平王元暉、赵郡贞景王元谧以及北齐文昭王高润等；还有高级官员，如北魏琅琊康王司马金龙、敦煌公宋绍祖等；还有入华粟特人，如康业、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北周凉州萨保史君等。由是观之，随葬石葬具的墓主身份等级较高，随葬石葬具在当时应有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

石葬具多为组合随葬，也有单独随葬，大多为仿木构式石堂，内置石床，石床前部多有图案装饰，或线刻，或浮雕，这种设置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并在唐前期形成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石棺床屏风最早见于北魏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韦正对其进行了初步复原和研究：“在石质的高足床榻上，直接放置或嵌置木质漆画的三面围屏；每一屏面用小木板组成大木板，然后在上面作画；围屏有边框。这个样子虽然可能与实用床榻仍有一定区别，但基本形态与许多壁画中的汉晋床榻相似，而不同于北朝时期常见的多扇独立板块的围屏床榻。”^[2] 屏风为漆木质，屏风画面内容为孝子烈女，颇具教化意味，墓主司马金龙父祖原为南朝人士，后降魏，故在司马金龙墓室中能够看到具有南朝画风的漆屏风，与石棺床、石柱础等构成北朝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石床屏风最早发现于西安北周萨保安伽墓中，后在康业墓、安阳固岸墓地 M57 中也有发现。安阳固岸墓地 M57 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置双阙，且为子母阙，阙顶象征性地雕出鸱吻，门两侧附墙，双阙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天门，能够满足墓主人升天成仙的心境。

二、北朝石葬具的来源

1. 石床的来源

《西京杂记》记载：“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

[1] 资料来源于洛阳网最新发布的洛阳市考古研究院 2022 年度项目汇报会上“孟津区朱仓村东北部发现的三座北朝时期墓葬”，发掘者初步推测墓葬年代为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其中 M260 出土 Bb 型双阙式围屏石床一具，M262 出土 Ba 型围屏石床一具，为北朝石葬具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洛阳网：《孟津发现北朝时期家族墓地 内有“董永七仙女”浮雕》，<http://news.lyd.com.cn/system/2023/02/12/032401271.shtml>，2023 年 2 月 12 日。

[2] 韦正：《北朝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2015 年第 7 期。

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三十许”。^[1] 以上虽然是对东周丧葬习俗的记载，但有助于我们认识北朝石床屏风。王雁卿认为：“平城出土的不见围屏的石棺床其象征意义是否可能是当时北魏时期北方人家的火炕，而形制采用榻形，尤其平城时代北魏后期出现的方形墓中砖砌棺床占据整个墓室半部，更像一个火炕。”^[2] 这种推测是可信的，为我们探讨石床、石棺床、石床屏风、石棺床屏风的来源提供了新视角。2009年5月，在山西省大同市御东新区文瀛北路施工时发现一座北魏壁画墓（图三）^[3]，墓葬坐北朝南，



图三 大同市御东新区文瀛北路北魏壁画墓

为长斜坡墓道砖砌单室墓，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墓室内紧贴北壁和西壁有砖砌床两座，两床相交处设一矮墙，床前设踏步，北侧床上置一具头西脚东、仰身直肢男性人骨。墓室内绘制壁画，由于长年积水，壁画大部分损毁脱落，仅存砖床立面、东北壁券顶等处的壁画。此墓中的砖床明显与黑龙江友谊县魏晋时期的凤林古城二号房址中发现的曲尺形火炕^[4]如出一辙。砖床四面原来都应绘制壁画，不过由于早期盗墓今已不见，但仍能看到绘制痕迹，用墓室内壁和矮墙充当屏风的作用，应为石床屏风的早期萌芽。鲜卑族的拓跋部发源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嘎仙洞，后不断向南迁徙，于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王朝很有可能将东北地区的生活习性带到平城地区，所以在平城地区发现如此多的石床、石棺床不足为奇。

床和榻本是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用具，在汉魏时期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到在床后或右侧置矮屏。平面呈曲尺状的屏风式坐床或榻，在汉晋时期的壁画上也可以看到，或墓主人独坐榻上，或墓主夫妇同坐床（榻）上，榻上置帷帐。司马金龙墓中出土了4件形制、大小相同的石雕柱础，由于墓葬早年被盗，墓中随葬器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和移位。石雕柱础分别位于后室甬道和后室内，由浅灰色细砂石制成，为鼓状覆盆状方基座造型，通高16.5厘米，中央柱孔直径约7厘米。前室散落两根竹竿，或有彩绘，一杆长238厘米，直径6.5厘米，另一杆残长155厘米，直径5厘米。有理由推测，石柱础中央应为插杆所用，柱础的功能相当于帷帐座，竹竿上应张有帷帐。山西寿阳县北齐库狄回洛墓中也出土了4件石柱础，位于木堂两侧，很明显应为帷帐座，这一发现为我们了解石雕柱础的功用提供了更好的材料支撑。在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石床挡板前侧（图四，1）、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石床屏风挡板前侧也能见到2个圆形铁质圆环嵌入石板内，同时田村北魏墓石床后部还出土3段残缺的彩绘木杆（图四，2），应为支撑帷帐所设。

北朝石床、石棺床、石床屏风、石棺床屏风等最早发现于山西大同一带，后多发现于洛阳、西安、安阳等地，这些都是北朝时期的统治区域，高官勋贵大多聚集于此。石床等也大多发现于上层贵族墓中，在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也有大量发现。邢福来认为石床屏风为入华粟特人在这一特定阶段的独特葬

[1]〔东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8、260-261页。

[2]王雁卿：《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石棺床》，《文物世界》2008年第2期。

[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

[4]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2期。



1



2

图四 山西大同南郊区田村北魏墓出土物

1. 墓内石床；2. 墓内出土彩绘木棺

立石板，围成框形结构，墓室底部多无底板，没有完全封闭，盖板或有或无。

北朝时期的石棺多集中发现于洛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石棺大多散落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很少，但其对研究北朝石棺的意义重大。北朝石棺主要流行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石棺形制模仿木棺，头大脚小，平面为梯形，装饰图案多为孝子、四神、伏羲女娲和龙虎升仙等图案。孝子图案的大量出现应与北魏统治者不断汉化并确立其正统地位有关，北魏统治者接受了汉晋时期的孝道观，以便其更好的统治。邹清泉在《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的改变及墓葬功能的实现》一文中提及：“北魏时，孝道思想由春秋战国以孝养在世父母为内涵演变为以‘孝悌之至，通于神明’为核心，‘孝’成为通神的工具与阶梯，孝子画像的图像内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北魏中后期特殊的政治背景下，经《孝经》的诱导，孝子画像因具有了‘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内涵而成为通于天人之际的象征并藉此获得与传统升仙图像相近的图像身份，由先代的

俗^[1]，刘振东认为无棺葬与中亚民族有关^[2]，这种直接将尸体置于石床屏风上的做法应为中亚粟特人的特殊葬俗。简而言之，石床等应为拓跋鲜卑民族火炕与华夏民族床、榻和屏风相结合的产物。北魏王朝第一次将这一石质葬具置于墓室中，可谓一大创举，丰富了中古时期墓葬美术考古研究的内容。

2. 石棺的来源

石材自汉代以来就与永恒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汉代人将墓室视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的场所，故模仿生前居住的空间来构造自己的墓室，以达到“事死如事生”。在两汉高等级墓葬中可以看到漆棺，不见石棺，如湖南长沙马王堆 M1 出土的四重漆棺^[3]、河北满城 M2 出土的镶玉漆棺^[4]、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镶玉漆棺^[5]等，在中小型汉墓中也可以看到木棺残件。而在同一时期的四川、西藏和贵州等西南地区可以见到一种石棺墓，但是西南地区汉墓中发现的石棺与北朝时期的石棺有很大差别。西南地区汉墓中发现石棺的形制多为在竖穴土坑壁四周

[1] 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围屏石榻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 年增刊。

[2] 刘振东：《论北朝时期无棺葬》，《考古与文物》2014 年第 5 期。

[3]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集），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第 16-31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第 234-244 页。

[5] 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1999 年第 1 期。

‘叙事性绘画’转为‘相关性绘画’。”^[1]可见,《孝经》客观上推动了孝子图像的流传和发展。

北朝石棺的来源比较复杂,关于梯形木棺的来源,学术界基本认同其是鲜卑墓葬的特征之一。北朝梯形石棺发现较少,墓主人身份高贵,既有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的元氏皇族,也有在华外来人员的墓葬,如西安北周李诞墓,根据墓志推断,墓主李诞及父祖极有可能是来自天竺的婆罗门人,于北魏正光年间从罽宾回到中土,因其为婆罗门族,多次受到皇帝的赏赐。元谧同样也是如此,《魏书》载:“正光四年薨。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帽帛五百匹。高阳王雍,干之母弟,启论谧,故超赠假侍中、征南将军、司州牧,谥曰贞景。”^[2]笔者认为元谧石棺应为“东园秘器”的一部分,这一名称屡见于汉代正史,如《汉书》云:“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绋锦。下至贤家僮仆皆受上赐,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弟尽在董氏,而乘舆所服乃其副也。及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赐贤,无不备具。”^[3]《后汉书·胡广传》载:“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4]在魏晋文献中也有较多记载。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汉化程度日益加深,通过学习汉族正统的做法以巩固其统治,赐予元氏皇族和来华外国人等上层贵族特殊的葬具正合其时。北朝石棺很有可能是北朝晚期统治者赠予上层贵族的特殊葬具。

3. 石堂的来源

孙伟刚在《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结合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出土石堂,推测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铭文所言“石堂”当指秦始皇陵地宫内的石椁或石质墓室。^[5]孙文仅凭铭文相同而将相隔年代较远的遗物进行比对研究的方法虽不尽合理,但为我们探讨北朝墓葬出土石堂的源头提供了一些线索。鉴于田野考古材料的匮乏,北朝石堂的源流能否追溯到秦代暂且存疑。巫鸿认为:“北魏石棺不仅继承了四川石棺的形式特征,同时还继承了许多诸如青龙、白虎和天门在内的道教题材,房形椁的改造和利用应看作这种广阔文化互动的一部分。”^[6]此处的石棺、房形椁与石堂为一物,但齐香钧认为“参照考古发现情况与文献记载可知,这种石堂的性质应为‘椁’,其形制直接仿照地上建筑石祠堂。这种葬具的产生,根源在于少数社会中层人员为实现祭祀目的,将墓上祠堂移至地下的需求。”^[7]在南北朝时期,大量汉代祠堂还保留在地面,所以这种说法还是较为可信的。马嘉琪对北魏平城时代房形石堂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对房形石堂墓出现的可能诱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正是在北魏中期加大力度转向晋制实施薄葬前后,平城出现利用晋制之外的丧葬传统在墓室内搭建一座房形‘建筑’以保留和再现墓葬壁画的特点。被创造出的房形石堂延续着墓葬壁画凝聚代人集团的政治功能,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代人集团用以规避晋制的手段。”^[8]笔者认为马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房形石堂的出现应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了一座木构建筑^[9],内置一函匣式木棺,木构建筑很明显为生前居住场所的微缩。无独有偶,北魏太和元年(477)贾宝墓^[10]墓室中部也置一木构建筑(简报称“木堂”),建筑内置木榻,无棺,均已腐朽,仅存痕迹,发掘者依据出土的木构痕迹判断木构建筑为前廊后室的单间

[1] 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的改变及墓葬功能的实现》,中央美术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I-II页。

[2] [北齐]魏收:《魏书》卷二十一上《赵郡王》,中华书局1974年,第544页。

[3] [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3-3734页。

[4] [南朝宋]范曄:《后汉书》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1510-1511页。

[5] 孙伟刚:《西安阎良新发现秦石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物》2019年第1期。

[6] [美]巫鸿撰,郑岩译:《“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年第2期。

[7] 齐香钧:《北朝至隋墓葬出土石堂再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8] 马嘉琪:《北魏平城(398—494)房形石堂墓研究》,东南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I页。

[9]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北魏贾宝墓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第6期。

房形结构。可见，北朝墓中的棺槨材质有木有石，不过由于木构很难保存下来，所以发现甚少，北朝石堂也是对生前居所的模仿。饶有趣味的是，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前室内有一庑殿顶石槨，槨内正壁（北壁）绘墓主人像，两侧各有一侍女，东西两壁和龕顶也绘制壁画。倪润安认为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至十六国早期，墓内石龕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龕。^[1] 笔者基本认同是文的观点，但从前室内石构件的尺寸与组合形态来看，应称为“石槨”或“石堂”，而不应称为“石龕”。前室石槨应与地上祠堂有相似功能，为祭祀墓主魂灵的产物，将地上祠堂直接搬到墓内，可能与游牧民族对祠堂的具体功能缺乏理解有关，也反证了是文认为石槨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观点。可见，魏晋十六国时期就有将石槨置于墓内的情况，北魏居平城时又将石堂置于墓内，可见其文化影响。石堂很可能是对魏晋十六国时期墓内石槨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是对汉代墓上祠堂和生前居室的承袭与发展，符合北朝时期人们将墓室看作永生之维空间的需求。

结 语

综上所述，北朝墓葬中出土的石葬具主要有石床、石床屏风、石棺床、石棺和石堂等，主要发现于北朝时期的统治中心及其邻近地区。石床、石床屏风、石棺床应为拓跋鲜卑民族火炕与华夏民族床、榻、屏风相结合的产物；石棺可能是北朝晚期统治者赠予上层贵族的特殊葬具；石堂很可能是对魏晋十六国时期墓内石槨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是对汉晋墓上祠堂和生前居室的继承和发展，也符合北朝时期人们将墓室看作永生之维空间的需求。

以石材构筑墓葬由来已久，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墓就是很好的明证。或许是因为坚不可摧、经久耐磨和可塑性强等特性，北朝时期墓内重新流行随葬石质葬具。不论是从石葬具的形制与组合，还是刻绘的内容来说，它们都是多民族融合、交流和互动的产物。

（责任编辑：陈 曦）

A Study on the Types and Origins of Stone Burial Objec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ng Tao

Abstract: The stone burial objects excavated from tombs of Northern dynasties mainly include stone beds, stone bed screens, stone coffin beds, stone coffins, stone halls, etc., which were mainly found in the ruling center and its adjacent areas. The stone bed, stone bed screen, and stone coffin bed were most likely produ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heated brick bed of the Tuoba Xianbei ethnic group and the bed, couch, and scree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one coffin was likely a special burial object given to the upper-class nobles by the rulers of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he stone hall might be a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arcophagi inside the tombs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hile also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ancestral halls on the tomb and former residenc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It also satisfied the demand of people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ho regarded the burial chamber as a space for immortality.

Keywords: Northern Dynasties, Stone Burial Objects, Stone Bed Screen, Stone Hall, Origin

[1] 倪润安：《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

佛山经堂铁塔文物研究

许晓静

佛山市博物馆, 广东佛山, 528000

内容提要: 1970年, 广东省佛山市经堂古寺内一座舍利铁塔被砸碎, 铁塔基座内发现石函、瓷盒、238颗舍利、“十宝”、铜镜和经书等珍贵文物。文物数量及石函内的文字信息可与典籍记载相对应。经堂铁塔来源于“佛山”之名起源地塔坡寺(后更名“经堂古寺”), 建造于佛山冶铁业兴盛的清中期。铁塔及塔下瘞藏文物对溯源佛山历史, 了解佛山地区佛教发展、冶铁业情况、国际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物证价值。

关键词: 经堂铁塔 佛教文物 舍利 十宝

中图分类号: K8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095-09

经堂铁塔原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经堂古寺浮屠殿内, 初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 为仿阿育王式大型佛教舍利铁塔。经堂古寺在佛山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前身是“佛山”之名的起源地——塔坡寺。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 东晋隆安二年(398), “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尊者, 因讲经而始建经堂”, 唐贞观二年(628), 塔坡冈上“夜放金光, 掘之, 得铜佛三尊”。^[1]“佛山”由此得名, 之后就地建寺, 取名“塔坡寺”。塔坡寺毁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明天启七年(1627)复建, 更名“经堂古寺”。清光绪初年, 广州华林寺住持勤安法师来佛山重修经堂古寺, 后被慈禧赐名“万寿塔坡禅寺”^[2], 经堂古寺由此名声大振, 成为当时岭南最著名的宝刹之一。1970年, 经堂古寺部分遭拆毁, 铁塔被砸碎, 于塔下基座内发现石函、瓷盒、舍利、“十宝”、铜镜和经书等文物。1987年, 佛山市博物馆将经堂铁塔按原貌修复后在佛山祖庙景区内展示, 铁塔残件和塔中舍利等文物由佛山市博物馆收藏。^[3]

经堂铁塔的文物面世至今半个多世纪, 尚无详细研究。张雪莲曾梳理经堂古寺和铁塔的历史脉络, 并简要介绍铁塔发现的文物来源; 陈志杰介绍经堂铁塔时, 虽有提及铁塔的佛教文物, 但未展开研究。^[4]本文意在经堂铁塔及塔下瘞藏文物进行梳理和研究, 挖掘它们在佛山历史、佛教发展和经贸方面的物证价值。

一、经堂铁塔文物情况

经堂铁塔下发现文物31套, 共计544件。有石函、青花瓷盒、水晶瓶、铜盒、铜镜、钱币、舍利、

[1] [民国] 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 民国十二年刻本, 第144页。

[2] [民国] 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 第145页。

[3] 佛山市博物馆编:《佛山祖庙》, 文物出版社2005年, 第27页。

[4] 佛山市博物馆编:《佛山祖庙》, 第27页; 陈志杰:《佛山现存古代冶铸产品之最》, 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 广州出版社2009年, 第150页。

经书、各类玉石器等。

1. 石函

1件。JT:20,大理岩石质,灰白色,表面光滑,长方体。通体长29.5厘米,宽23.9厘米,高20厘米。函身平面呈长方形,四壁平直,平底,中部开圆形槽,子口。外径18.7厘米,内径15.8厘米,深5.5厘米。函盖作盃顶,圆形内槽。径长19厘米,深5厘米。盃顶盖上有竖排手书红字“佛山古佛塔藏舍利”,横排文字模糊无法辨认。函盖内槽手书红字“舍利藏记”,“青石盒内瓷盒。瓷盒内有金精鉗安舍利贰佰伍拾壹颗红石,盖十宝相伴,碯金二颗、黄金一粒、玉石二环、玛瑙二环、宝石二粒、珊瑚二枝、珍珠二颗、砗磲一团、琥珀一团、纹银一粒”,“大清嘉庆五年安居日重建塔住持僧佛受敬来记”(图一,1)^[1]。

2. 青花瓷盒

1件。置于石函内。JT:13,由盒盖和盒身组成。盒盖圆口,圆弧面;盒身为子口,弧腹,矮圈足。釉面光滑,口和圈足露胎。青花发色偏蓝,器身和盖面满绘缠枝花卉纹,瓷盒内置舍利瓶。盒盖直径13.3厘米,盒身口径13.5厘米,腹径13.5厘米,底径9.5厘米,通高7.4厘米(图一,2)。

3. 雕花水晶瓶(带盖)

1件。置于青花瓷盒内。JT:11,淡黄色半透明瓶身,小平口,直颈,弧肩,扁弧腹,平底。附小盖,平圆口,圆弧面。瓶身雕刻莲花纹。瓶内置舍利。口径0.8厘米,腹径5.5厘米,通高6厘米(图一,4)。

4. 铜盒

1件。JT:31,圆形,由盒盖和盒身组成。盒盖敛口,盖面隆起呈四级阶梯状,顶部有8瓣花朵纹座乳突形钮。盒身直口圆唇,浅弧腹,圈足,素面。盖径20.2厘米,盒身口径22厘米,底径20.4厘米,通高9.5厘米(图一,3)。

5. 铜镜

1件。JT:26,圆形,桥形钮。内区底纹为复线水波纹,主纹由水牛、稻穗、祥云组成。外区有三周弦纹和锯齿纹构成的纹带。素宽弧缘。直径13厘米,厚0.47厘米(图一,6)。

6. 舍利

共计238颗。标本JT:12,为细小椭圆或者不规则圆珠状,多呈米黄色或白色,晶莹透亮,少量呈酱黑、黄棕色,不透明。最大直径约0.3厘米,最小直径0.03厘米(图一,5)。

7. 外国钱币

2枚。金币, JT:14, 圆形。正面居中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头像, 外环刻“VICTORIA D:G: BRITANNIAR: REG:F:D: 1866”, 背面居中刻“AUSTRALIA”, 外环上下分别刻“SYDNEY MINT”“ONE SOVERRIGN”。直径2.2厘米, 厚0.15厘米(图一, 7)。银币, JT:16, 圆形。正面居中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头像, 外环刻“VICTORIA DEI GRATIA BRITANNIAR: REG:F:D:”, 背面居中刻“SIX PENCE”, 底刻“1839”。直径1.9厘米, 厚0.12厘米(图一, 8)。

[1] 本文图片由高宇峰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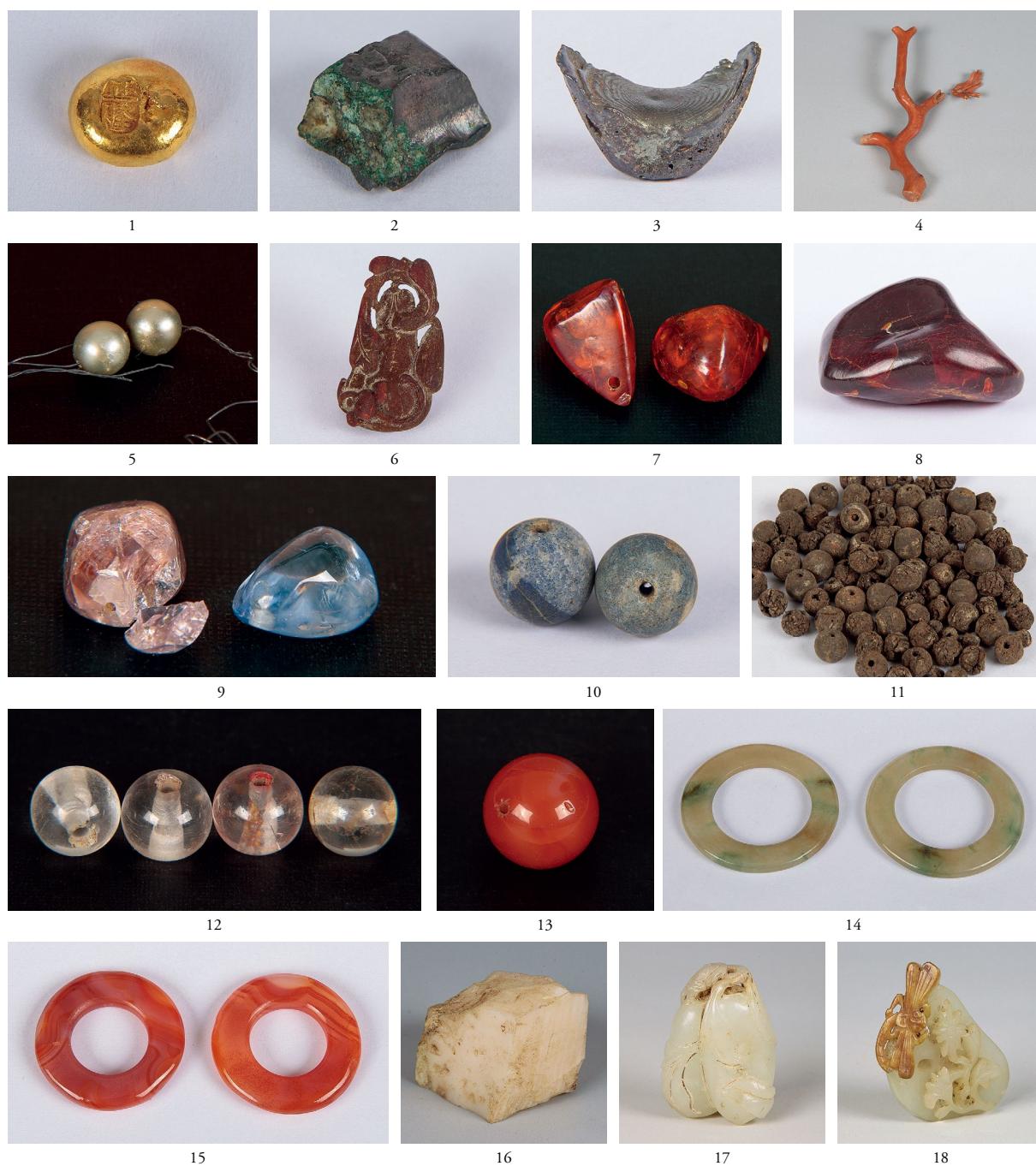


图一 经堂铁塔文物之一

1. 石函(JT:20); 2. 青花瓷盒(JT:13); 3. 铜盒(JT:31); 4. 雕花水晶瓶(JT:11); 5. 舍利(JT:12); 6. 铜镜(JT:26); 7. 金币(JT:14); 8. 银币(JT:16); 9.《大悲心陀罗尼》经书(JT:29); 10.《六字大明王咒》折页(JT:30)

8. 经书

2件。《大悲心陀罗尼》经书, JT:29, 纸本折页, 封面有竖排朱书“大悲心陀罗尼”, 经文为红色竖版印刷, 落款为“咸丰辛亥年粤省华林寺藏”。纵4.6厘米, 横69.5厘米(图一, 9)。《六字大明王咒》折页, JT:30, 纸本, 封面正中有竖排朱书“六字大明王咒”, 墨书落款为“大清光绪三年冬月佛成道日重修”, 咒语亦为朱书。纵12.8厘米, 横71厘米(图一, 10)。



图二 经堂铁塔文物之二

1. 金粒 (JT:1); 2. 银块 (JT:2); 3. 银锭 (JT:15); 4. 珊瑚 (JT:4); 5. 珍珠 (JT:5); 6. 琥珀坠饰 (JT:6); 7. 琥珀珠 (JT:7); 8. 琥珀石 (JT:17); 9. 宝石 (JT:8); 10. 硝金石珠 (JT:9); 11. 迦南木珠 (JT:19); 12. 水晶珠 (JT:27); 13. 玛瑙珠 (JT:28); 14. 翡翠环 (JT:10); 15. 玛瑙环 (JT:18); 16. 砵磲 (JT:23); 17、18. 白玉雕饰 (JT:21、JT:22)

9. 金银器和玉石器。

金粒 1粒。JT:1, 平面近椭圆形, 一面戳印“正隆”。长0.9厘米, 宽0.7厘米, 厚0.4厘米(图二, 1)。

银块 1件。JT:2, 近台体, 剖面呈梯形, 表面氧化呈黑色。长1.4厘米, 宽1.2厘米, 高0.8厘米(图二, 2)。

银锭 1件。JT:15,呈船形,两端高翘,表面氧化呈黑色。长1.5厘米,宽0.6厘米,高0.9厘米(图二,3)。

珊瑚 2枝。JT:3,断为两枝,主杆呈棕色和红褐色,分支多泛白,疑遭火灼。主枝高11厘米,宽14厘米;断枝高4.5厘米,宽1.5厘米。JT:4,断为两枝,茶红色,表面光滑,有玻璃光泽。主枝高9.2厘米,宽4.5厘米;断枝高2厘米,宽1.2厘米(图二,4)。

珍珠 182颗。据形状差异可分为两类。第一类,2颗。标本JT:5,圆形,莹白色,圆润,中间穿孔,由细银丝串联,直径0.48厘米(图二,5)。第二类,180颗。多数呈不规则椭圆形,少量为圆形,莹白色,圆润,穿孔,器形较小。其中,2颗直径0.28厘米,其余直径0.1厘米。

琥珀坠饰 1件。JT:6,棕红色,半透明,圆雕出葫芦、藤蔓、叶片,造型生动。长3.6厘米,宽1.9厘米,厚1.2厘米(图二,6)。

琥珀珠 2颗。JT:7,近水滴形,光滑润泽,半透明。尺寸分别为长1.7厘米,宽1.2厘米;长1.5厘米,宽1.3厘米(图二,7)。

琥珀石 1件。JT:17,不规则椭圆形,表面光滑润泽,棕红色,不透明。长5.5厘米,宽4.6厘米,厚2.6厘米(图二,8)。

宝石(碧玺、蓝宝石) 2颗。碧玺石, JT:8-1,粉红色,近椭圆形,半透明,破为两半。长0.9厘米,宽0.7厘米,厚0.6厘米。蓝宝石, JT:8-2,海蓝色,近椭圆形,透明。长1厘米,宽0.7厘米,厚0.7厘米(图二,9)。

碲金石珠 2颗。标本JT:9,圆珠状,青绿色。直径1.1厘米,中间穿小孔(图二,10)。

迦南木珠 90颗。标本JT:19,迦南木,黑色,圆珠状,中间穿孔,多朽坏。直径0.8厘米(图二,11)。

水晶珠 4颗。标本JT:27,圆珠形,莹亮透明,中间穿孔。直径1厘米(图二,12)。

玛瑙珠 1颗。JT:28,圆珠形,红棕色,莹亮呈玻璃光泽,不透明,中间穿孔。直径2.3厘米(图二,13)。

翡翠环 1对。JT:10,种水细腻,整体淡黄色,局部点翠,磨制光滑,扁体圆环状,截面呈椭圆形。外径5.1厘米,孔径3.3厘米,厚3.8厘米(图二,14)。

玛瑙环 1对。JT:18,红褐色,层理清晰,莹润光泽,磨制光滑,扁体圆环状,截面呈椭圆形。外径3.3厘米,孔径1.6厘米,厚0.5厘米(图二,15)。

砗磲 1件。JT:23,近长方体,乳白色。长4厘米,宽3.7厘米,厚3.4厘米(图二,16)。

白玉雕饰 2件。JT:21,和田白玉,玉质润泽,雕刻成三瓜造型,瓜叶低垂,顶部穿孔用于穿绳佩戴。长5.1厘米,宽3.5厘米,厚2.4厘米(图二,17)。JT:22,和田白玉,玉质润泽,主体雕刻成莲藕,上饰莲花,玉皮呈棕黄色,雕刻成蜻蜓,整体造型生动。长5厘米,宽4.8厘米,厚1.1厘米(图二,18)。

由于文物采集记录散失,文物所属方位不详。根据石函内文字记录、器物大小和形状、文献记载推测,石函(JT:20)内放置瓷盒1件(JT:13),瓷盒内放置水晶瓶1件(JT:11),水晶瓶内放置238颗舍利(JT:12)。另外,石函内还有“十宝”作为供养物相伴舍利,分别是碲金石珠2颗(JT:9)、金粒1粒(JT:1)、翡翠环1对(JT:10)、玛瑙环1对(JT:18)、宝石2颗(JT:8)、珊瑚2件(JT:3、JT:4)、珍珠2颗(JT:5)、砗磲1件(JT:23)、琥珀石1件(JT:17)、银块1件(JT:2)。其余铜盒、经书、铜镜、钱币和玉石器等方位不详。

二、经堂铁塔文物研究

（一）经堂铁塔

经堂铁塔为仿阿育王式舍利塔，舍利塔亦称“窣堵波”“浮图”。阿育王是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早年好杀戮，后皈依佛教，佛教史上有“阿育王造八万四千舍利宝”的典故。阿育王驱使鬼神，一日之间在各地建八万四千座塔供奉舍利，“世间人民兴庆无量，共号曰阿育王塔”^[1]。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舍利崇拜盛行。据《高僧传》记载，三国孙权时，康僧会祈请并得到舍利后，向孙权展示舍利之神奇和坚不可摧，“权大嗟服即为建塔”^[2]，这是中国最早记录建造舍利塔文献。

经堂铁塔于清雍正十二年建成，最初“高一丈零八寸，重一千八百余斤”，嘉庆四年（1799），铁塔重修，“增高一丈八尺，重七千余斤”。^[3]修复后的铁塔通高4.6米，重近4吨。铁塔呈四方形，塔下为汉白玉底座，塔身有莲花、水波浮雕纹饰，塔飘檐四面各雕刻两尊飞天像，塔顶竖立一株含苞待放的莲花。四面佛龕内各放置铜佛一座，其上雕刻“释迦文佛”四字。

国内保存的阿育王塔大多是木、砖、石结构，佛山经堂铁塔制作精良且体量较大，为清代铁质工艺中的精品。“佛山之冶遍天下”^[4]，“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5]，经堂铁塔的铸造与佛山冶铁业的兴盛息息相关。佛山地区的冶铁早于五代南汉时期已初具规模，现存世较有名的广州光孝寺东西铁塔、梅州千佛塔寺铁塔、韶关曲江南华寺降龙铁塔即为南汉时期南海永丰场生产^[6]，其中光孝寺西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有确切年代记录的铁佛塔。佛山冶铁业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官准专利”政策规定两广所产优质铁料需尽数运往佛山统一冶炼，大量佛山铸造的铁锅、铁农具、铁钟、铁炮等被应用于日用、生产、祭祀和军用器等方面。^[7]其中，用于祠庙场所的铁器有铁塔、铁钟、铁鼎、铁香炉、铁云板等。经堂铁塔在雍正年间铸造，恰是佛山冶铁业的辉煌时期。它采用佛山冶铁技艺中独具特色的“塔铸”法^[8]，针对体型较大的塔形器件，工匠一般由下至上逐层浇铸，分段铸造套合而成。“塔铸”技艺早在广州光孝寺南汉铁塔的铸造中便已经使用，高难度的工艺以及不间断的传承，是佛山冶铸产品闻名遐迩的关键因素，而经堂铁塔便是佛山冶铁黄金时期铸铁作品中的典型代表。

（二）经堂铁塔的舍利瘞藏

经堂铁塔下瘞藏的舍利容器包括石函、青花瓷盒和水晶瓶，供养物包含238颗佛舍利以及“十宝”、钱币等。这些文物保存完整、信息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1. 舍利

（1）舍利种类

舍利，“佛之身骨也”^[9]，通常指佛陀之遗骨，作为佛陀涅槃后的象征，供养舍利等同于供养佛本身。《法苑珠林》中将舍利分为三种：“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发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10]

[1]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183页。

[2] [梁]慧皎等：《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第144-145页。

[4]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458页。

[5]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第409页。

[6] 朱培建：《明清佛山冶铁业初探》，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第177-178页。

[7]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第93页。

[8] 陈志杰：《持续辉煌的佛山铸造技艺》，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第172页。

[9]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校勘本》（中），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257页。

[10]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1260页。

经堂铁塔的石函内有“瓷盒内有金精铍安舍利贰佰伍拾壹颗红石”等手书文字，“红石”两字表明这批被供奉起来的舍利是宝石类的舍利替代品，并非佛陀或者高僧的遗骨。《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曰：“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精、马脑、玻梨众宝等造作舍利。珠如上所用。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1]佛教舍利供养中使用替代品是常见之举。从国内考古清理的舍利塔基或地宫中的出土文物来看，舍利种类繁多，大部分舍利也并非佛之真身舍利。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出土的北宋石函中有一千余颗舍利，除了银方匣内有两颗绿豆大小的真身舍利外，其余全部是磨圆的细小石英石。^[2]另外还有用玛瑙、水晶、玉石等制成舍利替代品，以及用珍珠、珊瑚作为舍利象征物瘞埋佛塔下的做法^[3]。

（2）舍利数量

经堂古寺内发现的舍利共有 238 颗，根据石函内文字所载，其中有舍利“贰佰伍拾壹”颗，《佛山忠义乡志》中亦记载了“中有金精瓶藏舍利子二百五十一颗”^[4]。可见，最初瘞藏的舍利为 251 颗。从石函内记录的“清嘉庆五年”到舍利离开铁塔的 170 年间，13 颗舍利如何离散，可从期间发生的四次大事件来考察。

第一次大事件发生在清咸丰四年（1854），佛山当地红巾军起义，以经堂寺僧人和尚邝能为军师，经堂古寺为都督府，红巾军起义失败后，经堂古寺被焚毁。此次事件导致“寺被焚毁，片瓦不存，仅余铁塔与古佛像三尊无恙”^[5]，或曰“咸丰甲寅毁于兵，惟铁塔岿然尚存”^[6]。由此可知，经堂铁塔没有在这次事件中遭到破坏，舍利也可能没有散失。第二件大事件发生在光绪三年至光绪七年（1877—1881），住持勤安法师重建经堂古寺，落成后曾取出舍利供信众参观，后放回塔内。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佛寺重修和舍利展示仪式，石函中的“六字大明王咒”落款为“大清光绪三年冬月佛成道日重修”，也证明当时石函的确被取出打开过，再次瘞藏时还加入一份咒书。然而，以舍利在佛教信徒心中地位之神圣，展示仪式之严谨，舍利散失的可能性不大。勤安法师圆寂后，寺僧发动暴乱，此为第三件大事。寺庙内的器具遭破坏，藏经被焚烧，这次暴乱中原本供奉于经堂古寺内的铜佛不知所踪。但这次暴乱后“此塔金轮高耸，岿然独存”^[7]，可见铁塔再次幸免于难。1970 年铁塔被打碎，石函被取出后舍利仅余 238 颗，不见的 13 颗舍利极有可能在这次破坏中散失。

（3）舍利瘞藏时间和方式

石函内“舍利藏记”记载的时间是“嘉庆五年”（1800），但这并不是舍利最初的瘞藏时间。经堂铁塔舍利最初由潮省和尚从东莞宝坛祈请而来，于雍正十二年铁塔建成之时瘞藏塔下。60 多年后，僧人敬来重修经堂铁塔后将舍利重瘞，并有“舍利藏记”。因此，这批舍利最早的瘞藏时间可到雍正十二年。

从石函文字记录及内部文物放置的方式来看，经堂铁塔的舍利瘞藏以石函、瓷盒和水晶瓶叠加套层组合的方式存放。这种舍利瘞埋方式在印度佛教早期就开始流行，具体表现为舍利容器大小递进、层层包裹，被认为是用修辞学上的不断重复来强调舍利的神圣性。^[8]套层组合的瘞藏方式传入

[1]〔唐〕不空译：《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如意宝珠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9 册），No.961。

[2] 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记》，《文物》1981 年第 7 期。

[3] 南丰县博物馆：《南丰大舍利塔地宫清理简报》，《江西文物》1989 年第 2 期；夏忠润：《济宁铁塔发现一批文物》，《文物》1987 年第 2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大学历史系、固安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 年第 4 期。

[4]〔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六《金石一》，第 29 页。

[5]〔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首二《图》，第 79 页。

[6]〔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第 145 页。

[7]〔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六《金石一》，第 29 页。

[8] 于薇：《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文物出版社 2018 年，第 24 页。

中国后最早出现在河北定县的北魏塔，舍利的瘞埋使用了石函、铜钵/琉璃钵和琉璃瓶的套层组合方式。^[1]北魏塔基是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有纪年的舍利塔基，经堂铁塔的舍利瘞藏方式与其极为相似。此外，隋仁寿四年（604）所建陕西耀县神德寺塔也使用了函、盒和瓶的舍利瘞埋方式。^[2]至唐以后，层层相套的瘞藏方式虽然尚在使用，但已融入中国的丧葬风俗^[3]，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地宫”“金棺银椁”“天宫”“塔幢”等元素。

经堂铁塔采用佛教早期舍利瘞藏方式，或与清代佛山地区佛教的再度兴盛有关。佛山佛教发端于东晋时期^[4]，明代因受抑制而衰落，清初开始复兴。彼时寺院修建之风盛行，经堂古寺的数次重修不仅得到乡绅和信众的捐助，地方官府也大力倡导。在数次重修活动中，经堂古寺与佛山历史的关系不断被重提和演绎。经堂铁塔建造之初仅被称为“铁浮图”，并无标准样式，之后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四年不断重建加高，并在第三次修建之时明确为“仿阿育王塔”^[5]。而仿用佛教早期的舍利瘞藏方式应是一种强化正统地位的行为。

从形制上看，经堂铁塔舍利瘞藏的最外层使用了隋代典型的舍利容器——盃顶方函。这类方函从北魏时期开始便用于舍利瘞藏，被记录为“石函”“石匣”“石盒”等。隋文帝时期，石函的制式得到统一，隋文帝于三十州起舍利塔，著作郎王邵曾记载“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捧三十舍利，自内而出……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6]。这次以皇权为主导的大规模舍利瘞藏仪式，为石函用于舍利瘞藏制定了官方模式。之后，石函便普遍使用于舍利瘞藏中。从考古出土和零散发现的情况来看，虽然石函使用时间较长，范围较广，但大多出现在北魏至宋元时期的舍利塔基或地宫中，明清舍利塔中发现较少。佛山经堂铁塔的清代石函恰好验证了这类舍利容器使用时间的延续性，是研究明清舍利瘞藏容器的宝贵材料。

2. “十宝”

经堂铁塔的佛教文物中有一批金银和玉石器，石函内手书文字称之为“十宝”：“盖十宝相伴，碇金二颗、黄金一粒、玉石二环、玛瑙二环、宝石二粒、珊瑚二枝、珍珠二颗、砗磲一团、琥珀一团、纹银一粒”。《佛山忠义乡志》也记载了经堂铁塔舍利“伴以十宝：砗磲、玛瑙、珊瑚、宝石、珍珠、琥珀、玉石为七宝，加黄金、碇金、白金为十宝”。^[7]因此，“十宝”就是十种金银和玉石器，是和舍利一同瘞藏的供养物。

在佛教舍利供养物中，经常出现“七宝”的说法，指的是七种珍宝。东晋法显和尚西行求法，在那竭国见到国王供养舍利的仪式“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校饰”^[8]，唐高僧玄奘记录西域拘尸那揭罗国如来焚身处时称“如来寂灭，人天悲感，七宝为棺，千毳缠身，设香花，建幡盖”^[9]。在佛教文献中，“七宝”的种类略有差异。《佛学大辞典》关于“七宝”的解释多达五种，每种解释都罗列了不同的“七宝”^[10]。综上所述，“七宝”主要有金、银、琉璃、砗磲、珍珠、玛瑙、珊瑚、玻璃、琥珀、玫瑰等，数量并不止七种。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

[2] 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3] 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

[4]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八《祠祀二》，第144页。

[5]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六《金石一》，第30页。

[6]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1275-1276页。

[7] [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六《金石一》，第29页。

[8]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9] [唐]玄奘、辩机撰，董志翘译：《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230页。

[10]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校勘本》（上），第95页。

经堂铁塔石函中的供养物除了“七宝”：砗磲、玛瑙、珊瑚、宝石、珍珠、琥珀、玉石之外，还加了“三宝”——黄金、碯金（青金）、白金（白银），共有“十宝”。事实上，这十种珍宝都是常见的舍利供养物。河北定县北魏塔塔基出土的供养物有金、银、铜、琉璃、玉、玛瑙、水晶、珍珠、贝、珊瑚等^[1]，西安清禅寺隋舍利墓中出土了玻璃、玛瑙、水晶石、玉髓、琥珀、金饰、银戒指^[2]，辽宁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中有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片、金块、水晶珠、骨珠等^[3]。可见，“七宝”“十宝”组合都可当作供养物，其种类并不固定，一些晶莹剔透、五光十色的宝玉石因其珍贵的属性和清净的外观得到佛信徒的青睐，被选为舍利供养物。除“七宝”“十宝”外，佛教供养物中还会添加货币、香料、药材等具有时代或地域性特色的物品。

3. 外国钱币

经堂铁塔下发现的外国钱币一共有两枚，分别是1839年的银币和1866年的金币。由于铁塔建成于雍正十二年，改建于乾隆四十六年和嘉庆四年，时间都早于两枚钱币的发行时间，钱币不可能在当时进入铁塔。光绪三年至光绪七年，经堂古寺重修落成后，舍利曾被取出展览，重新瘞藏时有可能添加供养物，两枚钱币最有可能在这次舍利瘞藏时加入石函中。在舍利瘞藏中添加外国钱币作为供养物的习惯自古有之。河北定县北魏塔和陕西耀县隋神德寺塔的舍利塔基中都发现了波斯萨珊银币，它们为研究早期东西方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证。

佛教传播与商业息息相关，早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其中一条路径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在南朝时期自海路而来，最先在广州登岸，然后自南向北弘扬佛法。广东佛山在明清时期商贸发达，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尤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佛山因属广州府南海县管辖，工商业发展迅速。经堂古寺的两枚外国钱币大约在清中晚期流入佛山，被瘞藏在舍利铁塔下。寺内僧人视外国钱币为珍品，将其和珠宝玉石一并瘞藏供养。经堂铁塔发现的外国钱币体现了经堂古寺较大的影响力，也是清代佛山对外贸易的见证。

结 语

经堂古寺是佛山最早建立的佛寺，兴盛于晋唐时期，于明代抑佛事件中遭破坏，历经数次修建，辗转更名，香火绵延，至清代成为岭南名刹。寺中建造的经堂铁塔是清代佛山地区佛教复兴的产物，舍利石函的形制和舍利瘞藏方式有仿古制、强正统的倾向。此外，清代佛山经济的繁荣也体现在铁塔及其瘞藏文物上。铁质舍利塔的规模较大，使用佛山特殊工艺铸造而成，为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实证。铁塔下发现的外国钱币，也印证了清代佛山商贸活动和宗教传播的密切关系。经堂铁塔下发现的文物、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与文献记载相互对应，是佛山地区历史、经济、文化以及佛教传播的物证，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责任编辑：陈曦）

（下转第120页）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

[2] 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3]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将“社区”问题化：重思遗产研究中的社区议题

赵慧君

青岛市博物馆，山东青岛，266100

内容提要：“社区”一词凭借其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对其安全、美好、温馨等品质的想象一度让社区成为思考现代性危机的替代性路径。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区话语通过多种方式逐渐进入遗产领域，并被广泛使用。然而，无论是在遗产理论还是实践中，对社区话语不加思考的使用及滥用遗产学界造成了巨大的争议，并削弱了其之于遗产研究的潜力。社区本身是一个复杂且难以捉摸的概念，当遗产遭遇且拥抱社区之后，遗产领域在处理社区议题时生成了一系列的困境。以“社区”为切入点，采取将其“问题化”的处理方式，有助于重新思考社区议题之于遗产研究的价值与限度。

关键词：遗产 社区 社区参与 社区崇拜 遗产政治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10(2024)01-0104-07

在近年的遗产研究领域，“社区”^[1]成为一种学术批判性、社会关切性和文化道德性的修辞，似乎言及社区就能在激烈的学术辩论和棘手的现实实践中站稳脚跟。在此风尚的影响下，社区议题成为国内外遗产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增长点。将社区话语纳入遗产研究领域确实有助于重新发现被传统、权威和商业化表象所遮蔽的行为体验和遗产叙事^[2]，部分学者甚至将基于地方社区的遗产话语作为权威遗产话语的替代性路径之一（另一路径为旅游者建构的遗产话语）^[3]。因此，无论是作为切实存在的群体还是作为抽象的思维方式，社区之于遗产研究的价值已获得学界承认。

然而，国内外遗产研究在社区的生成逻辑和基本认知上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社区在遗产领域的生成逻辑不同。在西方社会，社区首先作为学术议题出现在遗产领域。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社区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与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包容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社区在文化研究和社会史运动的思潮下经过充分学术讨论之后，进而获得话语权和政治关照的结果。而国内遗产领域对社区的重视基本上来自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及其系列文件，或说是来自国家层面对上述内容的本土化理解与阐释，如2015年修订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社区”角色与作用的相关阐释。其二，社区在遗产领域的基本认知不同。近年来，以艾玛·沃特顿（Emma Waterton）、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和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为代表的海外学者陆续意识到社区在遗产研究

[1] “Community”一词对应德语“Gemeinschaft”，可译为“共同体”或“社区”，也有学者以“社群”代之。其中，在日常政策及实践中，“社区”的译法最为常见。除一些学界已成共识的翻译外，本文统一将“Community”译为“社区”。

[2] Emma Waterton, Steve Watson, *The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eritage; or How Research Can Spoil a Good Story*, Emma Waterton, Steve Watson(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eritage Resear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21-36.

[3] Rouan Zhang, *Chinese Heritage Sites and Their Audiences: The Power of the Past*, Routledge, 2020, pp.34-38.

领域的风靡可能导致的风险^[1]，并反思和重新认识社区之于遗产研究的价值^[2]。国内虽有研究开始讨论社区本身的复杂性^[3]，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遗产研究领域中的社区困境^[4]，但国内遗产学界对社区的认知尚处于从无到有的“拥抱状态”，且大量研究集中于探讨社区在参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等方面的潜力、方式与关系^[5]，对社区本身及其之于遗产领域的复杂性及影响力关注仍然不够。

政策与文件导向的社区理解以及反思不足的社区认知，共同造就了当前国内遗产领域对社区议题的普遍态度。据观察，遗产领域存在将社区作为本质主义的存在而加以接受或否定这两种相对极端的现象。具体来说，要么将社区作为一种时髦的、前沿的装饰，以此装点遗产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图景；要么将社区作为一种“水土不服”的外来物种，否定社区介入遗产领域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国内遗产领域没有将“社区”作为一个问题予以体认，也就更谈不上对社区复杂性，尤其是遗产领域中社区发展轨迹的深入剖析。

鉴于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主张将“社区”问题化，从社区本身的复杂性、遗产领域对社区的迷恋、社区在遗产领域生成的困境等方面重新思考社区议题之于遗产研究的价值与限度，以期为遗产与社区的关系这一复杂命题提供些许思考。

一、社区何为：社区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近代以降，不少词语都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重复使用甚至滥用，如“认同”与“文化”。近年来，“社区”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6]。社区一词的性质很模糊，至今没有一个共识性的定义^[7]。正如巴里·斯科菲尔德（Barry Schofield）所言，社区一词具有难以捉摸的吸引力，是一种“几乎具有无限潜力的话语资源”^[8]。事实上，很少有人去细辨“社区”一词的内涵，社区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

上述基本认识虽然尚未回答社区是什么的问题，但其背后的质疑声却为探究社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了可能。笔者将在此梳理“社区”话语演变的三阶段，将其视为关于社区的三种声音：本质意义上的社区、分析意义上的社区和阐释意义上的社区。其中，阐释意义上的社区预示了社区的开放性，这为目前遗产研究领域重新认识社区议题提供了可能。

“社区”（Gemeinschaft）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指一种稳定的、安全的、带有归属感的存在状态。滕尼斯分别讨论了社区（共同体）与社会得以可能的关系特征与结构形态，并以进化的视角探析从社区（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向。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基于本质意志和生命关系建构的原始或天然状态，是一种生机

[1] Emma Waterton, Laurajane Smith,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p.4-15.

[2] Stefan Berger, Bella Dicks, Marion Fontaine, “Community”: A Useful Concept in Heritage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26, 2020(4), pp.325-351.

[3] 彭兆荣、张进：《“社区”的维度与限度》，《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4] 吕微：《反对社区主义——也从词语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5] 叶仕安、杜芳娟、吴克华等：《世界遗产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机制研究——以施秉喀斯特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年第7期；苏明明、杨伦、何思源：《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与社区参与路径》，《旅游学刊》2022年第6期；陈岱娜：《权威话语与社会分化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参与——以耍歌堂的保护过程为例》，《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武文杰、孙业红、王英等：《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角色认同对旅游参与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年第1期；李耀武、田芳、车欣宴：《社区单元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于遗产价值与社区发展关系的探讨》，《建筑与文化》2020年第10期；李然、王春阳：《社区参与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地社区发展研究——以湖南永顺老司城村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谢小芹：《“村社本位”：社区参与的一种分析性框架——以贵州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个案》，《理论月刊》2020年第9期。

[6] Emma Waterton, Laurajane Smith,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4.

[7] Nigel Rapport, Joanna Overing,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Routledge, 2000, pp.60-61.

[8] Barry Schofield, Partners in Power: Governing the Self-sustaining Community, *Sociology*, Vol.36, 2002(3), p.664.

勃勃的有机体。^[1]这一基本判断很大程度上持续影响了其他学者对社区的认知与理解。在此，我们视这种想象为本质意义上的社区，接下来将讨论分析意义上的社区。

史蒂文·布林特(Steven Brint)认为，滕尼斯之后的社会学领域出现了两条理解社区的路径：其一是忠实于滕尼斯最初类型学构想的聚合性路径，其二是以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科学分析的分解性路径。^[2]前者将乡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从具体的空间环境中分离出来，从理论层面高度概括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以聚合性路径理解的社区是一种具有情感性、道德性的物理实体和道德类型，而且自始至终都充斥着一种怀旧与浪漫的情调。后者则将社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进行相关变量的提取、分解与研究，从而开启了对社区结构进行调查、分析与比较的先河。在最宽泛的层面上，这两条路径涉及的不再仅是社区的概念问题，还有与社区相关的实践、过程和阐释。

1980年代，“社区”再次成为一个引发共鸣的术语，有关社区的认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阐释意义上的社区。在此阶段，社区在公共政策、社区发展以及少数群体参与、社会可持续性等实践项目与话语思潮中，都象征着正确性和合理性，似乎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和路径，社区作为问题本身却常被忽视。与此同时，关于社区的理解也重新得到修正，社区内部的差异性和分化性、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等也被广泛纳入社区的范畴，社区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因而获得承认与阐发。就复杂性而言，每一社区成员都可能因为其他的纽带关系而从属于另外一个社区，同样，社区内部也会根据某种共性、差异性、排他性而形成多个亚社区。就动态性而言，任一社区都是过程性的存在，内部人员的变动、外在环境的改变、结构关系的调整等要素都会影响社区的记忆、主张、需求。同时，社区得以可能的群体标准也在随时发生变动，例如对虚拟社区的承认与关注等。

在社区话语演变的过程中，部分学者曾因社区本身概念的宽泛性和模糊性而焦虑不已^[3]，也有学者坚持社区议题是一个能够带来启发的存在，并坚信社区是一个不会倒下的学术概念^[4]。事实证明，在承认社区复杂性与动态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阐释，社区将表现出值得期待的潜在价值。

二、社区迷恋：遗产与社区的遭遇

既然社区是一个能够在学术话语中持续产生共鸣与争论的概念，那么其进入遗产领域，且在短时间内激发一定程度的迷恋也就不足为奇了。笔者将在下文围绕社区与遗产的遭遇，具体讨论社区进入遗产领域的契机、遗产与社区彼此同构的关系、社区之于遗产领域的价值等内容。

社区引起遗产领域的关注并成功进入遗产领域的过程与其他社会思潮的流行密不可分。在英国，社区与社会包容、社区再生等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良方，如移民、犯罪、教育、贫困和社会排斥等。在艾伦·科克伦(Allan Cochrane)眼中，“社区”成了一种气雾剂，可以喷到任何社会项目上，让它更进步、更富有同情心。^[5]在美国，社区与原住民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勾连。其中，参与和赋权成为社区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事务的关键。如何应对原住民社区的遗产返还、土地诉求等事项成为事关文化机构和政府政策合法性的系列问题。尤其是当社区与认同联系在一起时，由此衍生的讨论便与认同政治产生瓜葛。近年来，社区——尤其是

[1]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76页。

[2] Steven Brint, *Gemeinschaft Revisite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Sociological Theory*, Vol.19, 2001(1), pp.1-23.

[3] Margaret Stacey, *The Myth of Community Stud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0, 1969(2), p.134; Collin Bell, Howard Newby(eds.),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Psychology Press, 1974.

[4] Graham Day, Jonathan Murdoch, *Locality and Community: Coming to Terms with Places*,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1, 1993(1), pp.82-111.

[5] Allan Cochrane, *Community Politics and Democracy*, David Held, Christopher Pollitt(eds.), *New Forms of Democracy*, London: Sage, 1986, p.51.

因为种种原因被压制或处于边缘地位的社区，开始与人权理念发生联系。基于普世主义的社区理念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在这样的社区中，对差异的恐惧被打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获得安全感与平等地位，并感受到对其所属社区负有共同的责任。^[1] 总体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抑或一种口头修辞，社区广泛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且自带某种“不证自明”的光环。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社区”很快就吸引了遗产领域的关注，并迅速发展为“社区崇拜”（The Cult of Community）^[2]。虽然在遗产研究中，社区研究的发展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历史，但其中有三个较为突出的阶段，即20世纪60至7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分别与20世纪60至70年代国际保护伦理的认识发展，20世纪90年代对普通、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体的关注，以及21世纪初对社会包容和社区凝聚力的关切不谋而合。^[3]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区与遗产之间的密切联系，社区参与几近成为当代遗产实践的指导原则和重要特征，“转向社区”“以社区参与为中心”等理念在遗产运动的各个环节站稳了脚跟。

社区和遗产之间的联系如此自然，几乎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解释。社区和遗产都是模糊和难以捉摸的概念，但二者共同流行起来，交织紧密并被用作多种话语表述的基础。许多对社区的理解基于作为手段的遗产，以风俗习惯、语言、景观、历史、文物和纪念碑等界定社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认同表征被挑选出来，成为国家和社区的遗产。^[4] 遗产成为一种中介与载体，可以加强社区联系和社区组织，进而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社区则成为遗产活化利用的一种积极工具，助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网络，带来团结感和使命感。显然，社区和遗产相互扶持，两者的结合可实现互惠互利，对两者的可持续发展均有重要意义。把遗产所在地的社区参与纳入遗产实践的决策、管理层面，将社区居民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理解考虑进来，是遗产实践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5]

要理解社区之于遗产领域的价值，仅就上述提及的互相激活、彼此成就来说仍显不足。换言之，遗产对社区的迷恋不无道理。首先，社区开始以遗产的利益相关者身份进入到关于遗产的整体考虑中，由此逐渐在国际、国家遗产政策的宣言和公约中得到普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就会以其合法身份要求参与到遗产决策与遗产化的过程中。无论有效性如何，这都从根本上挑战了之前社区被抽离、被剥夺的尴尬状态。^[6] 其次，社区象征着一种替代性的遗产价值认知，社区对遗产的理解与阐释就成为思考遗产的另一种选择。无论是科学、艺术与历史价值，还是真实、完整与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判断都代表了专家的立场。^[7] 社区话语进入遗产领域意味着遗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被重新发现，我们得以在遗产相关的社区中重新发现遗产延续至今的真正原因。再次，社区隐喻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遗产路径，即“活态遗产路径”^[8]。我们对基于博物馆与遗产物质性的“以物质为中心的路径”和基于传统保护原则拓展而来的“以价值为中心的路径”较为熟悉，但是对基于社区关照的“活态遗产路径”关注不够。相较之下，这种路径更多强调社区及其与遗产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遗产之所以迷恋社区是有迹可循的，社区进入遗产领域似乎水到渠成，这使传统意义

[1] Sandy Bruce-Lockhart, Chairman's Foreword, 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Leading Cohesive Communities: A Guide for Local Authority Leaders and Chief Executives*, LGA Publications, 2006, p.4.

[2] Angela McClanahan, The Cult of Community: Defining the "Local" in Public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Discourse, Sven Grabow, Daniel Hull, Emma Waterton(eds.), *Which Past, Whose Future?: Treatments of the Past at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 Archaeopress, 2007, pp.51-57.

[3] Laurajane Smith, Emma Waterton, *Heritage, Communities and Archaeology*,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9, p.23.

[4] Elizabeth Crooke,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Heritage: Motivations, Authority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17.

[5] Emma Waterton, Whose Sense of Place? Reconcil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Community Values: Cultural Landscapes i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1, 2005(4), pp.309-325.

[6] 尹凯：《遗产过程的两分路径：“成为遗产”和“成为遗产之后”》，《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7] Laurajane Smith, Emma Waterton, *Heritage, Communities and Archaeology*, Bloomsbury, 2009, pp.11-20.

[8] Ioannis Poullos, Discussing Strate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as an Example of Strategic Innov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4, 2014(1), p.18.

上的遗产图景得以改观。值得注意的是，遗产对社区的迷恋也有其吊诡之处，关于社区一词的表面理解已如此之多，但对社区的理解与应用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1]。社区之于遗产的价值毋庸置疑，甚至具有成为替代性遗产路径的潜力，但有时社区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添加到政策中，而不是被纳入整体方法和思考视野中。因此，我们必须对不言自明的社区预设加以反省，一旦揭开社区无处不在的表象，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对社区的了解并不多，甚至存在着误读与矛盾之处。

三、社区困惑：不可见、不平等、不协调

在遗产领域，“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一种工具，对社区话语不加批判的使用已经渗透到遗产项目的意义和实践中。与之伴生的问题是，与社区相关的概念常常未经审视和辨析就已广为传播。以“社区参与”为例，绝大部分研究都不对其加以阐释，而是将其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路径或工具。^[2] 2008年7月，第六届世界考古学大会（The 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简称WAC）主题为“社区参与：协作或竞争？”（Community Engagement: Collaboration or Contestation?），其中诸多讨论指出：社区的概念现在似乎已经僵化成一套很少审查的假设和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思潮和政治使命的权宜之计，即一味颂扬社区的价值却从未审视过其定义或内容。^[3] 会议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因为这些问题也广泛存在于遗产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表面上，社区广受遗产领域追捧，实际上，在与权威遗产话语、专家群体的对话、协商与冲突的过程中，社区时常处于一种不可见、不平等、不协调的尴尬境地。

（一）不可见：被掩饰的、同质化的社区

社区在一系列的遗产政策与文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政府、学界及公众对社区参与和认同的兴趣显著增加，却无意识地生成了对社区概念的一种失察的、同质化的、笼统的认识。事实上，无论是基于地理、种族、年龄还是性别来界定，与群体联系在一起社区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便利”和“目的”而创建的标签。毕竟，许多人可能一生都没有考虑到自己可能属于的社区——我们往往避免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更愿意自由行动。^[4] 社区还将社区内每个成员融合成一个温和的、同质的集体，其中不存在不安、失望、冲突或斗争。这种对社区的理解极容易导致“成为同质，否认差异，同化他人”^[5]。“只见社区、不见个人”的模式最容易与遗产部门对社区的主流理解保持一致，或者说，强化社区的同质性与集体性是遗产领域接纳社区但又不想造成麻烦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群体的思想、知识、具体的地方和文化特征被忽视，最终削弱了社区的所有权、认同，以及参与。^[6] 在遗产实践中，有关遗产的大部分政策和实践是遗产本体导向的（无论保护还是开发），因此在地社区、社区认同、社区价值往往非常次要。当社区进入遗产视野后，社区也往往作为遗产总体规划中不得不出现的“点缀”，而真正站在社区立场来思考遗产之于社区意义的尝试少之又少。

[1] Emma Waterton, Laurajane Smith,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7.

[2] 朱刚：《从“社会”到“社区”：走向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界定》，《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

[3] Steve Watson, Emma Waterton, Heritag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1.

[4] Elizabeth Crooke,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Heritage: Motivations, Authority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19.

[5] Ingrid Burkett, Traversing the Swampy Terrain of Postmodern Communities: Towards Theoretical Revisioning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4, 2001(3), p.241.

[6] Corinne Perkin, Beyond the Rhetoric: Negotiating the Politics and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Community-driven Heritage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p.107-122.

（二）不平等：处于边缘状态的社区

谈及政府、专家决策为社区决策和参与提供了多少空间时，我们不禁要问，一些关于社区的主张是否掩盖了官方、专业人员和社区之间在控制资源和叙述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平衡？从历史上看，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一度只是国家机构和专家学者活跃的舞台，相较之下，社区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夺权”的境地：社区成员要接受“再教育”，由管理者或专家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的遗产具有什么价值，以及为何要保护这些遗产等^[1]。近年来，遗产政策越来越多地从自上而下的保护转向自下而上的、社区主导的保护行动，但这种转变的效果并不理想。社区建设与专家意见的提出同步进行，但专家意见往往不是出自社区，在地位上也高于社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那些与社区观念脱节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最适合主导遗产领域的项目，这些精英拥有管理和评估其他利益群体的权力，社区对其过去、遗产和自我形象提出主张时往往面临被约束甚至打压的境遇，失去了平等参与的权利。正如沃特顿指出，遗产学界对“公共遗产”的包容性存在一个悖论，即目前“公众”在管理过程中并没有发挥独特的作用，相反，这个角色通常是在过程的最后，以被教育或接收信息的形象出现。换言之，在现有的遗产框架内，社区是遗产保护进程的成果和受众，而不是进程本身所涵盖的要素。^[2]此外，尽管出现了许多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往往是“为了社区”（for）而不是“属于社区”（of），更谈不上所谓的平等与合作了。就最基本的经济利益而言，遗产旅游的经济收益经常归于国家或私营机构的行动者，而绕过与遗产地关系最密切的社区。^[3]社区参与仅成为一种象征，甚至只是对公共关系的虚饰。当地社区仅在很小的范围内被允许对即将实施的规划、计划、建议和发展做出反应。^[4]

（三）不协调：有冲突的社区

遗产专家与遗产社区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复杂关系。遗产管理过程不仅是技术的和科学的，其中也有情感和冲突。^[5]遗产是当代社会的产物，而遗产专家所持的主导方法往往忽视了遗产在地方的运作及其随时间变化和重塑的能力。遗产管理的进程往往掩盖了遗产和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将遗产视为一种“可管理”的东西，忽视了遗产的情感价值，忽视了个人和群体在遗产参与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观点。当一个社区未能获得足够的空间去思考 and 协商遗产之于社区的意义时，社区与遗产专家之间便会出现紧张的关系。沃特顿提出的对策是，管理过程中需要对那些试图自己决定什么是价值、什么需要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的社区做出反应^[6]。即便有和谐的工作与合作关系，误解的空间始终存在，紧张不仅来自社区的不同愿望和诉求，而且来自每个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定义：对专家学者来说，遗产可能是资料、数据，或可被展示的文化；对社区而言，遗产则是认识过去的寄托与集体记忆的载体。这可能会导致遗产专家和地方社区的讨论忽略、误解彼此的意图和相互影响。

事实上，社区话语与遗产理论、实践交织在一起的方式，使社区与其遗产一样成为遗产管理和保护过程中被规范的对象，这不仅强化了社区—专家关系中的权力差异，而且导向社区观念的误用。社区的“可爱”性质，加上遗产部门通过与社区的接触而产生自上而下从事“善事”的错觉，可能导

[1] 朱刚：《从“社会”到“社区”：走向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界定》，《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

[2] Emma Waterton, Whose Sense of Place? Reconcil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Community Values: Cultural Landscapes i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1, 2005(4), p.319.

[3] Peter G. Gould, *Empowering Communities Through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loomsbury, 2018.

[4] Macbeth J., Dissonance and Paradox in Tourism Planning—People First?, *ANZALS Leisure Research Series*, Vol.3, 1996, pp.2–19.

[5] Emma Waterton, Whose Sense of Place? Reconcil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Community Values: Cultural Landscapes i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1, 2005(4), p.309.

[6] Emma Waterton, Whose Sense of Place? Reconcil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Community Values: Cultural Landscapes i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1, 2005(4), p.320.

致社区与遗产间的问题难以阐明。尽管多国政府都发表了关于伙伴关系和促进社区协作的言论，但通常都反对下放实际权力，同样，不少专家学者也不愿意与社区共享权力并接纳社区的平等参与。

结 语

有学者指出，社区虽然曾在遗产领域风靡一时，但在实践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其原因在于社区群体没有“遗产专家”的头衔，缺乏参与遗产项目所需的资源（学院教育、经济手段等），也缺乏对遗产的特定愿景或理解，以及支撑这种愿景的公认价值观（普遍性、民族价值和美学价值等）。^[1]即便如此，社区依然为遗产领域提供了重新思考文化叙事与实践方法合法性的机会，在动摇微妙的遗产政治的同时，通过辩论和协商引导建立一套充满活力的有效制度。^[2]换言之，社区的介入让遗产成为一个协商过程，一个具有不可预测后果的高度创造性的旅程。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本身就有复杂性、动态性和流动性，即使均在谈论社区，但不同群体对其范围和预期结果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

通过梳理遗产领域中社区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社区在遗产实践与研究中实际上经历了未受关注而压抑、被认识而倡导发声、被重视而夸大其能的不同阶段。当然，我们应清楚认识到社区虽然隐喻的是日常生活框架或在地体验，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区立场是处理社区资源的最合乎逻辑的管理形式。^[3]实际上，为实现遗产的和谐与持续发展，官方、专家应放弃其能够代表所有人的观念，并培育社区（社区群体、地方）的文化自觉和自主自发意识，让社区能够“从消费者转向创造者”，“从读者转向作者”，最终实现社区群体与专家、地方与国家的共同在场，寻求平衡、对话与协商。此外，学界应意识到“社区”绝非修辞学的浮饰，而是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动力，要持续肯定“社区”的意义与方法，不应今天熙熙攘攘，而明天冷冷清清。

（责任编辑：肖羽彤）

Problematizing “Community”: Rethinking Community Issues in Heritage Research

Zhao Huijun

Abstract: The term “community”, with its rich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has gained enduring vitality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imagination of its qualities such as safety, nicety, and warmth has at times made communities an alternative path for contemplating modernity crises. Since the 1960s, community discourse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heritage domain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However, whether in heritage theory or practice, the uncritical use and abuse of community discourse have aroused significant controversies in the heritage field, undermining its potential in heritage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blematize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s of community issues in heritage research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complexity of communities themselves, the heritage domain’s obsession with communities, and the dilemmas arising from community in the heritage domain. It provides some thoughts on the complex pro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and communities.

Keywords: Heritage, Commun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Cult of Community, Heritage Politics

[1] Emma Waterton, Laurajane Smith,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6, 2010(1–2), p.10.

[2] Emma Waterton, Whose Sense of Place? Reconciling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th Community Values: Cultural Landscapes i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11, 2005(4), p.320.

[3] Gentry K., History, Heritage and Localism, *Policy Studies*, Vol.34, 2013(5–6), p.518.

整体保护利用视角下革命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价值评估研究

江梓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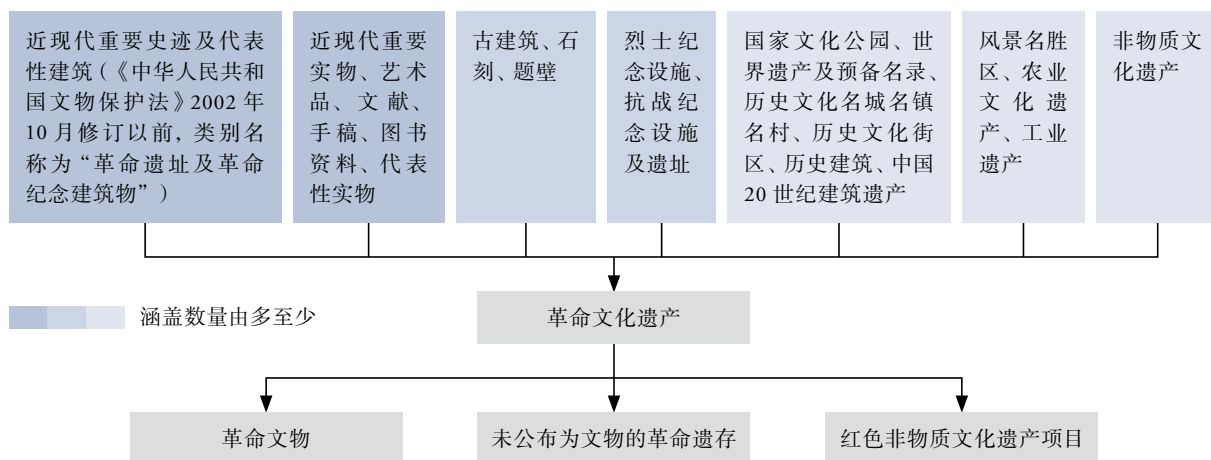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广东广州, 510075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现代百年风雨历程中, 革命文化遗产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 承载着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根”与“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革命文化遗产, 即为中华民族守住一方重要的精神力量。根据革命文化遗产现有“整体保护利用”的发展趋势, 构建一套完备的现状调查体系, 方便遗产信息采集者按图索骥。针对不同空间层级的遗产规划, 有多种价值评估策略可作为遗产展示利用的有效途径, 助推革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工作提质增效。

关键词: 革命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 调查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111-10

革命文化遗产凝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救国、兴国、强国的轨迹。革命文化遗产承载的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石。^[1] 革命文化遗产逐渐引起国内遗产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依据当前国内历史文化遗产的分类^[2], 革命文化遗产涵盖革命历史名城、革命根据地、



革命文化遗产组成图示

[1] 马福运:《革命文化对文化自信的精神作用及机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4期。

[2]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革命遗址、重要机关旧址、名人故居及墓、纪念设施、烈士遗物、红色标语等多类型文化遗存，可归纳为革命文物、未公布为文物的革命遗存、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三类（上图）^[1]。其中，由文物管理部门征集保护的一批革命文物已设立标识牌并对外开放，而更多“非文物”革命遗存也将随全国各地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和革命文化的传播陆续进入大众视野。学界对革命文化遗产的研究较少涉及片区、文化线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有必要对其开展全局性的资源调查和多样化的价值挖掘，逐步厘清革命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研究范围，促进跨学科、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推动革命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利用，充分发挥革命文化兴国育人的作用。

一、从“单体保护”到“整体保护利用”

（一）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受苏联“革命纪念碑”模式影响，通过设立历史纪念碑（馆）、收集陈列革命烈士物品以建立可持续的革命文化传统^[2]，实现了较早一批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物管理部门分批将部分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鲜明的革命文化遗产纳入文物名录实施保护。国务院1956年发布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将“革命遗迹”纳入文物保护范围，并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3]。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确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和“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4]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增加“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5]的条文，革命城市延安、遵义同年被列入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2013年民政部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提出加强“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念塑像、烈士骨灰堂、烈士墓等设施”的保护管理。^[6]2007—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之外，将“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纳入保护范围。^[7]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强调“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分别编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协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8]以上法规文件反映了我国对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革命文化遗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

[1] 作者自制。

[2] 朱宇华、乜小珂、徐睦：《革命文物内涵的认识发展——基于新中国文物法规文本演变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6期。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56年4月2日。

[4] 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年3月4日。

[5]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11月19日。

[6] 民政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2013年6月27日。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11月4日。

[8]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5/content_5458839.htm，2019年12月5日。

（二）整体保护利用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呈现出时空尺度扩大、多要素组合发展的趋势。如各省、市已经陆续开展革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规划的方案编制，包括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的涉及河北、江苏、河南和山东四省17市76个县的《冀鲁豫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1]，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制订的《福建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程实施方案》^[2]以及广州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的《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3]等。另一方面，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在推进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遗产底数不清，没有建立相应的数字化信息管理体系；管理分散，缺乏总体规划的统筹协调；价值评估参错，影响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效果等。如何贯彻落实革命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利用，笔者建议参照《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及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编制要求》^[4]等相关指导文件，借鉴丝绸之路、大运河、长征文化线路等跨地域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经验，采取整体立项的方式，对跨地区、分布散、群体价值远高于单体价值的革命文化遗产进行现状调查梳理和综合评估规划。首先摸清家底，明确保护对象及范围，其次评估遗产整体核心价值和个体特殊价值，依此量身定制遗产保护策略和利用模式，为遗产保护利用整体规划打好基础，为遗产与相关业态及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做好铺垫。

二、探索现状调查方法与价值评估策略

（一）构建遗产现状调查体系

编制遗产整体保护利用规划前的资源调查工作必不可少。由于革命文化遗产现状调查数量庞大、种类复杂，拟定标准化的调查方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革命文化遗产现状的调查应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5]所得文物古迹信息数据的基础上展开，抽选出与革命文化和革命历史相关的文物古迹点后，建立省级革命文化遗产数据库和信息交换平台，组织各市县文物部门核对修改遗产现状信息或者补充填报新发现遗产点及信息。数据初步整合后，调查组通过实地走访、考古勘察、文献梳理、史实考证，完成遗产信息的复核、汇总工作，运用数字化技术生成各项革命文化遗产分析图表，以便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群众清晰了解当地革命文化资源的分布状况，形成对地域革命文化遗产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充分调动、激发人们参与遗产保护利用的意愿与积极性。

从内容和作用来看，现状调查对应革命文化遗产的区域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三阶段^[6]，三者深度不同。第一阶段为跨市县的区域规划调查，由省级以上的规划部门会同文物等相关部门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革命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域性摸底工作，先分类、分级录入各处遗产点的基本信息（表一、表二）^[7]，再将所有信息汇总整理，归纳该区域内遗产资源的分布格局与总体特点，为不同城市就革命文化传承弘扬提出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指引。第二阶段为总体规划调查，革命文化遗产已经完成基本信息采集和建档工作的，市县级文物部门需会同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和

[1] 鲁文：《冀鲁豫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编制工作会议召开》，国家文物局网：http://www.ncha.gov.cn/art/2023/2/24/art_722_179917.html，2023年2月24日。

[2] 傅柒生：《八闽红色文物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人民日报》2019年7月13日第5版。

[3]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穗大湾区〔2021〕6号），2021年4月13日。

[4]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编制要求》（文物革发〔2021〕33号），2021年10月28日。

[5] 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国家文物局网：http://www.ncha.gov.cn/art/2012/7/24/art_722_107377.html，2012年7月24日。

[6] 曹型荣、高毅存等：《城市规划实用指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2-5、49、120页。

[7] 作者自制。

表一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基本信息

| 名称 | (填写已核定公布名称) | 级别 | (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一般) |
|------|------------------------------|-------------------------|---------------------------|
| 行政区划 | (××省××市/县××区××街道××社区/村××门牌号) | 经纬度位置 | |
| 全景照片 | 文物本体照片 | | |
| 文物本体 | (建筑、院落、构筑物、广场、景观要素) | | |
| 革命时期 | 旧民主主义革命(1840年—1919年) | | |
| | 新旧民主主义过渡(1919年—1924年1月) | | |
| | 国民大革命(1924年1月—1927年7月) | | |
| | 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8月—1937年7月) | | |
| | 全面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45年8月) | | |
| | 解放战争(1945年8月—1949年9月) | | |
| | 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 | |
|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12月至今) | | |
| 文物类型 | 旧址类 | 重要事件、机构、会议的名称 | |
| | 遗迹类 | 重大战斗、重要事件、革命根据地、领袖人物的名称 | |
| | 故居类 | 重要人物名称及其生平贡献 | |
| | 墓地类 | 烈士名称、事迹及其发生地 | |
| | 纪念设施类 | 纪念事件、人物、活动的名称 | |
| 保护现状 | (完好/一般/破损/濒临倒塌) | 修建情况 | (始建年代、修缮/改扩建年代、损毁年代、重建年代) |

城乡建设、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依托文物“四有”档案^[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2]、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管理备案^[3]等资料,进一步补充遗产保护现状信息(表三)^[4],包括总占地面积、已核定保护范围、与主题事件的关联度(提供事实证明材料)、附属文物种类及数量、历史环境格局及现状变化等,通过梳理保护对象的空间尺度和价值要素,加强国土空间规划中革命文化遗产资源以及所处环境的有效保护。第三阶段为详细规划调查,在前两阶段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在市辖区、街道具体实施的项目范围内,由区政府协调相关部门整合遗存管理现状信息(表四)^[5],增加遗产的管理使用概况、主要损坏致因、市政基础设施、景观环境要素等情况说明,引导城市建设控制性和修建性规划内容更多关注文化遗产展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1] 史水君:《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刍议》,《浙江档案》2009年第12期。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号),2014年10月15日。

[3] 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令6号),2022年1月24日。

[4] 作者自制。

[5] 作者自制。

表二 其他革命文化遗存遗迹基本信息

| | | | |
|------|--|---------------------------|---|
| 名称 | (填写已核定公布名称) | 级别 | (世界级/由国务院核定的国家级/由国家相关部门核定的准国家级/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定级) |
| 行政区划 | (××省××市/县××区××街道××社区/村××门牌号) | 经纬度位置 | (纬度、经度、海拔高程) |
| 全景照片 | | 保护对象照片 | |
| 遗产类型 | (国家文化公园、世界遗产及预备名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烈士纪念设施、抗战纪念设施及遗址;风景名胜、农业文化遗产、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 |
| 革命时期 | 旧民主主义革命(1840年—1919年) | | |
| | 新旧民主主义过渡(1919年—1924年1月) | | |
| | 国民大革命(1924年1月—1927年7月) | | |
| | 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8月—1937年7月) | | |
| | 全面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45年8月) | | |
| | 解放战争(1945年8月—1949年9月) | | |
| | 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 | |
| 历史沿革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12月至今) | | |
| | 重要战斗 | 战斗的时间、名称、地点、双方、结果、影响 | |
| | 重要组织 | 组织或机构的创建时间、名称、领袖、目的、作用与贡献 | |
| | 重要会议 | 会议的时间、名称、地点、参会人员、会议内容及影响 | |
| | 革命精神 | 成型时间、地点和精神的含义 | |
| 遗产现状 | (保存良好/荒废破损/濒临灭失) | 管理情况 | (核定时间、核定文件) |

表三 遗产保护现状信息

| | | | |
|--------|---|--|--|
| 名称 | (填写已核定公布名称) | | |
| 公布文件 | 史实文献 | | |
| 占地面积 | 保护范围 | | |
| 附属文物 | 代表性可移动文物、标语及其数量 | | |
| 历史环境格局 | 所在地的历史区域名称及位置、山形地貌、河流湖泊、交通干道、农田林地、传统聚落、建筑风貌、人文风俗、自然气候 | | |
| 现状环境格局 | 所在地的现状区域名称及位置、山形地貌、河流湖泊、交通干道、农田林地、传统聚落、建筑风貌、人文风俗 | | |

表四 遗产管理现状信息

| | | |
|--------|---|--|
| 名称 | (填写已核定公布名称) | |
| 保护管理机构 | 国有 | 机构名称、机构级别、上级管理机构 |
| | 非国有 | 企业、组织、个人的名称 |
| 开放情况 | (开放参观/未开放) | 展示情况 (充分/一般/无) |
| 使用性质 | (展览、会堂、文娱、体育、行政、研究、教育、餐饮、商铺、工业生产、旅馆、民宅) | |
| 主要损坏成因 | 自然因素: 植物生长、虫蛀、微生物侵害、雨水、地质灾害 | |
| | 人为因素: 年久失修、不合理使用、工程建设 | |
| | 道路交通 | 入口路面铺装、车行道路宽度及通行状况、行道绿化、停车场、公共交通 |
| | 电信电力 | 电网覆盖情况、电力电信管线的连接与敷设 |
| | 给排水 | 给水水源、蓄水池、排水方式、市政给排水管网 |
| | 环卫 | 公厕、垃圾箱、垃圾回收站 |
| | 安全防护 | 消防通道、备用水池、增压泵房、消防栓、灭火器、火灾报警监控设施; 防雷设施; 安防设施、值班制度、防盗监控设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相关消防、防洪、防灾规划 |
| 景观环境要素 | 广场、山石水体、古树名木、建构筑物 | |

(二) 认定遗产整体核心价值

各行政、地理或历史区段中的遗产群落及其环境间均存在错综复杂的耦合关系,而革命遗产点分布零星,单体价值不高,时空关系隔断,历史信息不全,亟待整合,化零为整,使革命文化遗产价值最大化。

中国近现代历史洪流冲刷留下的革命文化珍宝不可胜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及爱国人士为革命事业而献身,广州、中山等地为纪念著名的烈士与伟人,集资兴建了一批学校、文体馆、陵园和碑刻等。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召开多次重要代表大会,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留下了许多风格独特的会议旧址、办公场所和旅馆建筑。国内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土地革命的同时,还积极发展武装斗争,在江西、江苏、陕西等地建立多个革命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现存纪念馆、红色村落、名人故居、自然景观、运输水道、交通轨线及设施、通讯文件、报刊票据、历史典故、军歌名曲、标语口号等相关遗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役中留下了众多纪念战役胜利的遗址及其他纪念设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深圳、天津等地那些标志现代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现象的雕塑、桥梁、铁路、多层建筑也陆续列入了文物名录。要实现上述各类功能复合、形式各异遗存的整体保护利用,关键在于提炼其核心价值,即明确整体主题价值,分析组成部分与整体主题价值之间关联性的强弱,考虑个别遗产单体具有的独特价值。

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在革命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规划中主要依据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当期及远期计划,拟定不同规划阶段的实施目标,各有侧重地提炼遗产价值。近年来广东省的相关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2015年,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被公

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内多个管理部门随即开展“中央红色交通线”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利用工作，发现这条历史线路途经香港、汕头、大埔^[1]，但考虑到三地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条件差异较大，短期内难以形成跨地区遗产线路的实体空间展示，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因此先确立“中华苏维埃血脉”的总主题，对其红色建筑和沿线周边资源开展普查认定及数据采集工作，及时保护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化遗产，也为纪录电影《红色交通线》、南粤古驿道网“红色交通线”专题讲堂等宣传和数字化展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真实素材。2021—2023年，由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组织编制的《深圳市文化名人大营救遗址线路保护及利用规划（2021—2023年）》，尝试结合城市交通现状串联深圳市内多处相关遗址点，以点连线成片，利用革命文化遗产资源促进大湾区“文化+”（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建设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发展。^[2] 规划编制的前期任务除了挖掘遗址线路整体历史意义，还对各个遗址点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进行了详细评估。与上述围绕单一历史主题事件进行“遗产规划”不同的是，2021年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组织编制的《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越秀片区）创建规划》，规划范畴定性更广，涵盖该辖区内所有红色革命遗址或红色资源点，规划目标是修缮遗址或资源点本体，优化周边环境，重点提升理想信念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功能。^[3] 该规划涵盖的对象同处一区，人文和自然基底同质，强调空间功能的异质性，更能反映遗产分布的地域性特色。

三、现状调查与价值评估实践探索

（一）跨地区线性遗产的虚拟展示

跨地区线性革命文化遗产涵盖内容丰富，地域面积广大，长度可达数千公里，宽度涵盖沿线几十公里内的人文足迹和生态景观，所以在进行资源调查时，首先要明晰调查范围。例如，“中央红色交通线”水陆辗转约3000公里，其范围依据组成线路的实体路段和沿线各个重要遗产节点位置划定。交通线两头连接上海和江西瑞金，水路需从上海乘坐轮船经香港抵达汕头码头，再转陆路坐火车从汕头前往潮安，后换水路乘电船去往大埔茶阳，再步行30公里或搭乘木船到达青溪码头，在青溪则需夜行昼伏，翻山越岭，步行十余天进入福建，经永定、长汀到达瑞金。^[4] 整条路线复杂，在汕头、潮州、大埔等处诞生了一批内涵丰富的历史建筑或革命遗存，其中的历史文化名镇、“交通建筑”、名人故居、道路设施、纪念场所、文化景观、民间文化艺术等都是遗产线路不可或缺的部分，调研组通过采集遗产节点的地理和历史信息，确定其所在路段的位置、影响范围及自然环境方面的状况，有序整合相关遗产要素，以此确定“中央红色交通线”的整体范围。

对“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5]的整体保护利用，广东省采取实体保护、虚拟展示的方法建设遗产景点，同时积极在线上开展文化宣传与学术交流，在新媒体平台开设红色历史传承与革命遗

[1] 南方日报网络版：《这条“红色生命线”曾护送200多名中共党员前往中央苏区》，广东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gd.gov.cn/gdywdt/zwzt/qhxcz/fdzl/content/post_3312198.html，2021年6月9日。

[2]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市“文化名人大营救”遗址线路保护及利用规划（2023—2030年）》，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网：http://wtl.sz.gov.cn/gkmlpt/content/11/11068/post_11068843.html#3446，2023年12月25日。

[3] “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越秀片区）创建规划编制”（项目编号：1371-2041GDGH2282），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cggg/dfgg/zbgg/202101/t20210121_15828835.htm，2021年1月21日；广州日报：《广州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广州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gz.gov.cn/xw/jrgz/content/post_7215616.html，2021年4月12日。

[4] 石联星：《一九三二年，我是如何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南粤古驿道网：<http://www.nanyueguiyidao.cn/ViewMessage.aspx?MessageId=11203>，2021年6月15日。

[5] 陈洪仁、杨代武：《中央红色交通线（广东段）线路调查研究报告（节录）》，南粤古驿道网：<http://www.nanyueguiyidao.cn/ViewMessage.aspx?MessageId=13721>，2023年1月16日。

产保护的专题讲堂,2021年4月至2023年2月间先后发布上百篇文章,通过文章、图片、视频等形式,以小人物编织大格局、小站点展示大风云、小故事体现大智慧的表现手法^[1],讲述了当年上海到中央苏区交通线在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运输物资以及实现中央机关战略转移的重要作用与贡献,歌颂了地下交通员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汕头等粤东城市则试用互联网思维,搭建网上展馆,开发革命遗址打卡程序,设计“追寻红色足迹”系列的云游、云答题等网络互动游戏,以更多样化的形式传诵遗产故事、展现遗产价值。

(二) 同地域分区遗产的游径策划

同地域革命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利用可基于我国“五年规划”的制度优势,按照总体规划先行、局部示范控制规划随后的思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深圳市革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为例,深圳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策划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的大本营,也是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及其他人员从日占区香港经宝安龙华、惠阳海丰、江门台山等地前往苏北根据地或广西抗日后方安全转移的主要中转地。四条营救总路线中的东线水路和西线陆路跨越深圳10个市辖区中的6个,于坪山汇合后再转至惠州。大营救遗址的保护及利用涉及城市多个片区,牵动大湾区千百万民众的记忆与感情,因此在确认大营救遗址本体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大营救遗址周边健身绿道、休闲碧道、交通轨道的建设,以及生态景观、自然风光的保护,使那些魅力十足的绿林、水岸、街巷与革命遗址相映生辉,实施因地制宜的综合保护,联动城市资源的开发利用,优化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益。

2021年7月,深圳市启动深圳市文化名人大营救遗址线路保护及利用规划研究工作。^[2]目标是将相关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利用落到实处,讲好深圳本地红色故事,夯实名人大营救与香港的文化联系,实现大湾区文化遗产的共同繁荣。深圳市结合地方财政预算和行动计划,在系统梳理该主题遗产所有组成部分以及整合相关资源的基础上,优先启动一些重要节点的示范性保护展示,循序渐进地勾勒出深圳市名人大营救历史事件的游览地图,逐步加强人们对革命文化遗产的认识。重要节点的选取基于其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及其在宣传教育、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当代价值^[3],具体如下。其一,营救行动中主要转移队伍顺利登陆的深圳河岸码头,作为“突破封锁”的关键空间节点,依托河道风景沿岸设置滨水游径最为切题。其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连同白石龙村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方案的策划地和实施地,形成时间较早,关联程度较高,也曾是东江游击区的战时文化中心,邹韬奋、茅盾等文化名人与游击部队在此一起组织唱歌、办报、授课、集训等文化活动,阳台山森林公园可联合白石龙遗产资源,建设集人文休闲与户外登高于一体的文体游径。其三,大鹏湾东岸的沙鱼涌登陆点是不少被营救名人的途径地,可依托原生的客家聚落和成熟的民宿餐饮产业,串联东江纵队系列纪念设施,在服务产业中植入文化展示功能,以商业经济发展反哺遗产保护,以遗产活化利用提升城市品位。参考同类型规划成功经验,打造与所在地区历史和社会背景相契合的特色游径,分区联动发展遗产整体活化利用,具有经济可行性,更能发挥资源集聚优势。

[1] 李博:《电视剧〈绝密使命〉揭秘“中央红色交通线”》,《企业观察家》2021年第4期。

[2] “深圳市文化名人大营救遗址线路保护及利用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243-4560TC2106004),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s://www.szzfcg.cn/portal/documentView.do?method=view&id=946070150>,2021年6月9日。

[3] 桂元麟:《“广东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学术座谈会综述》,《岭南文史》2022年第1期。

（三）示范性片区遗产的求同存异

广州市是全国革命文化遗产资源存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自辛亥革命以来，广州在快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保留了一段延续百年、色彩鲜明的红色史迹，使得该地政府和民众较早地认识并推进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和红色资源传承发展规划。2021年4月，广州公布《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针对全市第一批革命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的115处红色史迹，计划加大活化利用力度，拟定到2025年“十四五”期末，向公众开放88%以上的红色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打造15个3A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全面建成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跻身全国红色品牌城市前列。^[1]在这一规划背景下，越秀片区的一批革命文化遗产陆续被列入各红色经典景区的地标建设项目。中山纪念堂、“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杨匏安旧居陈列馆、广州公社旧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等革命文化遗产共同构建全市红色文化的展示中心、教育宣传主阵地、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体现多元并存的文化活力，持续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

对这些年代相近的遗产做到应保尽保、物尽其用，全方位的价值认定及拓展工作是确立遗产保护利用措施的前提。目前广州市登记在册的革命文化遗产点有上百处^[2]，其中包括类型各异的建筑物（酒店、市政厅、少年宫、图书馆、体育馆、住宅、纪念碑等），既有繁华热闹的街市、环境庄重的烈士陵园，也有城市广场和道路景观等，涉及见证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或革命斗争的发生地、英雄烈士的生活旧居或办公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庆祝战争胜利建设的纪念设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遗存。这些革命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各自有不同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在革命文化遗产与社区的互动中，部分遗产仍维持日常使用状态，更多遗产则开始拓展新功能，活化为文化类的图书阅览室、研学机构、教育基地，艺术类的美术创作室、表演舞台、电影放映厅，体育类的儿童游乐场、健身体育馆、户外步道、军事培训营地，景观类的城市公园、郊野农家乐、生态保育区，等等。革命文化遗产的新功能为其与民众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提供了新思路，呈现出一座城市的历史遗存与当代人文融合发展的动人景象。

结 语

整体性规划作为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领域中的新兴方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均随社会需求和学术进步而不断变化。一方面，过去受限于勘察与制图技术，遗产现状的时空范围、分布格局、构成要素等方面的调查止步于定性研究，而现在借助先进的数字建模与空间分析技术，多用定量方法，遗产资源的发掘广度和保护深度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遗产的价值评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功能与利用，而遗产价值的延续和发展又受其功能的影响。因此，结合实践发展理论，优化现状调查标准体系，拓展价值评估技术思路，是实现革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效路径。

（责任编辑：肖羽彤）

[1] 广州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http://fgw.gz.gov.cn/tzgg/content/post_7218556.html，2021年4月13日。

[2] 欧阳旦霓：《对广州市革命文物资源保护和规划利用的思考》，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叁），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9—36页。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Investigation and Value Evalu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Jiang Zijun

120

文
博
学
刊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一
期

Abstract: In the century long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has witness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carries the "root" and "soul"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s a precious treasure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safeguar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piritual power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it constructs a complete set of status investigation system to facilitate heritage information collectors to locate information efficiently. For heritage planning at different spatial levels, various value evaluation strategies are listed as effective ways for heritage presentation and utilization,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vestigation, Value

(上接第 103 页)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Relics of Jingtang Iron Stupa in Foshan

Xu Xiaojing

Abstract: In 1970, an iron stupa was smashed inside the Jingtang Temple in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n a stone box, a porcelain box, 238 pieces of sarira, "ten treasures", a bronze mirror,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other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base of the stupa. The quantity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inside the stone box can correspond to the records of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iron stupa came from the Tapo Temple (later rebuilt as the Jingtang Temple), where the name of "Foshan" originated. It was built in the mid Qing dynasty when the iron smelting industry was flourishing in Foshan. The iron stupa and the cultural relics underneath it provide physical evidence for tracing the history of Fosha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the prosperity of iron smelting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exchanges in the Foshan region.

Keywords: Jingtang Iron Stupa, Buddhist Relics, Sarira, Ten Treasures

“接触”视角下云策展大赛的知识生产

张书良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云展览”与“大赛”组织模式的合体,使云策展大赛成为异质性人群、文化遗产与数字技术广泛互联的“接触地带”。在“接触”视角下,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为工具,对“2022年SROM丝绸之路云上策展大赛”中的知识生产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基于行动者之间协商与合作关系的知识生产实践拥有与个体或分立实践所不同的生产力:行动者的异质性和对统一性的追求之间产生的张力成为大赛知识生产的重要驱动力;有效的接触活动需要行动者走出固有文化身份,以“换位”的视角参与转义实践。在博物馆新技术广泛应用、公众参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关注互动性与即时性维度的“接触”视角将揭示展览暗流涌动的另一面,为展览与博物馆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关键词: 接触地带 云展览大赛 知识生产 行动者网络理论 团队合作

中图分类号: G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710(2024)01-0121-07

2022年以来多场大规模“云策展大赛”^[1]相继启动,在学界与业界引发强烈反响。云策展大赛在该年集中出现并非偶然。首先,“云展览”的技术与形态和“大赛”的组织模式形成了有效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持与呈现方案;后者为前者撬动文化与智力资源,提供聚合平台和传播渠道。其次,云策展大赛的出现以一定的技术为先导,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XR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元宇宙”概念的“爆炸式”讨论为此奠定了基础和营造了氛围。最后,近年来“文博热”持续升温,策展实践需求不断增加,而高校与博物馆提供的策展实践机会相对匮乏,云策展大赛可以弥补这个需求缺口。此外,新冠疫情对博物馆实地参观及其他业务活动造成较大影响,客观上也促进了云策展大赛的出现。

云策展大赛不仅意味着云展览中物、信息、人三者之间关系的转变^[2],还意味着既有知识生产空间的拓展^[3],原本位于隐藏空间内的知识生产被搬入公共空间,赋予公众参与的机会。异质性的群体与因素被纳入博物馆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之成了一个独特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借用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接触地带”^[4]概念来形容博物

[1] 包括中国丝绸博物馆主办的“2022年SROM丝绸之路云上策展大赛”,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2022首届全国大学生虚拟策展大赛”,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丽人行”虚拟微策展大赛,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主办的“2022宋韵数字策展大赛”等。2023年以来,“2023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虚拟策展大赛”“2023年SROM丝绸之路云上策展大赛”也相继启动。这类赛事的名称各异,但“技术形态”(“云上”“虚拟”“数字”)与“业务活动”(策展)是它们的共有要素。其中,“虚拟”“数字”等概念易与线下展览的数字技术运用产生混淆,因此本文称之为“云策展大赛”。

[2] 黄洋:《博物馆“云展览”的传播模式与构建路径》,《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3期。

[3] Eilean Hooper-Greenhill, 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Susan M. Pearce(ed.), *Museum Studies in Material Culture*,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1.

[4] [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译:《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9页。

馆内不同民族、社群之间的互动关系^[1]。作为“接触地带”的云策展大赛体现出如下特征。一方面，“云”使交流跨越空间的阻隔，“大赛”为交流提供了平台，异质性参与者在云策展大赛中时空共现。其参与者并不限于具体的“人”，云技术、文化遗产、比赛的组织模式等“非人”因素与“人”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接触网络。另一方面，云策展大赛融合了教育、学术、职业、比赛、互联网等多种空间特质，使参与者的身份走向流变、碰撞与模糊。这种异质混杂的局面带来阐释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使云策展大赛的每一步都在即时性的交流和阐释中交替出现，体现为“信息流”的形态。只是大赛的项目制和时限性为其设置了终点，呈现为最终的参赛作品和评选结果。在这一系列特征下，云策展大赛的知识生产将呈现出新的结构特征与动力机制。

因此，笔者对“2022年SROM^[2]丝绸之路云上策展大赛”（以下简称“大赛”）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对两支参赛队伍中的各3名选手进行深度访谈，并通过微信与多名参赛者进行交流。这一过程形成了三类互为补充的材料：一是大赛的参赛作品、评选结果等“结果性文本”，二是对参赛者进行访谈形成的“回顾性文本”，三是大赛中的参与式观察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等“即时性文本”^[3]。此外，鉴于前述“接触”的种种特征，由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提供了一种描述与分析的方法。ANT基于对称性原则，要求将“人”与“非人”^[4]统一视为创造差异的行动者，而网络是对一系列行动的描述。^[5]在云策展大赛中，各类异质性参与者与“非人”因素均可被视为行动者，各种接触活动则体现出网络的特征。笔者将首先通过“结果性文本”的分析，对大赛策展实践中的行动者进行追踪，并辅以“回顾性文本”进行佐证；进而依据“回顾性文本”与“即时性文本”对大赛中的团队合作进行更深入的描述与分析。

一、大赛组织规则的显与隐

根据中国丝绸博物馆官网发布的一系列通知与报道，大赛要求参赛者以“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为主题，在SROM上选择展品，撰写方案，在某室内设计平台上搭建三维虚拟展览。在比赛中，数名博物馆界资深学者、从业者为参赛者提供系列讲座和培训。在展览作品的评选中，以大众投票占20%、评委打分占80%的方式产生总成绩，并进行排名和评奖。这一系列规程是大赛的一种自我表征，也体现出大赛对行动者的一种界定，如参赛者、评委、技术人员、公众等人类行动者与SROM、室内设计平台、展览作品等物质/技术行动者。除了这些显性行动者外，大赛的接触网络中还存在一系列隐性行动者，催生更复杂的互动。

展览作品是参赛者“行动”的主要结果。入围复赛的展览作品在主题和内容上的多元化，体现出大赛的“赋权”特征。除了少数“定性”要求外，大赛对展览作品的角度与方式再无明文规定，为参赛者的自我表达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空间，展览作品因而蒙上了个性化与时代性的色彩。例如，“船·承”

[1]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89-219.

[2] 数融SROM (Silk Road Online Museum, 丝绸之路数字博物馆, <https://iidos.cn/museum/>) 是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起, 国内外丝绸之路联盟相关的40余家博物馆参与合作, 集“数字藏品”“数字展览”“数字知识”“云上策展”四大功能于一体的数融博物馆, 在由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丝绸之路周”上首次发布。

[3] 文中出现微信聊天记录和访谈记录, 均已获得当事人的知情与同意, 受访人姓名作匿名编号处理。其中, “船·承——10-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展(以下简称“船·承”展)团队的三位受访人编号分别为C1、C2、C3, “陶瓷: 丝路踏歌”展(以下简称“陶瓷”展)团队的三位受访人编号分别为T1、T2、T3。

[4] 具体而言, “非人”因素既可以指物(Object), 也可以指人与社会的创造物。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3.

[5] [法]布鲁诺·拉图尔著, 刘鹏、安涅思译:《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104-129页。

展团队的 C2 提到,在参观一场以“外销瓷”与文化交融为主题的展览时,她了解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船舱的配重方式和航程上偶遇海盗的故事。这使她想要着眼于航行智慧与船员生活,并选用“小陈贵”视角下的一次航行经历作为线索策划展览。这一选择还有情感投射,她提道:“我们选的这个航线,一趟就要两年。两年生活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感觉就跟我们在学校隔离一样。”

这种自我转义还可做进一步的纯化分离:一方面它面向过去,是对参赛者生命经验的客体性转义;另一方面它面向未来,是奠基于前者的主体性创造。这种对“保存过去以实现未来”的期待,形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1]。“船·承”展团队的 C1 对此这样描述:“之前做展览是在完成任务,因为你要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自作主张,但现在我们是所谓的‘自由策展人’。”

基于对称性原理,除了多样性,展览作品在某些方面体现出的共性也需被纳入考察。

首先,大多数展览沿用实体展览的范式,这一特征也体现出“比赛”的行动。大赛特等奖空缺,一位评委对此解释道:“评委们普遍认为参赛作品距离特等奖的要求至少有两点差距。一是云展览的特点不够突出,大多数方案更像是‘线下展’的形式和框架;二是方案的创新性不足,不像是 95 后 00 后的作品。”部分参赛者则反映,大赛的前期宣传未曾明确“云”的导向^[2],在大赛的讲座中,授课老师曾提到优秀作品实际落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按“落地”的标准进行了设计。参赛者对这种“保守”行动的解释诚然体现出授课老师的行动者角色,但由于“合作的”^[3]参赛者或多或少抱有功利性,在比赛的规则性、竞争性、目的性、不确定性等因素的作用下,他们选择去寻找并遵循大赛的各种导向;当导向相对模糊时,他们会选择稳中求进。因此,授课老师的相关话语被放大解读。

其次,大多数展览立足于阐释文物的基本历史信息,采用博物馆展览常见的“类型学”叙述逻辑,体现出策展人对当前博物馆展览主要特征的遵循。例如,“船·承”展团队的 C2 指出,展览的所有内容都有相关的考古材料作为依据。该团队的 C3 提及,他对展览大纲中的“传播目的”与“传播方案”进行了补充,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份规范的展览大纲应有的内容。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曾提到“博物馆的政治”^[4],即博物馆一方面作为多元民主的自我展示工具,另一方面则让公众在其中进行自我检视,构建和维持公众的行为规范。本尼特更侧重于分析观众参观的行为,但他的洞见在云策展大赛中也同样奏效:“自我展示”体现在大赛的“赋权”中,作为制度的博物馆则起到了敦促参赛者“自我检视”的作用,参赛者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也在进行自我质询:我们需要谨遵什么样的规范?

最后,部分展览体现出依托数字技术的创新。例如,在设计组中,“从此东行——中国自‘理想’走向‘同步’”展利用反重力元素,将金属环与丝绸悬浮在半空中作为展品。在文博组作品中,“船·承”“陶瓷”等展览“取消”了展柜玻璃;“云上漫游‘丝’路互联”展对文物进行夸张的缩放。“云”技术本身会诱发人们对展览新样态的畅想,如 C1 直接提出了他们的期待:“我们的一点初衷便是有别于实体展,云展览可以更有互动性、参与性——这就是视角的转变。”与之形成对称关系的是 SROM 的数字展品资源、室内设计平台等物质/技术行动者。在提供技术与资源的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钳制”。例如,“陶瓷”展团队的多个方案都因为数字藏品资源的限制而放弃,一系列互动设计也因为平台技术的限制未能实现。后来,该团队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策是: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条件而回避不适用的设计。“船·承”展团队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在征得组委会同意后,他们

[1] [英] 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译:《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年,第 153 页。

[2] 在比赛初次宣传的“策展要求”一栏中,“形式设计要求”一条提及要“有新的探索或突破”,其他地方则较少突出“云”特征。

[3] “合作的”是相对于“不合作”而言的,“不合作”的参赛者指排除那些虽然主动参加了比赛,但不在于比赛规则与成绩的参赛者,他们的心思实际游离于比赛之外。宗争:《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126 页。

[4] [英] 托尼·本尼特著,王杰、强东红等译:《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东方出版中心 2016 年,第 292-298 页。

自主上传了缺失文物的图片，并在全景漫游中保留了相关视频的外部链接。关于技术的畅想与技术本身共同促成了这种跨越时空的文物资源“借调”与多媒介叙事。

与大赛规程中得到直接定义的显性行动者相比，前述的几类隐性行动者既可视为社会空间性存在，又可视为主体意识性存在。在 ANT 中，我们可以暂时摒弃这种“纯化”操作，接受其杂合性。在大赛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它们或起“驱动”作用，如将个体的经历与畅想纳入博物馆知识的界域；或起“稳定”作用，如维持博物馆知识基本的内容与形式规范；或起“催化”作用，如承受来自其他行动者的转义，并有所选择地进行放大。

二、团队合作的实践与机制

大赛允许以个人和团队两种形式参赛，文博类赛道以团队参赛为主，设计类赛道以个人参赛为主。团队合作的知识生产属性突出，“接触”特征显著，前一部分中作为行动者的“参赛者”还有待于团队视角下的进一步展开。因此，笔者对“船·承”展和“陶瓷”展两支团队的合作过程进行跟进式观察。两支团队的共性在于：其一，由于疫情管控和地理区隔，赛程中团队的所有交流只能在线上进行；其二，团队作品在大赛中分别获得了文博类赛道的第二、第四名，其知识生产成果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将其合作实践进行横向对比，可进一步探究大赛中团队合作的实践与机制。

（一）团队合作实践

“船·承”展团队的3位受访人均对其团队合作，尤其在大纲写作阶段的合作表达了赞赏。C1在访谈中说道：“大纲的写作很有意义，讨论的问题很专业。大家集思广益，共同考虑如何把展览呈现得更好。”C2称：“大家尽情发挥想象力，各种想法交锋……丰富大纲的过程让我感觉很开心。”C3认为：“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都很高。”

“陶瓷”展的团队合作不尽如人意。T3给团队只打了7分（满分10分），他认为，“有很多东西应该去做但没做好，比如团队建设与分工合作。”T1指出：“交流不是那么顺畅，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找到了平衡点，有些地方又没找到，导致这些地方显得比较割裂。”

“船·承”展团队在项目伊始就确立了初步的分工，在完成大纲内容初步设计后又对分工进行细化，明确展览各单元的负责人并持续对各自负责部分进行补充与完善。团队根据项目进展每周开1至3次会，协调项目进度。C1在其中起着“项目总监”^[1]的作用，负责项目统筹和决策。该团队相对“成功”的合作或许得益于这种模式。这种“成功”从展览大纲勾勒和完善的阶段可见一斑，当被问及策展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时，C2称：“开会完善大纲时……各单元负责人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共享出来，陈述思路，然后我们为他提意见。所有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出谋划策。那次会议虽然时间长，但我们所有人都很开心。”

“有意义”“有效”和“开心”不意味着没有分歧，C1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体现出团队内部的异质性。当被问及“分工是否会导致各部分之间出现偏差”时，她回答：“一开始会，在第一次汇总各部分的写作内容时，我感觉非常割裂。我们当晚紧急开了一个会……连开了两天，后来这个大纲就好多了。”C2也说：“一开始大家的基调肯定不一样，但我们群策群力，一起把跑题的部分都拽回到主线上。”

[1] 来自C1自己的描述。

相比之下，“陶瓷”展团队采取了一种更机动的模式。团队不进行长期分工，而是在每次开会时根据项目进展和任务需要确定短期分工。团队没有一个“拍板”的人。在项目前期，为保证展览大纲在内容和风格上的“统一”，其中一名队员撰写了整个大纲，后来虽有其他队员参与修改与补充，最终仍不免被他“统一”。在项目后期，由于时间紧迫，对平台操作相对熟练的 T1 和大纲撰写者承担了较多的设计工作。

这种模式既有一定的“优势”也有一定的“弊端”。优势如 T2 所说：“我们文本的文风还是挺统一的。这件事需要一个主导的人，不然很容易分散。”也正因如此，“陶瓷”展团队不存在“船·承”展团队“拽回来”的过程。弊端则体现于两点：一是如 T1 所说，对整个展览内容比较了解的，可能只有 T1 和大纲撰写者，这对项目中其他内容的接洽带来较多的不利；二是缺乏决策者导致有些分歧悬而不决，该团队成员在回忆如何确定展览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时，T2 说道：“最开始那几次会开得太煎熬了。”T1 也表达了当时的焦急：“为什么两周还定不下来主题。”

（二）团队合作机制

在前述实践中，展览作品的“统一性”是两个团队在合作中共同追求的目标，可视为 ANT 上的一个强制通行点。“统一性”集中体现出“博物馆的政治”的转义，并得到“比赛”的催化，即博物馆的受众、从业者与研究者更青睐具有融贯性的展览，并乐见这类展览在比赛中取得佳绩。“统一性”的达成存在两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方式，即“认同”与“指派”。相对而言，“船·承”展团队可能具有较多“认同”的成分，如 C2 所补充的：“我们所有人都能讲出对整个展览及每个单元的设计”；而“陶瓷”展团队可能具有较多“指派”的成分，体现于前述“主导的人”。

认同是对团队内共同的东西进行确认。对认同的追求带来了团队内外持续性的转义压力。在 ANT 中，这样的压力存在多个方面：它面向持续“生长”的展览作品，即队员需要赋予文本特定意义来谋求认同；它面向其他团队成员，即队员将自己建构的文本与意义对队友进行说明与互认；它也面向团队外的其他行动者，如专家评委、公众、技术支持等。此外，其他行动者同样可以为队员所转义，成为谋求认同的“筹码”。在多面向的压力彼此交织的过程中，队员“被迫”持续反复地进行着文本的书写与解释实践，并将其他行动者的行动纳入其创造的文本与意义中。认同也可能影响队员自身的转义实践，如得到认同的转义会形成“正反馈”，促进团队内部的自主表达和再度转义，因此形成了 C2 描述的“开心”局面。

认同的达成依赖于一定的条件。首先，它需要团队成员积极表达自我与交换意见。在“船·承”展团队中，C1 这样评价：“大家都愿意表达想法，这也是我们比较好确定主题的一个原因。”而在“陶瓷”展团队中，或许由于团队中的很多人在比赛前互不相识，如 T2 所说“线上容易冷场，因为大家不是面对面说话，会想：‘即使我不说，其他人可能也有所表示’”^[1]。T1 也有类似的感觉：“在那之前因为大家都不怎么熟悉，是隔着面具在交流。”其次，它需要团队成员在“筹码”及其转义上的相对一致。“陶瓷”展团队的大纲撰写者曾一度萌生退意，他希望充分利用数字媒介的特性，尽可能做出“不一样的展览”；而团队其他成员对此并不认同，并提出“评委不会喜欢”，“你连我们都说服不了，又如何说服评委？”等观点。由于异质性筹码难具可比性，这种沟通难见成效且耗费精力。而在“船·承”展团队中，“大家都想着怎么去呈现得更好、更专业、更全面”，并且“确实没有什么颠覆性或冲突性的建议”。最后，它需要相互之间的熟悉与信任，“我们彼此也都认识，其实联系一下就组好队了”。

[1] 与同为线上沟通的“船·承”展团队相比，可认为这种冷场并不仅仅是因为“线上”，而是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而“陶瓷”展团队是在一个网络读书会的群聊中临时组织的，前期的沟通基础并不坚实，成员们经历了较长的磨合期。这种在“陌生人”中产生的临时组织是“接触地带”的典型产物，也将成为云技术下的新常态。

由于意义的衍变与 ANT 的即时性，“认同”只能是暂时的。多面向的“认同”压力使得新意义不断衍生，并对旧意义进行拓展或取代。例如，当 T1 回忆“陶瓷”展标题确定的过程时说道：“一开始我们提了很多名字，票选的是当时我的那个，而不是现在这个。”展览名称的悬而不决，既是因为投票的结果未能达成足够充分的“认同”，又是因为新的取名层出不穷，选择的标准也飘忽不定。事实上，“认同缺失”才是常态。前述“船·承”展团队“拽回来”的过程正是对“认同缺失”的弥补，而 C2 提到的“因为我们各个展厅各自搭建，每个展厅的灯光都不太一样”的问题，因为截止日期的到来未得到弥补。面对这种暂时性，一方面“指派”起到了兜底作用，另一方面持续进行的展览制作起到了将“认同”物质化的作用。这一过程将空间上的“即时性接触”转化为时间上的“历时性书写”，使“认同”得以积累，并最终形成具有融贯性的作品。

“指派”是指在“认同”难以达成时，迫于“统一性”及时间紧迫性等压力，指定某人或者某种意义“代表”团队的一种积极的处理方式，例如 C1 所扮演的“总监”角色，以及“陶瓷”展团队中大纲撰写者和 T1 在某些事情上的主导与覆写。“指派”体现出特定的权力关系，或者说，压力为权力创造了空间。与此同时，“指派”也依赖于一定的“认同”，如 C1 提到，“他们彼此间可能不太熟悉，但我跟他们都认识，所以这个事情（拍板）都是我来牵头”。人际关系上的位置优势使团队成员更愿意把“总监”身份赋予她。“船·承”展的团队分工“指派”也体现出这种认同，如 C2 所说：“我对我们组的同学特别有信心……每一到两人负责一个单元的时候，我非常相信他们能把各自的部分做好。”在“陶瓷”展团队中，当认同本身无法进行决策时，采用的方法往往是投票，投票的结果或多或少体现出对决策本身及投票这种方式的认同。

对于团队成员而言，其转义实践未得到“认同”或“指派”意味着自我实现的受阻，并可能导致思想上的震荡。前述“陶瓷”展团队中大纲撰写者“萌生退意”是认同失败后的一种消极的处理方式，而队友的耐心劝导让他重回合作之路。C3 则采取了另一种处理方式，即自主后退：“这个展览必须在大家比较满意的前提下，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我的想法是相对次要的。如果这个东西能做完，对我的想法有什么截取，都不太会在意。”尽管如此，访谈时他仍然分享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并说道：“我其实还想做我的那个船。”这种基于视角换位的自主后退体现于拉图尔对“传义”和“转义”的区分中：当行动者固守自身内部时，便只能形成单向的“传义”，在异质性行动者之间形成了对意义及其书写的钳制；唯有通过自我的后退与对方视角的带入，“转义”才得以实现。^[1]在这样的交互过程中，知识生产由单纯的“自我转义”转化为复杂的“自传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2]

结 语

在笔者的观察与访谈中，参与者们将种种美好的遐想寄托于新技术与新媒介。他们描述着自己心目中“云展览”的可能性，期待着突破博物馆展览的现有边界。而从“接触”的视角来看，这种突破并不全然来自主体的能动性，而是寄寓于关系网络之上，产生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彼此混杂

[1]〔法〕布鲁诺·拉图尔著，刘鹏、安涅思译：《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第90-93页。

[2]即“人们以他者对他们进行表征的方式描述自我”。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1991, pp.33-40.

的接触地带。基于行动者之间协商与合作关系的实践，拥有不同于个体或分立实践的知识生产力。一方面，行动者异质性与对统一性的追求之间产生的张力带来了转义实践的动力，驱动着知识生产；云技术与大赛的组织模式使异质性行动者的广泛纳入成为可能，为这种动力提供基础；行动者之间存在施压、驱动、钳制、稳定、催化等各类关系，其角色特征可作为这种知识生产的调控工具。另一方面，尽管异质性可能产生交流的壁垒，但行动者可以通过走出其固有文化身份、以“换位”视角参与转义实践，促成统一性的实现，并使知识生产突破非此即彼的线性局限。

新技术的应用与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化正推动着博物馆展览背后异质性行动者的广泛纳入。云策展大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侧影，看似融贯一体的展览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愈发纷繁幻变的“接触地带”。为此，一种关注互动性与即时性维度的“接触”视角将揭示展览暗流涌动的另一面，为展览乃至博物馆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责任编辑：吴昌稳）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Online Curating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ct”

Zhang Shuliang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exhibition” and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al models makes the online curating competition a “contact zone” where heterogeneous groups of peop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interconnected. By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2022 SROM Silk Road Online Curat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tool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ct”, it is found that knowledge production practices based on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actors have different productivity from individual or discrete practice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heterogeneity of actors and the pursuit of unity become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competition; effective contact requires actors to actively step out of the inher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t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pos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useums, the “contact”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dimension of interactivity and immediacy will reveal another aspect of the surging undercurrent in exhibitions and provide a new vision for exhibitions and museum studies.

Keywords: Contact Zone, Online Exhibition Competi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Team Cooperation

观众视角下地方史展览中重要信息点的策划

林禹岑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观众的良好反馈是展览策划的最终目的，基于以观众为中心的视角，当前我国博物馆地方史展览策划存在重要信息点呈现不到位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对观众注意力重视不足，对展览信息传播和博物馆学习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在展览大纲和文本撰写的实践过程中，可以从明确展览的传播目的、吸引观众注意力、强化展览的内在线索与逻辑关系以及营造学习情境入手，突出地方史展览的重要信息点。

关键词：地方博物馆 历史展览 重要信息点 博物馆观众

中图分类号：G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10(2024)01-0128-08

不同于审美型展览多以物件欣赏为首要目的，叙事型展览通常以信息的阐释和传播为首要任务。“既然负有传播的使命，就会涉及传播的目的问题，其本质是：在这个展览中我们究竟向观众传播些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1]在展览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存在主次关系，一些信息与展览的传播目的密切相关，是展览拟传播的关键信息。这些能够用来支撑展览传播目的的主要信息即是展览的重要信息点。“在有限的时空内展示某个主题展览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2]，在展览中突出重要信息点已然成为学界共识。虽然该主题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但目前还存在不够具体、有待深化等问题，具体表现为相关讨论主要是基于展览内容和形式策划者的视角进行的原则性论述，对“如何评判重要信息点是否突出”这一问题的认识忽视了观众的反馈，从而在“如何突出重要信息点”的问题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实践经验与理论探讨的结合尚不紧密。

地方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是我国博物馆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常典型的叙事型展览，需要在展览中突出重要信息点，彰显地方历史文化的重点和亮点。目前，在地方史展览策划过程中仍然存在重要信息点突出不足的问题，且没有引起行业的足够重视。本文尝试从观众视角出发，分析地方史展览重要信息点不够突出的原因，并试图结合相应的内容策划实例提出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在博物馆展览信息传播过程中，博物馆与观众通常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展览中重要信息点的确定大多由博物馆单方面确定，由展览策划人员与形式设计者承担。虽然有学者已经注意到重要信息点的策划不可脱离观众视角，“重点亮点的规划要遵循观众为上的原则，务必让观众看得投入且不

[1] 严建强：《缪斯之声：博物馆展览理论探索》，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5页。

[2]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

疲惫”^[1]。陆建松强调展览应通过“点”的逻辑化串联为观众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2]，但仍主要从展览策划人员的角度提出具体方法及路径。

观众是博物馆信息的接收者，观众的良好反馈才是突出展览重要信息点的最终目的。但在展览实践中，“博物馆更在意的是对于物的呈现或物相关信息的输出，而非观众能否从博物馆物中获益及其获益程度”^[3]。脱离了观众，展览信息的传播未必理想，更谈不上重要信息点的传播。

地方史展览中的重要信息点包括地方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和主要节点、地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当地文化的特色和亮点、当地代表性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地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古迹和馆藏精品文物等。笔者认为，我国许多地方史展览存在重要信息点突出不足的问题，其中既有显性表现也有隐性表现。

显性表现为展览缺乏突出重要信息点的意识，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史展览简单套用叙事型展览的结构框架，使用“部分—单元—组团”的框架，内核仍然是教科书式的通史思维。例如，某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策划大纲拟围绕“淮风楚韵”“将相故里”“汝阴遗珍”“名城颍州”“西湖盛境”及“征战要冲”6大地域文化特色策划6个专题展览，但在大纲定稿时被要求根据时间顺序调整为史前时代至明清时期等8个部分，内容要面面俱到，当地历史文化中较为重要的内容，如淮夷文化、汉代汝阴侯墓及颍州西湖历史故事等却着墨不多。展览因此变得平铺直叙，观众难以在参观过程中清晰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

隐性表现为部分地方史展览的策划虽有突出重要信息点的意图，但实践中并未获得较好的信息传播效果，观众感受度低，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为重要信息点在展览中突出不到位，不足以吸引观众注意，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郑州某博物馆基本陈列“天地之中”的一大重要信息点是“三教汇融”，策展团队为了突出这一重点特地使用了大篇幅的文字陈述。然而，大量文字信息的传播方式并不适合博物馆观众非强制性学习的特点。笔者与该馆工作人员交流后得知，多数观众并未仔细阅读文字，因此该重点信息并未得到有效传播。又如，赵星宇等对山东博物馆6号展厅的研究表明，展览中部分重要信息点没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如独立展柜中的6件特色展品只有1处能够吸引观众注意，还有2处起提纲挈领作用的单元说明经评估处于“不能吸引观众注意”的水平，重要信息点的呈现效果与设计意图明显相悖。^[4]

其二为一些展项虽然抓住了观众的眼球，却没有承载地方史展览的重要信息点。以成都博物馆基本陈列“花重锦官城”中的隋唐五代宋元部分为例，馆方对展览的定位为“主要展现成都在隋唐五代宋元时期作为西南大都会的繁华兴盛面貌。展厅中共有文物380余件/套……体现了成都隋唐时‘扬一益二’的盛况，五代时期‘天下之富国’的安定奢靡……”^[5]馆方在展厅中以多座独立柜集中展示赵廷隐墓出土的伎乐俑，意在表现五代成都盛行宴乐之风，非常吸引眼球，但对应说明文字介绍成都唐至五代的文学、书画艺术，仅在角落里有一个与乐舞俑相关的“锦城丝管”图文版面，导致展项背后的重要信息点不突出。这一后果也为观众研究印证，“大多数观众被重点文物——赵廷隐墓出土的伎乐俑吸引，但他们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伎乐俑的乐器、装束、肢体动作等艺术细节，而基本没有

[1] 方苏晨：《博物馆展览文本结构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

[2]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第178页。

[3] 周婧景：《“阐释与阐释规划”：影响当代博物馆转型的议题》，《东南文化》2022年第5期。

[4] 赵星宇、席丽、吴奇等：《博物馆学习视角下的展览环境效果评估——以展线与照明设计对观众注意力的影响研究为例》，《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0年第1期。

[5] 成都博物馆：《喧然名都会：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成都》，<https://www.cdmuseum.com/gudaipian/201903/759.html>，2023年10月30日。

从这组文物的陈列中了解五代时期成都的文化艺术地位”^[1]。更遑论一些博物馆为吸引观众眼球，过度使用多媒体展项，以及“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吸引观众的参与，盲目强调新媒体互动展示的娱乐性和形式感，在展览活动中增加了刻板的互动游戏”^[2]，形式虽有特色而内容单薄。例如，“在杭州某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新媒体展项中，画面中伞的位置会出现绿色的光影。这本是一个体现内容的手段，但对于观众来说更希望借此能进一步了解宋代各类伞的详细信息时却发现无处可寻”^[3]。换言之，展览的传播目的在最后的阐释和呈现过程中出现缺位或偏差，导致观众的注意力仅聚焦于信息载体的形式，却忽略了重要信息点本身。

二、地方史展览内容策划中重要信息点不够突出的原因

就展览的信息传播过程而言，将重要信息点成功传达给观众，本质上是对展览传播目的的贯彻和落实。展览重要信息点能被观众成功接收，至少应包括三个环节：首先，这一信息应能引起观众注意；其次，这一信息在观众参观过程中准确地向观众进行传达；最后，这一信息为观众所理解并给观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评判展览重要信息点是否被观众成功接收，也至少应包括对应的三个角度：首先，这一信息是否足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其次，这一信息是否进行了有效的传达；最后，这一信息是否被观众理解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本文尝试从这三个角度来探索上述展览中重要信息点不够突出的原因。

（一）对调动观众注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博物馆中的观众学习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是一个主动探究和发现知识的过程，因此足够的注意力是观众在博物馆中进行学习的基础。大卫·迪恩（David Dean）指出：“展览吸引参观者注意力的能力是影响学习效果的最大因素。如果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主题、物体或活动上，学习就很有可能发生。”^[4]有实验表明，刺激信息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的存入需要5~10秒钟。^[5]由此可见，吸引观众注意是传播重要信息点的前提。重要信息点如果在展厅中不足以吸引观众一段时间的注意，学习效果必然打折扣，难以实现突出重要信息点的目的。虽然观众注意力的确更多受到展览形式设计和空间的影响，但内容策划和说明文字撰写对如何激发和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认识不足，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对如何突出重要信息点无的放矢。

（二）对展览信息传播的特殊性认识不足

作为一种以“物”为载体的空间叙事，博物馆展览不同于小说、戏剧、影视等。“通过将叙事展览与小说叙事、电影叙事进行对比，其区别于其他叙事媒介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具备一个连续变化的实体空间、较弱的强制性并具备三个层次真实性。”^[6]博物馆展览不同于主要以符号语言（文字）传达信息的书本，需要综合运用实物展品、辅助展品、多媒体展项并在空间中加以呈现。博物馆展览

[1] 李林：《解构与重建：历史类博物馆展陈中考古文物信息的跨学科解读》，《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

[2] 苗岭：《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合理应用研究》，复旦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0页。

[3] 苗岭：《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合理应用研究》，复旦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3页。

[4] David Dean,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1996, p.26.

[5] 唐贞全：《博物馆展览中的观众注意力管理——以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为例》，《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2期。

[6] 许捷：《叙事展览的结构与建构研究》，浙江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3-84页。

的观众也不同于电影、戏剧观众，不是静坐在座位上被动接收信息，而要在参观过程中实现空间的移动并且主动发现信息。这是博物馆展览尤其是叙事型展览作为媒介面向观众进行信息传播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展览的结构演绎具有特殊性，需有明确的传播目的、主题设定和清晰的结构安排，使置身于展览中的观众获得引导，逐渐了解策展人希望传播的理念、思想或故事。如果展览策划缺乏明确的传播目的引领，没有合适的主题和逻辑结构将基于一个个展项的分散信息组织起来，那向观众呈现的将是一个混乱的展览，重要信息点很可能被观众忽略或误解。

（三）对观众博物馆学习的特殊性考虑欠缺

观众在博物馆中参观的过程也是接收信息的过程，要实现信息的有效传达，改善观众的信息接收效果，离不开对博物馆观众学习特点的把握。目前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想法是，博物馆中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意义上以教室、教师、教材为三要素的教学模式不同，是一种以实物为主要载体的非正式教育。具体到观众在博物馆中的学习过程，则具有鲜明的建构主义特征，表现为观众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会按照自己的理解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福尔克（John H. Falk）、迪尔金（Lynn D. Dierking）等的博物馆情境学习理论提出，观众学习效果受到个人情境、社交情境和环境情境（或译为“物理情境”）三个方面的多种因素影响。^[1]这一理论不仅为评估观众的学习效果提供了思路，也对博物馆的展览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理论应当引起展览策划和阐释人员的注意。乔治·海因（George E. Hein）指出：“博物馆方面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可以更好地组织自己的展览内容，并以此来影响观众的经验。”^[2]事实上，当我们把观众参观看作一种学习过程，展览策划人员所希望的“重点突出”岂不正反映了观众学习效果的增强？因此，借鉴博物馆学习理论提升观众的学习效果，加深观众对展览中重要信息点的印象，是突出展览重要信息点的关键。反之，如果仅在展览策划文本上标出某几个知识点很重要，却不考虑要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三、地方史展览内容策划突出重要信息点的对策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希望结合地方史展览策划的案例，针对展览内容策划提出突出重要信息点的对策和建议。

（一）明确并贯彻展览的传播目的

“‘传播目的’是展览最希望观众了解的重要信息，它扮演着航标的作用，引领着展览始终遵循既定航线行驶。”^[3]博物馆展览需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做引领，采用合适的主题和逻辑结构将一个个分散的展项信息组织起来，便于观众理解。为使重要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不被观众忽略或误解，展览策划有必要事先设定传播目的，通过主题结构与叙事线索的引领帮助观众完成逻辑框架的搭建。

以广大市县级地方博物馆为例，“这些博物馆的使命应该反映这些市县独特的地域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价值，反映这些市县特定的人地关系及人的生存智慧……其陈列展览应展示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人类独特的生产、生活活动及其文化创造”^[4]。因此，这类展览重要信息点的选取应紧扣当地

[1]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Altamira Press, 2000, pp.11-12.

[2] [英] 乔治·E·海因著，李中、隋荷译：《学在博物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年，第 198 页。

[3] 王思怡：《“博物馆学习”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6 年第 4 期。

[4] 陆建松：《博物馆运营应以使命为导向》，《中国博物馆》2020 年第 2 期。

历史文化，尤其关注地方历史发展脉络的节点和转折点，以及当地人地关系、经济、文化方面的亮点和特点。例如，上海市奉贤区博物馆选取奉贤建制沿革、制盐、捕鱼和棉纺织业三大特色产业以及繁荣的水乡市镇文化和历史上的反侵略斗争等作为展览的重要信息点。

展览各部分和单元也应明确传播目的。例如，绩溪博物馆“徽韵绩溪”展厅明确传播目的为“以绩溪境内民宅、宗祠、牌坊遗迹以及技艺传承人为支撑材料，通过功能、工艺和审美三个方面展示徽派三雕的实用、装饰和审美价值”，从而确定了其叙事型展览的定位。徽派三雕主要使用场合和功能是什么，工艺成就主要表现在哪里，具有哪些人文内涵？这几个问题也自然成为该展厅的重要信息点。

以富阳区博物馆展览大纲为例，策展团队提炼的富阳历史文化重要信息点有：山水秀丽，备受文人墨客称誉；历史悠久，自秦代设县两千余年绵延不断；东吴之源，孙氏故里；手工造纸历史悠久，品多质优；鱼米之乡，物产丰饶；徽杭水道，商贸繁荣；崇文重教的耕读文化与众多历史名人；等等。在具体单元中，传播目的更为细化，如“鱼米之乡”单元提炼的传播目的为“本单元通过对富阳在优越自然条件下产生的稻作农业、江河渔业、名优物产、乡土建筑等的展示，旨在告诉观众自古以来富阳就是富足的‘鱼米之乡’”，明确这一单元需要突出农业、渔业、特色物产及乡土建筑四个重要信息点。

（二）吸引观众注意——设计信息组团并重视说明文字的撰写

策展人应当基于对观众注意力的研究来思考如何在展览中将观众的注意力自然导向拟传播的重要信息点上。在内容策划过程中，设计合理的信息组团与使用活跃的说明文字都是调动观众注意力的可行手段。

1. 策划信息组团

“由选择性注意的捆绑理论可知，对共同位置的注意能使被注意特征的激活水平高于未被注意特征的水平，使被注意的特质能捆绑起来，并通达客体贮存在记忆中的表征。”^[1]相较于分散的信息，完整的信息组团更易吸引观众的注意。

如果展览大纲仅仅照搬地方史志中的内容，不管是平铺直叙的“编年史”，还是面面俱到的“教科书”，都不能很好地凸显展览的重要信息点。地方史展览策划需要在消化地方历史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传播目的出发，把握叙事中的节点，构成故事组团。例如，济宁市博物馆在策划基本陈列的过程中并未按照简单的朝代序列或历史发展时期划分章节，而是归纳了济宁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高峰——先秦时期的东夷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文化和明清两朝的大运河文化，并根据这三个“节点”构思展览大纲，设计“东夷腹地”“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等专题，突出重要信息点。又如，海盐县博物馆提炼了海盐县历史上的“五个千年”，即“千年聚落、千年盐都、千年海塘、千年港埠、千年古刹”五个特点，引领基本陈列中“沧海桑田”“缘海而邑”“海上长城”“海上丝路”“文脉渊源”五个单元的内容设计，突出了地方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信息点。

在明确叙事节点的基础上，地方史展览的策划还需要区分各个信息点之间的主次关系，构建重要信息点的层次。这既有助于在逻辑上凸显对应信息的重要程度，也为下一层级重要信息点的编排提供了空间。例如，杭州市富阳区博物馆在基本陈列策划中，考虑到富阳是孙坚、孙权父子的家乡，“孙氏故里”是重要信息点，将展览文本原第二单元“千年古县”下的“三国时期”组团提升为新的第三

[1] 焦丽丹：《论博物馆展示设计的注意控制》，浙江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0页。

单元“东吴之源”，避免“三国时期”组团体量与其他组团不协调的问题，且使观众直观认识到富阳作为孙氏故里的特色。同时，层级从组团上调为单元，意味着其下可以再划分为若干组团，便于展开介绍富阳当地积淀深厚的“孙吴文化”。

2. 重视说明文字的撰写

博物馆内许多说明文字并不能吸引观众驻足阅读，“观众以为这简单的一瞥已经阅读并获得了展品的信息，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他们只是被‘资料定向’了，而并没有记忆下任何东西”^[1]。可见说明文字撰写的要求之高，重要信息点更应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比特古德(Stephen Bitgood)指出：“激发注意力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简单的指示，建议做出一种反应或进行某种活动(例如‘寻找隐藏的动物’)，或提出一个启发性的观点或问题(‘哪种植物是仙人掌?’)。”^[2]这类可以激发观众互动的说明文字被艾利森·格雷(Alison Grey)等学者称为“活跃性文字”——“所谓活跃性文字就是可以激发观众互动的文字，例如向观众提问，或给予他们一项任务……这些文字配合简单的互动设施效果非常好，可以一下子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展览内容上来。”^[3]周婧景基于注意力理论对展览说明文字撰写的分析^[4]和黎婉欣对于展览说明文字的研究梳理^[5]都表明，说明文字的撰写应着眼于激发观众的思考，引导他们互动，从而凸显重要信息点。

将客观陈述的信息转变为“小贴士”式的问答或开放性的问题，有助于激发观众的思考。“以设问或对话的方式引导观众注意力，能够将观众的‘无意注意’变成有目的地寻找答案的‘有意注意’。”^[6]这种方式既可以置于展览(或每个单元)的开头，也可以运用在展项说明甚至各个单元的结尾。例如，乐山大佛博物馆在前言中围绕大佛的建造原因、过程、功用等方面设计了6个问题。又如，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在展览第二单元前的过渡区域设计了5个问题，如“‘火’在人类发展历程上有着关键作用……对于捕获的猎物，跨湖桥先民有着哪些烹饪方法呢?”，这些设问使观众在走入下一单元之前便对重要信息点有所注意。这种思路也可以应用在地方史展览中，如伦敦博物馆的“伦敦大火”展厅中设计了“该责怪谁”和“你想要拯救什么”等与观众互动的问题。

将客观陈述的信息转变为鼓励观众身心参与的文字，有助于引导观众的参与和互动，“‘无意、有意和有意后注意在活动中可互相转化’……而促成上述三者转化的重要动因是观众能否身心参与”^[7]。除依托“反转题板”或更复杂的互动展项外，用说明文字引导观众参与和互动也可以很简单，瑟雷尔(Beverly Serrell)书中提到的一个海洋哺乳动物展览说明牌就是很好的例子——“像鲸鱼发出一样的声音，捏住鼻子，闭上嘴巴，说三次‘哦!’”^[8]，通过生动的说明文字吸引观众模仿和体验，而且无需互动设施。与之类似，地方史展览也可以通过文字引导观众去寻找、模仿和比较来参与和互动。

[1] 张易婷：《博物馆展陈设计与观众注意力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2页。

[2] Stephen Bitgood, *Attention and Value: Keys to Understanding Museum Visitor*, Left Coast Press, 2013, p.122.

[3] [英] 杰克·洛曼、[澳] 凯瑟琳·古德诺著，吴衡译：《博物馆设计：故事、语调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2页。

[4] 周婧景：《注意力机制：试论展览说明文字撰写的理论中介——以美国2016—2018年“展览标签写作卓越奖”作品为例》，《中国博物馆》2019年第4期。

[5] 黎婉欣：《论博物馆展览文字说明的撰写——国际博物馆界对展览文字说明的讨论与启示》，《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1期。

[6] 张易婷：《博物馆展陈设计与观众注意力研究》，山东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2—53页。

[7] 周婧景：《注意力机制：试论展览说明文字撰写的理论中介——以美国2016—2018年“展览标签写作卓越奖”作品为例》，《中国博物馆》2019年第4期。

[8] Beverly Serrell, *Exhibit Labels: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200.

（三）引领观众认知——强化展览的内在线索与逻辑关系

“观众研究表明，若观众了解展览结构，按既定顺序使用，则会花更多时间，收获也更大。”^[1]反之，如果仅以文字说教的方式表现展览的重点亮点，没有组织好展览内容、帮助观众搭建知识框架，观众的学习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并影响到重要信息点的传达。前文述及，博物馆展览是一种以“物”为载体的空间叙事，其结构演绎具有特殊性。博物馆展览需要依托明确的主题、叙事结构和故事线索，将一个个展项的分散信息组织起来，便于观众理解。

为了有效引导观众感知展览的内在线索和逻辑结构，比较常见的做法是精心设计标题文字，使观众直观认识到展览中不同信息的并列或从属关系。同级单元（或组团）标题的字数或语言风格最好具有相似性，而不同层级的标题则宜具有字数或语言风格上的差异，帮助观众形成“自我引导”，更好地把握展览内在线索与逻辑结构。例如，上海历史博物馆“近代上海陈列”的单元标题均为高度凝练的8个字，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基本陈列每个单元的标题为一句古诗，首尔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的第一层级标题均为“某某年代的首尔”，伦敦博物馆基本陈列第一层级标题为“扩张的城市（Expanding City 1666–1850s）”“人民的城市（People’s City 1850s–1940s）”以及“世界城市（World City 1950s–Today）”等，统一的字数或语言风格，有助于观众把握内容层级。

递进、复沓、对比和呼应等手法也可以在展览内在线索和逻辑结构中自然地凸显重要信息点。例如，富阳区博物馆在基本陈列中，将富阳“造纸名乡”“鱼米之乡”的美誉作为展览中拟重点传播的信息，在展览的前言、单元说明和组团说明中反复强调，相关介绍文字从概括变得具体，在递进和呼应的过程中，观众对富阳地区农业、渔业、造纸业的印象不断加深。又如，台州博物馆的民俗展厅运用复沓和对比的手法，其中“山谷之民”“泽国之民”“海滨之民”3个部分都设计了“环境与资源”“劳作”“生活”“祭祀庆典”4个单元，这一设计既在复沓中点明了台州民俗的主要构成，也形成了一种平行的对比，凸显了人地关系对台州民俗多样性起决定作用这一重要信息点。

（四）加深观众印象——情境化提升观众学习效果

福尔克等学者的情境学习理论立足于观众的学习体验，虽然难以直接对接展览内容的策划，但仍有启发意义。其中，与展览内容策划最相关的是影响因素中的“先行组织者”，他如此定义：“心理学家以‘先行组织者’指代关于预期什么的先验知识。”^[2]赵星宇认为，“形式上，‘先行组织者’一般包括展览前言、结语、文字说明、图版、视频等内容”，并且在研究中证实观众对这些内容的参观投入程度与学习效果的强化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3]。由此可见做好展览内容策划，尤其是面向观众阐释内容、吸引并引导观众理解展览内容的重要性。因此，策展人应当留意展览内容与“情境”的关联点。从情境学习理论中学习效果的 influencing factors 来看，展览内容策划需要注重阐释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以强化观众的学习效果。

从观众的知识背景来看，建立重要信息点与观众的关联非常重要。将重点信息的阐释与目标观众的知识、经验和感受相关联，可以建立适合学习的情境，从而激发观众的学习兴趣，增强观众的学习效果。麦考密克桥屋和芝加哥河博物馆的展厅前言提及“在有城市之前，这里是一条河。如果你在350年前站在这里，会被埋在齐膝深的泥里……”其将展览的重要信息与观众的认知相关联，荣获美

[1] 周婧景：《“阐释性展览”：试论当代展览阐释的若干问题》，《东南文化》2019年第6期。

[2] John H. Falk, Lynn D. Dierking,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Altamira Press, 2000, p.117.

[3] 赵星宇：《展览信息传播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第130–131页。

国博物馆联盟 2021 年度卓越说明牌奖项。^[1]又如,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的“英国 V&A 博物馆馆藏吉尔伯特精品展”以人类的收藏行为作为暗线,通过“你为什么收藏?”的设问,启发观众感悟自己生活中的收藏行为,进而引出吉尔伯特的故事和藏品,即是构建相关性的尝试,可供地方史展览借鉴。

从社会文化因素来看,以互动性阐释促进观众之间“团体交流程度”的做法也值得注意。在实践层面,对互动性阐释的理解多从观众参与和探究式学习角度展开,但事实上互动性阐释也为家庭观众和团体观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王思怡对湖州博物馆“吴兴赋”展览的观众研究表明,“用时最长的驻足点为多媒体与互动性设施,而家庭观众在驻足点的时长要多于个体及团体观众”^[2]。这些家庭观众往往以语言交流及教育孩子为主。从情境学习的角度理解,互动性阐释所带来的类似行为有助于营造团体内交流学习的良好情境,深化观众对相关信息的印象。

结 语

综上所述,一个好的博物馆展览应当是重要信息点突出的展览,其目的是服务于观众的体验与学习。在以观众为中心的视角下,突出重要信息点绝不仅仅表现为精品文物的展示、文字的堆砌或新技术的运用,吸引观众注意、引领观众认知并且加深观众参观后的学习效果才是“突出重要信息点”的核心要义。为实现这一目的,地方史展览的内容策划需要明确展览的传播目的,通过重视信息组团组建、说明文字撰写、线索和逻辑关系编排以及学习情境构建等手段,在阐释过程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帮助观众搭建知识框架并加深参观印象。这一过程不仅是形式和空间设计的前置环节,更是基础性的工作。进而言之,展览策划不仅仅是展品的组合与呈现,还是基于博物馆信息传播和观众研究的相关成果、具备鲜明目的性和主题意识的创造性活动。

(责任编辑:吴昌稳)

Planning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Points in Local History Exhib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itors

Lin Yucen

Abstract: The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visitors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exhibitio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centered on the visitors, there exists a problem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points is inadequate in local history exhibition planning in Chinese museums. The reasons include neg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attracting visitor attention, and taking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exhibitions and museum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drafting exhibition outline and texts, important information points can be highlighted by clarifying the communication purpose of the exhibition, attracting visitor's attention, reinforcing internal storyline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exhibition, as well as creating learning context.

Keywords: Local Museums, Exhibition in Histo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Points, Museum Visitors

[1]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Excellence In Exhibition Label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https://www.aam-us.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2021_Label_writing_Competition_FINAL.pdf, 2024.1.28.

[2] 王思怡:《博物馆观众研究的反思与演变——基于实例的观众体验分析》,《中国博物馆》2016年第2期。

CONTENTS

No.1, 2024

Preface.....Xiao Haiming (2)

◎ FEATURE

Discussion o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Lingnan Region.....Zhao Hui (4)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Current Reflection on China's First Batch of Eco-museumsAn Laishun (10)

Several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useum Studies
..... Pan Shouyong (15)

◎ ARCHAEOLOGY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Neolithic Plant Remains from the Guye Site in Gaoming, Guangdong
..... Li Zhao Li Yan Ma Yongchao Ma Zhikun Li Quan Liu Changjiang Cui Yong Yang Xiaoyan (26)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Fisheries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 Yu Chong Li Zijie (35)

Examin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g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Societies through the
Images of Tents Discovered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mbs..... Shi Haocheng (44)

◎ MUSE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Zhu Lin Huang Yang (58)

Research on R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sign Practice of Peking University's Red Building.....Liu Xin (66)

◎ CULTURAL RELICS STUDIES

A Study on the Bronze Swords in Central YunnanDai Cheng (74)

A Study on the Types and Origins of Stone Burial Objec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ng Tao (85)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Relics of Jingtang Iron Stupa in Foshan..... Xu Xiaojing (95)

◎ CULTURAL HERITAGE

Problematizing "Community": Rethinking Community Issues in Heritage Research..... Zhao Huijun (104)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Investigation and Value Evalu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Jiang Zijun (111)

◎ YOUTH FORUM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Online Curating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act"Zhang Shuliang (121)

Planning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Points in Local History Exhib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itors
..... Lin Yucen (128)
